

北印象記

國記者



封面：

「統一戰線舞」

那是紅區裏少女們扮演的舞蹈，紅區每個村莊都由少年男女組成戲劇團體，圖中的陝西少女正在作那有名的「統一戰線舞」，它的意義是動員全中國人民來抗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039B

外 國 記 者 西 北 印 象 記



西 陝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行

口 元 一 價 實 口

1 9 3 7

上 海
图 书 馆
藏 书

這本書是由散見英美報章和雜誌的文章合譯而成，其中包括美國記者施樂 (Edgar Snow) 和韓蔚爾 (Norman Hanwell) 的作品多篇，前者的文章發表在：

China Weekly Review

Daily Herald (London)

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 (U.S.A.)

Evening Post Mercury (Shanghai)

The Sun (New York)

後者的文章則見今年和去年的Asia雜誌，書中所附照片，係由美國雜誌Life, Asia及Daily Herald所翻印者，有的已在國聞週報，東方雜誌和大美晚報轉載，照片所附之說明，亦係根據原註譯成。

譯者序言

二十世紀是科學昌明的時代，人們對於一切問題，都應以科學的方法，客觀的態度，作深刻的研究，輕薄浮淺，人云亦云，不求真理，是自投陷阱，最危險不過的。

例如共產黨問題，在中國發生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它對於整個民族生存關係非常重大，我們政治家乃至全國民衆，曾有多少人下工夫研究過這個問題？

誠然，研究這個問題有種種困難，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它困難，就可不聞不問。要知越是困難，手越見出它的嚴重性，而越應當從事研究。

說共黨好，自然應當去研究，說它壞，也不能「諱病忌醫」以不了了之。過去政府對於談這問題，一味嚴加禁止，這便是為政府本身設想，也不能說是一種聰明的辦法，人是有思想的動物，禁止與制裁，總不能使一個人不用腦子。人們越不如事實，越要幻想。而幻想的夢境，常是比事實富麗美滿。所以近年來在防止「左傾」的法網之下，不知有多少千萬青年，寧願犧牲性命而追求理想。

去年雙十二西安政變，民衆多年來盼望的國內和平統一，賴蔣委員長及西安陝北方面之顧全大局，互相讓步，得以實現。這在中國近代史中，實在有劃時代的意義。

自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一直繼續了十年的內戰。無論雙方理由曲直，或孰勝孰敗，但是這些年所犧牲的無數的生命與財產，對於國家民族總是一種無法彌補的大損失。而國共兩黨所號召的民族解放運動，不但沒有成功，反而使強隣進犯，坐失數省的領土，亡國慘禍，迫在眉睫，言之實堪痛心。

三中全會議決團結禦侮，同時對陝北方面之和平談判亦漸趨具體化。這對於國人，實在是值得額首相慶的事，但對於敵人，却是個極大的打擊，敵人盼望的，是中國永遠分裂，他們慣用以華制華的策略，來分化中國，所以一面勾結地方軍人，來反對中央，一面鼓吹中央，來厲行剿共政策。甚至利用其同防共的口號，來掩護它侵略中國的政策。因此他們對於比次的國共重新團結，不惜用一切手段來破壞，看哪！在偽滿有大批的同胞以思想犯的名自被屠殺了，在冀東以漢奸為領袖的防共政府成立了，在天津他們又製造假共黨機關來釀成恐怖狀態了。這些都表示什麼呢？

正如大公報社論所說「共黨是中國內政問題，」我們絕不要受敵人的欺騙，上了他的大當。也正如大公報社論所說「共黨畢竟為有生命力之鮮血，」以他們從江西到陝北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經驗與鐵的鍛鍊，須來一定可以作抗敵的先鋒，救國的主力。在這高唱團結救亡的時候，對共黨的再認識與再估價，以避免一切的隔膜和誤解，實在是必要的。

美國記者施樂去夏深入西北，訪問紅區，對於紅軍的內政、軍事、外交、經濟的政策與措施，以及日

常生活，都有詳細的報告，散刊歐美各報章雜誌，頗引起世人的注目。又美國經濟專家韓蔚爾氏，入川三月，對於紅軍西進時的情況，亦曾爲文刊諸亞細亞雜誌，譯者認爲這種棺料都是很珍貴的，是政府與民衆不該忽視的，所以特把它譯爲中文介紹出來。譯者從事這種工作，不但無可自矜，而且非常慚愧：爲什麼中國的最大問題，不能由中國人自己來研究，而需要外國人來這樣關心？然而如以本書問世，而引起國人研究的興趣，這畢竟是同人的最大希望，本書付印匆促，謬誤難免，讀者寵而教之，則不僅是譯者的幸事了。

譯者序

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於上海

譯者序言

目錄

譯者序言.....一

毛施會見記.....一

序.....一

外交.....二

論日本帝國主義.....一六

內政問題.....二七

特殊問題.....四九

論聯合戰線.....五五

共黨與西北.....六三

紅旗下的中國.....一〇一

尋找紅色中國.....一〇一

到『西邊的安樂鄉』——西安.....	一〇七
到紅區去.....	一一四
被『白色土匪』追逐.....	一二三
叛亂者.....	一三二
紅色伴侶們.....	一四二
毛澤東——蘇維埃的台柱.....	一五三
紅軍大學.....	一六二
紅色劇社.....	一七一
和紅區農民談話.....	一七九
西北的紅星.....	一八六
蘇維埃的工廠.....	一九五
彭德懷論游擊戰術.....	二〇五
中國紅軍.....	二一七

中國紅軍怎樣建立蘇區	二三一
在中國紅區裏	二四五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二五五
附錄：隨軍西行見聞錄	二七一
照片十九幅	
補白：歌十首	

目

錄

四



毛澤東——蘇維埃的巨人

他是紅黨的最高領袖，一九三四年被舉為蘇維埃主席。

毛氏在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一貧家，其經歷與性格頗類似林肯，最初在農家當雇工，因奮鬥的結果，得在長沙師範讀書，後入北京大學，與李大釗相識，參加國民革命，為當時國民黨中委，國共分家後，遂轉戰華南各省，從事擴大蘇區運動，其為人寬大，誠懇，頗富民主精神及對弱者之同情心，毛氏自奉甚簡，衣食住皆與士兵同，曾懸賞廿五萬圓捉之，他此次領導了有名的長征，可見其軍事天才殊不下於其政治經驗也。



一九三一年之蘇區中央委員

○壽國張及自秋瞿為疑，明不者二後，德朱，發鄧，克蕭，東澤毛，蓄稼王；左往右由
，金瑞都赤，七，一十，一三九一攝照此

○ 這是徐海東率領紅二十五軍在一
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佔甘肅南部兩黨縣
時所照的，徐海東坐在前排的正中間

徐海東與紅二十五 軍幹部



毛施會見記

美國施樂

序

一九三六年七月初旬，我到了中國西北部的蘇區，目的在求會見那里的共黨領袖，藉以考察蘇區的政治和軍事制度。蘇區現在包括陝北及甘肅的大部，西蘭公路以北，黃河以東，長城以南乃至寧夏的大部也都在內，此外還有小部共黨散佈在陝甘南部，山西極西北部以及江西、福建、貴州、四川等處。

現在的蘇區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廣大。他們各部分的紅軍領袖都能聯合在一個集中的區域，這是共黨歷史的新紀錄。朱德，彭德懷，蕭克，羅炳輝，張國燾，徐向前，徐海東，賀龍，林彪，陳昌浩，毛澤東，以及周恩來等都集中在西北。

我留在中國的蘇區，差不多有四個月。在那期間，我旅行於所有陝甘甯夏的蘇區，並且我費了一個月的工夫，追隨在紅軍的前方。陝北的保安是當時紅軍的臨時首都，我在那裏會見了許多紅軍領袖，毛澤東是中國蘇維埃政府的主席，並且也是一個紅軍司令，我與他會見的時候，總是在晚間每次

談話往往繼續到翌晨兩點鐘，毛氏休息的很晚，他常在日落後至午夜來處理最重要的工作，這種習慣可以說是他當年從事於新聞事業養成的。我們的談話太長了，並且涉及的範圍也太廣了，這裏真是不能完全復述的，但是下邊問答式的摘要，不僅特別有關於中國的發展，也實在是關於整個世界的發展。

我與毛氏關於蘇維埃政策的談話，是由在保安蘇區服務的青年吳梁萍作翻譯，毛澤東對我的解答，我完全用英文記下來，這種記錄又翻成中文，經毛氏的校閱，他對極細的節目，都力求其正確。因此，我相信下面的記載總可無大錯誤。

說來很有意思，並且很值得注意，幫我在蘇區搜集材料的吳梁萍君，乃是奉化一個有錢的地主的兒子，而奉化這地方却又是蔣介石的故鄉。他的父親是很有野心的，本打算叫他與總司令發生姻婭關係，因此他就在幾年前跑了出來和吳君在大夏大學畢業以後，曾經留學英法及蘇聯。他是二十六歲，現在在蘇區努力工作，所得的代價不過單純的衣食住而已。食的一項簡直只是粗糙的。

外交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在陝北保安

施問蘇維埃政府對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政策是甚麼？

毛答：在討論政策問題以前，我必須請你永遠認清中國人民當前最大的問題便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是針對這種鬥爭而產生的，日本軍閥企圖征服整個的中國，把全中國人民都作成他們殖民地的奴隸，所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粉碎日本經濟的和軍事，的征服，是分晰蘇維埃政府外交政策的兩個基本課題。

日本的侵略不僅威脅了中國的和平，而且威脅了世界的和平，尤其是太平洋上的和平。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敵人，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特別是英、美、法、蘇等在太平洋上有利害關係的國家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不祇直接威脅中國，而且直接威脅了上述的國家。

所以，日本侵略的問題不僅是中國一國的問題，而且是一切在太平洋有利害關係的國家，整個待決的問題。因此，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國人民，希望聯合所有國家，民族，各黨各派，以及民衆組織，成立聯合戰線，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那麼，我們對列強的希冀是甚麼呢？在消極方面我們希望一切友邦至少不援助日本帝國主義，而採取中立態度，在積極方面，我們希望他們能援助中國，抵抗侵略和征服。

問：蘇維埃政府對友邦和帝國主義者如何區別？

答：關於帝國主義問題我們的觀察是這樣，在主要的列強中有些國家已表現決不願參加新的世界大戰，也有些國家已經表示，決不能坐視日本佔領全部中國。這些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荷蘭以及比利時等等。此外還有一些永遠在侵略者蹂躪下的弱小民族，自治領、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等等如暹羅、印度、澳大利亞、荷屬印度等，這些差不多全在日本侵略的威脅之下，我們承認他們是我們的友軍，我們希望與他們合作，至於蘇聯，她一向是主張和平的，她是反對征服和剝削任何民族的，這當然是我們的良友。

所以，除了日本帝國主義以及一切援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以外，其他一切國家（反戰的國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以及社會主義的蘇聯）可以組成一個反侵略、反戰爭，以及反法西斯蒂的世界同盟。

上述任何等級的國家，祇要她希望加入這種普遍的戰線，無論他們對於這種戰線供獻如何，對侵略者制裁的實力怎樣，都是受我們歡迎的友邦。

在過去南京政府曾受到美國、英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許多援助，可惜這些資金和援助都用了內戰了，這種內戰不僅是壓迫紅軍而且摧殘中國無數民衆，因南京政府在殺掉一個紅軍以前，要犧牲

許多無辜的農民和工人，依著名銀行家章乃器先生最近的估計，中國人民對南京政府殺掉一個紅軍的担負是八萬元，所以這種「援助」在我們看來，並不是真正的援助了中國人民。

祇有在南京政府決心抗日，確實和人民革命組織聯合起來，組成抗日的民主政府，這種援助對中華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在這種情形之下，外國的援助可採用兩種辦法：（一）對中國抗日實力貸與現款並售給軍火飛機；（二）在中國對日本實際開戰以後實行有效的封鎖，假如英美兩國肯這樣援助中國的話，那麼中國人民對英美人民的同情與友誼一定會堅強的樹立起來。

問：蘇維埃政府是否承認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對外締結的條約，假如承認的話能承認的是那些條約？

答：日本事實上已經破壞了一切條約，他們軍事的佔領了全部滿洲，武裝的保護華北走私，以及其他一切非法的行動，事實上把一切條約都逐漸的毀壞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切列強在滿洲的條約利益，完全毀滅，一般通商和國際貿易完全被日本襲斷了。所以一切國家打算與中國保持和平的商業關係，必須制止日本的強盜行爲，因爲現在在中國本部其他國家保留的商業利益，也已經遭受日本的威脅了。

其他國家也許這樣問我們：「你們對於以前中國政府跟我們締結的條約，持何種態度呢？」

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很明顯的，我們要估計，修約問題要緊呢，還是救國問題要緊，當然擺在我們面前的，祇有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蘇維埃政府和整個人民，要集中我們主要的力量來完成這種工作。

問題在這裏，假如蘇維埃政府打败了日本帝國主義，收回中國失掉的省份，恢復了中國的主權以後，我們對於領事裁判權問題是怎樣？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答覆是這樣，假如到那個時候，中國有了一個人民的政府，而蘇維埃祇是那個政府的一部，我們對列強的政策，是根據他們在中國對外抗戰時期的態度如何而定，對那些援助或不反對中華民族進行獨立戰爭的國家，我們一定和他們建立親密的友誼關係和互惠，至於那些實際援助日本的國家，當然不能取得同樣的待遇；譬如德國，它已經和偽滿發生密切關係，而且最近還與日本成立了防共協定，我們當然不許他在中國享有友誼的利益。

當中國真正取得獨立以後，一切外國對華的商業利益將享受空前未有的機會，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生產力和消費力，並不是要剷除一切外人的利益，而是要和許多國家發生關係的，我們這幾萬萬人民一旦獲得真正的解放，用他們耐苦而偉大的生產力，自由的在各種部門上創造改革，一定會改善世界的經濟生活乃至文化水準，可是在過去，中國人民這種偉大的生產力，完全湮沒了，

相反的，他們內受本國軍閥壓迫，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

當我們取得獨立以後，我們一定和許多友邦談判，互助，互利的相互協定，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祇有一個方法，那就是武力的抵抗，但對其他國家，我們準備進行廣義的合作，並且完全站在互相尊重的立場上。至於日本，我們祇能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手段，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財產，剷除日本在華的一切特權，租界及政治勢力。其中包括中國人民一致反對的「何梅協定」，「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以及「防共協定」等等。

論到對待其他列強，我們共產黨在對日抗戰的過程中，所採的手段，決不絲毫影響中國的國際地位。

問：你們的政府是否承認外人在華的財產，那就是說是否歡迎外人投資？假如不能全部承認，而要承認的是那一類投資？而且在何種條件下，外商可以在華營業？

答：蘇維埃政府是歡迎外國投資的，在過去中國政府不能利用外資，謀人民真正的福利，一切外資對民衆沒有絲毫的補益，祇有在中國獲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以後，才能盡量的吸取大量的外資，來發展大規模的生產事業，也祇有一個真正自由的中國，才能利用這種切要的外資。

合法的外國投資，我們是承認的，我們要接受一切合法的外資來完成我們建設的計劃，我們堅

決反對一切政治借款，或者用以製造內戰進攻紅軍的借款，以及一切不爲中國大衆謀福利的借款，我們承認一切建築鐵路，電話，無線電，航空，以及發展農工業與賑災的借款。

問：蘇維埃政府對於（一）外國政治權利，（二）外國投資二者的政策與國民黨政策的基本區別在那裏？

答：國民黨利用外資主要的目的是從事軍閥的混戰，或者進攻紅軍，或者出在一些愚笨的行動上，並且他們一向對外借款總是損失了無限的主權。假如，一個人民政府成立以後，一切外國借款或投資，祇能用在發展中國人民經濟生活的基本生產上：特別是用在建設基本的重工業，介紹科學的農業方法，以及組織全國規模的農業改良上。和南京的政策相反，我們否認一切足以影響中國獨立主權的外國投資。

問：蘇維埃政府對於在華教會的財產權是否承認，是否允許他們繼續傳教，佔有土地，創立學校，或辦理其他企業？

答：是允許的，但是日本的傳教士，不在此限。

問：現在蘇維埃政府對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的希望是甚麼？他們怎樣作才算真正的援助中國？

答：根據我們的看法，美國人民以及美國政府，對中國的眼光一向是比較遠大的，同時客觀環境

也決定了他們在中日糾紛中佔有主要的地位；我們希望她仍然繼續過去的遠大的眼光，同時更進一步與中國人民組織聯合戰線，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它所代表的法西斯蒂戰線，這是美國人民及其政府在現在時對中國人民應當而且能夠幫忙的。許多美國人民已經自動的組織了許多團體，如中國人民之友社，太平洋國交討論會，汎太平洋協會，中國學社等等，都表現他們對中國的愛護，並且宣示了他們對中國全體人民的同情，我們願意代表中國人民對中國人民之友社等團體特別致敬，感謝他們對我們親切的同情與援助。

可是在美國也有許多近視眼的政客，他們認為日本征服了中國，與他們無關，我們共產黨認為這是少數美國人的錯誤觀念，因為美國在遠東以及太平洋上的利益，祇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才有保障，那一部份美國人是主張孤立政策的，可是歷史的啓示非常明顯，我們相信美國將來必得放棄孤立政策，而且迅速覺醒它在遠東的責任，來打倒直接威脅他們理想以及利益的日本帝國主義。

問：現在蘇維埃政府對英國政府和美國人民的希望是甚麼。他們應該怎樣作才算真正的援助了中國？

答：我們對英國人民的態度，差不多和對美國人民一樣，在英國人民中也有類似中國人民之友社的組織。我們敬愛而且歡迎這樣的英國朋友，繼續的同情中國大衆。

一部份英國政治家，十分明顯的，在過去採了一種錯誤政策，日本的進佔中國領土，英國政策縱未嘗予以鼓勵，但亦實促其可能。英國政府最近似乎也願意採取一種新的策略，可是他們又彷彿缺乏勇氣以使之見諸實行。假如英國政府依舊在徊徨，並且採取過去那樣消極的政策，企圖和日本合作，那與英國是沒絲毫利益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是人所共見的，它對英國也不過表面是友誼的面孔，而內中是陰謀破壞的。

問：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對少數民族如蒙族，回族，藏族，滿族，蠻族，黎族以及其他各族的獨立自治的規定如何？

答：我們對這種問題的政策與國民黨是恰恰相反的，南京政府的政策是「大漢族主義」我們的政策是種族平等，民族自決。各少數民族可以和漢族聯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但是漢人決不能用武力去打他們。我們反對「大漢族主義」也正如我們反對標榜「大亞細亞主義」的「大日本主義」一樣，這是我們對於滿，回，藏，苗，蠻等少數民族的辦法。

在甘肅，寧夏的回族已經組成了他們自治的政府，蘇維埃政府不但不干涉他們正當的民族精神，相反的，還盡力的鼓勵他們，這正與南京政府的企圖征服一切少數民族，依附在獨裁政治之下的政策完全相反。

我們贊成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少數民族政策以及蘇聯已經實行的少數民族政策。我們反對日本對朝鮮、台灣、琉球的少數民族政策，我們也反對國民黨對於滿蒙回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政策，因為在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上，國民黨與日本是無何區別的。

在蘇維埃政府之下，這些少數民族享受他們獨立的文化、經濟、政治以及社會的發展，同時並給他們充分的機會，使他們實現一種生產的、有意義的生活，他們決不會受到中國紅軍的絲毫壓迫。

問：許多中國人民在法西斯蒂的宣傳下，以為假如中國蘇維埃化以後，那中國的蘇維埃政府一定要受蘇聯的支配，而中國的內政外交也一定要在莫斯科的統治之下，一部份知識份子也顯然相信德國、意大利、日本以及南京政府這種宣傳，以為中國紅軍苦戰十年的目的是在推翻中國，歸服蘇聯，而成爲「赤色帝國主義」的一部。

答：法西斯蒂宣傳的虛偽，乃是有目共覩的。比如在莫索里尼遠征阿比西尼亞以前，他大聲疾呼的說，是到非洲傳播文化使非洲人民獲得自由，希特勒在歐洲發動侵略以前，他向德國人民宣示：「光榮勝於面包。」他向歐洲人民表示他是一個和平的愛護者。同樣，日本軍閥在侵略滿洲的時候，也聲言是解放中國人民，替中國人民創造王道樂土，而當西班牙的法西斯黨徒雇用非洲的、意大利的和德國的法西斯軍隊去屠殺他們自己的同胞，摧毀自己的城市，顛覆自己的民主政府的時候，他們

在成千成萬的新的屍首之上，擱上一塊招牌——「盡忠報國」

方才你說，現在法西斯蒂宣傳，「莫斯科將統治中國」假如那些真是事實的話，那麼由地球到火星建築鐵路，從韋爾士先生處買票，也是事實了！

雖然法西斯蒂的宣傳，十分愚笨，但是至少也要有人受其欺騙。所以，我們必須指出他們的基本弱點，譬如現在中國極需要和蘇聯成立互助協定，可是法西斯蒂們就大造其謠，說蘇聯又要收買中國了。假如這是事實的話，那麼法國和其他許多和蘇聯有互不侵犯協定的國家，都是莫斯科的殖民地了。

有一個問題，是法西斯蒂們不能答覆的，就是「莫斯科的莫斯科是在那裏？」在他們的宣傳中，認為每個將要有成功的革命的國家，都是在莫斯科統治之下。可是俄國革命是在受誰的統治呢？莫斯科的莫斯科是誰呢？俄國人民自從革命以後就是自治的，爲甚麼中國人民不能那樣？假如法西斯蒂的邏輯是正確的，那祇有歷史是錯誤的。每個國家革命成功以後，都有它本身的莫斯科。

事實在這裏，法西斯蒂們用這種邏輯是在暴露他們想統轄世界的企圖，正如日本在滿洲和華北的行動，以及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行動，在他們的頭腦中，根本就想不到除了一個民族奴役另一個民族之外，還有其他相互提攜的基礎，我們所看到希特拉在中歐的舉動，日本在東亞的舉動，以

及意大利在非洲的舉動，每一椿事不祇是充分的表現了法西斯蒂的威脅，而且是「法西斯統治」鐵的證據，可是我們找遍世界也看不見「莫斯科的統治」。

但是，在中國革命成功以後，歷史的發展，將有另樣的形態，中國人民要認俄國人民爲他們真正的朋友，也正如中國人民歡迎其他國家的自由民衆爲真正的朋友一樣，不但蘇聯人民我們要聯合，就是其他一切以平等對待我們的民族，我們都要和它取得友好關係，共同聯合起來，打倒企圖阻止歷史進步的法西斯蒂國家。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大聲疾呼：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都是共產黨，但是在中國除了少數漢奸以外，差不多一致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樣在中國人民看來，如果共產主義的意義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爲共產主義而鬥爭，就是爲民族解放而鬥爭，那麼以後大多數中國人民對這樣的共產主義，還有甚麼可怕的，而所謂「赤色恐怖」也不過是在少數漢奸們的夢魘之中罷了。是的，在中國整個民族中，這種共產主義的急切需要，正如飢餓的人，需要食糧的一樣孔急。

假如你認爲共產主義對中國人民是一種恐怖，那你最好去請教一位日本軍官，聽聽他的意見，他一定告訴你，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意義，是一個擁護國家自由完整爭取民族解放的運動，在這裏你可以明瞭，爲甚麼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定要和南京政府成立協定的打擊他，可是話又說回來，假如共

產主義是那種意義，那正是我們中國人民們切要的。中國人民不但怕這種運動，而且是他們急切要求的。他們一定高呼，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國主權完整萬歲！

斯塔林先生對一位美國記者的談話中曾說過：「革命是不能輸出的，」同樣的，「革命也決不能輸入的，」爲了要活命，用最大的努力，最好的方法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自然的出路。我們無論在共產國際的決議中或者蘇聯的憲法中，決找不到任何統治中華蘇維埃的計劃，同時這種事體，在共產主義的歷史中也從來沒有談到，但是，我們不必遠瞧，祇看我們近隣の日本，那裏早已預備好法西斯統治中國的計劃了。

我們從歷史的事實中，知道蘇聯的眞誠而平等的精神，援助一切被壓迫的民族，我們更知道她對任何國家，沒有侵佔寸土的野心。

問：中國蘇維埃人民政府計劃與外國成立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聯盟，是否欲與民主的資本主義列強成立此項同盟？

答：反法西斯同盟的本質，就是和平同盟，也就是反戰爭的攻守同盟。假如中蘇成立協定，那一定因爲法西斯蒂的日本，不但是中國的敵人，也是蘇聯的敵人。法蘇互助公約是建在互保和平的基礎上，同樣我們相信在太平洋沿岸的各國也可以成立互保和平的反日公約。

中國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成立反法西斯的公約，是十分可能而且是有望的。這些國家爲了自衛的緣故，有組成反法西斯戰線的必要。

擺在列強前面的，祇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叫中國完全殖民地化，還是使它抵抗侵略者的魔手來變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後者的情形下，外國對華的合作將空前的增大，因爲假如中國人民成爲一個獨立的民族，有了獨立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組織，這樣一個獨立自由中國，對全世界將有偉大的供獻。同時也一定站在正義的陣線，推動世界的文化。這樣的一個中國，對一切外國的帮助也一定很大。

但是，假如中國全部殖民地化；則未來的太平洋將成永久的黑暗，不但中國的獨立破壞了，而且所有太平洋沿岸國家的文化也將同歸於盡，一個兇殘而恐怖的大戰，將無情的繼續下去。

這裏的選擇是不容遲緩的，我們中華民族爲了我們本身的解放，祇有採取鬥爭的手段，來打倒壓迫我們的敵人，同時，我們希望世界各國的政治家，也和我們一同的走上這條鬥爭的路子，不要邁入帝國主義擺佈的血腥的歷史之黑暗道路。

所以，在這種基礎上，你一定會聽我們中華蘇維埃的人民，高呼「一切民族聯合起來！反抗日本法西斯蒂主義的侵略與壓迫！」

同時我們深信，這種聯合一定會實現的，因為我們找不出使太平洋上愛好和平互惠的文明國家不接受這種建議的理由。

論日本帝國主義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在保安。

施問：如果日本軍國主義戰敗，被驅逐出中國，你是否認為帝國主義的大問題。在這裏大致將行解決了呢？

毛答：是的，如果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不採取像日本的行動，如果中國戰勝了日本，這將表示中國羣衆已經覺悟，已經動員，已經建樹起來他的獨立國家，所以帝國主義問題就會解決了。

問：中國蘇維埃政府，曾發出許多申請書，許多宣言，要求成立各黨各派各軍隊等等的聯合戰線，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戰，驅逐日本軍隊出中國。這是否相信中國現在能夠自己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也就是說，不必用任何外力的幫助呢？

答：在這裏你最好先認清中國和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國家，遠東的戰爭與和平問題乃是世界問題。日本有她潛伏着的同盟國——德國和意大利——爲求抗日成功，中國也必須求外力的幫助。不

過這並不是說，沒有外力的幫助，中國就不能和日本作戰，這並不是說在我們開始抗日以前必須期待外邊的同盟國。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潛藏着未用的實力很多，在大的鬥爭期間，經過組織，能夠構成很大的反抗戰線，由一九二七反革命爆發的長期內戰之中，中國人民，經過共產黨的鬥爭，已經知道這種實力，並曉得怎樣運用它。中國羣衆，有長期的政治經驗，已經能夠運用最有力的武器，反抗他們的敵人。現在，特別自九一八以後，漢奸的詐術已經宣告破產，今日很少人會被它欺騙，羣衆們日漸認清了。誰是爲他們的真正利益領導他們，在抗日運動之中，甚至於一些國民黨員都已經參加或要求參加了。

我們深信中國人民絕不投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相信他們要動員他們最大的潛伏實力到戰場上去抗日，用他們最後的力量，應付侵略者的挑戰，在這種鬥爭之中，最後的勝利一定是中國的，如果中國單獨抗戰，自然犧牲要比較的大，戰期要比較的長，因爲日本是一個配備很好的強大國家，此外她還有同盟國。爲在可能的最短期間，最小的損失中，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最要緊的，第一必須在國內實現聯合戰線，第二必須將它擴大，到一切與太平洋和平利害相關的國家。

問：在什麼條件下中國人民能夠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

答：要有三個條件保障我們成功的：第一是全國抗日聯合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全世界抗日聯合戰線的完成，第三是現在受日本帝國主義蹂躪的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三個條件之中，但中心的還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大聯合。

問：你想這樣戰爭要延長多久呢？

答：這要看中國抗日戰線的實力及中日兩國許多決定勝負的其他因素如何，而國際間所給中國的協助與日本國內的革命發展也很有關係。如果中國的抗日戰線強而有力的平均發展起來，如果能橫的方面縱的方面有效的組織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牠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能給中國相當的國際間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來的很快，則這次戰爭自然會很快的結束，迅速的收到勝利。如果這些條件沒有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不過結果還是一樣，日本是必敗的，只是犧牲要很大，而成爲全世界的一個很痛苦的時期。中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紅軍和中國人民準備和任何國家聯合起來，去努力縮短這次戰爭的時間，不過就是如果沒有人和我們合作，我們也決定了自己幹。（遠在一九三二年，共產黨已由江西發出宣言，要求與南京政府合作，組成抗日聯合戰線，對日宣戰

——施樂）

問：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你以爲這樣一個戰爭的前途開展如何？

答這裏包括兩個問題——列強的政策和中國軍事的策略

現在日本的大陸政策是已經確定了，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想着以爲如果同日本進行經濟政治或領土的妥協與退讓，再犧牲一些中國的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一幫人們，只是陷入烏託邦的幻想罷了。過去南京政府就採取了這種錯誤的政策，其結果如何，只要我們翻開東亞的地圖便夠了。

不過我們確切的知道，不僅華北，就是楊子江下游和我們的南方各港都已經包括在日本的大陸政策計劃以內。再者，這也是很顯然的，日本海軍想要封鎖中國海面而攫取菲律賓、暹羅、安南、馬來與荷屬東印度羣島，戰爭一發，日本將以上述各地作她的軍事根據地，把英、法、美和中國截開，而來獨占南太平洋各海，這種行動都包括在日本海軍策略的計劃中。這種海軍策略，我們會看過幾本。它和日本的陸軍策略，將要互相配合而行的。

在這樣的時期，中國自然要陷入極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民相信，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只有在中國各商埠的富人是戰敗論者。他們害怕要損失他們的財產。

所以當中國考慮到經濟、資源、戰時、資料供給種種問題，乃至日本海軍封鎖、停止貿易等等問題的時候，必不可避免的要列強來解答，如果准許日本孤立中國，像它使滿洲孤立的一樣容易，如果

強持着爲滿洲事變時一樣的態度，這時候日本的困難自然縮小了。

按照理想，我們的軍事策略，要採用「內線戰」的策略。如果英法蘇諸國抵制日本的封鎖，他們彼此就要佈置「外線戰」的策略。這時候中國必須向日本帝國主義的心腹作戰，同時其他各國則由外面四方對抗她。在這樣的局勢下，包圍和粉碎日本帝國主義戰爭機構的可能性，必將在很短的期間就實現了。

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岸要塞被日本佔領，完成封鎖，則中國必然不能繼續作戰。這純粹是廢話。爲反駁它，我們不妨參考紅軍的歷史，有一些時期國民黨的軍力超過我們的兵力十倍或二十倍，武裝方面，他們也比我們精良。他們的經濟來源也超過我們的若干倍，並且他們從國外還得到原料的幫助，試問爲什麼當時紅軍還步步戰勝白軍，不但未被消滅，並且直到今天仍然繼續增加它的力量呢！

解釋是這樣的：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在蘇區所有的人民之中建立起來，就和磐石一般的穩定，因爲每個人在蘇區裏面，都準備爲他們的政府作戰，反抗他們的壓迫者，因爲每個人都自動的有意識的，爲他自己的利益和他所信仰的正義作戰。再者，在蘇維埃的鬥爭中，所有人民，都由精明強幹，富有決心，深切了解他們處境中的種種經濟政治，軍事策略的人們領導着。紅軍得到了許多勝利——起

始也不過是在一些有決心的革命者手中有幾十支槍——因為她在民衆之中有穩定基礎，從人民和軍隊裏，甚至於從白軍裏吸收了許多朋友。在軍事上敵人力量無限的超過我們，可是在政治上，敵人却沒有動員。

在抗日戰爭之中，中國人民所佔的優勢，要比紅軍和國民黨從事鬥爭時所佔的更大。中國是一個很龐大的國家，除非中國每寸領土都已經在侵略者的刀鋒之下，不然便不能說是被征服了。就是日本能佔領中國的一大部，取得佔有一萬萬或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我們仍然剩很大的力量和日本軍閥作戰，而他們在整個戰爭中，得時時在後方作防禦戰。

至於軍火，則日本不能奪取我們在內地是供中國軍隊若干年用的火藥庫，他們更不能阻止我們從他們的手裏奪取大宗武器，紅軍時常用這種方法，從國民黨方面武裝他們現在的兵力，他們作我們的「軍都接濟者」已經有九年的工夫了。如果全體中國民衆，聯合抗日，爲我們搶軍火，採用這種戰術的可能性，必然要無限的擴大啊！

自然在經濟上中國沒有統一。不過中國經濟不平衡的發展，在戰爭中，比日本的高度中央化集中化的經濟，反爲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各地斷絕，對於中國的損失，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各部斷絕時損失的嚴重。再者日本使整個中國孤立是不可能的。日本就大陸說還是一個海軍國

中國的西北、西南及西部是不能遭日本封鎖的。

所以這問題的中心點還是全體中國人民的聯合起來，動員起來，樹立舉國聯合陣線，這是自一九三二以後，共產黨時時提出來的。

問：一旦中日戰爭，你想日本要有革命麼？

答：日本革命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革命是不能避免，日本軍隊受了第一次嚴重的挫折之後，很快就開始爆發的。

問：你想蘇俄和外蒙必要參加這次戰爭麼，要幫忙中國麼？在什麼情形之下會這樣呢？

答：蘇聯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國家，自然不能置遠東的事情於不顧，不能再行緘默，她還是漠然的靜觀日本征服全中國，樹立起它來，成爲進攻蘇俄聯邦的根據地呢？還是要幫忙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建立起獨立國家，和俄國人民樹起友誼關係呢？我想俄國要選擇後者的辦法。

我們相信，一旦中國民衆，樹立起來他們自己的政府，起始作這樣的抗日戰爭，和蘇聯及其他友邦樹立友誼的同盟，則蘇聯一定會首先和我們握手，抵抗日本的鬥爭，是全世界的事情，蘇聯是世界的一部，英美不能保守中立，蘇聯自然更不能夠！

問：中國民衆當前的急務，是要收復所有丟給日本帝國主義的領土呢，還是驅逐日本出華北，收

復長城以內的中國領土爲止呢？

答：中國民衆當前的急務，是要收復所有我們的失地，不僅是保守城以內的主權，而是需要收復東北，可是我們並不包括先前中國的殖民地高麗，不過當我們收復中國失地主權之後，如果高麗民衆願意解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枷鎖，我們將熱心的幫助他們，作獨立鬥爭。對台灣也是如此。

至於對漢蒙雜居的內蒙，我們而努力驅逐日本出境，幫助內蒙成立自治政府。

問：設若中日戰爭展開到很長的時期，日本沒有完全戰敗，共產黨政府能否同意講和，承認日本統制東北？

答：這是不可能！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樣，不准日本留下中國的寸地尺土！

問：實際施行的時候，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在抗日戰爭中，怎樣能夠和國民黨軍隊合作呢？這就是說，在對外作戰時，必須將所有中國的軍隊，放在一個統一的指揮之下。如果允許紅軍參加最高軍事委員會，紅軍能否同意政治軍事雙方都從它的決議案呢？

答：自然，如果這個委員會能夠真正抗日，我們政府將很熱誠的服從它的決議案。

問：紅軍是否同意，除非最高軍事委員會同意或授命，不擅自移入或侵入任何國民黨軍隊駐區？
答：當然我們不會移動我們的軍隊到任何抗日軍隊駐區，我們從來也並沒有這樣作過。紅軍絕

不用機會主義者的方法，利用戰時的局勢。

問：這樣的合作，共產黨要提出什麼條件呢？

答：共產黨要求對日本的侵略，作最後決心的抗戰。此外共產黨爲求實行以上各點，進而提出樹立民主共和國與國防政府。

問：從事抗日戰爭，紅軍需要多大的根據地，需要多少的外來接濟呢？

問：無論根據地大小，紅軍都能作戰，不過根據地大一些，則所能動員抗日的實力自然大一些，強一些。如果我們有三四省的地方，我們能號召比南京全部軍隊還大，還有效率的抗日軍。至於援助我們很需要，愈多愈好，不過沒有外力援助，我們仍然能夠自行作戰。沒有任何人的幫助，在過去的十年革命鬥爭中，我們已經作戰過。我們時時的準備戰爭。當我們進入山西，走向華北日本陣地，我們就準備戰爭。這時候我們再沒有得到任何外面的援助，並且相反，我們受閻錫山和蔣介石聯軍的反對，就是蔣介石在我們東進的路上，集中了他的十個最精銳的師，這種行動對於我們前進抗日，予以很大的防礙。

這時候爲避免無益的閻牆內戰，防止更行削弱中國抗戰的實力，我們並不和這些軍隊作戰，而自動撤回我們陝西的根據地，以求商議和約，實現聯合陣線。從此以後我們加緊我們的抗日準備。我

們已經準備好了！我們相信戰爭起始愈早，中國成功的機會愈多。任何時候只要我們的軍隊跟日本的在華軍隊相遇，我們就對她作戰。

問：最好怎樣武裝民衆，組織民衆，練訓民衆，來參加這個戰爭呢！

答：民衆必須有權組織他們自己，武裝他們自己。在過去蔣介石曾拒絕他們有這種自由。不過這種壓迫並未會完全成功——例如紅軍一事。再者，在北平上海和其他各地雖有嚴重的鎮壓，學生仍然開始組織他們自己，並在政治上已經準備好自己。可是學生和革命的抗日羣衆，現在還沒有得到自由，不能動員，不能訓練，不能武裝。當和此相反的情形能實現的時候，當羣衆得到經濟社會政治種種自由的時候，他們的力量要增加百倍，民族的真正力量將要顯露出來。

由於它自己的鬥爭，紅軍從軍閥取得了它的自由，成了一種不可克服的勢力。用同樣的方法，抗日義勇軍由日本侵略者獲得了他們的行動自由，武裝起來他們自己。如果中國民衆受了訓練武裝和組織起來，同樣他們也要成爲所向無敵的勢力。

問：照你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是什麼呢？

答：這種戰略，必定是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線上作戰！這種戰略，全靠於艱險的戰場上，高速度行軍的成功，進退的迅速及集散的敏捷。這次戰爭是要大規模的遊擊戰略，而不是深溝壁壘，層層防線。

專恃堅固防禦工事的陣地戰，我們的戰略戰術得和發生戰爭的戰場配合起來，這就是規定了爲一種游擊戰爭。

這並不是放棄重要軍事地點的意思，這些地點，只要得利，就盡量用陣地戰來防守，不過轉換全局的戰略必然是游擊戰，對壘戰雖亦必需，但祇是屬於補助性質的第二種戰略罷了。

在地理上，戰場這樣的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游擊戰爭是可能的，並且日本遇到猛烈的後方活動，必得謹慎，她的戰爭機構，行動很慢，效率有限。深溝高壘，集中火力，在一個狹小戰線上爲一個兩重要地點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們徒然失掉了在地理上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了阿比西尼亞的錯誤，在戰爭的前期，我們的戰術和戰略必要躲避一切大的決戰，要漸次破壞敵人主力的精神，戰鬥力和軍事效率。

阿比西尼亞的錯誤，並非是他們內部政治的衰弱，而是因爲他們要保持密集隊形，叫法西斯來轟炸，放毒瓦斯，用精良器械來攻擊，致使他們密集的重兵，行動不靈，受了致命的傷害。

我們除了調動有訓練的中國軍隊之外，在農民之中，要政治的軍事的武裝大多數的游擊隊，在東北抗日義勇軍所完成的工作，僅僅是表示了全中國革命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實力的一小部分，如果指揮組織得當，這種游擊隊能使日本人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疲於奔命。

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本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民包圍，日本軍要被逼得運來他們一切的軍需品，而且要自己來看守，並需用重兵來保護所有的交通線，另外還要有
一大部人去駐紮滿洲同日本內地。

在戰爭過程中，我國能夠獲得許多日本的俘虜，奪取大量的武器彈藥和戰爭機械等物。因此，抗日軍隊的機械設備將逐漸改進，同時由外國的幫助而更行加強，因得從事於陣地戰，運用炮壘溝壕等等攻擊日本軍隊，這樣，在侵佔中國長期消費的壓迫下，日本的經濟將行崩潰，在無數不能決定大局戰爭的折磨中，日本軍隊的士氣將行頹靡，中國抗戰的潛伏力量一天一天的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衆不斷的傾注到前線去，集備爲自由而戰爭，但日本帝國主義却因中國的抵抗而日驅崩潰。

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要將戰爭決定了，要使我們能夠對日本的炮壘和軍事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的侵略軍隊出中國。

我們所俘虜的日本士兵和官佐，要受到歡迎和很好的待遇。不殺害他們，愛護他們和弟兄一樣，要採取種種方法，使和我們沒有糾紛的日本無產兵士，起來反對他們自己的法西斯蒂的壓迫者，我們的口號是：「聯合起來，一齊反對我們共同的榨取者，」反法西斯的日本軍隊是我們的朋友，和我們的目標並沒有衝突。

內政問題

保安，一九三六，七，一八。

問：關於下列各項，蘇維埃政府目前的政策如何？（一）本國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等等。（二）大資本家，地主及買辦。（三）知識份子及自由職業者——如醫生，工程師，記者，建築師等？

答：在目前情形之下，當整個中國正臨着要變為日本奴隸的迫切關頭，我們的政策，爲着要把一切愛國份子，組成一個抗日的民族戰線，在許多方面，已經改變了。

不僅在今日，從蘇維埃運動開始以來，我們永遠是歡迎知識份子的參加。一切的自由職業者，均給予蘇維埃市民權利。小資產階級，小商人等等，並給予政治權利，出身於資本家或地主家庭，但本人參加革命，也是給予蘇維埃市民全部權利的，而且能被選舉擔任官職。

我們不僅歡迎知識份子，並且鼓勵他們來與我們聯合。担保幫助他們在蘇維埃區域裏找到有用的和快樂的生活。我們能馬上供給他們以職業和充足的生計。

在目前準備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對於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担負職務的一切工業，必給與充分的保護。這事的證明，可以在陝西一切城鎮的牆上所張貼的宣言和法令裏看到。

在這時期裏，富農的土地，是不被沒收的，地主的土地必需被重行分配，因為土地革命的不能貫徹，會削弱抗日戰爭的基礎；但被沒收的地主們，會給予一份耕種的土地。小地主們的財產不遭受沒收。參加抗日運動的地主們，會要予以特殊的看待。參加抗日戰爭的白色軍官們，會有權利領有土地，他們的家屬被保護。

在蘇維埃法律中特列有一條規定，保護海外華僑。這些華僑們是愛國者，他們也是在異國的壓迫之下；所以我們盡可能的設法去保護他們的自由和權利。

我們現在政策的目的，在促成全民族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大團結，對日本侵略者作戰，去爭取我們民族的解放。

一切國民黨徵收的捐稅，我們已經取消了。在陝西和甘肅現在我們不徵收土地捐稅，而在將來我們只會徵收一種很低的累進稅。

問：這些改變的某幾項，好像表現着你們放棄把共產主義當做你們的目的的現象嗎？

答：不是，我想不是。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會是世界共產主義勝利的一部分，因為戰敗了在中國帝國的帝國主義，就是摧壞了一個它最有力的基礎。假如中國爭到了她的獨立，世界革命會很快地進行。

假如我們的國家被敵人征服了。我們會要失掉一切。對於一個被剝奪了民族自由的民族，革命任務，不是馬上的社會主義，而是爲獨立的鬥爭。假如我們被奪去了一個可以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那我們就連談共產主義都不能了。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祇限於任何一個階級的參加，也不能在一支單獨戰線上進行。否認這點，就是否認許多富人參加了反日運動的事實；因爲日本帝國主義是富人窮人一同摧殘。一些資本家，一些銀行家，甚至許多地主和許多國民黨軍隊中的軍官們，已經表示了他們爲民族解放而戰的志願。我們不能拒絕他們在這個鬥爭中擔負一種職務。甚至蔣介石如果一日決定了參加反日的抗戰，我們也會歡迎他的參加的。如你所知道的，我們已經寫了許多的信和公文給他，表明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誠意，並且提議；在他願意抵抗日本的那一天，把我們的軍隊放在他的指揮之下。

問：對於這些建議，接到了任何答覆了嗎？

答：至少蔣總司令沒有回應。但是我們的建議仍舊存在。我們仍舊希望着他能接受。南京的軍隊，現在正前進攻擊我們。一方面我們不得不與之周旋。我們被強壓迫着和企圖消滅我們的人們進行防禦的戰爭。同時我們還繼續督促南京和我們合作。我們的口號是：『停止內戰。聯合抗日。』

反對繼續內戰的運動，是普遍全國的擴大着，國民黨官吏越來越多地會加入聯合戰線，直至到

蔣介石被強迫着改變他的戰略。其實，我們的許多紅色領袖，過去曾經是國民黨軍官和官吏——舉例來說，朱德，羅炳輝，賀龍，彭德懷，林彪，陳克，葉劍英，徐向前，僅僅舉這幾個，過去都是國民黨軍官。林伯渠過去是國民黨的財閥並且是中央執行委員中的一員。許多其他這樣的人們已經和我們聯合了，而且在將來，隨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加深，更多這樣的人會和紅軍聯合的。

保安，一九三六，七，一九，

問：關於說紅軍「野蠻」和「殘忍」的記載，在中國和外國報紙上，都有很多。或許這些攻擊是由南京上海以及別的城市裏的紳士先生們所寫的；然而究竟還有許多人相信他們的故事，正好像在美國的許多人，相信希爾斯德和麥克法登所傳在蘇聯的「殺嬰」、「飢饉」、「共妻」等等的故事一樣。可是，究竟用蘇維埃法律眼光看來，在實際施行中，什麼樣的罪，是值得加以死刑的判決呢？

答：以前蔣介石和國民黨散佈了許多虛構的故事，述說紅軍在蘇區的殺戮，姦淫和焚燒。最近這種宣傳沒有那麼多了，大概是因為今天只有很少數的人，能被這些拙笨的謊話所欺騙了吧？我們請你自己去周遊參觀一下，看是不是有任何人從事於殺戮焚燒來消遣。我們的人民用別的方法來做他們的遊戲——像跑步，跳高，打網球，籃球以及幫助農夫們耕他們的田。你也不會聽到一件紅軍奸淫的事情。在紅軍中這樣的罪犯是用死刑來處罰。

到了現在，許多人已經知道了蔣介石的戰略，時常是要把從紅軍奪回來的整個區域毀滅沒把鄉村焚燒的。蔣介石自己也說了：『辨別在蘇區裏的良民和共匪，簡直是不可能。』只有屠殺在蘇維埃化區域中的人民大眾——因為人民大眾是紅軍的唯一真實『基礎』——國民黨才能收回這些區域供他們自己的統治。

紅軍不焚燒任何房屋，也不殺戮任何清白人民。極普通的常識就能告訴我們，紅軍所以能夠存在這許多年，根本因為它得到了在蘇區裏人民大眾全部的同情和擁護，普通常識也能告訴我們，焚燒人民的房屋和殺戮人民，是不能取得他們的同情和擁護的。

我們還沒有廢除死刑；這層我們不能辨別。但僅僅危害國家安全，危害革命的人們，僅僅漢奸和日本的走狗，或者積極的反革命的領袖等罪人們，才遭受嚴重的處罰。即便在他們之中，蘇維埃也分別選擇，他們的犯罪，也是用各等的判決，從感化教育，公眾勞役，拘留，監獄，到死刑來處罰。談到普通小的犯罪者，他們是在一度簡短的詢問，討論，和教育的拘留後，就被釋放了。蘇維埃法律的基礎，是社會全體的利益。

四個月以前，紅軍俘虜了在馬鴻逵部下的一個旅長和一千五百人。解除了他們的武裝以後，紅軍給了他們自由，願意回到『白』區去的還給予路費。在出征山西中，我們俘虜了屬於閻錫山的許

多白軍軍官和兵士，他們是被用同樣方法待遇的。一大部份的士兵還留在我們這兒，從前閻氏部下的一個團長，現在在我們的教育部工作着。在過去和蔣介石作戰中，我們俘虜了他的軍隊總數不下三十萬。除了三四個他的最高級軍官（如張輝瓚等幾個因為他們的壓迫和殘忍，被人民痛恨欲絕了）之外，我們沒有槍決他們中的任何人。他們被允許去選擇：和我們聯合，服從蘇維埃法律，或是回到『白』區去。這是對於國民黨軍隊普遍知道的事實，儘管白色報紙被強迫登載謊語。

有些的宣傳說紅軍屠殺知識份子。這特別是一種極蠢的謊語。我們必須保有知識份子，而且我們用盡種種方法，爭取他們來革命。我們的使命是解放知識份子，而不是摧殘他們，你周圍看看在蘇區中的學校教員，技術師，工程師和作家一下吧，問問他們，紅軍屠殺知識份子是不是真的。

人們也說我們屠殺地主們。你自己可以目睹我們屠殺了多少個地主們，奪去不參加反革命的地主們的生命，不是蘇維埃的政策。能遵守蘇維埃法律，和平地工作，不參加積極的反革命的活動的大小地主們，能夠不遭受蘇維埃壓迫，很容易地在蘇區中生活。

蘇維埃法律的教義是改變犯罪者的行爲，教育並改造他們，而不是摧殘他們，這正和國民黨對待犯人相反。

在蘇維埃政府的臨時法中，定規了兩種法庭。一種是司法制度，有由地方蘇維埃選舉出來的法

官和陪審員。犯人可以對法官陪審員提出自己的控告，他可以和法官討論加於他自身的判決。他可以呈請覆審，從鄉蘇維埃到縣蘇維埃，從縣到省蘇維埃，這樣直到蘇維埃最高法院。他可以要求紅軍，要求他自己的工會，或者要求他自己是一會員的任何民衆團體，替他自己作有利的辯護。

此外的一種審判，是在同志法庭前舉行。在這裏被告控告者出現於自己的伴侶前，領受批評和勸告。這種法院，僅僅密判很小的犯罪者，牠除了一種經被告同意的威化的判決外，不能科罰任何事件。在一切政府機關和一切民衆團體中，都有同志法庭存在着。

現在蘇維埃法律承認：在中國除共產黨以外，還有別的政黨，是抱着反帝政策。這些政黨不能在國民黨區域裏自由存在。我們供給他們避難所。我們對人民給予完全的自由，准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自由。我們只對反革命者，漢奸，人民的壓迫者，不予這些特權。

中國人民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不允許在它的行列中有官吏的舞弊。對於侵吞公款，和盜竊公共財產的任何犯罪者，規定嚴重的處罰，在最嚴重的場合是死刑。犯有這樣罪狀的共產主義者，是比非共產主義者更重地處罰着。

問：蘇維埃政府馬上要放在國家佔有或管理之下的工業，是些什麼？一些什麼可以暫時允許私人管理下存在？

答：一般地說來，沒收私人工業，和把它放在國家管理之下，不是我們現在的政策。但是不待說，一切日本領有的工業和實業，必須馬上沒收，而為人民的利益去開辦的。

問：你以為當政權取得了以後，在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會要和蘇聯採取同樣的速度，沿着同樣的進行之路嗎？

答：像我已經再三說過的：我們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民族解放。在現在我們的目的，不能是社會主義，更不能是共產主義；我們所要求和希望的，是全民族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牠是為爭取獨立而必須進行的重要機構。全中國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社會主義的實現，當然留做將來的目的。社會主義的建築，假如蘇維埃在民主共和國被給予權力的話，也必須經過共同的同意和人民大多數的要求？

即使在實現創造一個全中國的民主共和國中成功了，我們也不能堅持立即實行社會主義。牠仍舊是一個遠景。在中國社會主義的實現，大概不會像蘇聯那樣快地發生，因為中國——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有着較長的和更困難的路去走的。無疑地，我們主要的工作，要求着為民族獨立的鬥爭，配合着要求民主的繼續的鬥爭——為着這鬥爭，紅軍自一九二七以來，一向在戰爭着。

問：紅軍歡迎一切願意為革命，為反對帝國主義而戰爭的人們，不管他們的階級出身，來參加到

自己的隊伍裏來嗎？

答：當然我們唯一的條件就是他們是否願意爲民族解放而戰爭。

問：蘇維埃政府，爲中國歷年的問題提出些什麼改革的策略？你能關於下列的問題給我一個簡單的政策的報告嗎？（1）土地貧窮——重行分配或是集體化？（2）飢饉和水災。（3）失業。（4）鴉片和毒品。（5）高利貸。（6）貪官污吏。（7）文盲。（8）虐待童工。（9）賣淫。（10）軍閥政治。（11）交通阻塞？這些改革在江西實現了嗎？在現在革命的階段，主要的任務是爲反帝鬥爭的軍事準備，在蘇區實行上述的改革，是可能的嗎？

答：我一個一個地來答覆這些點。首先，關於土地問題。目前的問題不是一個集體化的問題，而是一個重行分配的問題。革命把土地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們，不僅使他們能利用牠，增加生產力，而且使他們能擁有牠。

集體化必須是將來的一件事，而且僅僅只能當整個國民經濟，是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實現。有些人問我們爲什麼我們不建立一個公社制，共同領有土地？我們的答覆是：目前農民的要求，不是一個公社，而是土地的領有，所以我們迎合大衆的要求。農民的現狀和土地經濟，因爲土地的重行分配，會有很大的進步。農民已經領有土地了，但他們以前是沒有土地的，這對於他們是一個大的

勝利。他們並不打算集體化，集體化只能在國家計劃經濟之下，在全民政治實現，教育力量奏效之後才能實行。

問：爲着聯合戰線的利益，在蘇維埃政綱中，許多別的事情已經延期停止了，是不是土地重行分配，也能緩期？

答：不沒收地主們的田產，不滿足農民階級的主要的民主要求，那是不能爲順利的革命的，爲民族解放的鬥爭，打下一個廣大的羣衆基礎，爲着要爭取農民對民族使命的擁護，那是必須要滿足他們對土地的要求的。這不僅在中國是這樣。法國大革命，也是在廣大的農民階級的基礎上，建立了牠的勝利的。在經濟上，把農民縛束在他們現在這種被壓迫的情形之下，也是非常愚蠢的。農民階級是過重地被剝削了，不能增進土地生產力，不能爲一個工業和商業的擴大市場發展必需的購買力。

至於『飢饉』和『水災』這些向來被認爲是『上帝的事業』的。實際上牠們主要地是被人們促成的，而且是能由人們預防的。蘇維埃政府用一切努力去和這些災患鬥爭。被蘇維埃解放了的農民們，有着豐富的財源去和水災與飢饉同時鬥爭。在江西我們不僅建築堤壩溝渠及一切別的需要的東西，使我們蘇區不遭受任何重大的水災；我們也收獲豐足的穀物，而且在任何一年，我們沒有飢饉。在那裏過去我們僅僅缺乏鹽，這是不能在蘇區生產的東西，而由於南京的經濟封鎖，不能輸入。

然而現在在蘇區沒有鹽的短少了。我們有許多中國的最好的鹽的蘊藏，特別是在鹽池及其周圍一帶（鹽池的鹽在中國的歷史上是著名的。牠是靠近長城，在寧夏，陝西，甘肅的邊境上。紅軍和在這一帶的蒙古族分有了鹽的蘊藏。——施樂。）在那裏，湖水產出最純的晶鹽。在我們現在的地位，我們不懼怕國民黨對我們的封鎖，因為有一個大量的好的鹽的供給。一切其他的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我們都能在我們自己的蘇區裏生產。

在蘇區沒有失業的問題。你自己周圍看一下，是不是在這裏有任何的乞丐和失業的人。我們是每人都有工作的。在蘇維埃江西，過去沒有乞丐，現在蘇維埃在埃西北，也沒有乞丐。一切人都有土地，而且有些事情去做。今年一月裏，在瓦窖堡——陝北最大的城——我們在新年會譚席上，招待一個被俘虜了的東北軍的總部的長官。許多別的東北軍官們也在座。我們給了這位總部的長官的行動的自由，他能夠走到任何地方，信任他不企圖逃跑。在會譚席下他表示他的驚訝：在城市裏他（整天看不到乞丐。他說在「白」區裏在新年元旦他不能走過一條街而不被乞丐們圍困的。

在江西僅僅那些供給外界的企業的工人們，被拋棄原來的工作，因為國民黨的封鎖把市場關閉了。但他們並不變成失業者，他們在別的工業部門，被給予位置而轉到那裏去了的。

什麼是我們對於鴉片的種植和吸食的政策呢？最好你向任何你遇見的農夫，問關於這些問題。

的答覆吧。我們禁止罌粟花的種植，和鴉片的購買，銷售和吸食，除了經由軍醫院爲醫藥用以外，我們禁止任何種的毒品的生產和販賣。在江西蘇區，有許多從前以出產鴉片而著名的區域。在兩年中被我們完全根絕了。我們如何成功了這事呢？不是單用武力的。我們教育農民們，慢慢地說服他們去放棄牠，爲他們同胞的好處，也是爲他們自己的土地的好處。在陝西和在甘肅舊的蘇區裏，也是同樣。現在在陝西和甘肅舊的蘇區裏的任何地方，你不能找到鴉片的販賣和種植。我們的禁絕不是像國民黨區域裏的所謂的禁烟；在那裏國民黨的鴉片專賣，僅僅限制別人買賣鴉片，而用死刑對待那些不遵重國民黨的專賣的人。僅僅在農民們明白禁烟是爲他們自己的福利的必要以後，牠才能成功。

問：這必定是很有力的一種教育。在實施中，牠是如何辦理的？

答：自然鴉片的吸食，是和鴉片的種植，很密切地聯繫着。沒有鴉片種植的嚴厲禁止，鴉片吸食的除根，是不能到達的。一個人民的政府，不需要依賴從鴉片種植買賣來的稅收。牠不願意毒殺人民，而是要救活他們。僅僅由買辦地主操縱的政府，才熱心地用鴉片摧殘人民，而且僅僅這樣的政府才從鴉片專賣的辦法裏，找到用處。這樣在江西，當紅軍離開了，地主回來了以後，農民仍舊被強迫種植鴉片，爲着要交納重的租金和捐稅，和剩下的能夠維持生活。地主必定督促他們種牠，在他們以上的軍閥也是一樣，爲着要從人民榨取更多的錢。

在蘇區高利貸和高利貸者均不允許存在。這並不是說我們禁止普通在合理利率下的金融借貸。在我們現在實行的經濟計劃下，錢的流通和借貸是重要的，但高利貸是不允許的。因為從前的利率，高到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八十，我們蘇維埃法律的利率的最高點，是百分之十，牠馬上很大地便利了農民階級。蘇維埃政府本身用百分之五的利率，借錢給富裕的農民，對於窮苦的農民，牠舉辦沒有利息的放款。我們在陝西的蘇維埃銀行，今年舉辦了兩項大的放款。第一項是對農民的春耕放款，不帶利息；別一項是對小商人的營業放款，收一種最低的利息。

當舖完全取消了，裏面的物件，交還給了真正的原主。但普通的商業銀行是允許存在的，這樣的銀行有許多設在安邊，定邊，和靖邊——沿着長城的一些大的商業城市中。

在紅色區域裏，侵吞公款和公行賄賂，是嚴厲懲辦的。我們的法律，在這方面是嚴格地施行的，濫用公共錢財和不正當的花費，也受一種嚴格的處罰。依照蘇維埃法律，賄賂是最重的犯罪。只有蘇維埃政府不允許官吏的『榨取』，而關於它的嚴苛地實行這項法律條文，連南京也很知道。蘇維埃政府官吏，比紅軍兵士，決得不到較高的生活費。我自己算是個蘇維埃要人，但比一個紅軍兵士得到的少，當做一個紅軍指揮官，我每月得到伍元錢的津貼。

希特勒宣稱他在銀行裏沒有存款，關於這事我們不十分確知。但我們知道了他以強迫他的德

國人民，買他的書——「我的奮鬥」——得了幾百萬的馬克。但我們請求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去試找得一椿屬於蘇維埃官吏的銀行存款。

至於關於文盲的問題，這對於一個人民的政府，不是一件難的工作。牠真是願意提高大眾經濟的和文化的程度，在一切舊的蘇區裏，人民的大多數是識字的；而在中國的非蘇區裏，人民的大多數是不識字的。爲什麼是這樣呢？這是因爲紅軍在佔領一個地方後，馬上開始組織民衆學校，並且用一切方法督促人民改善他們自己。

在江西我們的清除文盲會，在教育委員會領導之下，有着驚人的成功。牠在一切鄉村裏組織小組。由青年學生、共產青年團、少年先鋒隊領導，教育人民如何地讀和寫。這些民衆教育學校——這樣的學校是成千累百的——是由農民階級自己創設的，是由很熱心的紅色青年來教，他們對於這件工作，很充分地提供他們的時間和精力而不領受薪金。這樣的三四年以後，在江西蘇區人民的大多數，統認識了好幾百個中國字，而且能夠讀簡單的文章、演講，以及我們的報紙及其他的出版物。

我們的統計在「長征」中遺失了，但我在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的報告中，已將當時民間的民衆教育運動，和經蘇維埃主持的經常教育組織所得到的在教育上的進步作一個整的敘述。到那個時候爲止，在舊的蘇區裏的居民中，從十歲到三十歲之間那一部分文盲，完全被清除了。對於年

齡老一點的居民，也有很多的進展。（第二次全中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于一九三四年一月開于江西瑞金。可參攷「Reb Chia: president Mao Tse-tung Reports on progress, Martin LaWrence, London, 1964.」[毛澤東主席在代表會上的報告]一書——施樂。)

在陝西和甘肅也已經組織了一個撲滅文盲會，在這裏的文化水準是很低於在江西的，而我們正臨當着重大的教育工作。但是正如你所看見的，在陝北農民階級中，從前只有居民百分之三或五能夠讀和寫，我們已經有了個開頭了。在從前絕對看不見教員的鄉村裏，已經建立起學校來了；新聞雜誌和書籍在這裏第一次被發行。現在當你走經鄉村中的時候，你常常很容易地在貧農的家裏，找到了一本蘇維小冊子或者一本雜誌，而且你能在正午或傍晚，看見他們在鄉村集夥兒閱讀。

爲着要加速文盲的清除，我們在這裏已經開始試驗新文字——一種拉丁化的中國文字——了。在我們的黨學校，在紅色學院，在紅軍裏，在『紅中日報』的特別一欄裏，它是被用着。我們相信拉丁化是征服文盲的一件好武器，中國文字是那樣地難學，甚至就是最好的基礎單字方法，或者簡單化了的教授方法，也不能使人民具備一個真能夠用的豐富的字彙。我們相信，假如我們要創造一種新的社會文化，使大眾能夠完全參加，那我們早晚非完全拋棄方塊文字不可。現在我們普遍的拉丁化，假如我們在這裏停留三年，文盲的問題，會要大部分地被征服。

在蘇區童工奴役是完全廢除了，而且將來在紅軍所到的任何地方，會被廢除。兒童奴隸馬上被解放了，回到他們的家庭去了。無家可歸的便送入蘇維埃工廠或旁的生產機關去工作。不過當紅軍進入新的區域的時候，許多兒童奴隸，都被地主們，連同他們的貨物和金錢，一齊帶跑了。

內政委員會看顧他們的幸福。假如他們足夠成年了，而且是身體健全的，他們能領得一部份可耕的田；不然的話，他們有權享受某種共公土地底生產物的一份。

和兒童奴隸一樣，娼妓是窮人經濟破產的結果。沒有別的生計方法的人民，爲着生活不得已出賣她們的身體。在江西蘇維埃的鄉村和城市裏的娼妓，完全消滅了，只在像汀州和漳州這樣一兩個大的城市裏，還存着一點兒小問題。

極多數的幾個婦女，祕密地繼續操持賣淫，但這種職業的大多數婦女，都被吸收到有用的工作裏去了。他們中的許多已經結婚，而且在發給貧農的土地上安居了。有些在工廠裏工作。有兩三個成爲學校教師。他們大多數變成好的公民，而且因爲人們對於她們並沒有歧視，大多數很快就忘記她們從前當過娼妓的事了。

軍閥主義的問題，也大部分地是個農村破產的產物，職業化的和雇傭兵士，如果給予土地和可做的工作，他們能很容易地再作成良民。我們用加緊的教育和宣傳的方法，去改正從前雇傭兵士的

反社會的惡習，而在南方這些方法，曾經收效極大。被貧困所壓迫的土匪們。如果給予一個比較寬裕生活的機會，和施以相當的教育去改正他們以前的惡習，也是能夠消滅的。

舉例來說：在福建西部許多年有着武裝了的小幫土匪。從蘇維埃政權在這些土匪最厲害的區域建立了以後，他們很多的已經變成好的農民，工人和人民軍隊的戰士了。蘇維埃供給他們土地和在工廠去做的工作。福建西部和蘇維埃江西，兩年以後，盜匪完全絕迹，人民夜不閉戶。

但是現在紅軍已經離了這些區域，國民黨和地主又回來了，你看，土匪又起來了。特別在沿着福建邊境，成千的雇傭軍隊用來防匪，並且預防許多貧農轉變成強盜，而攻擊他們的剝削者，來取還地主和軍閥們重新從他們那兒搶去的貨物和金錢。

談到交通：在江西的蘇維埃建築了許多公路和改良的交通——這是現在週知的事情，而且甚至到國聯的專家的報告中記載了。我們不建築汽車路，這些對於農民們沒有用，而農民必須為牠們付款，我們只建築許多好而堅固的載重大車和手車的路。

對於蘇維埃這種建築容易辦到而不費錢。我們的築路計劃，不是由幾個留學生設計的，那些留學生在美國學了工程學，而想為些不實用的計劃，得到大宗的款項，我們的築路計劃是由蘇維埃農民自己草成的，他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這樣當一種計劃決定以後，是農民們把牠實行出來的。蘇維

埃動員成千的志願工人去建這些道路，是輕而易舉的，因為是人民的路牠對於人民是有實際用途的；而不是留學生的路，留學生的路是為軍閥和他們的姨太太們的汽車而用的，農民不能用牠。

在陝西我們築路不少，因為蘇維埃在這裏還不久。但是我們已經宣傳並教育民衆，喚起他們對載重大車路和改良的貨車路的需要。

抗日戰爭會停止上面所說的建築計劃和改革嗎？我們不這樣想。在抗日的戰爭中，全國要用儘可能的速度，實現一切這些事情，不僅是可能而且是絕對需要。不表明對於他們的種種利益，人民是不會被動員起來為國家的禦衛的事實上一個為獨立的戰爭，必需改善人民的狀況。

為什麼我們要求戰爭呢？因為，第一，為保全民族的生命，那是絕對需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毀滅一切漢奸，以達到民族獨立；第二，為着提高人民大眾的經濟和文化的水平。

即便紅軍在中國舉行牠的革命戰爭，馬上給人民帶來大的福利也是可能的。紅軍佔領一個區域一個月以後，牠就能有許多改進。領導改造的工作，不僅是紅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來擔負，每一個司令官，每一個紅軍戰士，都參加喚醒和領導農民的工作。

每一個紅軍戰士，都幫助實行土地政策和人民經濟的設計及人民大眾組織等等。在陝西紅軍已經實現許多上面所說的改革。在甘肅和甯夏蘇維埃改革已經開始了。

或者你早已注意到了，在紅軍中的每一個人，都是極端地忙碌，不論是否在軍事行動的時候，紅軍在種種方面幫助人民。人民把他們的問題交給紅軍，請求幫助。他們信用它，並且相信它的正義。他們成羣地來歡迎我們。許多參加我們，許多自動地拿出他們所有的東西去幫助我們。許多自願地供養紅軍。許多為我們探訪消息，幫助防備密探奸細，在戰爭中農民們自願地幫助紅軍——例如當響導，工兵，伙夫，及搬運等等。人民大眾和紅軍打成一片，人民大眾和紅軍的這種不可分離性，是我們戰勝白軍的基本原因之一，儘管白軍在人數上和在物質來源上都比我們優越萬分。

紅軍佔領一縣之後，馬上開始進行實現上面所提的改革。當這工作有了相當成績，蘇維埃成立了，農民工作者被訓練了去領導實行這種綱領，紅軍就離開往新的區域裏去活動。

但是紅軍的整個的鬥爭，主要的是反帝的鬥爭，這就是為什麼它現在擴大到為解放的必要戰爭的反日戰爭。這是一種進步的戰爭，而且為着加速大眾的復生和革命化，是不可缺的。

問：蘇維埃政府目前的工業計劃是什麼？

答：戰事工業必須放在蘇維埃管理之下。『軍事工業』是指着直接和戰爭行動有關係的工業。別的工業部門仍舊留給私人管理。——自然日本帝國主義的工業是除外的，它們立刻要由政府沒收。

但是除了國家企業以外，還要舉辦各種人民的合作事業，而且這種計劃，有很大的前途。必須要記着：今日中國的情形，和革命後俄國的情形，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我們的革命，主要是民主和資產階級性質的，因為中國仍舊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

問：在戰時的利潤的管理如何？

答：自然，當戰爭開始的時候，一種利潤稅的問題，是必須考慮的。

現在蘇維埃政府實行的關稅，是中國唯一不受帝國主義操縱和管理的關稅，我們的觀念以為：在戰爭期間，稅則必須自主地調整，去適合抗敵戰爭的需要，而且滿足全中國民衆的需要和要求。僅只像酒，烟捲，等等的奢侈品應該重重課稅。對於像汽油，煤油，等等必需品的入口貨的稅額，應該很低，因為中國不能生產這些東西到充分的數量，夠國家的需要。

問：你對於南京的外交政策意見如何？

答：如每個人所熟習知道的，在蔣介石領導下的南京的外交政策，是一種和帝國主義協妥，和對於外國侵略者退讓的政策。所以人民對於南京政府的不滿，已經廣泛的百展起來。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中國人民，用無數次的請願，信件，示威以及各種的方法，要求南京政府，改變牠的錯誤政策，擔負起救亡的任務來。這種要求已經存在好幾年了。即便在南京已經有許

多人覺悟了他們的政策，是一種投降和屈辱的政策。但是直到現在，蔣介石還同樣的沒有醒悟的表示。

假如蔣介石繼續這樣道路，他個人權力的危機，一定會深刻化，而從這點，也許發展到一個大的中國內部危機。他可以暫時收買這個或那個將官，他可以收買中國各地的軍閥的擁護，甚至實現某種程度的御用統一，然而這樣不能解決他的問題，也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問題是一個爲自由和獨立的民族而生存的問題。

總會有這麼一天，他得決定或是反抗日本，或是被他自己的部下來推翻，他的部下不都是甘心去做日本的奴隸的。他許多的將官，現在是很動搖，要求看一種抗戰的政策。舉例說來，陳誠——蔣氏手下的一個最有才能的戰術家——最近力勸蔣氏開始反抗侵略者的戰爭，並停止內戰。胡宗南，南京最好的將官，不久以前對蔣氏說：『跟紅軍作戰簡直是無期徒刑。』他們兩人都被蔣介石叱責了，但這事表示着在南京一羣有才幹的青年司令官們之中，正滋長着一種不忍目覩年復一年的內戰，使國家支離破碎的意見。即使是湯思伯吧，最近也主張在內蒙抵抗日本和復成一個一切愛國軍隊聯合起來的戰線。

這種從他自己的將官以及反日民衆運動而來的增長的壓力，也許可以強迫蔣氏瞭解他的錯

誤並接受人民的要求。假如他停止內戰，開始抗日，再行建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聯合，我們一定歡迎這種轉變，益熱心該戀的同他合作。但這個只有蔣介石自己能決定，這種決不能夠再長久地延遲了。

特殊問題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保安。

問：在實際的情形下，倘若中國革命勝利了，那麼蘇維埃中國和蘇維埃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是否仍維繫於第三國際或類似的組織中，或者會是實際上某種的政府合併呢？中國蘇維埃政府與莫斯科的關係，是否可以和現在的外蒙政府與莫斯科的關係相比呢？

答：我想這純粹是假設的問題。我早已說過，現在紅軍並不在謀得領導權，而在求中國統一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

第三國際是一個匯集全世界無產階級前衛的集體經驗以貢獻全世界革命羣衆的組織。它不是一種行政機關，除顧問作用之外，它並無任何政治力量。雖然它的本質和第二國際大不相同，組織上却沒有多大的分別。正如沒有人會說因為某國的內閣由社會民主黨組成，因此第二國際就是獨裁者一樣，倘說一個國度裏有了共產黨，那麼第三國際就是獨裁者，是極端可笑的。

在蘇聯，共產黨握着政權，但即使在那兒，第三國際也沒有統治權，更毫無任何對民衆的直接政治力量。同樣地，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份子，却並不能說蘇維埃中國被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治了。我們爲自由中國而戰，絕對不是爲了使中國處於莫斯科之下！

中國××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對全民族負責。決不是爲了俄國人民，或第三國際的統治，爲的僅只是中國大衆的利益，只有中國大衆和俄國大衆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說是「服從」莫斯科的「的意志」。而當然，一旦中國大衆像他們的俄國弟兄一樣，獲得了民主權及社會的經濟的解放以後，這種共同利盡的基礎將驚人地擴大了。

當許多國家已經建立了蘇維埃政府，然後蘇維埃國際聯合的問題才會生產，其解決之法也是很耐人尋味的。但是今天我不能提供什麼方式，這是一個尙未解決，不能提前解決的問題。現在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和文化的關係日益密切，這樣一種聯盟是急切需要的，如果彼此自願的話。

還有最後一點顯然是最重要的，即這個世界聯盟能成功的話，必需各國依其民衆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權利，必需各國主權完整，絕非「聽命」於莫斯科。共產主義者從未有別的想法，「莫斯科統治世界」的神話，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發明罷了。

過去和現在的外蒙和蘇聯之間的關係，一向基於絕對平等的原則之上。中國人民革命成功以

後，外蒙共和國將依其自己意志，自動地成爲中國聯盟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同樣地可以組織自治共和國而參加中國聯邦。對少數民族的不平等待遇，如國民黨所施行的，絕不能發現于蘇維埃政綱之中，也不能發現于民主共和國的政綱之中。

問：請你解釋，蘇聯將來對蘇維埃中國的協助，跟過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活動，有什麼基本的相異之處。你何以認爲「赤色帝國主義」是荒謬的呢？

答：有人說法西斯沒有什麼創造能力。我却不完全同意。「赤色帝國主義」一詞實際上是他們所創造的，這就可見法西斯頭腦的創造力的高明了。在這個名詞的背後，日本和中國的法西斯是希望奴役了中國的。我們其實不必回溯國民黨以往的历史，就可看到這種宣傳，究竟起了多大作用的。假使真有「赤色帝國主義」這東西，南京政府自己的生命就得叨光它。當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革命的時候，誰都知道，鮑羅庭和加倫將軍幫助着國民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着，共產黨員並且領導了許多最好的民族主義運動的隊伍。那時候並沒有國民黨員談起「赤色帝國主義」。但是當國民黨變成反革命，背叛中山主義，開始壓迫工農大衆，投降帝國主義之後，他們之中的最無恥份子，却創造了一赤色帝國主義一這個名詞，它在反動報紙上，變成他們違叛中國民衆的護身符了。

事實怎樣呢？即使蔣介石也不能否認，當國民黨和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時候，革命達到了

一個高潮，帝國主義的基礎動搖了，而民族解放的前途非常光明。孫中山先生死後，他的不肖的同志，開始背叛他的主義和政策，國民運動衰落了，國民黨失去了所有的革命性，和帝國主義委曲求全，把中國最好的省份不抵抗送給日本，得了帝國主義者的幫助，發動長時期的內戰來反對人民的革命。十年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和中國人民大眾淪為奴隸的加速，使南京現在開始明白蘇聯才是中國真實的朋友，而國民黨要反抗帝國主義，只有和蘇聯及中國共產黨重新聯合。

今天，鬥爭已經尖銳到成為兩個陣營之間的戰爭了：第一個由日本領導，包含有賣國賊和反動者，組成所謂與日本提攜的反共陣線；第二個是包括中國絕對多數的民衆及一切同情中國革命的國家，這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線。反共陣線基於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合作。反日戰線基於和蘇聯以及所有同情中國的獨立鬥爭的國家的合作。作反共陣線意思是民族奴化。反日戰線意思是民族解放。中國人民必然會漸漸把他們自己投入這一個或另一個陣線；兩者是不能調和的。

的確，許多國民黨員如今迫於環境，或爲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在重新考慮他們政策了。過去有許多愛國份子，如宋慶齡，何香凝，陳銘樞，蔡廷楷，李濟琛和蔣光鼐，等都明瞭國民黨的基本錯誤在繼續「剿匪」。現在李宗仁，馮玉祥，孫科，宋子文，張學良和其他人等，正在改變他們的觀點，似乎願意蘇聯和他們之間的合作復活起來。

我們堅決的主張和蘇聯密切合作，來和日本開戰。那個集團希望結束中國的內戰，希望建立一個聯合的民主的人民抗日政府，來保衛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我們就歡迎跟它合作。

問：你怎樣解釋紅軍在最大的壓迫之下節節的勝利呢？它的不可征服性究竟是在那裏？

答：這有三個原因。第一，它是民衆的軍隊，民衆無微不至的支持它。除非先消滅了愛護它的民衆，否則沒有辦法消滅它的。白軍攻擊蘇區，他們不僅在打紅軍，而在打所有蘇區的老百姓。

第二，我們的存在，是依靠着共產黨正確的策略和戰術的領導。

第三，紅軍的指揮官都是能幹的，正確的，聰敏的，誠懇而忠實的。每個紅軍司令，只要他肯接受南京的賄賂和獎賞，無論何時都可以發一筆財而退休，然而九年戰爭以來，我們却還沒有發現過一個投降國民黨的司令。

問：隨着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勝利的時候，你認爲在其他亞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如朝鮮，安南，菲律賓，印度等，會爆發革命麼？現在的中國是不是世界革命的關鍵呢？

答：中國革命是世界現勢的一個關鍵因素，它的勝利是各國民衆所熱誠預期着的，尤其是殖民地國家的勞苦大衆。中國革命一旦獲得全權，許多殖民地國家的大衆一定效倣中國，取得同樣的勝利。不過我現在得重新再說一遍，「奪取政權並非我們的目的。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停止內戰，產生

一個各黨各派的全民的民主政府，爲獨立而抗日。

問：中國革命在全國的最後勝利，大約需要多少時候才能完成，你有什麼意見沒有？

答：中國革命的勝利，無疑要被由革命鬥爭發展出來的客觀環境所決定，而這環境是太複雜了。現在實在難以預測。可是我們可以斷言，這勝利的到來決不渺茫，而且是和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勝利，相偕而行的。

中國人民將會採用最適合于他們自己的政體，這政體我們以爲是一種民主共和，而在有了選舉權的大衆的掌握裏，在組織上，我們相信，蘇維埃制度——自中央機關以至最小鄉村代表制，是最適合於民主政治制度的實現，也最能保障中國大衆的利益。

問：抗日之後，革命的主要內政工作是什麼？

答：中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性的，因此初步的工作是調整土地問題——農業改革的實現。

中國農村的亟需改革，可以從現在的土地分配的數字中看出。國民革命的時候，我是國民黨農民的部長，負搜集二十省土地統計之責。我們研究的結果，指出令人驚異的分配不均。約計百分之七十的農村人口是貧農，佃農或半佃農，以及長短工。約計百分之二十是自耕的中農。高利貸者和

地主約佔百分之十，在這百分之十中還包括有富農，收稅吏，軍閥之類的剝削者等等。

這百分之十的富農，高利貸者和地主等擁有幾乎佔百分之七十的可耕地。中農則有百分之十二至十五。而全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佃農，半佃農和長短工只佔有全部可耕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

這些統計當然在全國各處有極大的差別，甚至相鄰的兩縣差的也很顯著。我所引用的數字，是當時全中國我們研究到的各處的平均數，當時農民部的職員們，搜集二十一省內的有關數字。當然，在反革命之後，這些統計材料是被壓下了，而十年以後的今天，南京政府還是沒有關於中國土地分配的報告。

但這些事實可以把紅軍的成功解釋一大部份。革命的起因主要由於兩者的壓迫——帝國主義者和百分之十的中國地主和剝削者。因此我們可以說，我們要求民主，土地改革及反帝國主義戰爭，至多遭人口中百分之十的反對。而實際上沒有百分之十，大概不過百分之五光景的中國人情願甘作漢奸，上日本的「防共協定」的圈套，聯合日本人來征服自己的同胞。

論聯合戰線

一九三六，九，二三，保安，

問：請你給我說明一下，共產黨的聯合戰線政策和對國民黨政府態度的轉變好不好？

答：我們最近宣言中所公佈的政策是受了三個主要因素的影響（該宣言在八月二十五日由保安向國民黨發出——施樂）

第一是日本侵略的嚴重：這種侵略一天比一天的加緊，致使中國各種力量必須聯合以對抗之，除掉共產黨之外，我們承認中國還有其他的政黨存在，而且，自然其中最有力量的還是國民黨，不同它合作，祇共產黨不足以抵抗日本，南京必須參加對日戰爭，國民黨與共產黨是中國兩個主要政治勢力，如果他們仍然繼續內戰，對於抗日運動是極大的不利。

第二是自從去年（一九三五）八月共產黨發表要求全國各黨聯合，一致對日的宣言以來，雖然國民黨仍然進攻我們，但是我們的建議，已經引起全國民衆廣泛的同情，爲了救國，現在一般國民及許多愛國官吏，都等著國共兩黨的重新聯合，大家都盼望結束內戰，因爲不如此，抗日運動是遇着極大阻礙的。

第三是甚至國民黨裏的愛國份子也主張再同共產黨聯合，因爲民族危機的嚴重，南京政府裏面與其自己軍隊中的抗日份子，也都感覺到同我們聯合必要。

這些是目前中國形勢的主要特點，基於這些特點，我們得詳細的重新考慮民族解放之具體方案，實際上，我們已在最近將這個具體方案提出與國民黨交涉，抗日為我們主張的原則，為了實現這種目的，我們相信必須建立一個民主國的國防政府，它主要的任務是（一）抵抗外敵侵略（二）賦與人民一切公權（三）積極發展國家經濟。

這樣一個綱領，能實現人民目前的願望，一定會得到全國一致的擁護，因此蘇維埃政府贊助成立這樣一個全民的民主政府。

我們贊成一個議會代議制的政府，一個抗日國防政府，一個能援助與保護民衆愛國團體的政府，假如成立了這樣一個政府，中華蘇維埃將變成他的一部，我們要在我們的區域內實現如在中國其他部分內所實行的民主代議制度。

問：那就是說，這樣一個政府的法律能同樣的施用在蘇維埃區域內嗎？

答：是的。

問：然則現行的蘇維埃法律，尤其是關於土地問題的部分將被廢止了嗎？

答：假如如同南京的聯合戰線成立，這個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自然，我們知道日本和國內親日份子將要激烈的反對這種綱領，但是中國人民定會歡迎它，並

且我們相信會得到成功，不然，如果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之下，則凡有民心之人，都能知道這是使中國人民走向滅亡的路子。

我們知道已經有一部分國民黨反對再向日本投降，在民衆中，各階級，軍人，科學家，學生，商人，警察，職工以及在蘇區裏的工農，都已經自動的組織起來抗日救國團體，同這些團體，我們要盡力的提攜合作，我們希望這樣份子聯合起來，去克服親日派與不遵守孫中山主義的叛徒。我們希望這些份子能協力來恢復實現孫中山的基本主張與遺囑，那就是聯合蘇聯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國家。（二）與中國共產黨聯合。（三）保障中國勞動階級之基本利益。我們希望這樣份子能幫助實現孫先生的遺囑，並反抗日本帝國主義。

假如在國民黨裏開展了這樣一個運動，我們預備同它合作並支持它，希望造成一個類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的反帝聯合戰綫。我們相信這是救中國的唯一辦法，假如這個綱領實現，我們毫不必懼怕日本，日本帝國主義不能戰勝一個真實團結的，武裝的，與有組織的中國人民。

但是，現在在日本正企圖建立反共戰綫，其實這也便是一個征服中國人民的戰綫，我們要建立一個民族解放戰綫；他的成功也就是反日鬥爭的勝利，同時也是世界和平的勝利。因為唯有這樣勝利，才能使中國人民跟地球上所有自由的人民共同攜手邁進。

問：你所謂的「代議制度」政府究竟是如何呢？譬如，選舉權有限制嗎？

答：選舉權是普及的，沒有任何財產、地位、教育及性別的限制。

問：假如南京接受這樣一個綱領，紅軍可以改變他的名稱並聽南京上級的指揮嗎？

答：如我從前所說一樣，我們承認在對日作戰時國家軍隊的統一指揮，是絕對必要的，但是我們同時認為軍事委員會必須採代表制度，要認清這種聯合唯有在抗日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有些國民黨談「統一」，但是他們不援助民族解放與反帝運動。實際上，如不作真正的反帝鬥爭，則中國永不會統一。

紅軍是否改變其名稱要看聯合的情形。

問：共產黨的新政策，是承認民族解放必須在階級革命之前完成嗎？

答：共產黨自始至終重視現在階級的反帝鬥爭，所以現在提出的抗日救國主張，並不是甚麼新的理論，同時，我已經指出，我們相信抗日運動，祇能在解放被壓迫農民及實現孫中山先生主張的保障工人利益等，同時進行，才能收得效果。

問：聯合戰線政策是說共產黨願意放棄或是無期的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分配與貧農的政策嗎？

答：這個也要看抗日運動的發展如何而定，但是我們相信，如不解除農民痛苦，則抗日鬥爭是不

會成功的。爲你所知。土地革命也屬於資產階級性質，他對於資本主義發展是有利的，我們不反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反對帝國主義，這種主張全國民民主主義者的要求，我們熱烈的擁護它。

問：在這樣的基礎上所完成的聯合戰線將立刻對日宣戰嗎？

答：是的，那是很可能，如果今天實現聯合，明天也許就開仗了。

問：那麼，唯一的問題，祇是在南京政府是否接受這個綱領，及蔣介石之有否對日作戰的決心嗎？

答：是的，問題就在這，此點我們不敢斷定，蔣介石始終是動搖不定，總是遲延着不同我們來談判。

問：在過去的兩三箇月中，什麼原因致使共產黨採行他們的新政策呢？你所提出的三點情形，在前些年已經存在，祇是漸漸臻於嚴重而已，是什麼直接原因，使這個新策略必得提出來？我想這是貴黨這十年來最重要的決議。

答：直接的原因是一方面於日本侵略的加緊，提出足以致中國死命的新要求，其結果將使中國今後抗日圖存越發困難；一方由於民衆間反日愛國運動的高漲，甚至南京政府中的一部份人也改變了態度，在這裏情形下，我們的政策很有實現的可能性，但如在一年前，則全國民與國民黨皆無接受此種建議之形勢。

現在交涉心在進行中，雖然共產黨沒有絕對的把握促國民黨抗日，但是仍有相當的可能性，無

論何時，共產黨都準備着用一切方法去合作，但如蔣介石繼續內戰，紅軍亦決與周旋。

新送大哥

女唱：送我哥哥當紅軍，勇敢向前打日本，不要留戀我一人，去當紅軍最光榮，嚶嚶，嚶嚶，

我的哥，去當紅軍最光榮。

男唱：多謝妹妹一片心，送我出去當紅軍，一心一意上前線，勇敢銜鋒殺敵人，嚶嚶，嚶嚶，

我的妹，勇敢銜鋒殺敵人。

女唱：送我哥哥當紅軍，打倒漢奸和日本，堅決作戰莫回頭，家庭不要您掛心，嚶嚶，嚶嚶，

我的哥，家庭不要您掛心。

男唱：親愛妹妹您放心，哥哥出去打日本，驅逐日本出中國，那時再來講愛情，嚶嚶，嚶嚶，

我的妹，那時再來講愛情。

女唱：送我哥哥到前方，後方工作我擔當，前方後方相配合，戰勝日本有把握，嚶嚶，嚶嚶，

我的哥，戰勝日本有把握。

男唱：妹妹莫要怕困難，一切事情都好辦，參加工作要努力，紅軍家屬作模範，嚶嚶，嚶嚶，

我的妹，紅軍家屬作模範。

女唱：哥哥向前殺敵人，做個民族的英雄，繳到槍砲百千萬，全國民衆齊歡迎，嚶嚶，嚶嚶，

我的哥，全國民衆齊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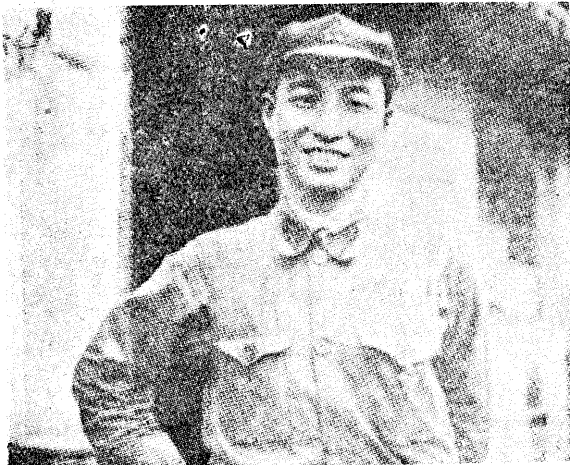
男唱：不勞妹妹送我路，我當紅軍如猛虎，打倒漢奸和日本，誓死不做亡國奴，嚶嚶，嚶嚶，

我的妹，誓死不做亡國奴。

紅軍裏有青年，少婦，小孩與老人

紅軍第一軍第一師司令——陳賡

陳賡是紅軍第一師的青年司令，黃浦軍官畢業後，為蔣之隨從武官，當蔣被陳炯明打敗時，陳賡背伏蔣急行三英里餘，始得出險，蔣因此升陳營長，後發現彼為共黨，乃押之，陳得機脫逃，參加南昌暴動，在一九三三年又在江西被捕，蔣謂如彼投降，可畀以參謀之職，不服，遂解往南京，途中乘守者之不備，又逃回赤區。



劉羣山——「陝西女匪」第一號

她是陝西省工會婦女部長，現年二十九歲，從前是一個上海工廠的女工，後至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一九二七大革命時組織上海女工，與孫中山夫人頗相得。

跨着三個時代

老 當 益 壯

徐特立，蘇維埃政府教育委員，現年已六十歲，曾任湖長沙師範校長，第一屆國會議員，並為國民黨之元老，四十年留學法國

里昂大學，

歸國後參加

國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

入共黨，繼

又留莫斯科

二年，歸國

後潛入江西

，隨紅軍北

上，現居保

安。



「豆」布爾雪維克

這個是在甘肅河蓮蓮灣遇見的兒童團的隊長，他綽號叫「山西娃娃」，剛十一歲，去年乘紅軍入晉之便，偷着同三個夥伴從當學徒的舖店跑出來，投入紅軍，開始了他的冒險生活，這個像便是他自己的總部前攝的，牆還有隱然可見的標語。



共黨與西北

美國施樂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北平協和教會講

共產運動在中國，特別在今天，已經走上一個空前的歷史階段。在西北方面，現在展開的嚴重情勢，在我個人看來，是許多年來中國未有的複雜局面。中國整個未來的命運，也許要看這個局面的開展如何。這是事實不是誇張，在這裏共產黨提出的要求：有停止一切內戰，恢復一九二五——二七的國共合作，成立代議的民主政府，以及立即對日宣戰。這裏有東北軍，也有西北軍，他們在事實和表面上都同共產黨的主張一致，紅軍爲什麼取採這個新策略呢？這種策略真是一個新的政策嗎？

爲了解現在的情勢，我覺得我們有溫習最近歷史上幾種事實的必要，這幾種事實，充分的影響了中國的共產運動。在這裏我不願意消費許多的時間，來搬出國民黨所作的史料。因爲那是諸位早就熟悉的，我現在要根據在赤區所聽到的，來解釋一下：

我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一九二〇年創始的，到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和蘇俄使者越飛（Григорьев）會見以後，更得到迅速的發展，不久以後，即有國民黨的改組，與共產黨成立同盟，實行合作，共同發動一九二五——二七的國民革命運動。

這一次合作的基礎，是由於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接受兩大原則：第一在對外政策上必須持定反帝國主義政策，那就是用革命行動恢復中國整個的政治、經濟、領土、主權的完整。第二對內政策上，是反封建主義，那就是實現民主的革命，打倒軍閥、地主，而建設新的社會經濟生活，這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所共認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制度，他們也共同認定，這種革命的目的，可以在民主代議的共和制度下順利的完成。自然，在共產黨方面，認為資產階級性的民主制度，是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經的序幕。社會主義社會遲早是會到臨的，所以，他們對這種前進運動的擁護是完全合乎邏輯。

大家都知道，國共的合作，到一九二七年結束了。在共產黨的眼光看來，原來所謂國民革命也。在此告終，國民黨右派在新軍閥的統治之下，破壞了合法選舉的武漢政府，而在南京另組政府。在那個時候，大部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認為那是一種背叛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反革命行動。

國民黨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後，共產主義者，即變成須處死刑的罪犯，而共產黨組織，也就被逐入地下了。從此以後，共產黨所期望的反帝反封建兩大民族主義原則也完全放棄，同時鎮壓革命的大規模的內戰，也就開始了。成千累萬的共產黨慘遭屠殺，許多農工協會的領袖，都處死刑，而農工協會組織的本身也完全破壞。民主政治沒有建設成功，軍閥的獨裁却樹立起來，這樣各種各式的對定戰爭無期的展開了。但是在軍隊裏仍潛伏着許多共產黨。經過了一個時期的恐怖，共產黨的本身，集中

起來！

一九二七年八月國民黨軍隊第一次叛變，在南昌爆發，這次暴動的事實，非常有趣。領導暴動的人是共產黨和黃埔軍官畢業蔣介石的學生，但他們仍然持着青天白日旗，標榜三民主義，反對南京政府，背叛國民黨的革命主義。繼南昌事件而起的有汕頭，廣州以至於各地的暴動。以後這些主持暴動的隊伍，慢慢的集中到江西和湖南的山間，他們的領袖，大部是黃浦的軍官，激烈的學生，以及各地的勞工和農民。在這個時代共產黨祇有被消滅或鬥爭的兩個途徑，他們選擇了鬥爭的途徑，一九二八年他們正式宣佈國民黨為無望的反革命的集團，並在江西和湖南挑起他們自己的紅旗，為保衛農工民主革命的前驅，他們認為他們是保持原來的革命主義和三民主義的精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赤色政府成立的時候，他們本身並未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而稱為資產階級性民主政治農工蘇維埃政府。蘇維埃在俄文中的唯一意義，是議會，僅是代議制度的一種形式，而這種制度無論社會主義社會或資產階級社會都可以採用。遠在一九〇五年時，蘇維埃制在俄國已被實行，此後在資產階級的克倫斯基時代，尤常被用為民衆代表的組織形式。

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間，紅軍的發展非常迅速，起初僅有幾十支步槍，可是因為陸續參加新的份子，很快的在湘贛兩省發展到數千農工的軍隊，他們繳除了許多國民黨軍隊的槍枝和子彈來

武裝自己。這樣迅速的發展，激起國民黨在一九三〇年間始首次大圍剿。以後在「肅清赤匪」的旗幟下，開始了延續不斷的進剿計劃。

第一二三四次的圍剿計劃，可謂完全失敗。在這幾次圍剿之中，紅軍粉碎了許多師團的國民黨軍隊。這些次圍剿，事實上充分的供給了紅軍以武器和軍火，同時還擴大了他們佔領的地盤。所以紅軍戲稱「白軍」爲「軍火的輸送隊」，當我在赤區的期間，他們給我看許多像片，上面照着他們從國民黨軍隊奪的大批旗幟，子彈槍枝，以及其他軍需用品，並貼着「共產黨青年的禮物」等字樣，毛澤東親自告訴我，在南方歷次圍剿中被他們繳械的國民黨軍隊總數在三十萬衆。

直到第五次圍剿，也就是國民黨對紅軍進攻的第七年，「殲滅」的計劃才微奏功效，在一九三四年初開始五次圍剿，那時全中國蘇維埃會議，剛在赤都瑞金開過，到會的有在蘇維埃統治下生活九百萬民衆的代表，事實上當時蘇維埃中央政府已經統治了江西的大部及福建湖南二省的一部分。此外還有其他的蘇區，與江西蘇區在地理上沒有有機的聯合，這些蘇區散佈在河南，安徽，湖南，廣東，四川等地。

在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動員了九十萬大軍，其中有四十萬參加積極進攻，他採用一種新的戰術，充分的利用大量的資財，優越的富源，精銳的武器，以及機械的戰術。又命大部的南京軍隊把整個

赤匪包圍起來，各守固定的防區，對蘇區實行嚴厲的經濟封鎖。

這次圍剿消耗最大，蔣介石建築了幾千里的軍用公路，數千座小砲壘型的碉堡。在上面配着合機關槍，蔣氏這種攻守的計劃與戰術，使紅軍的活動受了極大的限制，因為他們缺少資源及器械，少數的軍隊利於作遊擊戰而不利於作陣地戰。所以這第五次圍剿不啻使蔣介石建立了一條人築的長城，包圍了蘇區的四周，並逐漸向內推進，他們的意思，是想把紅軍推到潰滅無路的境地，同時在審慎的計劃中，決不輕易使他的軍隊，離開軍用公路及碉堡，祇有在礮兵，裝甲車，坦克車，重轟炸機，及毒氣（祇用這一次）的掩護下才開始前進，可是在這樣環境下，使紅軍失去機會和他們的敵人作誘敵，伏兵，奇襲或遊擊戰術，他們不能接近利於佔有大量資源的敵方。

第五次圍剿的大部據說是由蔣介石德籍顧問，所計劃的，而其成就如何，實多歸功於前國社黨參謀總長塞克特將軍（General Von Seeckt）塞氏曾任蔣氏的最高顧問。

蔣氏的新戰術與新策略，雖然相當的澈底，不過仍是十分的遲鈍，除勞民傷財之外，並未發生甚大效果，所以五次圍剿，雖然延續了幾日，而對紅軍的主力，並未與以致命的打擊，不過，因為嚴密的封鎖結果，使地面狹小的赤區，對於國民黨軍嚴重的壓迫，無力支持，在這種情形之下，南京以為殲滅紅軍的企圖可以成功了，以為無論如何，被重重包圍的紅軍是無法逃避了，成千累萬無辜的農民，每天

在飛機轟炸機關槍掃射之下，無情的犧牲了，甚至許多紅軍也被殲滅了，但是，農民的犧牲是超越紅軍的，這種情形根據我個人在西北的觀察下是相當確實的，據上海著名銀行家章乃器先生在大衆生活上的一篇論文中統計，第五次圍剿中一切間接的財產損壞，失業，城鎮破壞加上維持軍隊的消耗，南京政府殺掉一個紅軍，需要八萬元之數。

不過在事實上，五次圍剿的目的完全失敗了，它原來的目的是在根本肅清紅軍的主力，而紅軍在瑞金召開軍事會議，通過在戰略上退却的決議，把紅軍的主力移置到另一個根據地。這種偉大的長征計劃，在一年以內，完全的達到了。在這次長征的行動中，他們表現了比在過去取攻勢時期還大的軍事天才，在統一號令之下，他們造成了歷史空前的西北長征。

紅軍的主要實力在九萬人以上，他們退出江西的神速，敏捷，嚴密，直到他們已經退走幾天以後，敵人的最高司令部才發現紅軍退走的事實。他們首先把一切正式的紅軍從前線撤回，集中到江西的南部，而用遊擊隊填防，這些活動，完全是在夜間執行的。等到全軍集中在瑞金以後，才宣佈遠征的命令。在三夜之間，他們加速的西進，在第四天他們全部出人不自覺的衝破湖南廣東方面的防禦線，他們向這線上的堡壘各個猛攻，使他們的敵人手足無措的疲於奔命。他們繼續猛擊下去，直到把全線上的壘堡濠溝全部佔領了才休止。這才打通了一條往西往南的血路。

衝破了防禦線之後，他們便進入湖南，這「萬里長征」便由此開始，這一段的故事太偉大了。紅軍方面對這長征，有一部綜合的紀述，是集合若干人的記載而成的，全書不下三十萬言，但離完成還遠呢。我現在能告訴你們的是：他們在敵人的軍隊追逐，壓迫，空襲之下，平均每日一戰，紅軍到底穿出了湖南，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青海，甘肅而於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第一軍的前鋒到了陝北了。在那裏他們和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十七軍取得聯絡，因為那裏早在一九三三年便成立了蘇維埃區了。

這長征，最初的起點是福建，紆迴曲折的據說有二萬五千里，約合八千英里。無論如何誰也不能否認這長征是在軍事歷史上成就了一個奇蹟。當年漢尼拔率軍橫越阿爾卑士山。與這個長征比較起來，也不過如同星期日的旅行罷了。祇有拿破崙兵敗莫斯科退軍回法的長途，差堪比擬吧。

紅軍的向西北進行，無疑地是一種軍事上的撤退策略，絕對不是一種潰退，而且直到最後達到目的。他們的中心幹部仍然完整，他們的意識和政治信念依舊堅強。紅軍們自己宣稱而且相信，他們是向着抗日的陣地前進了。他們這種信念，在心理上是很關重要的。因為這麼一來，可以使他們很容易從淪為沮喪的潰退一變而為勝利的前進。歷史告訴他們這種遷移是對的：因為西北的確是一個抗日的軍事根據地。他們很清楚的看出這個決定未來中日蘇三國命運的地帶。

中央紅軍遠征歌

十月裏來秋風涼，中央紅軍遠征忙，星夜渡過零都河，固陂新田打勝仗。
十一月裏來南湖，宜臨永藍一齊佔，通過二道封鎖線，嚇得××狗胆寒。
十二月裏過湘江，廣西軍閥大恐慌，突破三道封鎖線，勢如破竹誰敢當。
正月裏來梅花香，打進請州過烏江，佔領黔北幾十縣，紅軍威名天下揚。
二月裏來到黔西，部隊改編好整齊，發展川南游擊隊，擴大紅軍兩千幾。
三月打回貴州省，二次佔領遵義城，打坍王家烈八個團，消滅周薛兩師兵。
四月紅軍向南征，打了貴陽打昆明，巧妙渡過金沙江，浩浩蕩蕩蜀中行。
五月過了蘆定橋，劉文輝部下望風逃，大渡河天險從容過，十七個英雄姓名標。
六月裏來天氣熱，夾金山上還有雪，一四兩個方面軍，懋功取得大會台。
七月轉入川西北，黑水蘆花青棵麥，吃苦耐勞爲能個，爲了蘇維埃新中國。
八月繼續向前進，草地行軍不怕冷，草地從來人少走，無堅不摧是紅軍。
九月進入潘州城，陝甘支隊內北行，突破渭河拉子口，打了步兵打騎兵。
二萬里遠征到陝北，南北紅軍大會合，粉碎敵人新圍剿，抗日討逆救中國。

這種技巧的領導，可以說是一種偉大的政治策略。驚險的長征，得以成功，殊非偶然。在這長征裏，

他們經過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嶺，渡過了中國最深的河流，深入蠻荒，當他們路過西藏的大草地時，五日不見人烟，粒米滴水不曾入口呢！

關於紅軍的長征已經說了很多，現在紅軍已到西北了，讓我來把我自己的紅軍訪問報告諸位。我於去年七月的下旬到了陝北的保安，在紅區逗留一直到去年的十月。保安是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都會。蘇維埃區包括陝西的北部，甘肅的東部（清水河以東），西蘭公路的北部，甯夏的東南角（黃河以東以及長城以內的部分）。

我在保安住了一個月左右，在路上有四十天以上，其餘的時間，使用在訪問蘇維埃各種組織及甘肅甯夏的紅軍前綫上。那方的紅軍領袖，我差不多都遇見了。我和紅軍的士兵一起旅行，我住過鄉下人的草屋，我住過醫院，同時也住過紅軍在保安的外交部。我和若干農民，工人，士兵以及兒童談過話。兒童大一點的被組成先鋒隊，年紀小的則屬於兒童團。

在這期間我得到許多新的見聞，和新的智識——多到直至現在我還沒有時間來領略它。所以我所能告訴你們的祇有是竭力把我的印象歸納起來。分成四個部分：第一，蘇維埃區的政治與社會組織；第二，蘇維埃區的經濟狀況；第三，紅軍的性質；最末是蘇維埃政府的政策。而我所能告訴你們的祇是一個概括，正如孔子所說「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一樣，其餘請大家自己去判斷揣測吧。我爲什

麼把社會和政治的組織歸納到一起呢？因為這兩樣在赤區是差不多不開的。

例如，我先告訴你我自己一個經驗，當我初入蘇區時，首先經過一個整天見不着人烟的地方，身邊祇有一個騾夫陪伴着。這些邊界常常受地主們豢養的民團所騷擾，他們不斷的侵入蘇區裏掠奪放火，以及擄人。他們簡直是些匪賊罷了。有些民團很顯明的在追逐我。有一次他們祇有幾里路便追上我了，不過因為我所旅行的是些山路，看不見後面的人影，所以不知道。有一個村童，也就是紅軍的先鋒隊，看見這情形，便急速地抄着一條山上的捷徑，去警報紅軍的前哨，說是一個帝國主義者領着一百名賊匪，侵入蘇區來了。紅軍立刻派下了伏兵，結果把民團趕走了。那天晚上我到了安塞，纔知道此事，紅軍的軍官告訴我脫險的經過。幸而他們不相信這些民團是我領來的。

這個少年先鋒隊的忠實行動，就是蘇區政治與社會責任相關的具體表現，他們的忠實與負責，正與中國其他鄉人的不管閒事相反。

當你旅行蘇區時，你常常會被一些農人或婦女阻住，問你要一張路條來看看。有些農大會和你談些淺顯的政治問題，最少他們也能和你談一些他們區內的政治。在一般鄉村裏，至有少有一兩個人了解中國的政治現狀，而且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和蘇俄一些事情，對英美兩國也有相當認識，甚而可以來和你討論法西斯蒂與共產主義，例如當我旅行蘇區的時候，中國正鬧着西南叛變，國

際間正鬧着西班牙內戰，好些農夫便把這兩個事件提出來問我。雖然住在深山的村落中，但他們很知道一些關於國內與國際間的事，他們也許是從村民集會中聽得來的，也許是從他們的蘇維埃報紙看見的，也許多是從他們的蘇維埃廣播無線電聽來的。我記得曾遇見一個山中的居民，也很注意阿比西尼亞事件，他向我發了幾個問題，使我至少知道他對這問題是有相當研究的。自然這些人都

是例外的，平均一些鄉民祇知道他們當地的村政罷了。

談到政治，蘇區裏一切組織都根據蘇維埃制度。從村落到中央，都各有一個人民代表的政府，他們的機構是：鄉蘇維埃，區蘇維埃，縣蘇維埃，省蘇維埃，乃至於中央蘇維埃。每村選出若干代表爲村代表，村代表選區代表，遞嬗而至蘇維埃大會。

區蘇維埃以下，成立若干委員會。其中最具權威的是人民革命委員會，是由一個公開的民衆大會推選出來的。區蘇維埃以下的委員會，大致分教育，娛樂，擴軍，軍訓，合作，政訓，土地，衛生，遊擊隊訓練，革命保衛，及其他等委員會。這樣組織，下自區蘇維埃上迄中央蘇維埃都是一樣，不過中央蘇維埃是個取決國策的最高機關罷了。

可是組織並不止於政府本身。共產黨在城市與鄉村的農工之中佔有多數的黨員。此外還有共產主義青年團，其下更附屬兩種組織，卽先鋒隊和兒童團。共產黨把婦女也同樣組織成青年共產主

義者同盟，抗日會，看護學校等。成人的農夫便組成貧民會，抗日會。甚至從前的秘密會社，如哥老會等，也被吸收到蘇維埃的組織裏。他們在赤區內公開而且被認為是合法，可以參加各種活動。農民會和遊擊隊也是政治社會機構中一種嚴密的組織。

這些組織與各種委員會的工作和蘇維埃政府，共產黨，紅軍等都是相輔而行的。至於他們在組織上的關聯，實非在這樣簡單的談話中所能盡。總之可以概括地說，他們的組織非常廣泛，使每成人婦女以及小孩都能參加一種組織，負擔着一定的工作，這種制度的好處，是他們的工作不是用政府或軍隊的力量強迫去做，而是由人民組織裏的公衆力量敦促成每人成爲一個志願服務社會者。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活動都成爲人民與政府工作人員的合作事業。而民衆中一切的力量，聰明，愛國心，經濟的潛伏力都能充分的利用與發揮。

可是一些農民到底作何感想呢？中國的農民是被認爲反對組織，反對訓練的，尤其是對於他們家庭以外的社會活動。我所能回答的是：據我所會談的農民，都似乎偏袒蘇維埃與紅軍。自然，他們對一個洋鬼子的答話，多少會有些遲疑。不過許多鄉人還不知道我是個洋鬼子，因爲蘇區裏，中國的各省人都有。有從廣東去的，有從東北去的，方言是那麼多，外觀是那麼複雜，許多土著還認我是個中國人呢。

在各種環境下我單獨和一些工人或士兵談過話，他們都可以自由地批評政府，但當我問他不是愛蘇維埃甚於國民黨，他們的答語差不多都是毫不遲疑的說聲是，我更注意到一件事，著多鄉民談到蘇維埃都說『我們的政府』這使我認為是中國的一件新奇的事。縱然他們對於某一種事件，感覺到抱怨，但他們都似乎對紅軍懷好感。

還有一件有興趣的事實，值得提出表明紅軍確有它的羣衆基礎。從前的蘇區都是由一些農民自己去警衛，蘇區裏沒有固定的守備兵，所以他們戰鬥力可以全用在前線上。地方的警衛完全操於村民及革命保衛團，農民自衛團以及遊擊隊之手。例如陝北的前綫，完全由這些農民組織來防衛。這種事實可以表示人民對於紅軍的愛戴。因為紅軍並不是寄生在他們中間，作一種剝削與壓迫他們的工具，而是長期的在前線上，鞏固新得區域以及和進攻的敵人作戰。在另一方面說，這種嚴密的農民組織變成一種後方保衛隊，使紅軍高枕無憂地極力出動。這功效是顯著的。

言論的批評，是不加禁阻的。在蘇區裏你可以看見許多壁報上的短文或小故事是從事批評或指責的。值得讚美的文字可以得獎賞。

要想理解農民所以援助共產黨運動的基本原因，須先考察蘇區的經濟狀況。在我未討論這問題之前，我最好先給你們介紹一下，紅軍未佔領前的西北狀況一個概念。

我現在先引用施登泊博士(Dr. Stamper)所作題名『西北各省與其發展的可能性』的報告書。施博士是國際聯盟會的專員。

施博士提及西北幾年前的大飢荒，說是陝西的某縣經調查死去百分之六十二，另一縣甚至死去百分之七十三。他更指出據正式估計，甘肅一省餓死的人口有二百萬人，我現在隨便引施博士的報告，來表示在國民黨治下的西北各處狀況。

『一九三〇年大災荒時，二十畝地可以用三日的糧食換來。資產階級便利用這時機，大量增加他們的地產，而自耕農的數目便逐漸減少了。許多田地，淪為荒野，許多土地，流入地主與官僚手中。尤其是甘肅更多可種植而不種植的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的荒年，甘肅的地主們用極賤的價目收買許多土地，從那時起他們大發其財。

『在陝西不納地稅被認為是光榮的表徵，所以闢地主慣例是免稅的。

『在陝西更有一件令農民感覺不滿的事，就是催繳歷年欠納捐稅，可是在荒年的時候，他們都棄地逃荒去了，地都沒有耕，那有捐稅可納，但官方不肯放過他們，不納足欠捐，不准他們恢復舊有地產。

國民黨治下的甘肅，施博士也說：

「甘肅在過去五年中，平均每年歲收超過八百萬元。這課稅數目比浙江省還重，而浙江本來是中國課稅最多，人民最富的省份之一，他們所納的數目實際比公佈的還多，第一因為稅吏要扣得一部提成，或有時候要扣一大部分，第二因為除了省縣政府稽徵的捐稅以外，還要加上駐軍長官所課的稅，這在甘肅根據官方估計在一千萬元以上。此外人民還要供給當地民團的餉膏，這些民團有時候還會變成流寇，要附近的鄉村來供養。」

關於這一層我不能扯的太遠了，但還有一件值得提供參考的就是甯夏省政府官報裏載着一張甯夏省在馬鴻逵治下時替國民黨所徵收一切捐稅的表，它列舉有「交易稅，家畜稅，駱駝稅，鹽運稅，食鹽稅，鴉片烟燈稅，羊羣稅，商人稅，攤販稅，地產中人稅，普通食品稅，特別食品稅，額外地畝稅，屠宰稅，婚嫁稅，食油稅，石磨稅，木料稅及菜蔬稅等」。稅的名目，自然不止於此，但這已經足夠表示出來當地的人民對於國民黨不會有什麼好感了。

共黨在他們的蘇區裏把那些佃戶，貧農，以及中農的環境澈底的改造了。就是在一個新得的區域裏第一年全數豁免各種捐稅，並且保證以後對土地和商業祇徵收一種簡單的輕微的累進稅，其次便是把一些土地分給那些渴望耕種的鄉民，同時墾殖許多荒地，這不能不使我們注意到蘇維埃的土地政策了。重分土地是共黨的基本政策。那麼，怎樣去沒收土地呢？

共黨把鄉村的居民分成這麼幾個範疇：（一）大地主（二）中小地主（三）富農（四）中農（五）貧農（六）佃農（七）農業工人（八）產業工人（九）流氓無產階級（十）自由職業界及智識份子。

西北蘇區的土地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公佈的）規定沒收所有大地主的土地及富農自己不耕種的土地。但仍發回他們自己所能耕種的數量。在那些土地並不缺乏的縣分（西北這樣的縣分很多）那些地主與富農的土地，可免沒收，但是荒地與主人不在的土地是要被分配的，有時也許把較肥沃的土地重新分配，使貧農分得一些較好的地，而富農使攤得一些較壞的。

地主是什麼呢？照蘇維埃的定義簡單說來：凡是一個農民他的大部分收入不是出自他自己的勞動而是靠着把土地租給別人的都是地主。由這種定義的解釋，那些放高利貸的人也併在地主的範疇裏，受同等的待遇。照施登泊博士說，在西北放高利貸的利率從前高到百分之六十，甚至當緊急的時候，利率還會高些。他說許多農夫借了高利貸已經還過兩三倍原借的數目，而仍然欠着比借來的還多。這樣情形屢見不鮮。雖然他價在陝西和甘肅許多地方是那麼便宜，但一個沒有本錢的農夫想積累錢來購買一塊田地實際是不可能。我記得我會經和一個從前甘肅的佃農談過話，他移居到裏有十五年了，可是未能積蓄一注本錢來購買一小片農場，雖然那裏地價祇有兩塊錢一畝。

除了上述地主階級以外，其他階級的土地是不在沒收之列的。赤貧的農人、佃戶及農業工人都給與足用的土地來供給他們的生活。須知蘇維埃這種土地政策，不是平均地權，蘇維埃現行土地法的目的是使人人都有相當土地來保障他及其家庭的充足生活這也許就是農人們的迫切要求啊！

這土地沒收和分配問題，因為西北的大部分土地，過去是在官吏們、稅吏們及逃亡的地主們手中，所以很容易解決了。他們用不着和那些富農或地主爭執，便可以把土地沒收過來，分別給與那些貧農來滿足他們的希望。因此之故，蘇維埃不特在貧農及無產階級裏樹立了經濟基礎，而且因為豁免捐稅，也博得中農階級的相當同情，甚而有些小地主也對他們抗日運動予以相當援助。陝西許多著名的共產黨員是從地主階級來的。

此外對於貧農還給與格外的援助，就是用最低利率或者無利的將款項貸與他們。高利盤剝制度當然取消了。去年在陝西就有大量的棉麥種子照成本分配與農民們。紅軍兵工廠裏還製造幾千部農具，給予沒有土地的農民去開墾荒地。初級的農林學校已經在保安成立了。他們還告訴我，一所畜牧學校也在籌備中，祇要從上海聘請的專家一到，便可以開辦。

陝西甘肅甯夏的北部，從前的時候，文化上和經濟上在中國算是最落後的。那裏不會有過機器工業，而共黨居然破天荒在那裏成立幾家報館。吳起鎮工廠裏有一位工程師，是留學回來酌，甯願捨

葉了在上海一年賺一萬元的職業來到紅區裏作沒有報酬的工作，他管理的那部炭燃機在那裏是一件新奇的事，簡直沒有一個農民看見過這種機器。

共黨的工業，原來是極幼稚的。它們包括製紙，製革，棉花和羊毛紡織，被服，兵工等工廠。其中許多簡單的機器是從江西帶來的，有些是去年從山西「俘虜」來的，更有些是私運來的。共黨開發了延長的石油井，而且設法增加產量，超過了從來的紀錄，他們能作很好蠟燭給消費合作社出售。

陝甘甯的紅區裏都成立了合作社。他們告訴我紅軍在江西的時候，有一萬多家合作社，農民社員有五十萬以上。興國——紅軍在江西時的模範縣——有一條二里長的街道，完全為消費合作社所佔，出賣各種貨物，一天作不少的生意。在陝甘甯蘇區裏也有四百家合作社。以上的消費都是蘇維蘇財政委員長林伯渠告訴我的。林想不到是一個極有趣的老年人。他和孫中山組織過同盟會，後來又是國民黨的創辦者，一九二六年作過中央委員，任過國民黨的財政部長，他的元老資格比蔣介石還高。一九二七年國共分家的時候，便加入共黨裏。

林伯渠從江西隨軍出發，步行七千英里，白髮飄飄，笑容滿面的活像一個聖誕老人，與那充溢着青春的紅區恰成一個鮮明的對照。他在國民黨裏有那麼高的地位，以已過半百的年紀，毅然捨去了親戚朋友，家庭，產業而加入十字軍長征——他們相信紅軍這樣領導着他們林伯渠是一個在兩個

極端相反的社會裏仍然列居高位的少數人物。因為他在封建制度，君主制度的滿人治下及共產主義的中國蘇維埃政府裏，都當過大官。像他一樣的，還有一個謝覺哉，陝西省蘇維埃政府的祕書長，他在滿清時代是一個秀才而且作過知縣。

對不住得很，因為時間短促的原故，我不能再多細說蘇區的經濟組織了。我現在把題目移轉到紅軍的本身問題吧，我相信這是最有興趣的。我們要記得所有紅區裏的社會，政治，經濟第組織都是暫時的。就是在江西的時候也不過如此，因為蘇維埃從創始以來，無日不在戰爭中圖生存。我們不能把今日的紅區認為是已完成的改造社會的試驗。實在祇能視為一種未完成的革命，而為紅軍將革命勢力擴大的一個根據地。

現在的紅軍，不特佔有空前的廣闊的相連區域，而他們的數目也許是除了在江西紅軍勢力達最高峯的時期之外，比任何時期為多。朱德賀龍徐向前張國燾領着他們的隊伍在南京軍隊圍攻之下，衝出了四川西康，于十月初旬在甘肅取得各主力軍的大會合，而擴大了西北的根據地。

紅軍經過了從新改編之後，現在分成三個軍團，叫做等一二四抗日紅軍。除了這些基本隊伍之外，在陝西還有東西集團軍，數千百的遊擊隊，赤衛軍和農民自衛軍。

估計這三方面軍隊，總數約在九萬至十萬人之間。這些軍隊大多數都有新式步槍的配備。他們

也有自動步槍輕重機關槍及輕砲，所有這些軍器都是從敵軍手中得來的。紅軍還有兩師騎兵，所騎的差不多都是從馬鴻逵手中奪來的甯夏馬。這些騎兵都是很好的騎手，也是中國唯一佩馬刀的騎兵。甯夏和綏遠還有回族紅軍和蒙人遊擊隊。

這就是所謂『殘餘共匪』。蔣介石將軍在去年雙十二西安政變時正欲剿清的，那是第六次圍剿了。

我可以告訴你一些紅軍的事，在我看來是極有興趣而且值得注意的。這些事實是我會見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楊果泉——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所聽得來的。

我要先說的：許多人都以為紅軍是困苦的土匪及流氓。在我看來，這觀念是錯誤的。紅軍的主力多半是一些年青的農工，他們自信是為家，為國，為土地而戰——大體來說，這是事實。他們隊伍的平均年齡是十九歲。我自己的印象是：他們在知識上，體格上的確稱得起一隊少年軍。他們深深瞭解他們的使命與任務。他們都是極端愛國者。倘若你問他為甚麼加入紅軍，他們通常的回答是：第一因為我們要和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第二，我們忿恨地主們和高利貸者。

彭德懷所統轄的第一方面軍裏，有百分之廿五是農業勞動者，（包括手工業者，驢夫，學徒，農業工人等）；百分之十三是產業工人；百分之五十八是農民；百分之四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以及小

地主，富農等等。在這一軍裏，士兵和軍官合起來，有百分之五十是共產黨黨員或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

大約百分之七十三的士兵能寫讀簡單的文字，標語及傳單等等。（地方的軍隊識字比例略低些）他們的識字程度比陝西的農民——百分之九十五是文盲——高得多了。紅軍是從入伍那天起便要開始辨認那特編課本的字，他們每天還要聽些政治講演。

士兵也和軍官一樣，是沒有薪餉的，祇是每人在他分得的土地裏取得一些收入，飲食，服裝，氈毯，以及其他應用物件，完全由軍隊供給，士兵個人永遠不許沒收他人物品，如果盜竊他人物品，要受嚴厲的制裁。士兵購買物件必須償價，而且絕對不許欺壓小商人及販夫。在蘇區裏祇有蘇維埃政府檔案處，兵工廠及儲械庫是謝絕參觀，我曾和許多農民士兵接觸，住過好些生疎的地方，但我不曾丟失過一件物品。

紅軍士兵按着省份來說，百分之五十四是陝甘晉人，百分之十四是河南人，百分之十三是安徽人，百分之九是湖北人，百分之二是江西人，百分之五是東北人（東北軍的舊部）。在第一方面軍裏，大部份是南方人。其中還有苗人，傣人及回人的兵士和小隊長。第二及第四方面軍裏，雜有西藏人及蒙古人。

紅軍軍官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四歲。包括由分隊長以至軍長的年齡都在內。營長以上的幹部都是黨員，祇有一兩個例外。

連排長以上都是識字的，雖然我遇見過許多入伍以前還未學讀書識字的。

團長以上的軍官，雖然年紀是那麼輕，可是平均起來，都有過八年的作戰經驗。在紅軍的將官及蘇維埃的幹部裏，有黃埔軍校的畢業生，有大學中學的畢業生，有從前國民黨的官吏，有東北軍的軍官，更有許多從英、法、德、俄回來的留學生，但我所遇見留美的祇有一個。

紅軍大多數的士兵和軍官的未婚或「離婚」的——就是他們把妻子和家庭撇下。幾個例子中，我很懷疑他們的所以加入紅軍與他們想解脫婚姻，不無牽連。紅軍的士兵不叫作「兵」，而稱之曰「戰士」。我的印象是半數以上的紅軍戰士還是童男女。共產黨是很少在前線上和軍隊在一起的。據我的見聞，紅軍對於農民的婦女都非常尊重，農民對他們的紀律也很稱道。紅軍很少吸煙喝酒的。第一方面軍軍長彭德懷——他原是國民黨軍隊裏的將官——告訴我少年的紅軍，最大的長處是刻苦耐勞，這也是他們不急劇就要異姓伴侶原因之一。彭氏本人從一九二八年領着一部國民黨的軍隊加入紅軍以後，就沒有見過他的夫人。

紅軍軍官的死傷率是很高的。他們自團長以下常常和士兵在一起作戰。在第一二次國民黨大

圍剿的時候，紅軍軍官的死傷率達到百分之五十，可是軍隊怎麼能忍受這種重大犧牲！所以從那次以後，他們採取一種戰略來減低有經驗軍官的生命危險。但是國民黨第五次——他就是江西末次——的圍剿，他們的死亡率還到百分之二十五。在現在的蘇區裏，你可以看見許多事實上的證明，很多二十幾歲的青年，失掉手或割去了手指，面部創傷或四肢不全，但他們還在爲革命而戰爭。

紅軍自然有一個規定的時間表來作體育，智育，社會及政治知識的訓練。他們鼓勵跳高跳遠，攀牆，賽跑等比賽。每天認兩點鐘的字是強迫的，由連排長領導着在本連排的俱樂部上課。每天還有射擊，騎馬，戰術，刺刀，以及步伐等操練，在娛樂的時間他們便唱歌，寫壁報，研究各種學術等。

實在紅軍的生活並不算壞啊！在我看來，他們大部時間是消耗在歌詠上。他們自己製出千百百的新歌，而且繼續撰作。如果你走近他們的營地，聽吧，一陣陣入耳的歌聲，是他們在上音樂課。歌詠也有比賽的，還給善歌者預備獎品。信不信由你，他都唱得很好，尤其在夜間，歌聲震蕩着你的心弦。而遊擊隊的集團合唱，更能使你感動。一個在吳起鎮的嚴正的工程師告訴我，他認爲「紅軍消耗在歌詠的時間太多了。」

實在我所遇見的紅軍，要算是在中國裏最快樂的貧民。他們的生活自然的困苦，平常而簡單的食品，襤褸的衣裳，而艱難困苦還是不斷的來臨。但是人人的生活，都是如此，上至朱德，彭德懷，下至

C調

紅軍抗日先鋒進行曲

4/4

5·1 3·1 5 5

我們 人民 紅軍

我們 人民 紅軍

3 1 3 5 3 1

滿腔 熱血 沸騰

只見 刺刀 光芒

1·1 1·3 5 3

爭取 獨立 解放

寧願 戰死 沙場

5·3 5·3 2 3 2·5

前進前進快快前進

衝鋒衝鋒快快衝鋒

5·1 3·1 2 2

我們 抗日 先鋒

我們 抗日 先鋒

3·1 3·5 2 5

準備 一切 犧牲

只聞 炸彈 亂轟

1·1 1·3 5 3

爭取 民族 生存

不願 亡國 偷生

1 11 1 23 1

槍口要瞄準敵人

槍口要對着敵人

5·1 3·1 5 5

吹着 前進 號音

吹着 衝鋒 號音

3·1 3·5 222 2·3

挽救國家危亡與敵

誓死收回失地保護

2 22 2 3 25

我們要打倒漢奸

我們要打倒漢奸

2 3 1 5

進! 進! 進! 我

衝! 衝! 衝! 我

5 1 3·1 2

堅決 向前 進

奮勇 向前 進

1 5· 2 2

決 死 戰爭

領 士 完整

1 11 1· 2 35

我們要反抗日本

我們要反抗日本

1·3 1·3 1 ||

們抗日先鋒

們抗日先鋒

行列的弟兄，在士氣上一些也尋不出差異來。因為他們不分上下的，同樣要忍受着痛苦和身體的不安，所以更增加他們集團的革命意識。

在我以為永遠不能忘的驚異，就是我所訪問過的先鋒隊。他們在紅軍裏有一個親熱的外號叫做「小紅鬼」，差不多人人都喜歡他們，每一個紮營的地方，都有這麼一隊由共產主義青年團所組織的「小紅鬼」。他們的年紀都在十二至十六七歲之間，甚地麼地方的人都有。他們有的參加過這八千英里的長征，有的參加過去年向山西的出動。他們的職務是傳令、演劇、號兵、無線電報員、挑水夫、宣傳員、馬夫、看護、及書記等。

我記得在甘肅遇見過一個小鬼，他們都他叫山西娃娃。他是山西洪洞縣附近城鎮的一個學徒，當紅軍來到的時候，他糾合三個小夥計一起跳牆出去加入紅軍裏。他為什麼決定加入紅軍我却不_？知道，但閻錫山的反共宣傳和年長人的勸誡，對他們實在是適得其反。當我問他為什麼要加入紅軍？他說：「紅軍是為貧民而戰。紅軍是抗日的軍隊。為什麼別人不可以加入紅軍呢？」像他這樣加入紅軍的人還多着呢。

和這小孩成個對照，我在甘肅那個鎮裏還見過一個紅軍的老人，也是從山西來的。我遇見他的時候，他在紅軍裏當一名馬夫，他表示着不大願意幹這職務，他想到前線去，但那軍官告訴他這職務

也很重要，他祇好樂於從命了。我問他爲什麼喜歡紅軍，他從袋裏掏出一個日記本來。很驕傲的眩示給我。看那小本有他自己寫的二三百字。他說「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沒有人肯找麻煩來教給我認字，我入紅軍祇有半年光景，你看，我現在學的怎麼樣。」由此看來，怪不得紅軍去年向山西出動一次，便招募來了一萬五千個新的同志。

在紅軍裏，我遇見過幾個基督教的學生。我遇過一個會說英語的中國人，他從前當過基督教的牧師。我在寧夏遇見一個紅軍的士兵，他從前在山西一個基督教醫院藥房裏作事。他告訴我他現在還是一個基督徒，他每天祈禱也沒有人來干涉他，那些「小鬼」因此叫他管作「禮拜堂」。我見他的時候，他當一個理髮匠，他也似乎不大滿意這低微的地位。他把衣服擦起來，指着兩處他最近在火線上所受的榴散彈傷痕給我看。他說他對於從前基督徒的顧主仍然忠誠，因爲他們並不對他加入紅軍，而且告訴他和他的朋友，說紅軍都是些好人。他告訴我山西基督教醫院裏兩個美國大夫的名字，請我寫信告訴他們，說他現在很好而且很快樂，待革命完成以後，他還願意回到那醫院裏服務。我很不願意和那「禮拜堂」分別。他是一個好人，好理髮匠，而且是基督的忠實信徒。

在紅軍裏，我遇見過回教人和裸裸。我遇見過從奴隸式的學徒那裏逃亡出來的青年，我也遇見過爲紅軍解放的少女奴婢，他們在紅軍裏作看護，縫作制服或者作婦女團體的組織者。她們都很

勞碌並且總是歌唱着。

我遇見過二十三、四歲的青年，他們參加紅軍，有過十年的作戰經驗了，他們的家鄉，給「白軍」——他們對國民黨軍的稱號——毀滅了，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給白軍屠殺了。我見過徐海東，他是紅軍裏的著名軍官，他原是湖北的一個鑛工，後來作了鄂豫遊擊隊的領袖，漸漸變成一枝龐大的紅軍。徐告訴我，他的湖北家族有六十六個人給國民黨的軍官下令處死了，現在生存的祇有他和他一個同族弟兄。

由此看來，你也許會問共產黨爲什麼能誠意的要求國民黨及其他政黨成立一個聯合陣線？他們怎能忘却十年來所受的戰爭與痛苦？他們怎能忘却一九二七年國共分家時所感受的悲憤？

共產黨對付南京政府的政策是什麼？我且把我去年九月二十在安保會見埃維蘇政府主席毛澤東的一段談話引用出來作答案吧。

我問毛澤東：『請你給我說明一下，共產黨的聯合戰線政策和對國民黨政府態度的轉變好麼？』
毛答：『我們最近宣言中所公佈的政策是受了三個主要因素的影響：（該宣言在八月二十五日由保安向國民黨發出——施——樂）

第一是日本侵略的嚴重：這種侵略一天比一天的加緊，致使中國各種力量必須聯合以對抗之，

除掉共產黨之外，我們承認中國還有其他的政黨存在，而且，自然其中最有力量的還是國民黨，不同它合作，祇共產黨不足以抵抗日本，南京必須參加對日戰爭，國民黨與共產黨是中國兩個主要政治勢力，如果他們仍然繼續內戰，對於抗日運動是極大的不利。

第二是自從去年（一九三五）八月共產黨發表要求全國各黨聯合，一致對日的宣言以來，雖然國民黨仍然進攻我們，但是我們的建議已經引起全國民衆廣泛的同情，爲了救國，現在一般國民及許多愛國官吏，都熱望着國共兩黨的重新聯合，大家都盼望結束內戰，因爲不如此，抗日運動是遇着極大阻礙的。

第三是甚至國民黨裏的愛國份子也主張再同共產黨聯合，因爲民族危機的嚴重，南京政府裏面與其自己軍隊中的抗日份子，也都感覺到同我們聯合的必要。

這些是目前中國形勢的主要特點，基於這些特點，我們得詳細的重新考慮民族解放之具體方案，實際上，我們已在最近將這個具體方案提出與國民黨交涉，抗日爲我們主張的原則，爲了實現這種目的，我們相信必須建立一個民主國的國防政府，它主要的任務是（一）抵抗外敵侵略（二）賦與人民一切公權（三）積極發展國家經濟。

這樣一個綱領，能實現人民目前的願望，一定會得到全國一致的擁護，因此蘇維埃政府贊助成

立這樣一個全民的民主政府。

我們贊成一個議會代議制的政府，一個抗日國防政府，一個能援助與保護民衆愛國團體的政府，假如成立了這樣一個政府，中華蘇維埃將變成他的一部，我們要在我們的區域內實現如在中國其他部份內所實行的民主代議制度。

於是我又問：『那就是說，這樣一個政府的法律能同樣的施用在蘇維埃區域內嗎？』

他答：『是的。』

我又問：『然則現在的蘇維埃法律，尤其是關於土地問題的部分將被廢止了嗎？』

他答：『假如同南京的聯合戰線成立，這個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自然，我們知道日本和國內親日份子將要激烈的反對這種鋼領，但是中國人民一定會歡迎它，並且我們相信會得到成功，不然，如果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之下，則凡有良心的人，都能知道這是使中國人民走向滅亡的路子。

我們知道已經有一部分國民黨反對再向日本投降，在民衆中，各階級，軍人，科學家，學生，商人，警察，職工以及在蘇維埃裏工農，都已經自動的組織起來，抗日救國團體，同這些團體，我們要盡力的提攜合作，我們希望這樣份子聯合起來，去克服親日派與不遵守孫中山主義的叛徒。我們希望這些

份子，能協力來恢復並實現孫中山的基本主張與遺囑，那就是（一）聯合蘇聯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國家。（二）與中國共產黨聯合。（三）保障中國勞動階級之基本利益。我們希望這樣份子，能幫助實現孫先生的遺囑，並反抗日本帝國主義。

假如在國民黨裏開展了這樣一個運動，我們預備同它合作並支持它，希望造成一個類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的反帝聯合戰綫。我們相信這是救中國的唯一辦法，假如這個綱領實現，我們絲毫不必毫懼怕日本，日本帝國主義不能戰勝這個真實團結的、武裝的、與有組織的中國人民。

這似乎是一篇很清楚很坦白的談話。不過有人認為這種提議只是欺騙國民黨放棄政權的一種詭計。我看這倒太幼稚了——因為共黨既不能祇用言辭而使南京聽信，南京也不會這樣的易欺，使自已成爲一種詐術的犧牲品。我想這種恐懼是不必要的，因為共產黨和國民黨二者對於政治策略都很有經驗，不致輕信魔術。

照我看，國民黨或南京政府放棄任何權力給反對黨，是沒有什麼可能性，除非他在全國的嚴重壓迫之下，或除非絕對的積極要擴充他的政權的基礎以自衛。很顯然的，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只是壓迫南京樹立民主政府的勢力的一部。除非這種要求也受大部武力和非武裝民衆的支持，裝是很難實現的。

無論如何，近來事態的發展表示這種勢力正在動員。此次西安政變提出的要求，和紅軍及蘇維埃政府的要求相符，在根本原則上完全一致：停止內戰，成立代表制民主政府，要求言論自由，釋放政治犯，抵抗外國的侵略。將這個綱領和全國救亡運動的綱領比較，顯出大部非武装人民也同意這個方案。全國救亡運動雖然遭受了嚴重的鎮壓，過去一年中却變為很大的勢力了。如果危機照現在的路線發展下去，桂川綏晉冀魯諸省的意見也似乎要偏重贊成停止內戰，在中國開始民族和民主的復興的新時代。

西北事變爆發的根本原因，照我的意見，可以總括之如下：

- 一、厭惡十年來的內戰，不忍坐視國家被日分割。『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是西北的一致口號。
- 二、對於南京經敵人六年殘酷的侵略，而不作抗日戰爭的政策不滿。試看中國近年的損失，領土為全國五分之一，鐵路為百分四十一，未墾土地為百分八十五，鐵礦為百分八十，最好的森林地域為百分之三十七，國家出口貿易為百分之四十——許多人感到：這能損失，就是將來若干年南京怎樣建設，都不足彌補。

三、對於南京鎮壓應民族危機的需要而起來的愛國民衆運動的不滿。西北和這個愛國的民衆運動保持密切的關係。當日本作新的進攻，要侵佔綏北的時候，不幸南京竟同意日本的要求，鎮壓反

日運動，曾用武力和流氓手段破壞上海日沙廠的中國工人罷工。這次罷工含有愛國的和經濟的性質，來回答在綏遠的新的挑戰。南京同樣屈服在日本的這次罷工含有愛國的和經濟的性質，來回答在綏遠的新的挑戰。南京同樣屈服在日本的要求下，應允鎮壓青島的罷工工人。並且在一些喪權辱國的條約下，應允鎮壓任何將來在該市日本工廠的罷工——這個不幸事件正發生在西北事變的時候。

不過南京這時候，最刺激國民感情的事，或者是在上海逮捕全國知名的七個愛國領袖，這些人的影響已經深入所有中國抗日的各階層，包括武裝和非武裝的羣衆。同時十四種全國有力的雜誌，也一下子給封閉了。

四、或者比表面上顯露的更深刻的一個原因，是不信任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普遍的擴大，一般都認爲。南京預知德意日所進行的法西斯大同盟，而不能公開的責難反對。在西北和中國其他地方有一種信念，以爲事實上南京已經默認參加這個同盟，和日本成立反共協定。當德意這兩個法西斯國家事實上承認東北成爲日本的一「滿洲國」以後，而南京仍有多數的德意顧問，這是東北軍所不能忍受的。所以張學良文日通電中提到『近來國際情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爲犧牲。』

和日本進攻綏遠同時，對西北共黨第六次最後圍剿的準備也都作好了，這以足證明南京繼續

內戰的決心，而是東北軍堅決反對的。因為東北是在第一次圍剿時失掉的，侵略上海在另外一次，熱河失陷在又一次，而冀東察北是在繼續的剿共的戰事中失掉的。因此我們相信，在這次新的剿共戰爭中，緩遠必定要失掉的。

不過所有這些，祇是此次西安事變及全中國對它同情的背景的一小部分。整個事情在這裏說得太複雜了。為避免過於簡略的危險，我儘已所知識說一下，俾大家明瞭此事。

在基礎上西安事件是代表中國兩種相對立的勢力的尖銳的裂痕，這兩種勢力的對立比休戚相關的將軍們的命運還來得急切。其中一種勢力是構成南京政府基本的力量，是右傾的，他們恐懼任何民衆運動，反對民主，反對和共產黨妥協及致任何足以威脅獨裁霸權的政敵進行合作，假如政敵逼迫過甚的時候，他們有和德意等法西斯國家聯合的趨勢，最極端的少數派，甚至能聯合日本，進攻中國紅軍，再進攻蘇聯。

另外一個勢力，就是對委員長施行兵諫背後的勢力，代表中國最極進的反日分子。它要求立即對日作戰，所以他們擁護各黨各派各團體各軍隊的『聯合戰線』主張停止一切內戰，開放黨禁，實行民主政治來擴大南京政府的基礎，他們要求實現農業改良，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一個民衆運動，在這樣意義上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第二派還受抗日軍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學生運動，在野政黨，紅軍等有力的支持。它顯然也希望以後從英國美國法國蘇聯得到支持，成爲世界民主陣線的一部。楊虎城演講說『我們的運動和世界民主和平陣線是不可分離的。』第一派，至少當它很活躍的反抗第二派的勢力的時候，自然受日本和極反對中國親蘇參加民主戰線的國家的支持。

由西北向南京提出的八項要求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這次西北運動是兩派中的那一派：

-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 二、停止一切內戰。
-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 五、開放民衆愛國運動。
- 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 七、切實遵行總理遺囑，要求與蘇聯同盟，和共產黨合作，保護農工。
-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這些表示大部分有政治意識的中國人的良心的要求，據我看來，這似乎是自一九三一以後對

於中國政治有認識的人們中，很少人會反對的一種事實。

在這局勢中，共產黨站在什麼立場？誰都知的他們完全支持抗日運動，甚至於改換他們的軍隊的名稱爲『抗日先鋒紅軍』。由演講和廣播中得知，西安的領袖提到四種勢力聯合抗日，這四種勢力是，西北軍，東北軍，抗日紅軍和人民的羣衆運動——這就是政治，軍事上，受了訓練，武裝起來的西北成千成萬的工人和農人以及最近幾個月集到西安作政治工作的學生和兵士。

並且紅軍，和所有抗日軍隊一樣，反對繼續內戰。爲了反對南京政府的武力統一中國政策，他們要求最要緊的，是給南京適足的壓力以實現在堅固的民族的前進的，民主的基礎上的和平統一。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聯合簽名的通電中，有它給南京的提議如下。

『自西安提出抗日綱領以後，全國震動，南京的「安內而後攘外」政策，不能再續。平心而論，西安諸公愛國熱心，實諸首列。其主張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諸公，步驟較緩。可是除親日份子外，亦非毫無抗日者，能發動內戰，當非心願。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自速其亡！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本黨本政府謹向雙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爲界，南京軍隊勿向潼關進攻，西安抗日軍亦暫止甘陝境內，聽候和平會議決定。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並通知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派代表參加。本黨本政府亦準備代表參加。

三、在和平會議前，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並討論蔣介石先生處置問題，但基本綱領，應是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四、會議地址暫定在南京。

上述建議，實為解決目前緊急關頭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諸公，望立即決定國策，以免值此國家混亂中，日寇竟乘虛而入也！並望全國人民各黨各派，立即督促當局，召集和平會議，討論一定國策，共赴國難！

因為我相信，現在的局勢，雖然一定有它的喜劇的外表，實際却藏有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的最深刻的問題，我希望我已經能給你們談出一些緣因。這或者是一九二七年以來這國家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機。我沒有法子將這題目講盡了。我只希望我沒有使我的聽衆感到疲倦，謝謝諸位。

F調 (雄健) 中國人民大聯合

4/4

5 5 5 ——— | 56 45 3 1̇ | 2 2 2 ——— | 2 3 12 5 ———

中國人 聯合起來 | 向前進 萬眾一心

5 5 5 ——— | 56 45 3 1 | 2 2 2 ——— | 2 3 12 5 ———

中國人 聯合起來 向前進 奮勇衝鋒

6 6 5 5 1 1 6 6 | 22 1 1 3 3 2 2 | 5 5 6 6 3 3 5 5

我們團結我們前進我們奮鬥我們犧牲打倒那日本帝國

2 2 3 3 1 1 2 | 6 6 5 5 1 1 3 3 | 2 1 2 1 2 5 1

主義的 大本營 最後勝利必竟 歸于我工農商學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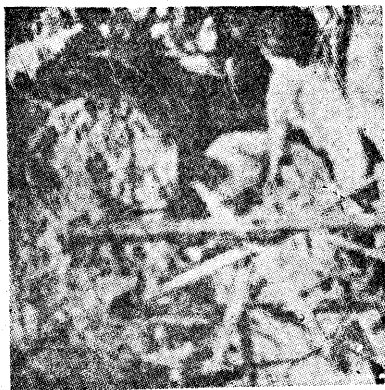
「紅軍之機關槍」

紅軍的武裝多半是從剿共軍方面得來的，他們有很好的美國造和英國造的機關槍，他們也有很好的機關槍射手。



「妙齡女匪」

她是吳起鎮的一個女工，是一個得過獎賞的裁縫。一個中國的新達哈諾夫運動者。



遊 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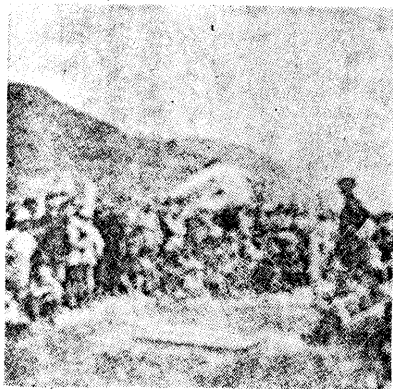
跳高，跳遠，爬山，賽跑，是紅軍最愛的運動。



「工作」



共產主義與紡車，是乎有些不配合，這裏的的少年工人是甘肅一個少年先鋒隊隊長，他很努力的工作他爲那帽上的紅星驕傲。



讀 書



在所有蘇維埃的俱樂部裏工人，士兵，學生及一般民衆都可以得到書籍，報紙及雜誌讀。紅黨用各種方法將「白區」的書報「走私」進去。他們因此對國際和國內的事情，非常熟習。



紅旗下的中國

美國施樂

尋找紅色中國

我在遠東八年期間，大部分時間耗費在中國，關於中國共產黨運動，曾發生好幾百個問題，可是大部分都沒有得到解答。在這些年之中，恐怕在國際間，沒有比中國紅軍的故事更神祕的了，恐怕沒有比它更偉大的沒有寫成的新聞史詩了。

中國蘇維埃，在世界上人口最繁的國家的正中心，正在戰爭着，可是九年之間，竟被如同堅石砲壘一樣有效的新聞封鎖，和外邊隔離起來。百餘萬的國民黨軍隊，組成一座活動的長城，永遠包圍着他們；他們的區域，似乎比起西藏來，更難達到。沒有人穿越過這座長城，而回來寫他的經歷。

即便在最簡單的各點上，贊成和反對的黨人們，都爭辯過，但是對於尋找客觀真理的人們，雙方却都缺乏可靠的證據。下面是每個關心東方政治的人，最感興趣的幾個問題：

我們先從什麼是「紅色中國」這一問題開始說起。

這樣的一個名詞，能正確地用在討論那些浮泛不定，時常改變的中國內陸地帶嗎？（這些地帶，

促進了中國紅軍的永遠繼續增長的活動。這個名詞能夠適用到現在在紅色統治之下的西北的廣大地域嗎？

在事實上，中國究竟有一個像紅軍這樣的軍隊嗎？是一個訓練好了的，服從一個綱領，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指揮之下的軍隊嗎？如果是這樣，那麼，這個綱領是什麼呢？共產黨肯定說他們自己是反對法西斯蒂（國民黨獨裁），為民主政治而戰爭的。獨裁者蔣介石就說他們只是有知識的土匪而已。誰是對的呢？或者說兩方都對嗎？一九二七年以前，國民黨被允許參加共產黨，共產黨也被允許參加國民黨，但是在那年的四月裏，開始了有名的『清黨運動』。當時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領導之下，共產黨以及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黨和成千的組織起來的工人和農民們，大規模地被屠殺了。從那時起，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同情者，都成了可用死刑處罰的罪案，而且已經有成千的人受到了這種處罰。然而更有萬千的人，仍舊繼續冒險，參加紅軍反抗蔣總司令的鬥爭。為什麼呢？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中的基本矛盾，是些什麼呢？

至少，中國共產黨像什麼組織呢？他們在什麼情形下，和各國的共產黨或社會主義者相同呢？在什麼情形下，他們和各國的共產黨或社會主義者不同呢？游歷者常問，是不是他們留蓄長的鬍子？不是喝湯的時候吵嚷？是不是在他們的行囊裏帶着自製的手榴彈？心思深遠的人想知道他們是不

是『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讀過『資本論』和列寧的著作嗎？他們對斯達林和托洛斯基的爲想是什麼；他們的運動，真正是世界革命的機構的一部嗎？他們是真實的國際主義者呢，或者只是感一個獨立的中國而鬥爭的國家主義者呢？

這些戰士們，這樣長期地戰爭着，這樣兇猛地，這樣勇敢地，一句話，這樣所向無敵的戰爭着，如同被各種彩色的觀察者，以及蔣總司令自己的部下所私自承認的那樣，到底是些什麼人呢？什麼使他們這樣地戰爭着？什麼東西抓住了他們？那些使他們變成這種讓人難信地頑強的戰士的希望，志願和夢想，是些什麼呢？（和中國特有的妥協精神的歷史比較起來，這是使人難以相信的。）他們經歷了好幾百次的戰爭？封鎖，鹽的缺乏，糧食的缺乏，疾病和流行病，最後又經歷了有歷史意義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這『長征』中，他們越過了中國十二省，衝破了成千成萬的國民黨軍隊，最後在西北他們的新的根據地勝利地出現了。

誰是他們的領袖？這些領袖們是在一種理想和主義上，有着沸騰着的信仰的受過教育的人嗎？或者僅僅是些沒有知識的農民，盲目地爲生存而戰爭？舉例來說，在南京名單上第一名『紅匪』毛澤東，是什麼樣的人呢？蔣介石曾經爲捕獲，生擒或者打死他，懸賞過二十五萬元啊。在這個價值最高的東方頭顱中，裝着一些什麼東西呢？其次，朱德，紅軍的總司令，他的生命對於南京也有和毛澤東同

樣的價值，又是什麼樣的人呢？還有許多別的紅色領袖們，他們曾被屢次地傳說着已經死了，可是又在報上出現，不僅毫未受傷，而且指揮着新的反抗國民黨的軍隊。這些領袖們，又是什麼人呢？

什麼東西可以說明他們的反抗着比他們優越許多軍事組織這種的驚人的記載？沒有一個工業根據地，沒有大礮，毒氣，飛機，金錢，和現代的技術——這些東西，南京已經在他們反『共』的戰爭裏，都利用了——他們是如何地生存下來，而且到今天，增加了他們的聲勢的呢？誰給他們當顧問？他們當中有些俄國的天才軍事家嗎？他們不僅擊退了一切送去征討他們的國民黨軍隊的指揮官們，並且也曾打败了蔣介石的龐大而用費很多的外國顧問團——這團部以前是由希克特（Yer Seekt）將軍率領的，希克特將軍現在就是希特勒的國防軍的領袖。

中國蘇維埃是一種什麼組織？農民們擁護它嗎？在他們已經集中了他們的勢力的區域裏，紅黨們實行『蘇維埃化』到了何種程度？為什麼紅黨們沒有佔領大的城市？這層是不是證明他們不是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而主要地只是一種農民的反抗呢？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從事於農業的，而工業本質主義仍然還在牠的強裸中，如何談得到『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呢？

紅黨們怎樣穿衣，吃飯，遊戲，戀愛，工作呢？他們的婚姻法律是什麼呢？婦女們是如國民黨當局所

宣傳的那樣被『共』着嗎？中國的『紅色工廠』是什麼？『紅色戲曲社』是什麼？他們如何組織他們的經濟？關於公共衛生，娛樂，教育，『紅色文化』等，又是如何呢？

最後，紅軍現在的實力如何呢？牠從那裏得到器械和軍火呢？假如像蔣總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佈的，南京已經『摧毀了共匪的威脅』，那麼，如何解釋今日紅黨佔據了一個較以前任何時候都龐大而統一的區域，一個在中國最有戰略價值的西北？假如紅黨是被消滅了，那麼，為什麼日本作為有名的廣田三原則中的第三項，要求南京和東京（也和德國）訂結反共協定，『防止亞洲的布爾塞維克化』？紅黨們真是反日的嗎？

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運動和政治運動的前途，是怎樣呢？牠是一種歷史的有力的發展嗎？如果是的，那麼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成功呢？雖然牠經歷了長期地奪取政權的鬥爭，牠能成功嗎？但是，假如牠已經是成功了，那麼，加上在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這種重大的變化，牠的結果影響會如何呢？在世界政治上，在世界歷史上，牠會產生什麼變化呢？牠會如何地影響英美及其他外國在中國廣大的投資呢？

在過去這是一件覺得可笑的事：為什麼沒有一個局外的觀察者，能夠確切回答這些問題。這是一個興趣和重要性日益增長着的問題。這正是中國的故事，如同新聞通信員，在拍發關於瑣碎的側

面觀察的稿件中，彼此互相承認的。但是我們在過去都是可怕地不知道牠。在『白』區中和共產黨接近，是非常艱難的。在頭上懸着死刑的共產黨，在中國社交上，是不公開承認自己是的。而且即便是在外國的租界裏，南京也有廣大的偵探組織在工作着。舉例說吧，像拍區克季文（C. Patrick Givens）這樣的警狗，都是被豐富地報酬着的。他是上海英國警察隊紅黨緝捕者的領袖，在他手下，有許多的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被逮捕，以後被監禁或被槍決了。

我們都知道：想知道一點紅色中國的事情的唯一的法子，只有到那裏去一趟。可是我們都原諒自己說：『沒有法子，』『辦不到。』人們都相信：沒有人能走進紅區，還能活着走出來。這就是幾年反共宣傳的力量，在這個國家裏，牠的新聞，是和在意大利或德國一樣地被嚴厲地檢查和統制着的。

但是這種情形在外國是不贊成的，特別是在美國，那裏對於中國紅黨的興趣，一天天地增加。兩年以前，美國出版者 哈利遜施密士（Harrison Smith）對我提出一個合同，請我著一本關於中國紅軍的書，而我在一時的樂觀中，接受了這個提議。但是，從未看見過紅軍，而來寫牠，（像有些人這樣做過的，）對於我，似乎覺得是不合法的，後來我不得不向施密士先生說明搜集可靠材料的困難，但他不能瞭解。他是太性急了，他想知道：爲什麼我不『只要買一張車票，走到紅色中國裏去就是了？』

但是，可憐得很，沒有人供給任何的車票，而且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似乎合同永遠不會被廢行了。後來突然地我得到了走進紅區的一種可能的辦法的消息。這種辦法需要立刻動身，拋棄我在北平的職務，放下我一本正在寫作而且幾乎快要完了的書。這個機會實在是太可珍貴了，是不容許放過的。我不再遲疑地決定了接受了牠，企圖着要打碎這種九年來的新聞封鎖。

這自然是帶有某種危險的，但是我決定相信讓報紙登載我的死的消息——被土匪殺死了——是多少有些言過其實的。對着充滿了被津貼的本地報紙和在中國的外國報紙上的許多關於紅色殘忍的可怕的故事，我是沒有一點點意思起程的。但是，最後我想：在這些年裏，已經有成千成萬的生命，被犧牲在革命戰爭中了，一條外國人的生命，也許能僥倖，努力尋出爲什麼的原因來吧？

我是在這種多少帶點衝動的情緒之下出發了。

到『西邊的安樂鄉』——西安

是六月初旬，北平正披着春的綠帶，密叢叢的楊柳和皇宮的柏樹，使紫禁城變成一個奇妙和媚人的地方。在這裏人們很難相信，在這個崩潰的中國，皇宮發光的屋頂的以外，有着勞苦，飢饉和革命北京的某種魔術，使着外國人在這個舊都一年復一年地住着，永遠不會意識到在牠的靜穆的隔絕

的城牆以外的人類的脈搏。

然而在剛過去的這一年，即便在北平這塊沙漠中的樂園，也被籠罩着全中國的鬥爭的氣焰侵入了。日本侵略的威脅，激發了人民的大的示威遊行，特別是在怒火中燒的青年學生之間。全北平的防禦組織，不能制止對於紅軍走經山西，開始抗日戰爭的驚人的企圖的響應——這企圖被蔣介石委員長的軍隊禁止了。英勇的學生們，追求着監禁和死刑，在街道上集會着，高喊着「抵抗」並且呼出「停止內戰！與共產黨合作共救中國！」等等違禁的口號。

一天半夜裏我跳上一輛破爛的特別快車，覺得略有點不舒服，可是在一種高度興奮的狀態中興奮是因爲在我的前面，擺着一個，空閒離開封建繁華天子之城幾千里外，時間距離幾百年的地域去的一個探險旅行。我是向着「紅色中國」出發。

然而有點不舒服，因爲我已經施用了一切可能有的注射了。我的血流一定是像一個游行的醫院，我的手和脚被注射着預防天花，腸熱病，虎列拉，瘟熱病，和流行時疫的藥針。這五種病在西北都是很流行的，而且，最近傳說在陝西有魚口疔的傳播的驚人的報告。在那裏這一種病是種風土病，患者很容易死去。如果這種冒險是值得的話，這是另一件事，不必管牠，可是被一個跳虱咬傷而病倒，是再滑稽沒有的事了，這我想是誰也會承認的。

我最近的目的地是西安府——這個名詞的意思是西邊的安樂鄉。西安府是陝西的省城，在北平西南，去要兩晝夜的疲倦的火車路程，他是隴海路西端的終點。從那裏我計劃着往北走，走入蘇區。這蘇區現在佔據遼闊西北的正中心。在實際上，這是紅軍首次佔有的最大的整個區域。由於一種奇怪的歷史的原因，這些在陝西北部，甘肅東北部，甯夏南部的蘇區，幾乎符合中國發源地的原有邊境。因為在過去，幾千年以前，中國人在這裏開始組織，統一了他們自己，或為一個民族。

平漢快車是很可憐的。車上的電燈設備失掉了作用，車掌不能說出的毛病的所在，它在最後一次從漢口開回來的時候，就不能再用了。在車廂和走廊裏，都點着蠟燭，光線還可以對付，可是因為不能夠打開窗戶，所以空氣的流通是很少的。我歎着氣。這一次列車，比較起七年前我頭一次在平漢線上坐的那一次來——那一次我是拿南京政府的一個客人的資格而旅行的——是更不可形容的一種列車了。

那時候鐵道部長是孫科博士——國民黨最大的領袖孫逸仙的長子。孫科請我作一次國有鐵道的旅行，並且還要我寫一篇關於牠的文章，我也寫了，認為前途是很有希望的那時候政府是充滿了去實現孫逸仙全國敷設十萬里新的鐵路的驚人的夢想的計劃……但是今天在今天，不僅沒有新的鐵路，中國所有的鐵路，比起一九二九年來，已經更少了，因為幾年前當日本佔領滿洲時，不抵抗

的損失了所有的鐵路的里數的百分之三十。

早晨我考查了一下我的旅伴，看見了一位青年和一位很好看的有一把白鬍子的老人，他們對着我坐着，喝着苦茶。一會兒那個青年和我說起話來，開始的時候，是說些禮貌的客套，以後不知不覺間說到政治上去。我發現了他的妻子的叔父，是一位鐵路上的職員，他是用一張免票來旅行的。他要回四川去，四川是他的故鄉，七年沒回去了，可是他不敢決定究竟能不能再回他的故鄉，據說土匪在那裏附近活動着呢。

「你是說紅黨嗎？」我問他。

「不，不，不是紅黨，雖然在四川也有紅黨，不是說紅黨，我是說土匪。」

「可是紅黨不也是土匪嗎？」由於好奇心我這樣問他。「報紙上總是叫他們做赤匪或者是共匪。」

「啊！你必須知道：報紙編輯們，必須叫他們做土匪，因為是南京命令着他們這樣做。」他這樣地解釋着。「假如他們叫他們做共產黨或者是革命者，那麼這樣就證明他們自己也是共產黨了。」

「但是在四川，難道人民不和怕土匪一樣地也怕紅黨嗎？」

「這層要看情形如何。富人們怕他們，地主們，政府官吏們和租稅的徵收者們也是怕他們的。但

是農民是不怕他們的。有時候他們甚至歡迎他們。」說到這裏，他機警地警視了那位老人一下，這位老人坐在那裏很注意地聽着，雖然表示着好像沒有聽的樣子。他繼續說：「你看，農民是太沒有知識，不明白紅黨只是想利用他們；他們以爲紅黨真的和他們嘴上所說一樣。」

「他們不認真要實行嘴上所說的嗎？」

「我父親寫信告訴我，他們在松潘（四川）真的廢除了高利貸款和鴉片，告訴我在那裏他們把土地重行分配了。所以，你看，他們不是土匪。他們有很對的主義。可是他們是惡人，他們殺的人太多了。」

這時候，白鬍子老頭，很驚奇地抬起他的和善的面孔，用一種很莊嚴的神氣，說了一句驚人的話：「他們殺的還不夠！他們殺的還少！」我們兩人都帶着詢問的態度注視着他。

不幸得很，車已經走近鄭州了，在這裏我必須改換隴海路的車，我們不得不中斷這個討論。可是以後總是驚奇着這位帶着孔子面貌的老人，怎會提出這麼一個驚人的見解。我旅行的第二天一整天，都在想着這件事。我們很慢地爬過在河南和陝西的黃土山的神祕坡面，直等到我坐的火車——這列車是很新而且很舒服的——滾到了新近築成的漂亮的西安火車站。

我到了以後，不久就去拜訪綏靖主任楊虎城將軍。——楊將軍在兩年以前，無疑地是在陝西那

些沒有被紅黨統治的區域裏的「皇帝」。

但是最近他不得不同幾個在西北的別的大人先生們，分享他的權力了。因為在一九三五年，少帥張學良——他從前是多年的滿洲的統治者——把軍隊帶入了陝西，而且就任了在這一帶的最高權位的紅黨驅逐者——即全國剿匪副司令。而且隨着少帥來了邵力子——蔣介石委員長的一位副手。這位邵先生是陝西省政府主席。

在這三個和一些其餘的人物之間，保持一種很細膩的勢力均等。而在他們全體的背後牽扯繩子的，是可怕的委員長本人，他努力着伸張他的獨裁到西北去，而且要毀壞青年的蘇維埃民主政治。邵主席在他的很寬大的街門的花園裏接見我，在西安塵土街道上的焦燥的炎熱之後，花園裏是很涼快舒服的。我過去最後的會見他，是在六年以前，那時候他是蔣介石的私人祕書，他曾經幫助我謁見委員長，從那時起，他很快地在國民黨裏高升起來了。他是個有能力的人，受過很好的教育，委員長現在加給他省主席的榮位，但是可憐的邵力子和其他省主席一樣，不能伸張他的統治權到省城灰色的牆以外，在這以外的區域的被楊將軍和少帥分去了。

或者提這件事是不敬的，邵先生自己曾經一度加入「共匪」。實在說來，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但是對他不應責備過嚴了：因為在那時候當共產黨是很時髦的，而且沒有人確實知道牠真是什

麼，祇是道一切前進的青年，都是共產黨。後來他退出了，因為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以後，共產黨的意義，成爲很明朗了，而且你會把你的腦袋爲此犧牲的，邵以後變成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以後他沒有再表現別的信仰的態度。爲什麼在我們的談話裏，他沒有一次用『土匪』兩字來提到紅黨——這可以拿他以前曾一度參加過革命來解釋。

『紅黨的情形是如何？』我問他。

『他們沒有剩多少了。在陝西的這些，僅僅是些殘餘。』

我提醒他說：在一九三〇年我和他會面的時候，紅黨也是說只是殘餘了。這種殘餘的長命，如何來解釋呢？

他很詭詐地看着我，發着笑，『有時候摧毀殘餘，比起摧毀全體來更難。』他解釋說。

『那麼，戰爭繼續進行着麼？』我問。

『不，現在陝西沒有戰爭。紅黨向甯夏甘肅移動着。他們似乎想和外蒙取得連絡。』

他把談話轉到西南的政局上，在那裏叛逆的將軍，那時候正要求着北上抗日。我問他，是不是他以爲中國應該和日本戰爭。『我們能夠嗎？』他追問着。接着他老實告訴我，他對於日本的感想不便發表的——正如每一個國民黨官吏，會告訴你他關於日本的意見——但不便發表的一樣。

當我們交換的意見，險些兒互相接近同意的時候；我祇好告別了。我已經從邵力子知道了我想知道的東西。他已經證實了我的北平情報者的話：在陝北的作戰，已經暫時停止了。所以，如果很好地安排一下，到前線去，應該是可能的。我接着就進行辦理手續。

所以不久以後，我便離開了「西邊的安樂鄉」，坐在一些國民黨兵士的中間，在一輛軍用汽車裏，向着「剿匪」前線進發。

到紅區去

我們在黎明以前離開西安府。高的木門從前一度叫做「金城」的，在我們的軍事護照的魔力之前打開了，而且鐵練響聲很大。

在黎明前的半明半暗中，我們的汽車走過了飛機場，這裏的飛機每天出發，在紅區上空偵查和投彈。

往前再走幾千碼，我們就達到漢朝（紀元前二〇六年到紀元後二二〇年）定都的舊址的邊界了。在坍塌的城牆裏，一個大的土邱上就是那漢武帝的皇宮寶座，你現在還可檢到從這些二千年以前的高貴的屋頂掉下來的瓦的碎片。

一個中國旅行者，在西安往北這條路的每一里路，都是引起對於古時候人民的富足，和有聲有色的表現發生感想。最近中國歷史上的突變——共產主義運動，選擇了這個地域來賭賽它的命運，似乎是得當的。

在一個鐘頭之中，我們渡過了渭河。在渭河河床流域，從前中國的祖先們，最早開發他們的米的種植，並且形成了一種在今日農業的中國的民間神話中，仍然有勢力的風俗。快到正午的時候我們達到了中部，那個高超而可畏的最先「統一」了中國的人物——秦始皇帝，就在大約在二千二百年以前，生在這個雉堞的城池的左近。秦始皇帝建築了中國的長城。

沿着這條新近完成的馬路邊，鴉片罌粟花點着它們膨脹起來的頭，已經成熟等待收獲了，這條馬路已經帶着被水沖刷的和車轍很深的皺紋，所以有時候，甚至於我們的六噸重的道濟汽車，都幾乎通不過，陝西很早就成了有名的鴉片省分。在幾年前西北大飢饉中，三百多萬人民的生命失掉了，美國紅十字會的調查員，把這種慘劇的大部分責任，歸罪於貪求捐稅的軍閥們，強迫人民種植鴉片的結果，這完全是真的。最好的田都專用到種罌粟花上去了，小麥蕎麥和玉米，本來都是西北的大宗產物，然而在大旱之年，竟極端缺乏。

我在洛川一家很鄙陋的客店的土坑上過了夜。第二天一早晨出發，離城幾里以外，黃土的高隴

越起越高，越來越莊嚴，境地是在神祕中改變了。

這種黃土地帶，包括着甘肅的大部，陝西，甯夏和山西諸省，這些地域的驚人的肥沃的原因——常有雨的時候——就是因為這種黃土，供給數十尺深的肥沃的多孔的上層地面。地質學家以為這種黃土是好幾百年前從蒙古及西方被起於中央亞細亞的大風所吹來的一種有機物質。在景緻上，這結果是成爲一種極端千奇百怪的，築成形狀——山是像些大的礮臺，像許多排大象一樣的很圓的堡壘，像被某種大手撕壞的大山脈，留下些發怒的手指的痕跡。發狂的，神祕的，有時候又驚人的形狀，像被在發瘋的船上的希臘酒神們所造成的世界一樣。

雖然在每個地方你都能看到田園和耕種了的地，可是你很少看到房屋。農夫們也被這些黃土山圍封着看不見了。普遍了西北，人們已經住在從神祕奇幻的山崖掘出來的洞裏，安立了他們的家，這無疑地已經是幾世紀的習慣了。這些「穴宅」中國人叫它做「窰房」。可是它們不是像西洋人的意義上的「穴宅」一樣。在夏天裏很涼快，冬天裏很暖，是很容易建築很容易清掃的。即便最富裕的地主們，常常也在山裏掘立他們的家。它們之中有些是有許多房屋的偉大建築物，很闊暢地排置裝飾着，有石頭的地板，高大的天棚，經過黑漆大門，光線從在土牆上所開的粉蓮紙糊的窗戶透過來。有一次，離洛川不遠，一個在我身旁坐着很皇堂的汽車的國民黨軍官，用手指給我一個這樣

的「窑房村」。它離汽車路只有一英里路的光景，那裏去一個很深的山谷的過道。

「他們是紅黨，」他說：「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們的一個聯隊被派到那裏去買小米。這些村裏的人，拒絕賣給我們一擔。蠢的兵士們用武力搶了一些。當他們往回走的時候，他們對他們開槍了。」他揮動他的手做一個弧形，包括了在大路上兩旁的一切東西——這大路是由國民黨軍隊十幾個堡壘所守衛着的——「在那一帶都是共匪區域。」

我用更尖銳的興趣，注視着他所指示的地方。因為在幾點鐘後，我要進行的道路，正是那一帶不相識的山脈和高原。

第二天下午我們達到了延安（膚施），這裏是陝北唯一能走有輪的車輛道路的盡頭——長城南二百上下英里。他是一個歷史上的城地，在過去好幾世紀，游牧的侵略者，從北方經這裏走來。成吉思汗，在他對西安征服的進軍中，在這裏經過，曾橫掃過他那大的蒙古騎兵隊。

延安是很理想的。適合於防禦，他是盤據在一個高的石質的沿山的中間。堅固的城牆爬到這些山的絕頂。角上新築成的砲壘上的機關槍，對着不遠的紅黨聳立着。那時候，公路和緊接公路附近還是國民黨軍隊所有，但是最近延安完全失掉對外的連絡了。紅黨把委員長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封鎖，掉轉過來加在委員長的一些軍隊身上了，有好幾百人被困而死於飢餓。

即便是飛機，對於圍城的紅黨，也證明了完全沒有用處。紅黨在山頂上安置着機關鎗——因為沒有高射砲——他們機關鎗運用的這樣準確有效，使敵人的飛機的駕駛員，強迫着不得不在極高度上飛行，以致於他們企圖扔到城牆以內去的糧食的包捆，因距離目的地太高了，實際上，大部分都落到紅黨的手裏，他們在延安城門以外，開闢了一個市場，把這些食糧賣回給被困的居民。張學良的外國飛機駕駛員，因為被射擊而懼怕了，一個美國人竟因此辭職。當我在西安看見了少帥的美麗的波音私用機，佈滿了子彈孔，我對他那駕駛員祇有同情。

我到延安前幾個禮拜，紅軍對延安的長期的圍攻，才解開了，但是在飢饉的容貌的居民身上，在空的架棚上和堵塞了的商店的門上，圍攻的痕跡，仍然是很明顯的，城中只有很少量的糧食，而價錢是很高的。那時一切能夠買到的糧食，都是由於與紅色遊擊隊暫時休戰的結果而得到的。爲着換得政府在這方面戰線上不對蘇區採取攻擊，蘇維埃農民，現在才把糧食和蔬菜賣給飢餓被困的南京軍隊。

我有一張到前線去的護照，我的計劃是第二天一早就離開縣城，走到「白」色前線上去，在那裏政府軍隊，僅僅只守住他們的位置，而不企圖任何的前進。以後我想從山裏的街巷中的一條岔道過去，從那裏，人們說，就是商人們私運貨物，出入蘇維埃區域的要道。

實在說，當一個國民黨的黨徒和我一起走的時候，而能像我的希望，經過最後一個步哨而走到無人區域去，本來是很難的。但是經驗告訴我，中國的一切事，祇要用中國的法子去應付，沒有辦不到的。因此我在等二天的早晨七點鐘，居然把國民黨的機關槍守備撤在後面，而行經一條紅白分界的小徑上了。

我是同一個在延安僱的脚夫一起走。他允許把我所有的很少的東西——一個行軍床，很少的一點食物，兩個照像匣子和二十四捲膠片，帶到第一個紅軍游擊隊的前哨。我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一個紅匪或白匪——但是他確像一個土匪。這一個地帶，好幾年了，由這兩種顏色的軍隊，交相統治着，他很可能的是這兩種土匪中的一個，或者兩種都是。我決定了最好不問不相干的問題，只馴服地跟隨着他，期待最好的事情。

四個鐘頭，我們完全沿着一條屈轉的小河行走，而且看不見任何人類生命的記號。幾乎是沒有路，僅僅只有河床，牠在兩岸高的石頭牆之間奔流着，而在牠以上，黃土的山很快的升起來。這正好給一個好事訪求的洋鬼子的一個好安置。祇有一件最引起不安的事件，就是脚夫對於我的牛皮鞋，不斷地表示贊美。

「到啦！」他突然地圍着我的耳朵喊着。石頭的河岸最後消失了，展開了一個狹小的山谷，嫩小

的麥子綴成一片青色。『我們已經到了！』

心情放鬆了。我注視周圍，看見在山旁邊的一個黃土鄉村，在那裏藍色的烟，從高的土烟囪向上捲。烟像是些長的手指，迎着山涯的前面直上雲端。幾分鐘後，我們就到那裏了。

一個年青的農夫，在頭上戴着一塊白布的頭巾，腰上掛着一枝手槍，走了出來，很驚奇地看着我。問我是誰，我要做什麼？

『我是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我說，『我想要會見本地窮人會的領袖。』

他的臉貌和善了，我看見他是很年青，有一個好看的黃銅色的臉皮。但是他不像屬於中國內地那種畏縮的農民。在他的快樂的發光的眼裏，有種挑戰的神情和某種勇氣。我很高興的看見他慢慢地把手離開他的手槍把，他露着白牙齒發笑了。

『我就是那個人，』他說，『我就是本地的領袖。走進來喝點熱茶吧。』

坐在他家裏墊着氈子的坑上，我關於我自己和我的計劃，更進一步的對他說明了。他好像很快地就相信了。我想到安塞去，那是縣城，我相信那時候毛澤東在那裏。他能不能給我一個嚮導和一個脚夫？

一定，一定，他同意了，但是我是不要在日中的炎熱裏的。太陽已經爬到正午的中天，而且，難道我

已吃過了嗎？實在我是很饑餓的，不帶一點更多的客套，我領受了他的宴請。

我的脚夫很急於要回到延安，我付給他錢，和他告別了。這是在將要來到的幾個星期裏，對於我和白色世界的最後的連繫告別了。我已經越過了「紅色的疆界。」

我現在是完全在劉龍火先生掌握之下了——我聽見這青年農夫這樣地被人們叫着——也是在他的一些粗壯的同志們的掌握之下。這些人從附近的窰房裏，開始鑽進來了。穿着同樣的服裝，佩着同樣的武裝，他們都奇怪地看着我，笑着我的外國聲調。

劉請我吃烟，酒和茶，追問我許多的問題。他和他的朋友，帶着很關切的興趣，問着讚美的呼聲，查看我的攝影機，我的鞋，我的毛襪，我的棉襖衫的格紋。他們一般的印象，認為這些東西雖然好像很可笑，但大體上很適合牠們的用途。我不知道，對於這些人，在實行中的共產主義的意義是什麼；所以我在等着看我的所有物，很快地會被「共產」了——但是，自然，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據我所能下斷語的，我所遭受的這種細密查驗的目的（這是比在別的邊疆所受的海關查驗，要快樂多了。）是爲着加強「外國鬼子是不可側摸的」這種以前保有的信念。

一點鐘以後，來了一大盤的炒雞蛋熱花捲，小米粥，白菜湯和一點薰肉。我的主人爲飯菜的簡陋道歉，而我却爲非常的食慾道歉。

龍火告訴我到安塞「只有幾步路遠。」因為他固執着他的意見，我雖然是不放心，但我除了等着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後來終於一個年青的嚮導露面了，跟他來的還有一個驢夫；時間已經過了下午四點了。在出發以前，我要給劉吃東西的錢，但他很莊嚴地拒絕了。

「你是一個外國客人，」他解釋着說，「並且你是和我們的毛主席有公幹的。再說，你的錢也不好用。」看着我給他拿出來的票子，他問，「你沒有蘇維埃的鈔票麼？」當我答覆沒有以後，他數出一塊錢的蘇維埃紙幣，「這個，你在路上是會要用牠的。」

劉先生收下了一塊國民黨的錢作為交換，我再謝謝他，跟在我的嚮導和驢夫之後，我走上了我的路程。

「很好，」當我跑上山以後，我對我自己說，「直到現在為止，一切都是很好的。」我已衝進了紅色的門戶。這是一種如何簡單的手續啊！

但是在途中，我遇着意外發生的事情我僥倖的逃脫了。這件事情以後就造成我被土匪搶了殺死了的謠言。事實上，在這裏安靜的黃土牆之後，土匪們——不是紅色的，而是白色的土匪們——早已經追蹤我了。

被『白色土匪』追逐

『打倒吃我們的肉的地主們！』

『打倒喝我們的血的軍閥們！』

『打倒把中國賣給日本的漢奸們！』

『歡迎和一切反日軍隊的聯合陣線！』

『中國革命萬歲！』

『中國紅軍萬歲！』

夜。
在這些有點動人的，用大的黑字裝飾出來的標語之下，我的命裏造定要在紅區裏，過我的第一

但是這不是在安塞，也不在任何的紅色兵士保護之下。因為，正如我所怕的那樣，那天我們沒有達到安塞。在太陽落下去的時候，我們僅走到躲在河灣裏的一個小村莊，四圍聳立着些沉默而黑黯的山。幾層石板屋頂的住宅，在溪岸矗立着，在這些房子的泥牆上塗寫着許多標語。五六十個農民和汪視着的兒童們，湧了出來迎接我們這祇有一個驢子的旅客。

我的年青的嚮導者——你要知道他是貧民會的一個密使——決定把我安置在這裏。他說，他的一個母牛最近產下一個小犢，鄰近的地方有狼，他必須要回去安排一下。到安塞還有十英里路遠，我們不容易在黑暗中走到那裏。他把我委託給本地貧民會的主席妥爲保衛，嚮導和驢夫都拒絕領受對於他們的服務的報酬，不論給他們白色錢或紅色錢。

支會主席是一個剛過二十歲的青年，黃色的面孔，穿着一件退了色的藍棉布背心，有一隻堅勒的赤腳，穿着一條白褲。他很歡迎我，而且對我很和善。他在村子的接待室裏給我安置了一間房子，並且給我送來一些熱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不喜歡這間黑暗而且氣味不好的房子。請求給我兩扇卸下來的門。我把這兩扇門放在兩條板凳上，打開我的被褥，在露天搭了我的床。這是一個美麗的夜間，在清朗的天上，煌耀着北方的許多的星。在我下面的小瀑布，像低聲歌唱着平安和寂靜。由於長期間的行走疲乏，我馬上就睡着了。

當我再打開我的眼睛的時候，天已經破曉了。貧民會的主席站在我跟前，搖我的肩膀。自然我被驚動了，立刻坐了起來，完全睡醒了。

「甚麼事？」我問。

你早一點走，』他勸告我。『最好早離開這裏一點，這裏附近有土匪，你應該快一點到安塞去。』

土匪。我正要答覆他，說我來正是爲的要會見這些所謂土匪的。可是我一轉念間，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不是說紅黨，而是指白黨。他的意思是指『白色的土匪。』我不用他再加勸說就起來。我不願意發生在蘇維埃中國裏，被白色土匪擄去的笑話。

讀者須知，用國民黨的名詞來說，白色土匪就是『民團。』爲着努力鎮壓農民暴動，國民黨逐漸組織這些民團隊伍了。他們的功用就是『保甲』制度裏的組織的一部分。這種『保甲』制度是一種統治農民的舊式方法，現在被國民黨在中國，和日本在滿洲國，很廣地採用着了。

按字面來講，『保甲』是『保障的甲冑』的意思。這樣的一種制度，規定着每十戶農家，必須要有一個首領，由這個首領，維持對農民們的威信，使本地縣官滿意。這是一個彼此互相担保的制度，所以保甲裏的一個人犯了法，保甲的全部或任何一部都要負責的。這就是蒙古人和滿洲人，統治中國成爲他們的大帝國的方法，也就是南京想統治中國成爲一個『共和國』的方法。

用這方法來防止農民組織反叛，幾乎是再好沒有的了，因爲保甲的領袖，幾乎永遠是富農，地主和高利貸者的——這些是國民黨的最熱烈的國民，所以很自然的，不願意『担保』任何有着叛逆傾向的佃農和負債的農民。但是不被担保，是一件很嚴重的事。一個沒被担保的人，在任何藉口之下，都能被當做一個『可疑的份子』而投進牢獄的。

這就是說，在實際上，整個的農民階級，是被放在地主和高利貸者的掌握之下。他們在任何時，都可以用拒絕担保的辦法來摧殘人民。現在，保甲制度的職務裏的一種，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種，就是爲支持『民團』的捐稅的徵收。民團是由地主們挑選，組織，指揮着的。牠的最主要的責任是和共產黨打仗，幫助徵收地租和分享收穫債務，收取放款和利息，協助縣政府收集不斷增加的軍閥捐稅。

這樣，當紅軍佔領一個區域，牠的自始至終的敵人就是民團。因爲民團除了供應他們錢的地主們以外，是沒有基礎的。自然這種基礎，當紅軍來了以後，就失掉了。中國的真正的階級鬥爭，可以在民團和紅色游擊隊之間的戰爭裏，最容易看出來。因爲在這裏，很普通地主們和他們以前的佃農和債務者之間的直接武裝衝突。民團的數目，有幾十萬，是二百萬中國正式反共軍隊的最重要的助手。

現在，雖然在這方面戰線上，紅軍和國民黨軍隊有一種停戰協定，但民團對紅色游擊隊的攻擊，是時來時往地繼續着的。在西安，洛川，和延安，我聽見有好幾百逃到這些城裏去的地主們，現在正籌劃或親自領導白色土匪，在蘇維埃邊境區域裏活動。找紅軍主要部隊的不在的機會，他們常常衝進紅色區域，焚燒搶劫鄉村，殺戮他們捉獲的農民。農民領袖們被捉帶到白區，在那裏地主和白色軍官們，給與俘獲這種的「共產主義者」的人一些重賞。

從事於突然的進攻，和很快的搶掠撤退，被民團認爲是紅白戰爭中，最富破壞性的工作。無論如

何，我沒有想用我自己去試驗白色土匪的「外交政策。」雖然我的所有物是很少，可是我覺得我的很少的一點錢，我所有的衣服和我的照像機，一定很能證明是足以引起他們的注意，因為祇要除掉了一個孤獨的洋鬼子，便可以把這些東西據為己有。

急匆匆地吞嚥了些熱茶和麥餅，我和支會主席所派的另一個響導和驢夫一同出發了。我們隨着河床走了一個鐘頭，偶爾經過小的洞穴村落，那裏有長毛的本地狗，很威脅地對我叫着，兒童守望者走出來盤問我們的「路證」——通行證。接着我們達到一個清靜的可愛的池邊，在這裏看見了第一個紅色戰士。

除了一匹好看的白馬，站在水旁吃草以外，只有他一個人。這個青年人正正洗澡，當着我們來到的時候，他很快地跳起，披上天藍色大褂，和一塊白布的頭巾，在頭巾上有一顆紅星。在他的屁股上掛着一把手槍，一些紅的穗子很輝煌地在木盒子柄上拖着。他把手放在他的槍上，等着我們向他走去，對響導者盤問我們的任務。響導者拿出他的路證，簡單地解釋他怎樣護送着我。紅軍戰士很好奇的注視着我，等着更進一步地解釋。

『我是來見毛澤東的，』我解釋說，『我知道他在安塞。我們到他那裏還有多遠呢？』

『毛主席嗎？』他很慢地問着，『不，他不在安塞。』於是他注視我們的後面，看看是不是只單獨

是我們。相信了我們以後，他的顧慮消失了。他笑了。好像有某種祕密的快樂似的。他說：『我正要到安塞去。我願意和你一塊到縣政府去。』

他騎着他的馬在我身邊走，我自告奮勇地再詳細地介紹我自己，也冒昧地問了他一些問題。我知道了他是在『政治保衛局』裏做事的，正是在這條邊境上巡邏值勤，馬是張學良的禮物。他告訴我，在陝北最近的戰爭裏，紅軍從張學良的軍隊，俘虜了一千多匹馬。我更知道他是姓姚，二十二歲。他已經當紅軍六年了。六年了！他會有多少故事可說呢！

我很喜歡他。他是一個外貌誠實的青年，很漂亮，身材勻合，在他的紅星下，帶着一捲發光的黑頭髮。在孤獨的山谷裏遇見了他，是壯膽的。真的，我甚至忽略問他關於土匪的事了，因為我們很快地談到紅軍春天裏到山西的東征。爲報告我報告關於這次東征在北平所發生的效果，他告訴我他在這次驚人的抗日東征裏，他所得經驗，在這次東征裏，紅軍的基本隊伍，在一個月之中，增加了幾乎到兩倍。

兩點鐘後我們到了安塞，牠位於延水——黃河的一條支流的對面。安塞是很小的，但他的城牆是很美麗。街道完全被人遺棄了，一切東西都在傾倒的殘餘中。我起先想，以爲這些東西，里是搶掠蹂躪的結果。但是更仔細一點的觀察，看不見焚燒的痕跡，而且很明顯的，這些頹毀的痕跡，都是很陳舊

的，而決不會是出於紅黨的手的。姚解釋說：這個城已經被十多年前的一個漫沒全流域的大水，完全摧毀了。

安塞的居民沒有重新建築這個城，他們現在在正面由窯房排列成像蜂房似的一個石頭山住着，這些窯房離城周圍很近。但是，在我們來到以後，發現了從前駐札在這裏的一支紅軍隊伍，已經被派遣出去追逐土匪去了，而地方蘇維埃的人員已經到白家坪——附近的一個小村鎮——對省委員做報告去了。姚自告奮勇地要護送我到白家坪去，在傍晚的時候就達到了。

我已經在蘇維埃區域裏居住一天半了，可是我沒有看見一點戰時慘痛的現象。我只遇見一個紅軍兵士，而全體居民普遍地表示着在極端的安寧裏，從事他們的農業勞作。但是我不會被外觀欺騙的。我記得，在一九三二年中日上海的戰爭期中，中國的農民們，如何地在戰爭的緊急當中，很明顯的毫不關心，去繼續進行耕種他們的田地，所以，當我們圍繞一個轉角，要走進白家坪的時候，我聽見最可怕的最慘酷的號叫的聲音，正對着我，但我也不是沒有準備的。

我決定不現露懼怕的狀態。向着戰場的呼滅的兇猛的聲音望去，我看見了十幾個農民，站在山坡旁邊的馬路上，揮舞着大刀長槍和一些手槍，態度是非常堅決。好像我這個衝入封鎖者的命運——是不是把我當作一個帝國主義者，交給執行槍決的隊伍，或者是把我當做一個詳實的訪問者，而

被歡迎——這一個問題，眼看地就要解決，不能再耽擱了。

我帶着一種很滑稽的面孔去看看姚，因為他正在大笑起來。「不怕！」他笑出來了。「不要怕！他們只是一些遊擊隊——在操練着。這裏有一個紅軍遊擊隊學校。不要驚慌！」

後來我知道了：遊擊隊的日課，包含有這種古代的中國戰爭呼喊的演習，正好像在封建比武的時代，在布克夫人英譯『水滸』的書中所描寫的那樣。我經驗了某種不知不覺的身體上的脊背上的戰慄，我能夠證明，在恫嚇敵人中，這種呼喊仍舊是有效力的。在黃暗中，當遊擊隊最便於行動的時候，在突然的攻擊中，呼喊着，這些呼喊是十分可怕的。

我剛剛坐下，和一個，由姚在白家坪介紹給我的蘇維埃職員開始會談，這時一個帶着印度英軍式的皮帶的軍官，騎了一匹出了汗的馬跑了進來。他很好奇地看着我。從他，我知道了我自己的冒險的整個的詳細情形。

這個新來到的人姓李，他是安塞紅軍保衛團的指揮。他說他正和一百多人的民團的會戰之後回來的。一個小農民兒童——一個紅色先鋒隊——跑了好幾里，幾乎完全筋疲力倦地來到了安塞，警告他們，說民團已經侵入蘇區了。又說他們的前鋒真是一個白色土匪——一個外國鬼子——就是指我。

「我馬上帶領了一個聯隊，到山上的小路上。一點鐘後我們看見了那些土匪。」李重述說着。「他們是跟隨着你的。」他指着我說。「只離你兩里路的光景。但是我們把他們包圍了，在山谷裏攻擊他們，俘虜了十八個人，其中有兩個領袖，和好幾匹馬。其餘的人逃跑出邊境以外去了。」當他簡短的報告完了，他的幾個部下走進院子裏來，領帶着幾匹被俘虜的馬。

「現在，」他突然地質問，在他詢問的視線裏，知道也問蘇維埃職員姚，和我。「這個外國人，在這裏做什麼呢？他要怎樣呢？」

「我的天！我這樣想着。」他真正以為我是帶領着民團的嗎？「白黨如果在無人區把我捕獲了，他們一定會把我當做紅黨看待，難道我從白黨逃出來，僅僅是爲的要被紅黨當我做白黨去俘虜嗎？我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在這一剎刻很有趣味的一剎那間，一個很漂亮的青年軍官出現了，他帶着很濃的黑鬚鬚。他走近我，用一種很柔和文雅的口氣對我說：「喂！你想找什麼人嗎？」

他說着十分漂亮的英文！

馬上我知道了：他是周恩來——最有名的紅色領袖，爲他的頭顱，蔣介石曾經懸賞過八萬塊錢。到了這裏，我是被他們接待了。

叛亂者

我和周恩來談了幾分鐘後，解釋給他我是誰，他就爲我安排好，在白家坪過夜，而且請我第二天早晨到附近的鄉村，他的司令部裏去。

我坐下來，和駐紮在這裏的交通部的一部份人員，一塊午飯，我遇見了十幾個住在這裏的青年人。他們有些是在遊擊隊學校裏的教員，一個是無線報的司機者，有些是紅軍軍官。我們的餐飯有煮的小雞，沒有發酵的蕎麥饅頭，白菜，小米，和我吃的最舒服的馬鈴薯。但是，習慣上除了白開水以外，普通沒有可飲的東西，而開水我是不敢嚐試的，所以我是非常地渴。

食物是由兩個漠不關心的青年小孩子傳遞。他們穿着很長的制服，戴着有尖的紅帽子，長的帽緣，繼續不斷地在他們的眼上敲着。他們起先很無興趣地注視我，可是幾分鐘後，我設法從他們兩人裏的一人，引起了友誼的微笑。我被這種成功鼓勵起來，當他走過我旁邊的時候，我就呼喊他『喂！』我要求着，『請給我拿點冷水來！』

這個青年人乾脆地不理我。幾分鐘以後，我試驗那另一個，可是沒有較好的結果。

一會兒我，看見了李克農——交通科的領袖——在他的厚鏡子眼鏡的後面譏笑我。他扯了我

的衣袖一下。「你可以叫他做「小鬼」。」他勸告我，「或者你可以叫他做同志，但是你不能叫他們「喂」。」在這裏每一個人都是同志。這些兒童們都是少年先鋒，他們所以在這裏，只是因為他們是來幫助我們的革命軍和義勇者。他們不是奴僕們。他們是將來的紅色戰士。

那時我原沒有侮辱的意思的，如果我停止了去想一下，我會知道對於少年先鋒隊，「喂」是不適用的稱呼形式的。牠正像英文裏的「嘿」是很不恭敬的。這是一個沒遇過的經驗，我覺得自己像一個沒有思想的蠢人。

這時候涼水真來了。

「謝謝你，同志！」我道歉地說。

這個少年先鋒隊，很勇敢地看着我。「不必客氣。」他說，「你不要為這樣的一樁事情，謝謝一位同志。」

我自己想：這些兒童真是敬人，我在任何的中國童兒們裏，以前曾沒有看見這樣大的自我尊嚴。這種第一次的遭遇，只是少年先鋒隊給予我的一串驚奇的開始。因為當我更深地穿進蘇維埃區域，我就在這些紅頰的「小紅鬼們」裏，發現鼓舞的，快樂的，有力的和服從的精神——驚人的青年的十字軍的精神，即中國紅軍的活生生的精神。

早晨護送我到周恩來的司令部裏去的人，是列寧主義青年團團員中的一個，司令部是一個用竹子防衛着的茅屋，周圍又有許多完全和牠一樣的茅屋圍繞着，在這些屋子裏住着許多農民，他們在戰區裏一點也不驚惶，因為在他們中間，有東方戰綫的紅軍司令官。這就是傳說着的紅軍在農民中的服衆望的祕密嗎？——我這樣地懷疑着——牠能夠像這樣地巖阻的推進別的區域嗎？在附近駐紮一些軍隊，鄉村的安寧完全不像曾被驚擾過。

在周恩來——為他的腦袋蔣介石懸賞八萬塊錢——司令部門前，只有一個守衛兵。

我看見屋子裏面是很乾淨的，但是很粗陋地裝飾着的。可看到的唯一的奢侈品，就是挂在土坑上的蚊帳。在坑的腳頭上，立着一對鐵的旅行箱。一個小的木桌子當做書桌用。當守衛兵報告我來到了的時候，周正灣身伏在桌子上看電報。

『我得到一個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於中國人民是很友愛的，並且說你是很可靠，能自己辨別真理事實，而為之宣揚。』周說。『這是我們想知道的一切：你是不是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我們願意歡迎任何新聞記者，來參觀蘇維埃區域。阻禁這件事，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能夠寫一切你所看見的東西，而且你會被給予一切幫助，去查蘇維埃區域。』

對於這種信賴允許的誠懇，我是有一點驚奇和有一點懷疑的。我本來想到：即便會被允許在蘇

區邊旅行，我會受到某些限制，像關於拍照，採集筆記，召集談話等等，但是他答應得太理想了；在別的某種地方一定會有缺點的……

很明顯地，關於我的「報告」是從在西安的共產黨的祕密總部來的。紅黨和中國的一切重要城市，包含有上海、漢口、南京和天津，有無線電的交通。雖然他們在「白」區的無線電台累次的被破壞，但國民黨在長時間破壞和紅區的交通，是永遠沒有成功。據周恩來說：自從他們用從「白」軍奪的器具，第一次建立無線電臺以來，國民黨永遠沒有能破壞紅軍的密嗎。

「我們幾乎翻譯了一切蔣介石所用的密嗎。」他說着。「所以我們能夠翻譯送給靠近我們的他的部隊的大部分信件命令。因為這種緣故，我們也能夠知道：國民黨從來沒有能得到我們的密碼的翻譯方法。他們得到的關於我們的行動的消息，幾乎完全不同而且不正確。」

周的無線電台，在離他的司令部很近的一個地方設立着。經由這個電台他和一切在蘇區裏的重要地方，和一切的前線上連繫。他甚至和總司令朱德有直接交通關係，而朱德的軍隊，那時候駐紮在千餘里外的川藏邊境。在西北蘇維埃的臨時首都保安，有一個無線電學校，在這裏有八十個學生，先前當過電報工程師專家，在那裏受訓練。他們從南京、上海、東京、伯利等選取每日的放送，供給紅色中國的報紙的消息和新聞。

周在他的小書桌前面坐着，把他的無線電報放在一旁——這些電報主要地是從沿着黃河，山西的對面，紅軍的東方戰線上駐紮的單位作來的報告。他開始爲我製造一個遊歷的路線。當他製完了以後，他交給我一張紙，寫着包含着九十二日的項目。

『這是我的介紹，』他說，『但是你是不是依照他，是你自己的問題。我想你覺得他是一個有意思的旅行。』

但是九十二天！而且幾乎一半的日子，會被用去專門在路程上。會看見些什麼呢？紅色區域會像那樣地廣大嗎？我沒有說什麼，僅僅關於路線做了一個腦子裏的保留。實際上，我化費了比他所建議的較長的時間，最後因爲我看見的非常少，只懷喪的就離開了。

周允許我用一匹馬，帶我到保安，有三天的路程，而且安排我第二天早晨起程。我可以隨着交通隊的一部分行走，他們正要回到臨時首都去。我聽說毛澤東和一些別的蘇維埃官員們，這時正在那裏，周並且同意打一個無線電報給他們，告訴他們我的來歷。

在我們的談話裏，我用很深的興趣研究周，因爲在中國和許多別的紅軍領袖一樣，他是一個活潑潑的人，同時也是個故事裏的人物。他有細弱的軀幹，中等的身材，細小的格架，儘管有長的黑鬍子。在外表上是有孩子氣的。他有大的熱情的深眼。他有着某種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好像是從羞赧，個

性的嫵媚，和命令的堅確的一種奇怪的結晶，產生出來的。他的英文有點口吃，但很是正確的，當他告訴我有五年不用她了，我是很驚訝。

我從一個舊同學那裏，知道一點關於周的事情，也從一些國民黨人們，知道一點，他們在大革命中和他一塊工作過。——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外國人叫做中國「國民革命」。從周恩來我會學習更多的東西。爲一個原因，他特別地引起我的興趣。很明顯地他是中國人物中最稀少的，一個純粹的知識份子，在他，行動，學識及信仰，是很好地結合着的，他是一個轉變成叛逆者的學者。

他是一個官宦的子弟，祖父有滿清朝廷，作很高的官，父親是一個很光榮的教師，母親是非常奇特的（一個實際上喜好近代文學的讀書很多的女子！）周恩來自己好像命運注定了要做一個大學者的前程，因爲從很早兒童時代，他有驚人的文學天才。並且，像他那個時代的許多別人一樣，在民族醒覺的時代中受着教育，他的文學興趣，是改變了。第一次革命以後，當中國的幼稚的文藝復興，萌芽了更重大的生長的時候，周恩來被捲入了到社會革命的運動裏去，這一運動動搖了中國的魂靈深處。

他在南開中學學的英文，得到的一種「自由」的教育。以後到南開大學，一個美國教會在天津主持的事業。他是他們班裏的出色的學生，在南開的三年中，他靠着學校津貼過活。以後就來了日本

的二十一條，袁世凱的企圖恢復帝制，全中國叛變的開始，爲民主和社會改革的運動，一九一九年的學生的革命。當一個學生的領袖，周恩來在天津被捕了，被監禁了一年。和他同時下獄的別的青年愛國者之中，有一個急進的女學生，天津女子師範的學生——這個女人，現在是他的妻子和同志。

釋放以後，周到法國去了。被戰後共產主義所影響，他幫助組織在巴黎的中國共產黨，也變成那時在中國組成的組織的創始人。在巴黎讀了兩年書，在英國讀了幾個月，又回到法國，以後又在德國讀了一年。一九二四年他回到中國，已經是一個很有名的革命組織者了，而且馬上在廣州聯合了孫中山，孫中山這時正和中國共產黨及蘇聯合作，準備國民革命。

在二十六歲，周成了廣州政治生活的領導人物，有名的黃浦軍官學校的秘書長，那時候的黃浦的第一名俄國顧問加命將軍的親信人。加命將軍現在是蘇聯遠東紅軍總司令。對於那時候黃埔的校長蔣介石，這位青年共黨，是一個眼中釘，但蔣被強迫着，不能不任命他做他的「政治顧問」，因爲周對於黃埔的急進學生，有大的勢力。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和北伐都進行了，蔣介石任總司令，由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選舉的。周恩來受命令準備一個叛變，幫助國民革命軍奪取上海。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沒有正式的軍事訓練，很少的關於工人階級的經驗，（因爲他是大布爾喬亞家庭的子弟，從大人階級隔離了。）沒有

指導書籍，告訴他如何地去鼓動一種暴動，沒有人當他的顧問，重要的俄籍顧問們都和蔣介石在一塊，周恩來來到上海，僅僅有武裝一個革命的決心，和一種強壯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在三個月裏，共產黨組織了八十萬工人，而且能夠號召一個總的罷工。回答是一致的，對於在中國外國帝國主義這個最大的堡壘的高貴的外國人民，這是一個驚人的經歷。但是這個叛變，沒有能實際化。沒有武裝沒有被訓練，工人們不知如何地去「奪取城池。」周需要由經驗去學習工人中間一個武裝的核心的需要，而軍人們給他以方便。

過低地的估價了第一次和以後的第二次罷工的重要性，舊的軍閥們，只斫了一些頭顱，但是沒有阻止工人運動，沒有明瞭周恩來，沒有禁止共產黨組織五萬工人糾查隊，沒有禁止給他們中開二百人的軍事訓練。沒有禁止他們武裝，和運手槍到城裏，組織了三百人的「鐵隊」不能這樣，就宣佈了軍閥們的末日。當宣佈了第二次的總罷工的時候，周恩來成功了，領帶着他的二人，第一先奪取郵政局，其次奪取警察局，以後兵工廠，在這以後就是勝利。

這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最驚人的政變。

這樣，蔣介石剛巧在後幾天來到上海的四郊，覺得他的戰爭已經是勝利了，而且能夠進城，從勝利的工人軍隊接受權力。也是這樣發生着：當一個月以後，蔣介石開始反革命和屠殺共產黨，在他的

罪人的名單上，這個曾經給他以勝利的危險的青年人，是第一名。這樣周恩來就開始了從國民黨逃亡的生活——他成了第三次革命的領袖，這次革命在中國舉起了紅旗。

周逃到武漢，又逃到南昌，在這裏他幫助組織有名的八一南昌暴動。以後到廈門，這裏紅色工人佔領了中國南部的大海口，在周恩來指導之下，抵抗了外國軍艦和本地軍閥的軍隊雙方的攻擊，支持了十天。以後到廣州，有著名的廣州公社的組織。

廣州公社的失敗之後，周被強迫着在地下工作——直等到一九三一年，他成功的衝出封鎖，走進江西福建的蘇區。在這裏四年精疲力竭的鬥爭，抵抵中國一切白色軍隊的綜合力量，抵抗外國的飛機炸彈，抵抗毒氣和坦克車，在一種英雄的努力中，亟救這個小的蘇維埃共和國。……重的病和極僥倖的逃脫。……接着，二萬五千里路的「長征」來到了西北的新的紅色根據地。

這樣的一種的堅強目標，這樣的完全放棄老中國的哲學見解，這種妥協的哲學和愛顧面子，這樣的忍受懲罰和困苦的驚人能力——這種紅軍的故事，是如何地完全非中國的啊！我告訴我自己，周一定是一個瘋癲者，他一定是一個瘋癲者，我找那眼膜的致命的光芒，這是被認為可以證明瘋癲的種類的。

但是假如是有的話，我是沒有能夠查出來。他說下去，慢慢地，平靜地，有思想地，有智慧地。他關於

蔣介石的觀察，由於它的客觀的態度，很少反映他個人必定感覺得到的。對於每個紅黨，都認為負有屠殺這麼多成千的人民責任的人的仇恨。

不，蔣介石不是一個蠢人——周恩來這樣想着。他在許多方面是陰險、狡猾和有才幹的。他是一個有手段的政治家。但是，當做一個指揮野戰的軍事領袖，他是沒有用處的，比起許多他的下級將官們，拙劣地多。蔣自己對於紅軍會沒有打過一個勝仗。周很有意思地笑着。『我們就只希望蔣指揮一切對我們的作戰。這樣戰爭會很快的結束的。但是蔣是不蠢笨的，他知道他的弱點的。他有好的軍事專家，像胡宗南和陳誠，而且他知道如何地去用他們。』

周稱讚總司令對於軍事策略的天才。『在過去十年裏，他從他的外國顧問：大多數是德國法西斯蒂，學習了許多的東西。他學習了而且進步了。在今天他大概是中國舊式軍閥裏最有能力的戰略家了。』

這很和平地說出來的議論，針對着九年來對於紅色領袖們的毀謗的背景，這些紅色領袖在國民黨的宣傳中被叫做「狂人」和「無知的土匪」，或者別的巧妙的名辭，把這兩方對照起來，是如何地奇特呀。

當周同着我沿着到白家坪的安靜的鄉間道路，經過芝麻和熟了的麥子田地，和點頭的玉蜀黍，

走回家的時候，他好像不適合任何對他常說那些形容詞。完全相反，他好像是真正地爽快，而且和「小紅鬼」一樣的充滿了生命的愛戀，這「小紅鬼」像大人似地在他後面走着，而周恩來伸出一隻父親似的手，圍繞他的肩膀。他十分像那種在南開學校遊戲中，吸引女性們的青年——因為在那些日子裏，周是非常漂亮，而且有一條像女子的苗條的身軀。

「那不會是種奇蹟嗎？」這位叛逆者，在他的天真的熱情的突然爆發中說了，當「我們有像他這樣的五千萬少年先鋒隊，佈滿全中國組織起來了的時候！有一日，我們總會成功的！」

雖然我是久經世故和多疑的，在那一刻時候，我是相信他的。究竟和佔領上海比較起來，牠好像是件小事件。

紅色伴侶們

第二天早晨六點鐘，我同一隊大約有四十個青年的交通隊，一同出發，他們是護送一隊貨物的駱駝隊，到保安去。

我發覺出來，只有我和傅金魁——紅黨們自己的外交部的使節，和李祥林——一個紅軍軍官，三個人騎着馬。可是也不能以辭害意，因為傅雖然可以坐在一個強壯的騾子上，但這騾子早已馱載

過重了；李祥林也坐在一個同樣載過重的騾子上。而我是漫然地跨在孤獨的馬上，這馬我有時候不能夠十分確定是不是還在我的跨下。

我的牲口，有一個灣月的脊背，和一種駱駝的脚步。他的可憐的瘦弱的腳，很危險地蹣跚着，我每一分鐘都等待着牠的摔倒，嚙了牠最後一口氣。當我們沿着窄小的道路爬的時候，牠是特別地困苦。這條窄的小路，是由我們沿走的河床那裏，高起的山涯斫成的。我好像覺得馱着我的重量，祇要任何一個突然的變動，會把我們一同扔到下面的石頭的山谷裏去似的。

李祥林坐在他的行李堆成的金字塔上，嘲笑我的困難和不安。「你坐的是一付好鞍子，同志，但是在鞍子下面的馬怎樣了？」

我的地位是不應該抱怨的，因為到底我算誰呢？我應該騎馬嗎？但是聽見了他的談話，我禁不住批評一句：「李祥林，告訴我這件事吧，像在這樣狗一般的馬上，你們如何能夠驅逐白匪呢？你們所騎的難道就是我所常聽見的不會打敗仗的紅色騎兵用的馬嗎？」

「不——不！不！你會明白的！你的馬壞啦，那就真沒有用了嗎？正是因為在後方，我們有像這樣的壞馬，所以在前線，我們的騎兵隊是不會被打敗的。我們在後方只是用騎壞了的馬。對於一切的東西：槍，糧食，衣服，馬匹，騾子，駱駝，羊——都是這樣的。——好的東西都給我們的紅色戰士同志，如果你想

要一匹馬，到前線去吧！」

我很快的便決心依從他的勸告。真的，如果在膝下沒有一匹好的光滑的牲口，能夠嚼到「土匪」存在的快樂嗎？

「但是，李祥林，怎麼你自己沒有在前綫呢？難道你也壞啦嗎？」

「我壞啦！決不會！但是你可以知道，在前綫捨棄一個好人此捨棄一匹好馬容易些。這就是剛才所說的話的意思。同志！」

李指揮真正是一個好人，一個好布爾什維克，一個會說故事的人。他已經做了十年的紅黨了，是一九二七年有名的南昌暴動的元老，那時候被逼到不是戰爭就是消滅的關頭的共產黨，開始在中國成爲一個獨立的力量。當我在李指揮旁邊騎着，走着，氣喘着，口乾着，上下陝西破斷的山路的時候，他一個又一個地，重述着發生的事件和典故，而且有時候，當被一再地催促着的時候，甚至彎着腰談論他自己。

他仍然還是一個青年人，大約三十一二歲。但當他慢慢地展開他自己的故事，你便知道他已經出生入死地十幾次了。我想生命對於他，除了是一種對於死的挑戰外，是沒有別的有思的。而在他身上，我開始發現一種特殊的性格，這種特殊的格，在這個奇怪的中國革命者們的鐵的友誼結合中，我

不斷地遇見的。某種東西，使着每個人的受罪成功，成爲大家集體的負擔和快樂；某種力量，把個人推翻了，消失了個人，使他們真正地忘掉他們自己本身，然而在自由和力量的尊貴之中，以及彼此共同吃苦耐勞之中，多少地表現他們自身。

且說，這樁事情，是使人不相信的，假如你認識中國！但是它是一樁事實！將來我試要解釋爲什麼。

李祥林是一個湖南人，在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他是一個中學生。他參加了國民黨，投入了黨的學校，在一九二五年，連同一個宣傳隊被學校送去作一件責任重大的工作。他們的職務是去拜訪土匪首領賀龍——現在在國民黨報紙上被稱做「罪惡昭彰」的賀龍，但每一個紅軍兵士都承認他現在是一個光明奇特的英雄。李祥林和他的宣傳隊，被派做代表去游說賀龍來順從國民革命的使命。

『即便在那時候，賀龍的手下也不是土匪，』當我們那天在一個小河旁的樹下休息的時候，李告訴我：『賀的父親，是哥老會的一個首領。賀龍承襲了他父親的威勢，所以當他青年時候，就名聲遍蓋湖南了。湖南人傳說了許多關於他的青年勇敢的故事。』

『當我們走去見他的時候，他已經被編爲省軍。他管轄一個區域，那裏正是從雲南到漢口的鴉片烟運輸隊必經之路，他恃着徵收鴉片烟稅爲生，而不搶掠剝削人民。他的部下，不好淫也不飲賭，不像別的土匪和大部分的省軍一樣，他更不准兵士們吸食鴉片。』

『我們的宣傳隊，向賀龍談了三個星期。他那時是不識字的，但不是個無知無識的人。他很快地明白了革命的意義。但他很小心地考慮和他的軍隊商量，最後他同意參加國民黨。他被命為國民革命軍的指揮，當革命到了湖南的時候，他使自己和革命聯合了。』

李說他和賀龍直等到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以後，才變成共產黨。在這個時候，湖南的腐敗的軍閥何健和蔣介石勾結了，並且開始了他的無恥的「屠殺農民。」

賀龍原在何健指揮之下，但是當屠殺繼續下去，這把他幾乎逼瘋了。他自身是從低級的農家出身，他是同情於窮人們的，他不能明白為何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能開始屠殺成千累萬沒有武裝的男女，而他們的罪名不過是作過國民黨自己組織起來的農會的會員。於是他變成紅黨了。

『何健是一切反革命軍閥們中的最殘忍最野蠻的，』李說，『我不知道他一共殺了多少人！一定有好幾十萬了。我只知道：在我自己的區域——湖南瀏陽縣，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到六月之間，他殺了二萬以上的農民，我那時在那裏，所以我知道。』

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如何地逃跑的，所以我問他，他拉開他的藍棉襖——在棉襖之下他沒有穿

別的東西——指着一條很長的有齒的疤痕，從筋骨到腰部。『你看，我沒有能完全逃脫呢，』他笑了。

我們決定到河裏去洗澡。我們投進水裏，臥在一塊長的平的石頭上面，淺的水在我們身上蕩起

冷的皺紋。一些農夫在我們身邊走過，在他們前面趕着一大羣羊；在頭上的天，晴朗蒼翠。在這裏除了和平和美麗以外，沒有別的東西，正在這神秘中午的時候，這世界好像幾世紀都像這樣，只有和平與美麗。

有幾個「小鬼」爬向前來，扔了一塊大石頭到我們後面，濺了許多水到我們頭上。他們自己很高興馬上跑開了，李望着他們背後笑了。

「我的孩子如果留到現在，會要有他們這麼大了。」他突然提起來。「但是他和我妻子被何健殺死了。」

我漸漸明白了一點爲什麼中國紅黨戰爭了這樣長久，這樣地不妥協，這樣不和中國人一樣的。當我更前走了幾十里我從一些別的紅色伴侶那裏，知道了更多這些事。

第一天以後我騎在馬上的時候很少，不是因爲可憐這匹老馬，而是因爲別人都是走路。李祥林是這一隊人裏面的最老的戰士，大部分別的人，都是十幾歲的兒童。他們之中有一個綽號叫做「老狗」的，我和他一齊走，問他爲什麼參加了紅黨。

他是一個南方人，從中國南部福建蘇維埃區域，隨着紅軍的長征，一直來到西北——這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是外國軍事專家，不會相信牠的可能的。但是這裏就是「老狗」年紀十七歲，但看來

只像十四歲，他完成了這個長征，而不把它當做一回事。他說：假如紅軍須要的話，他準備再走二萬五千里。

和他一塊的，有個綽號叫做「老表」的，他是十六歲。

我問過他們喜歡紅軍嗎？他們帶着真摯的驚奇看着我。很顯明地，他們任何一人，從來沒有想到過，會有人不喜歡紅軍的。

「紅軍教給我讀書寫字了。」老狗說了。「在這裏我學會了運用無綫電了，也知道如何能準確地射擊。紅軍幫助窮人們。」

「就只這些嗎？」

「牠對於我們是很好的，而我們永遠沒有挨打。」老表接着說了。「在這裏一切的人都是平等的。不像在白區裏，在那裏窮人是地主和國民黨的奴隸。在這裏一切人都為幫助窮人而戰爭，為拯救中國而戰爭，紅軍和地主與白匪戰爭，紅軍是抗日的。現在，請告訴我，為什麼有人不喜歡像這樣的一種軍隊？」

有一個農夫的小孩，他在四川參加了紅軍，我問他為什麼要參加的。他告訴我，他的父母是窮的農夫，只有四畝地，不能夠養活他和他的兩個妹妹。當紅黨來到他們的鄉村的時候，一切的農夫都歡

迎他們爲他們泡茶和做點心。紅色的戲曲家爲他們表演戲劇。這是一個快樂的時候，只有地主逃跑了，當土地被重新分配的時候，他的父母，得到了的他們的一份。所以當他參加了窮人們的軍隊的時候，他們不但不發愁，並且很快活。

另外一個青年人，大約十九歲，從前是湖南的一位鐵匠的徒弟，綽號叫做「鐵老虎」。紅軍到了他們縣裏，他扔了風箱，火爐和徒弟的職務，僅僅只穿上雙草鞋和褲子，急忙跑開投入紅軍了。爲什麼呢？因爲他想和令他們饑餓的師傅們打仗，想和搶去了他們父母的土地的地主們打仗。他是爲解放窮人們的革命而戰爭，紅軍對於人民是很好的，他不像白軍們搶他們打他們。他扯起來他的褲腳，很驕傲地擺露出來一條長的白疤痕——他的戰爭的紀念品。

還有一個從福建來的青年人，一個從浙江來的，幾個從江西四川來的，可是大多數是陝西甘肅的本地人。有些已經從少年先鋒隊畢業，雖然他們外表像小孩，可是已經當了好幾年紅黨了。有些參加是爲了去和日本作戰，兩個參加爲的要脫逃奴役，三個拋棄了國民黨軍隊，但他們的大多數參加是『因爲紅軍是一個革命的軍隊，和地主帝國主義戰爭的。』

以後我就和一個聯隊的指揮官談話，他是一個「老一點」的人，年紀二十四歲。他從一九三一年起就在紅軍裏。在那一年他的父親和母親都被南京轟炸機炸死了，並且把他在江西的家燬滅了。

當他從田地裏回到家裏的時候，看見了他的父母都死了，他馬上扔下他的耒頭，和他妻子告別，投入了共產黨。他的一個兄弟，是個紅色游擊隊，一九三五年在江西被殺死了。

他們是很混雜的一羣，但比起普通按省份區分着的中國軍隊，在組織上更具有真實的「民族性」。他們的不同省份的背景和方言，沒有把他們區分開，並且常常變成了很要好的夥伴。在他們之中我從來沒有看見一件很嚴重的口角。實在，我在蘇區整個的旅行裏，沒有看見一件紅軍兵士之間的交手打架，我認爲這件事在血氣方剛的青年之中，是很難能的。

雖然悲劇幾乎接觸了他們全體的生活，但是也許是他們太年青了吧，悲劇並沒有使他們沮喪。在我看來，他們好像是真正快樂，而且或者是我第一次看見的中國普羅列塔利亞從心裏快樂的一羣。消極的自滿，是在中國的普遍現象，但對於生存的積極感覺的高一層的快樂情緒，實在是稀少的。他們在路上整天的唱，而他們關於歌的來源是無止境的。他們的歌唱並不是由於命令，都是自動的。他們唱的很好，完全是由心坎流出的。每當靈感激動了他的時候，或者他想到了一個適合的歌，他們裏的一個人，會突然的爆發出來，而指揮官和士兵都聯接起來。他們在夜晚也唱，從農民學習了許多新的民間的調子，這些農民帶來了他們陝西的胡琴。

他們所有的紀律，幾乎完全都是自己訂立的。當我們走經一些在山上的長的野杏樹的時候，猝

然人都分散了，直等到每人都裝滿了他的口袋，而且總有人帶回一手捧給我。於是，離開這些樹，他們恢復了秩序，就很快地前進，追補剛才耽誤了的時間。但是當我們走經私人的果園的時候，沒有人動在裏面的果子，而我們在鄉村裏消費的五穀蔬菜，都是十足給錢的。

盡我所能觀察到的，農民們對我這些紅色戰士，沒有仇恨。相反的，他們好像彼此有很親密的友誼，而且是很忠誠——這種事實，或者不是與最近的重分土地無關的。他道所有可吃的東西，都很有地拿出來賣，而且毫不躊躇地接受蘇維埃貨幣。當我們在正午或日落的時候來到一個鄉村，本地的蘇維埃主席，很快地會為我們準備地方，指定爐火給我們用。我屢次看見農夫家女人和他們女兒，自願地拉扯我們的火爐的風箱，和紅色戰士們哂笑談諧——這對於中國婦女是極解放了。特別是陝西的婦女。

最後一天，我們在一個綠色山谷之中。一個鄉村裏停下吃午飯的時候，那裏的一切的小孩們，都來了圍着觀察他們平生第一次看見「外國鬼子」。我決定了要盤問他們。

「什麼是一個共產黨？」我問。

「他是一個幫助紅軍攻擊白匪和日本的公民。」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說了。

「還有什麼？」

『他幫助攻擊地主和資本家！』

『可是什麼是資本家呢？』這句話把那個小孩子問的說不出來了，但是另一小孩子走向前來：『一個資本家是一個自己不工作，但是使着別人替他做工的人。』這或者是太簡單了，但我繼續問下去：

『在這裏還有些資本家和地主嗎？』

『沒有！』他們大家一齊喊。『他們都逃跑了。』

『逃跑了？爲什麼逃跑的？』

『躲開我們的紅軍逃跑的！』

『我們的』紅軍，一個農民兒童談論「他的」紅軍那麼，很明顯地這不是中國，但是，如果不是的話，那是什麼呢？我決定了，這是不可說的，誰能夠教他們所有這些事情？

以後當我考察紅色中國的教科書的時候，當我遇見聖誕老人徐特立——從前長沙師範的校長，現在蘇維埃教育委員——的時候，我會要發現他是誰的。

真的，我在這天的下午，當我們的小駱駝隊下了最後的山坡，踏進保安——「中國人民蘇維埃共和國」臨時首都的時候，就會要見他的。

毛澤東——蘇維埃的台柱

在西北方面小的鄉村很多，但是大城小鎮是很少見的。除了紅軍開辦的工業區以外，完全是農業地域，而且有些地方是半游牧的。所以經過崇山峻嶺峭壁懸崖，走到羣山環繞的紅色中國的臨時都城——倒覺得豁然開朗。是在山坡下面，一片綠色的凹地上，展開了頹舊的保安古城。

保安從前是邊疆的重鎮，在唐金兩朝，是抵禦北狄進襲的要塞。殘破的堡塞還依然存在，在夕陽斜照之下，還可以看到。山坡側面蔓延着窄狹山道，據說是從前蒙古南侵騎兵出入的而口，此外還有一個內城，在這裏會駐過守戍的軍隊。有一個很高的用石頭砌成的要塞，周圍有一方哩，近來被紅軍修理改善了，保安城就坐落在這裏面的。

也就是在這裏面，我最後見着了紅黨的領袖——毛澤東，爲着他南京已經戰爭了十年，用他的官銜來稱呼的話，他是現在「中國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

他們已經接到了周恩來的無線電了，正在等着我。在外交部裏爲我預備了一間屋子，而我暫時成了蘇維埃政府的一個客人。我的來到，造成了在保安的外國居民的一個百分之百的驚人的增加。那另外一個西洋人的僑民，是一個德國人，被稱爲李德同志，他是紅軍唯一的外國顧問，這事太使希

特勤難堪了。關於李德的事，以後再談。

我到了不久就遇見了毛先生。他是一個細高，瘦長，有點林肯風味的身材；有些駝背，一頭的密黑的頭髮；大而銳利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很凸出的頰骨。在相見一剎那裏，我對他的印象，是這樣：我覺得他具有一個機警智慧的，而是知識階級的面孔，不過，以後幾天，我始終沒得機會來證實這種印象的正確。我第二次看見毛先生的時候，是在黃昏的時候，光着腦袋，和兩個年青的農夫，在街上指手劃腳的，一面走着，一面談話地。在許多的行人中，我沒有能認出他，後來人家指給我看，我才知道他。他很隨便的走着，沒帶一個衛隊，雖然南京在他的頭上，用着二十五萬的賞格。

關於毛澤東我可以寫一本書。我和他談了好幾夜，談到一些很寬廣的問題，我又從許多的兵士和共產黨員聽到許多許多的故事，我和我的會談，紀錄，寫成的已有二萬字。他告訴我他的生活，他如何愛上了北京大學某教授的女兒，如何變成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領袖，又爲什麼變成了共產黨，以及紅軍是如何發展起來的。他更提到紅軍如何舉行了到西北的長征；關於這次長征，他寫了一首古典的詩。他還告訴我許多別的共產黨員的故事，上自朱德下至背運兩個——滿裝蘇維埃政府文件的——鐵箱，走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青年。

從這些未出世，甚而從來未公開的寶貴材料裏，我沒法簡段節說，用幾百字來告訴你，關於這個

農民出身，而轉變成革命者的知識份子。他的生活可說是中國近一代最豐富的交叉點，也就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啓發的文件。

第一，不要以爲毛澤東是中國的救主。這是瞎話。永遠不會有任何的一個中國的救主，但是不可否認的，你在他身上要感覺到一種確定命運的力量。它不是某種過激和華潤的東西，而是一種堅強的基本的活力。你感覺出來：在這個裏面，有一着特點，滋長到不可測摸的程度。那就是他綜合的表現了千百萬中國人的急切的要求，特別是農民的。這些農民是貧窮困苦，營養不足，被人剝削，目不見的，可是他們却溫柔和善，寬洪大量，猛勇驚人，而且現在是很有反抗精神的人類。他們在中國人民中占大多數。假如這些要求和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振興中國的動力的話，那麼在這種深闊莊重意義下，毛澤東確有成爲中國偉人的可能。

但是我不敢宣佈歷史的批判，不過就是拋開了政治生活，從爲人個性上來看，毛先生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雖然他的名字對於許多中國人，像蔣介石那樣的熟識，但關於他個人生活，人們所知道的還是很少，而且有許多關於他的神話存在着。我是會和他會談過的外國記者的第一人。

毛先生爭得了一個有神祕生活的美名。他被南京屢次地宣傳說「死了」。但幾天以後，又回到新聞攔裏，和以前一樣的活躍。當他拜訪紅色中國的時候，他正是在一個報紙上見不到他的時期裏，

但我看見他確確實實的活着。但是，他的神祕的生活，好像是有些根據的。在事實上，他雖然參加了幾百次的戰爭，雖然有一次被敵軍捕獲了而又逃脫了，雖然他的首級上掛着一筆世界上最高的賞格，但在這些年，他從沒有一次受過傷。

在保安一天晚上，當他正被一個紅黨的外科醫生檢驗身體的時候，我恰巧在他家裏。這位醫生是從法國回來的，深明醫理的留學生，他說毛先生的身體，是十分康健。他絕不如報紙上所常常傳說的，說他有肺結核病。他的妻子和同志——以前是一個學校教員，現在也成了一個共產黨組織者——不如他這樣地倖運。她在身體上有了十八處傷，但都是些表面的輕傷。正當我離開保安之前，毛氏夫婦，作了一個新產生的女孩子的高傲的父母了。

毛澤東現在是四十四歲。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到會的代表，代表着那時候生活在紅色法律之下的九百萬人民——他被選舉做「蘇維埃中央政府」的主席。他的勢力在整個共產黨的中國，大概要大於其他任何人的。可是每個人也許都秉着盎格羅撒克遜人民民主精神，雖然都知道他，尊敬他，但在他四周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把他當作偶像式的英雄崇拜着。更與蘇聯把史太林如同「半上帝」被供奉着，絕不相同，我從沒有遇見一個中國紅黨把毛先生當做人類以外的東西來看。我也沒遇見一個人，口裏掛着「我們的大領袖」等等辭語，並且我更從沒有遇見一個人，

不喜歡他和不稱讚他的。

我對他的觀察，他好像是一個有趣味的而且複雜的人。他具着中國農民的樸浮和天真，具有幽默和活潑的感覺。和自己很容易發笑。他是平易地說話，平易地生活，而有些人會以為他是很粗野鄙俗的。這些個好像不適合於一個大領袖的性格——特別是自己發笑的毛病。然而他合併了鄉村的天真的、奇怪的性格，以及最銳利的智慧和世俗的詭辨在一處。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一種天生的智慧——大概是對的。然而毛也是一個中國古典文學的成功學者，一個博覽羣書的讀書人，一個高深的哲學和歷史研究者，一個口齒伶俐的演說家，一個博聞強記的人，一個善於屬文的作家，在個人的習慣和外表上非常粗心大意，但就中國人說來，他是對於職務的細節上，是特別苛求的，一個具有不知疲倦的精力的，一個列寧似的天才軍事和政治的韜略家。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實，許多日本人把他看作現代中國最有能力的軍事家。

紅黨正在保安建築些新的樓房，可是當我在那裏的時候，設備是很簡陋的。毛先生和他的妻子，在一所兩間用蓆遮蓋的房子裏住着。他住過比這樣更壞的房子。而且因為他是湖南一個富農的兒子，他也住過更好的房子。他們能誇張的唯一的奢侈品，祇是一床蚊帳。除此以外，他和紅軍弟兄們是一樣生活的。在領導紅軍十年之後，在沒收地主官吏和捐稅徵收員的成千成萬的土地財產以後，他

的私產僅僅是他自己的破褥，少數的隨身所有物，和兩身棉制服。雖然他是紅軍指揮官和主席，他只在大衣領口上，戴着兩條紅線，這是紅軍兵士普遍的標誌。

我好幾次和他一齊到鄉民的，和紅色仕官的羣衆集會裏去，也一齊到紅色劇社裏去。他常常靜悄悄坐在羣衆之中，而得到隨便享樂的機會。我記得有一次在抗日劇曲休息的時候，有一個一致的要求，請求毛澤東和林彪一同合唱。林彪是一個二十八歲的紅色大學的校長，以前是蔣介石總部的名的青年仕官。林像學校裏的小孩一樣地紅了臉，他倆從普通座位中走出來，各作了一段優美的演說之後，由女黨員們合唱一隻歌才算了事。

毛的食物是和普通人的一樣，但是因爲是個湖南人，他有南方人愛辣的嗜好。他甚至於用辣椒煮在麵餅裏。除了這個嗜好以外，他很少注意他吃的是些什麼。有一天晚間吃飯的時候，我聽見他講一種喜歡吃辣椒的人，常是革命的理論家。他第一舉出他自己的省份湖南，是由於出產革命家而出名的。接着他列舉西班牙，墨西哥，俄羅斯，和法蘭西來擁護他自己的理論，可是當有人提出著名的意大利人，喜歡吃紅辣椒和大蒜，來反駁他的理論的時候，他只好發笑地承認自己失敗。

「紅軍」們最有趣味的一個歌，很巧是一個名叫「熱紅椒」的小歌謠。這歌謠述說辣椒對於自己沒有鋒芒的植物，專等着被人們吃用而存在的譏笑，和牠如何嘲笑白菜，菠菜，大荳等等的內容，

和它們沒有好的前程。結果它領導起來一個植物界的暴動。

——這就是主席的最大的嗜好。

他充份的表現着完全從妄大自尊的惡習中解放了，但他有一種很深的自尊的觀念，當他決定某種事情是必須的時候，他顯出某種無情的決定的力量。我從沒有見他發怒，但從別人聽到，他有兩三次被激到大怒。在這種時候，他的譏諷和責罵的命令，是很文雅而要命的。

我發覺他驚人地熟知世界現在政治情形。即便在「長征」中，紅黨們好像也接到無線電的廣播新聞。自然，在西北，他們發行他們自己的新聞。他特別地熟讀了世界歷史，而且關於歐洲社會的和政治的情形有真實的了解。

他對英國工黨非常感覺興趣，很深刻地詢問我它現在的政策，很快地就問盡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他覺得很難澈底明白爲什麼在一個工人被解放自由的國家裏，仍舊還不能有工人的政府。我恐怕我的答覆沒有能使他滿意。他對麥克唐納表示十分的輕蔑，把他指成英國人民的漢奸。

他讀過了一些關於印度的書籍，而對印度有些確定的意見。這些意見裏的主要的，就是印度獨立，不經過一個土地革命，永遠不會實現的。關於甘地，爪哇哈拉斯奴，蘇哈西呢，茶圖拍得黑（Gandhi Jawarhalala Nehru Suhasinichattopadhyay）和一些我所知道的印度領袖們，他問了我許多

問題。關於在美國的黑人問題，他也同樣地深刻的了解，並且不愉快的把黑人和在美洲的印第安人的待遇，和蘇聯對少數民族的政策相比較。但是當我指出在美洲的黑人的歷史的和心理的背景中，和俄國的少數回教民族的歷史的和心理的背景之中的某些異點以後，他也是很感興趣的。他也注意到在美國的禁酒運動，貢獻給我一個很明澈的分析，表示着他對美國社會的客觀的瞭解，提到了是如何失敗了的。

他是一個熱烈的哲學學者。有一次，當我正和他規定了那關於共產黨歷史的晚間會談的時候，一個家人帶給他幾本關於哲學的新的書籍，他請我延期我們的約會。他在三個夜間，很有意思的閱讀中，把這些書消化了。在這個期間，他把一切別的的事情都忘了。他不僅閱讀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哲學家，而且還讀了一些古代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哥德，黑格爾；和盧騷的書籍。自然，還有一些別的人的。

他每天工作約十三四小時，常常一直到夜間很晚。常常忙到夜裏兩三點鐘才休息。他好像有一種鐵的機構。他把這事歸根到幼年時候，在他父親的田地裏做堅苦的工作，和在學校生活時期的一個刻苦的時代，那時他和一些同志組織了一種斯巴達俱樂部。他說「我們常常節食或絕食，在中國南部許多森林的山上走着，在最冷的天氣在水裏游泳，不穿衣的在雨雪中散步——這些事，把我們

煅煉堅強了。』他還告訴我：『我們看的很清楚，在中國未來的年度裏，更需要最高限度的堅苦精神和忍耐能力。』

毛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到法國進一步讀書的機會。他幫助組織了些在歐戰中與歐戰後到法國去的學生「工學團」。但毛自己却不願意去，他說：『中國自身是一個大陸，我關於她知道的太少，看見的也太少。在我們自己民族的生命和歷史，正在大的激變中，在這樣的一個緊急時候，我覺得我們不能夠走開。後來我幫助送到法國去的許多學生，有許多變成共產黨員。有許多參加了蘇維埃政府和紅軍，還有許多被殺死了。』

他有一次用一個夏天走遍了他的湖南本省。他從這一家工作到那一家，來賺飯吃，有時候實行討飯。還有些時期，好幾天，除了硬豆子和水以外，沒有吃別的東西——這也是一種煅煉他的胃的方法。在他幼年遊歷湖南時代，鄉村中所交結的朋友，對他在十年以後，組織成千的農民的農會的時候，是很有價值的。這些農會，在國民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以後，成了蘇維埃的最早的基礎。

毛先生在我腦子裏的印象，是一個很熱情的人，當提到死去的同志的時候，我記得一兩次看見他的眼睛濕了。在回想到幼年時代發生的事情，在湖南的飢饉和「米荒」之中，有許多飢餓的農民，因為向衙門要求糧食而被砍了頭，他也同樣掉淚。有一個兵士告訴我，他看見毛君自己的大掛給了

一個在前線受傷的人。他們說，在紅色戰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拒絕穿鞋子。

在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中，和弟兄士兵們一樣，除有幾個星期他病了以外，他也是步行的。在近幾年的任何時候，用叛變投降到國民黨的辦法，他可以得到高官厚祿。這種辦法對於許多的紅色指揮官們都可以適用的。除非你知道了在中國的「銀彈」的歷史——用這種方法，別的謀亂者常常被收買的——你不會充分地認識理解到這些共產黨員，是用一種如何驚人的堅固信心，堅持着他們自己的主義的。最低限度，很明顯地，他對於私人的財富，是不感覺興趣的。

我覺得他的報告是很誠懇，忠實，和可的信。我能對証他說的許多話，而查出他說的是正確的。不管在我的寫作中和拍照像片中，他對我不加任何的監視禁止。可是他竭他的力量注意我是不是得到了一些事實，去解明蘇維埃生活的劣點。

我想，是因爲件這事，同時也因爲今日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共產主義政策的極端重要性，他們主要宣言，才受了極端的重視。同時也因爲整個西北，以及許多別的中國武裝了的和未武裝的人民的，大衆，也都同情這些政策，所以，他們會成根本改革中國命運的有力工具。

紅軍大學

關於在陝西保安的紅軍大學，是有許多事情，非常奇特的。

牠的校長，是一個年紀二十八歲，從來沒有打過一次敗仗的軍隊指揮官。在紅軍大學中有一件很可自豪的事，就是在一班研究生裏，老練的戰士們，平均的年齡是二十七歲，每個人平均，都有八年的作戰經驗，和三處傷痕。每人平均都走過一萬英里的長征。除了紅軍大學之外，世界上能有一個因為紙的缺乏，以致祇有用敵人宣傳品的空白或背面，做課室的筆記本的學校麼？教育每一個學生的費用，包括着衣食和一切雜費，每月用不到十五元的學校有嗎？能有這樣的一個學校，為在那裏的幾個著名的學生的首級，懸賞價值的總數，超過二百萬元的嗎？

這樣就是所謂紅軍大學。

最後，紅軍大學，大槪要算世界上唯一有的——教室都是一些土洞，椅子和桌子都是石頭和磚，的黑板都是些石灰和土的牆，建築都完全是預防空中轟炸的——最「高學府」

這件事也是因為，在陝西和甘肅，除了普通房子以外，有些大的窯洞式住宅，窯洞式的廟宇，和幾百年古舊的堡壘牆穴。在一千年以前，富足的官吏和地主們，建築了這些奇怪的建築，去防備水災，強盜和飢饉，並且在這裏堆集糧食和財寶。

許多圓頂的房子，很深地挖入黃土和堅固的石頭之中，有許多屋子能容幾百人。這些山涯的住

宅，今天做成了很好防空的掩蔽部，預防着南京新的漂亮的飛機；這些飛機，是中國人民送蔣介石去和日本作戰的。在這樣的古代的住宅裏面，紅軍大學安置了奇怪的，但是安全的設備。

在我到達不久，蒙介紹得見紅軍大學校長林彪先生。並且有一天被邀請對他的學生講演。他提出「英美對華的政策」這個題目。我猶疑着。對於雙方我知道的都太少。此外，我不能用很好的馬克斯主義的名詞來解釋。但林先生堅持着。他說他們自己可以供給馬克斯主義的名詞。當時他爲這盛會安排了一頓麵食，這對我太過分了，所以我接受了他的要求。

林彪生於一九〇八年，是湖北省一家廠主的兒子。他的父親是被苛捐雜稅摧毀了，但林先生掙扎着讀完了初級學校，而變成廣州黃浦軍官學校的學生。在這裏他有了驚人的成績。他在蔣介石之下，和蔣介石的主要顧問俄國加命將軍——現在蘇聯遠東紅司令的之下，受了深刻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訓練。畢業不久，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了，林彪被提升到陸軍上尉的職位。到一九二七年，當他二十歲的時候，他是有名的國民黨第四軍的上校。在那年的八月，南京右派政變之後，他率領了他那一團人，和賀龍葉挺領導之下的第二十軍聯合，在南昌暴動，開始了共產黨在中國的反抗。

林彪和毛澤東享有同樣的聲名，是幾個從未受過傷的紅軍指揮官的一個，在前綫上參加了一百多次戰爭，指揮作戰在十年以上，經受了士兵所知道的一切艱難。爲了他的首級南京曾懸賞了十

萬元，他很神祕地沒有受傷，很康健的活到今日。

在一九三二年林彪被委派爲紅軍第一軍的總指揮，那時候有兩萬枝槍。他成了紅軍最可怕的一部，主要地是由於他奇特的軍事天才，他打敗了，摧毀了，解除武裝或驅逐了一切派去圍剿他的政軍。但是，關於有名的紅軍第一軍，以後當我到了前線的時候，再詳細地說吧！

和許多的有能力的紅軍指揮官一樣，林彪永遠沒有到過外國，除了中文以外，他不能說任何語言。然而，不到三十歲的年齡，他已經爭取了紅區以外的贊許。他在中國共黨軍事雜誌「鬥爭」和「戰爭與革命」上面的文章，在南京的軍事雜誌上，曾被研究與批評過，也受過日本和蘇聯的研究與批評。他被稱贊做「突擊」戰術的發明者。這種戰術馮玉祥曾經很精密地註解過。紅軍第一軍的許多的勝利，據說可以歸根到紅黨的這種「突擊」戰術的巧妙運用。

一天早晨，我和林彪以及他的教職員們，一同出行，走到保安城外不遠的紅軍大學去。我們在下課的時候來到那裏。許多學生，在兩個設備很好的場子上打籃球；還有一些學生，在黃河支流旁邊的泥土地安置好了的場子上打網球。這條黃河支流圍繞着保安邊界。紅軍大學的講師吳良平，在閒暇的時候又是網球教員，以二對六的比例下，打敗了我，顯露他的威力。還有一些學生在打乒乓球，寫字，看閱新書和雜誌，或者在他們的簡陋的俱樂部中讀書。

這是大學的第一部，有二百多學生。這大學在蘇區普通都稱做「紅大」，共有四部，八百以上的學生。在教育委員會管理之下，在保安附近，還有無線電報，騎兵隊，農業的和醫學的練習學校。有一個共產黨訓練學校，和民衆教育的訓練中心。

聚集了二百多學生，來聽我講解「英美政策」。我做了一個英美態度的粗略的總結，世且同意答回他們的問題。我很快就知道了，這是大大地錯了。這頓麵食很難償還我受的苦惱。對我的問題，雖有韋爾士的聰明和天才也難應付，舉例說吧，你會如此地答覆下面對我發的問題呢？

「英國政府對於親日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的組成，和華北日軍的駐防，持如何的態度？」

「美國的復興方案的實在的結果如何？他對於工人階級的利益如何？」

「假如日本和中國的戰爭起來了，德國和意大利會幫助日本嗎？」

「假如別的列強，不幫助日本的話，你以為日本對中國大戰爭，能繼續多久呢？」

「國際聯盟，為什麼緣故失敗了？」

「為什麼在英美兩國，共產黨是合法的，而兩國都沒有工人的政府？」

「在英國反法西斯陣線的形成，有了些什麼成就？在美的情形又怎樣？」

「在巴黎國際學生運動中心的前途如何？」

「在你的意見看來，李茲羅斯訪日，是否會產生一個對中國的英日協定政策？」

「當中國開始反抗日本的時候，英國和美國，是幫助中國？還是幫助日本呢？」

「請告訴我們，如果英國和美國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為什麼英國和美國，在中國保有他們的軍艦和武裝？」

「美國和英國工人們，對於蘇聯的觀感如何？」

你會要承認，在兩點鐘發問的時間裏，所包括的範圍，是不小的！而事實上，這並不限在兩小時裏，從早晨十點鐘，一直延長到下午很晚。在結局，證明了是不能得到結論，而且擾亂了當天的工作。

以後，我參觀了各種課室，和林彪及其他職員們說話。他們告訴我一些關於他們的學校的投考的情形，給我看了他們的印就課程一覽表，已經有了好幾千份祕密地分散到全國各地。大學的四部，不分階級以及社會政治上的不同。凡一切決心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戰，願為民族解放的目的而貢獻自己的，他們都歡迎。年齡的限制是十六歲到二十八歲。性別不論。「投考的人必須要身體強壯，沒有流行病，」而且也「沒有任何的惡習。」

我發覺了，實際上，大學第一部的大多數的學生，是營旅，或師的指揮官，或者是紅軍的政治委員，領受高級的軍事的和政治的訓練。在這裏教授的課程，須要四個月之久。依照紅軍的規則，每個指揮

官或政治委員，在每兩年的活動職務裏，最低限度，必須在這個時期，在紅軍大學，消費四個月。

第二和第三部包含：中隊，連，和營的指揮官。有紅軍裏有經驗的戰士，和從「中學或同等學力學校畢業，選擇出來的新入伍人，沒有職業的教師和官吏，反日義勇軍學生，反日游擊隊領袖，和從事組織工人和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人員。」在紅軍對山西省的進征中，有六十個以上的山西的中學畢業生，參加紅軍了。

第二和第三部的課程，須要六個月之久。第四部主要地是專門訓練工程師，騎兵學兵，和砲兵隊。在這裏，我以後會要遇見一些以前的機器師，和學徒們。當我要離開紅色中國的時候，我遇見八個預備投考紅軍大學的學生，從上海北平來的。他們告訴我：從中國全部，他們有一個二千人以上的學生投考者的候補名單。那時候最大的問題，是入境的問題，因為每一個學生，都是祕密地進來的。

「紅大」各個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課目。但第一部學生的食物單，可以拿來當做樣單。政治講話包括有這樣科目：政治知識，中國革命問題，政治經濟，黨的建設，民國策略問題，列寧主義與民主的歷史基礎，日本的政治經濟力量。軍事科目包括有：對日戰爭的戰術問題，對日的遊擊戰術，反日戰爭中之遊擊隊戰爭的發展，日本對華作戰中之問題。

其中的一些科目，預備了特別的教本。有些是從在江西的蘇維埃印刷所全部運來的，他們告訴

我在這個印刷局的主要工廠，有八百以上的印刷工人被雇用着。別的科目所用的材料，是紅軍指揮官及黨的領袖們關於俄國及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的演講。

這些科目，或者是對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問題——「紅黨們真心地想和日本作戰嗎？」——的一個回答。更進一步的證明，是在毛澤東對我解答「解放戰爭」中的所必須採用的主要的戰略的單刀直入的答案中，因為他的解釋——他也在紅軍大學裏講課——是根據對中國的很深認識，所以是值得簡單地的引用的。

毛澤東以為：中國對日作戰的戰略，必定是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線上作戰。這種戰略，全靠艱險的戰場上，高速度行軍的成功，進退的迅速及集散的敏捷。還次這爭是要大規模的遊擊戰略，而不是深溝壁壘，層層防線，專恃堅固防禦工事的陣地戰。

從地理上說來，戰場這樣的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遊擊戰爭是可能的，並且日本遇到猛烈的後方活動，必得謹慎，她的戰爭機構，行動很慢，效率有限。深溝高壘，集中火力，在一個狹小戰線上為一兩個重要地點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們徒然失掉了在地理上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了阿比西尼亞的錯誤，在戰爭的前期，我們的戰術和戰略必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漸次破壞敵人主力的精神，戰鬥力的和軍事效率。

阿比西尼亞的錯誤，並非是他們內部政治的弱點，而是因為他們要保持密集隊形，叫法西斯來轟炸，放毒瓦斯，用精良器械來攻擊，致使他們密集的重兵，行動不靈，受了致命的傷害。

我們除了調動有訓練的正式軍隊之外，在農民之中，要政治的軍事的武裝大多數的遊擊隊，在東北抗日義勇軍所完成的工作，僅僅是表示了全中國革命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實力的一小部分，如果指揮組織得當，這種遊擊隊能使日本人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疲於奔命。

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本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民包圍，日本軍要被逼得運來他們一切的軍需品，而且要自己來看守，並需用重兵來保護所有的交通線，另外還另一大部人去駐紮滿洲同日本內地……這樣，在侵佔中國長期消費的壓迫下，日本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不能決定戰爭大局的折磨中日大軍隊的士氣將行瓦解，中國抗戰的潛伏力量一天一天的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衆不斷的傾注到前線去，準備爲自由而戰爭，但日本帝國主義却因中國的抵抗而日驅崩潰。

我聽到這些豪壯的話以後，繼續問毛先生日本會發生些什麼呢？

『日本的革命，不僅是一種可能，而且是種必然，』他這樣地回答。『這是不可避免的，在日本軍隊遭受了第一次重大失敗以後，革命會立即爆發的。』

這次談話，還有很多事情，是關於高深的軍事的和技術的問題。僅就所說的這點已經足夠指明紅黨對中國抗日的民族獨立戰爭是如何地看法；以及如何地極積地計劃——這個戰爭他們認為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於某種奇蹟，日本從中國的廣大領土上撤退了。

前途不是樂觀的。一些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家，認為這是一個發狂的預測。但是別的一些人們，坦白地說他們並不責備中國人民——他們好幾千萬已成了日本所征服的人民了——假如他們現在寧為玉碎，而不再不鬥爭地退讓任何一點自由。

至少，紅軍現在是完全地決心要戰爭，而且他們相信，戰爭的開始，他們會站立在最前線上。這些不僅表現在軍隊中的嚴刻的實際訓練，而且你也能在普遍蘇區中的深刻宣傳中看得出來。

在這種教育使命中操着領導地位的，是許多的青年隊伍，名叫「抗日劇社」，他們不停止地來回在蘇區裏巡行着！散佈着抗敵的福音，喚醒在農民階級中酣睡着的民族意識。

我現在要介紹給讀者，這個驚人的兒童劇社的一次公演。

紅色劇社

當我同一個邀請我到「紅色劇社」去的青年軍官一同出發的時候，人們已經向着由一所舊

廟臨時搭成的露天戲台移動了。那天是星期六，日落前的兩三點鐘，整個保安好像在走向那裏去。

紅校的學時們，驢夫們，軍衣工廠和鞋工廠的女工們，合作社和紅色郵務局的書記們，士兵們，木匠們，鄉人和他們的小孩們——都開始向着河邊的大草原上流去，在那裏演戲劇者正在表演。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民主化的聚會。甚至於一些羊都在離不遠的網球場上吃草。

那裏不賣票，也沒有什麼優先座位。我看見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財政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一些別的官吏們以及他們的妻子們，在羣衆中散佈着，和別人一樣地坐在有彈性的草捆上。演劇開始以後，大家對他們都很少注意。

橫掛在台前的是一塊大粉紅綢幕，上面寫着「中國人民抗日紅色戲劇社」是漢字，同時也有拉丁化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紅黨們正採用着來加速民衆教育。演劇程序定三小時演完。裏面有戲曲，跳舞，歌唱和一種中國劇。這劇是一種雜色的表演，或者是童謠，主要的是表現兩個中心題目——日和革命。它充滿了明顯的宣傳，完全率直的，而它的情調是原始的。但它有着從銅鈸敲打和假聲歌唱解放出來了的優點，而且是和活的材料有關係，不是一些沒有意思的歷史設計，如同沒落的中國歌劇一樣。

最後，它在機巧和精緻中所缺乏的東西，由它的強壯的生活力，和它的感人的幽默，以及一種演

者和觀者之間的交流，一部分地被補充起來了。在紅色劇社的客人，好像真地細「聽」台上所說的話。這和中國其他酣歌醉舞的觀衆對比起來，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因為在中國聽戲的人們，主要的時間是消耗在吃菓子和瓜子，談話，來回地拋熱手巾，從這一個包廂去拜訪另外一個包廂的人，而只偶爾地看到台上去。

這裏的第一齣戲叫做「侵略」。開幕的時候，是一九三一年在滿洲的一個鄉村的場面。日本人來了，把不抵抗的中國軍隊驅逐去了。第三幕是日本軍官們在一個農家裏宴會，用中國人當椅子，喝醉了酒去調戲他們的妻女。再有一幕是表演日本販賣嗎啡和白面的毒犯，強迫每一個農民買一定的分量。有一個拒絕買的青年被帶走去受詢問去了。

「你不肯買嗎啡，你不遵守滿洲國的衛生法律，你不愛戴你的聖主溥儀，」他魔王一般地責備他。『你不是好人，你是一個反日的土匪！』而這個青年，很快地被處死了。

又一幕是鄉村的市上。小商人很平安地販賣他們的貨物。突然日本兵來了，搜尋「反日土匪」。馬上他們盤問護照，那些忘記帶着的人們，都被槍殺了。以後兩個日本兵大吃豬肉販子的肉。當他們和他們要錢的時候，他們很驚訝的望着他。「你要錢嗎？這可怪了！蔣介石把滿洲，熱河，察哈爾給我們，塘沽停戰協定，何梅協定，冀察政務委員會，給我們，沒有向我們要過一個銅版！而你爲一點肉便向我們

要錢麼！」這樣他們就把他當做「土匪」用木椿釘死了！

最後一幕，自然，這些事情對於鄉村裏的人們是夠受的了。商人們推翻了他們的攤子和布棚，農人們帶了他們的槍刀衝了出來。婦人和小孩們拿着他們的刀子，一切人們都發誓和「日本鬼」作殊死戰！

這個短劇充滿了幽默和一些土語，與討厭及仇恨的罵街互相輪流着，引起觀衆的哄堂大笑。聽衆是很受刺激了。這對於他們不僅是政治的宣傳，也不僅是激動感情的戲曲，而且切合真理。事實上演劇者大多數祇是一些十幾歲的青年，山西和陝西的都有，但是劇情的深刻，觀衆在心領神悟之中，好像忘却他們是小孩子。

這種慘痛的劇情——用一種笑劇形式表演出來，可是它的真意是智巧和默幽不能隱瞞的。至少對於一個青年兵士是如此的。在完場的時候，一個兵士站立起來，用一種被感情震動起來的聲音呼喊道：「打倒日本強盜！」「打倒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打回老家去！一整個人羣很有力地回響他的口號。我後來知道這個兵士是東北人，他的父母雙親是被日本殺死了。

秩序單上的第二項是「收獲跳舞」，由戲劇社十二位女演員表演的。赤着腳，穿着農民的褲子，大褂，和相似的背心，頭上包着綢手巾。他們用整齊的步調，很莊嚴的跳着。我知道這些女孩子裏有兩

個，完全步行由江西走來的。她們在瑞金紅色戲劇學校學習了跳舞，她們很聰明而有天才。

再一項奇特而有興味的是：「聯合戰線舞」牠的意義是解釋中國抗日的總動員。但他們用的什麼幻術，製造成他們的衣服，我是不知道的，只知道突然一羣青年穿着水手的短衣服，先是當做騎兵隊登場的，以後又當做空軍隊，接着當做步兵，而最後當做海軍。他們的姿態和手式，以中國人天生的藝術天才，很真實地表演出來，

還有一種叫做「紅色機械舞」。用聲音和手勢，四肢和頭的交叉來表示。小的跳舞家們摹做着活塞，摹做着大小輪子的旋轉，發電廠的聲音——象徵着中國將來的機械時代。

在休息的時間，從聽衆之中起來了民衆的歌唱。有五六個本地的陝西女孩們——在工廠裏的工人——被大家的要請，唱一個古的本省的民歌，有一個陝西的農夫，彈着他自己做的琵琶配合着。一個紅校學生拉着胡琴，並表演一種手提琴，另一個又被請求唱一首南方流行的歌。忽然，使我完全舉止失措，一種要求外國新聞記者的獨唱開始了！

他們不肯饒恕我。可憐的很，我除了狐步舞，爵士舞，波希姆舞，和國歌以外，什麼都不知道。而這些好像在這裏都不適合似的。我甚至連馬賽曲都忘掉了。他們堅持着他們的請求。在極端窘困之中，最後我唱了「飛行木棒上的人」。幸而他們都非常客氣的，使我下了臺。

我看見下一幕展開了，才覺得放心。這是一個以革命為題材的社會劇——一個會計師和他的地主的妻子陷入愛情了。接着又有一些跳舞，關於最近從西南來的消息的「活報」，兒童們「國際歌」的合唱。在這裏圍繞着一個光明的圓柱掛一串萬國旗，年青的舞者圍繞着牠傾斜着身子。他們隨着字句慢慢地起來，而當唱到結尾的時候，都站起來，高舉攢着的拳頭。

戲已經是完了，但我的好奇心還存有着，所以第二天，我去見危拱乞女士——人民抗日紅色劇社的監督。

危女二十九年，前生於河南，已經做了十年的紅黨。她以先是參加「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國民軍宣傳部，但當馮和南京在一九二七年妥協以後，她和一些別的青年學生脫離開，參加漢口的共產黨。一九二九年她被共產黨派到歐洲，在法國讀書，以後又到莫斯科。一年後她回到中國，很順利地穿過了國民黨對紅色中國重圍的封鎖，而到瑞金開始工作。

她告訴我一些關於「紅色劇社」的歷史。戲劇組好像是五年之前開始在江西組織的，依照危女士的話，在那裏，瑞金的「高爾基學校」有一千以上從蘇區招集去的學生。紅黨訓練了六十組的戲劇隊。他們旅行遍了前線和各鄉村。每一隊都從鄉蘇維埃接到許多預定單。農民們對於在他們的文化飢餓的生活裏的任何娛樂，永遠是非常感激的。為這種貴客，總是自動地為他們安排一切運輸。

食物和住的地方的。

在南方的時候，危女士是助理指導員，但在西北她已經負責戲劇組織的全部了。自然她也參加了從江西出發的長征，是數十個經歷了這次長征的蘇維埃婦女中的一個，在南方的隊伍來到以前，在蘇維埃陝西早創立了一些戲劇隊，但從江西來了新的分子以後，顯然地戲劇的藝術得到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訴我，這樣的游行戲劇隊現在已經有了三十隊以上，在甘肅還有些別的。以後正我的旅行裏，我遇見很多。

「每一個軍隊有它自己的戲劇組，」危女士接着說，「幾乎每一個區域也是同樣。演員幾乎都是本地召集的。我們從南方來的有經驗的演員的大多數，現在都成了教師。」

我遇見好幾個少年先鋒隊，長征的老手，都仍在他們十幾歲的年齡，負責組織並訓練在各鄉村裏兒童戲劇團體。

「農民們很遠地到我們的紅色戲劇社來，」危女士很驕傲地告訴我。「有時候，當我們離白區境界很近的時候，國民黨兵士們祕密地打發使者，請求我們的劇社，到邊境區域的市場鎮甸上去，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白軍和紅軍的兵士們，都放下他們的兵器，來到這個市場地方，看我們的表演。但是國民黨軍官們，如果知道了這事的話，永遠不會允許的，因為如果他們只要看見了我們的戲劇，國

民黨的兵士們，不會再和我們的紅軍作戰了！

可是，這些戲劇俱樂部最使我驚訝的，不是他們貢獻了對於世界任何藝術上重要的東西，很顯明地這事他們沒有做到，而是因為雖設備簡單，它們能夠適合一種真正的社會需要，他們有最少限度的器俱和服裝，但是用這些最原始的材料，他們產生了許多戲劇的深刻幻像。演者只領受他們的食物和衣服，和一個很小的生活津貼，但是他們每天研究像一切的共產黨和少年先鋒隊一樣，而他們相信他們自己是為中國和中國人民而工作的。他們什麼地方都睡。很高興地吃任何人替他們預備着的東西，從一個鄉村到另一個鄉村很遠地走着，從物質享受的觀點來看，無疑地，他們是世界上最可憐地領受報酬的戲子，但是我似乎從來沒有看見過再比他們還快樂的人。

紅黨們幾乎寫著一切他們自己的戲劇和歌曲。有些是由有天才的軍官們捐助的，但大部份由宣傳部的小說作家和藝術家預備的。有好幾個有名的紅色戲劇的諷刺劇，是由成仿吾寫作的，他是有名的文學批評家，三年以前參加紅黨的。最近還有一些是丁玲——中國最著名的女作家寫作的。她現在和紅軍在一塊。

在共產黨運動裏，比紅色戲劇隊更有力的宣傳武器是沒有的。而且也沒有運用得更巧妙的。劇目是常常改變的，幾乎每天改變的「活報」劇，新的軍事，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都成了戲劇的材料。

而疑點和問題，用一種幽默的，對於狐疑的農民階級可以懂得的方法，來解答了。當紅軍佔領了新的區域以後，也是紅色劇社，來平靜人民的恐怖，傳給他們紅色綱領的基本觀念，發散大量地的革命觀念，去征取人民的信服。舉例說吧，在紅軍的最近的遠征山西的期間，幾百的農民聽到了紅色的演劇者和紅軍，成就羣地來看他們。

危女士穿着乾淨的紅軍服裝，而且像一切蘇維埃婦女，她剪了頭髮。從距離較遠看來，你或者以為她會是一個整齊的紅軍軍官。但是仔細一觀察，發覺她是一個很漂亮年青女人，帶着一種媚人的笑，和一種很適任的能辦事的人的態度。我以為她可以是一個露茜·司脫恩諾，就問她是不是已經結婚了。她搖着她的頭發笑了。指着她的學生，她說：「一個丈夫能供給比我這裏更多的小孩嗎？！我還沒有結婚，革命沒有勝利，日本沒有打倒以前，我不會有時間為這樣的一種奢侈品！」

而這就是紅色劇社目前的志願最好的總結。關於這事我不懷疑，是「在藝術中的宣傳」運用到最極點了。

和紅區農民談話

我旅行過了保安，走向甘邊與前方，我住在農民的草屋里，睡在他們的土炕上，在那里吃他們的

飯，並快樂的與他們談話。他們都是貧苦的民衆，很和氣的招待客人。有些人們聽說我是海外來客，便拒絕接受我的錢，我記得有個纏足的老農婦，養了五六個小雞雛，她竟要宰了一半給我吃。我聽她對我的一个伴侶談：「我們不能讓一個洋鬼子到外旁談我們不懂得禮貌。」她叫我洋鬼子，並不見得便算失禮；因為許多中國農人因襲着這種稱呼。

後來，我要注意考察赤區的農民生活，看看他們是否與世俗的描寫，被稱爲土匪者相同，並且看看他們與一般農民不同之點安在，他們對於革命的認識怎樣，現在就把在陝北一個農村的談話記下來，因為這是一段很好的農民衷心之談，它指示出來赤區制度的優劣。

傅金魁是一個青年共產黨，他被赤黨交際部委派，來伴着我到前方去旅行，傅君像一般在後方的共黨一樣，他一見得到機會，與軍隊接觸，精神是特別愉快的，他看我就像天使一樣。同時，他也坦率的拿我當做一個帝國主義者，並且對我的整個旅行，是抱着顯明的懷疑態度。然而在各方面，他都是誠懇幫助我，因此，不久我們便成了很好的友朋了。

一天晚間，在一個村莊，傅君和我找得一個地方，那里住了五六家的農戶。一個約有四十五歲的農夫，他看護着六個來回亂跑的小孩子，竟允許給我們以一切的方便。他給我們一間潔淨的小屋，燒好了熟炕，給我們的馬備上草料。他賣給我們一隻雞，要了五十枚，並且賣給我們一些雞卵。但是那間

小屋，他却取不代價。他曾經到過城市，看見過外國人，但其餘的男女老幼，却都沒有看見過外國人，他們都圍着來窺視。有一個小孩因為駭怕，竟而哭起來了。

飯後，一些農民來到我們的屋里，給我一些煙，於是便開始談話了。他們問我的國家是否也有五穀雜糧，牛馬牲畜，是否用羊糞作肥料。一個農民問我的國內是否有雞雛，引得房主人嘶了一下，插着說：「凡是有活人的地方，一定有雞雛的。」他又問在我國內是否也有貧富之分，是否也有一種共黨和紅軍。我想要說我國只有共黨而沒有紅軍，真怕阻撓了他們的問題。

答了許多問題以後，我又提出來一些問題。我問對他們紅軍作什麼想法，他們起始訴苦說軍馬的食量太大。聽說當紅軍大學遷移騎兵部的時候，曾經在這村里停住了幾天，結果把他們存儲的草糧吃個一空。

傅金魁問道：「他們沒曾給代價嗎？」他們馬上答道：「不錯，他們完全給錢了，這不是我們的問題。要知道我們的糧草是有限的，除備自用外，簡直沒有富餘。來年一月合作社能賣給我們嗎？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用蘇維埃的貨幣，能買什麼？甚至鴉片也買不到！」

上邊這段話是一個衣服襤褸的老頭兒，嘴裏含着二尺長竹烟袋，瞪着眼睛說出來的。傅君承認不能買到鴉片，但是他說他們能夠在合作社里買到一切應用的東西。

我們的主人問道：『現在我們就能夠嗎？我們能買到像這樣的酒杯嗎？』於是他拿起來我們從西安帶去的紅色的假象牙杯。傅君承認合作社沒有紅色的杯，但却說那裏有許多的布匹，洋燭，針，火柴，食鹽等等。

一個農民問道：『我聽說你們每人得到的布不過六尺，這不是真的嗎？』

傅君不大相信，他想是有很多布匹的。他轉到抗日問題上來了。他說：『我們的生活和你們是一樣的苦，紅軍是替你們工農打仗，以免你們受日本和國民黨的壓迫。即使你們不能買到所需要的布匹，並且不能得到鴉片，但那是一個事實，你們不納稅了，不是這樣了？你們不再向地主負債而失掉你們的房屋與土地，你們不是嗎？好了，老大哥，你們是願意白軍，還是願意我們？請答復這問題。白軍對你們的收穫所給的是什麼？』

這時，一切訴苦都歸消失，而大家的意見也都一致了。我們的主人搖頭道：『老傅，絕對不是，絕對不是！如果讓我們選擇的話，我們喜歡紅軍。我一個九歲的兒子現在在紅軍里，就是我送去的，有誰不承認這件事？』

我問他們爲什麼喜歡紅軍。

那個說合作社沒有鴉片的老頭兒發表一篇熱烈的談論。

他問道：「白軍來的時候是怎樣？他們是盡量的勒索，永遠不會談到代價問題。如果我們拒絕，便要被當作共黨而逮捕了。如果我們盡量的供給他們，我們便無法納稅了。如果不能納稅的時候，又該怎樣？他們就要出賣我們的牛馬了。去年紅軍不在此處的時候，白軍回來便把我的兩隻驢和四頭豬拿去了。驢是每隻三十元，豬都是長成的，每頭兩元。他們給我什麼了？」

「哎呀！他們說我欠租稅八十元，而把我的東西估爲四十元。他們向我再要四十元。我該怎麼辦呢？我再也沒有可以被剝削的了。他們讓我來出賣女兒，這是一個事實。我們這里真有些是不得不這樣辦的。那些沒有牛馬和女兒可賣的人，都被囚到保安的監獄里去，其中許多人都凍死或病死到那里了。」

我問這老人他有多少土地。

他帶怨恨的說：「土地」並且指着院外一道小河的那邊的一塊種着五穀和蔬菜的土地說：「那裏就是我的土地」

「這土地值多少錢？」

他說：「這裏的土地如果不是平原地的話，是不值多少錢的。我們花二十五元，就可以買到那樣的一塊山地。值錢的只有驢，羊，豬，雞，馬和其他物品。」

「好了，那末，你的整個農場到底值多少錢？」

他仍然不願說出他的田地究值多少錢。最後他才算出來說：「你有一百元，便可以得到所有這些房屋，牛，羊等其他物品，並且連這座山都在內。」

我追問道：「對於這些東西，你須納多少稅？」

「一年須四十元！」

「那是在紅軍未來以前的事情嗎？」

「是的，現在我們不納稅了。但是誰又知道來年是怎樣？紅軍一走，白軍就來。今年是紅軍，明年就是白軍。當白軍來時，他們叫我們是赤匪，當紅軍來時，他們又到處找反革命的。」

一個年青的農民插言道：「但是有一個不同之點，如果我們的鄰人證明我們並未幫助白軍，那就百事皆無。但是如果遇到白軍，便是我們有一百個好人的名字來證明，而沒有地主的頭銜，白軍也得說我們是赤匪。這不是一個事實嗎？」

那個老人搖一下頭，他說上次白軍在此地的時候，曾經把那山坡上的一家貧農的全家都給殺掉。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問紅軍藏在何處，而那家人不肯說出。從此以後，人們都逃跑了。當紅軍再來時，我們這才又回來。

「如果白軍再來時，你們是否還是要跑呢？」

一個長髮白牙的青年人喊道：「噫呀！那我們一定得離開，否則他們要殺我們呢！」

他們起始敘述他們的罰狀。他們曾參加了貧民會，曾在蘇區投票，曾把白軍行動消息報告紅軍，有兩人的兒子在紅軍里，另外一個人有兩個女兒在看護學校。這算罪不算罪呢？他們告訴我其中的任何一項，都夠上槍斃。

但是現在有一個赤足的十幾歲的青年插上前來，為談話所興奮，忘了這洋鬼子了。「爺爺，你把這些事都叫犯罪嗎？這些都是愛國行為，我們為什麼做這些事？不是因為我們紅軍是貧民的軍隊，而為貧民爭取權利嗎？」

他熱烈的繼續談話。「我們在以前有一個免費的學校嗎？在紅軍未帶來無線電之前，我們能得世界的消息嗎？誰告訴我們現在世界的實情？你說合作社沒有布匹，但是以前曾經有一個合作社嗎？從前你的土地怎樣，不是給地主王家很大的抵押嗎？我的妹妹在三年前餓的要死，但紅軍來後，我們不是足衣足食了嗎？你說那是痛苦，但我們青年人只要學會看書，並不感到痛苦。我們青年人學會拿槍，而去打漢奸與日本，也感不到痛苦！」

青年說得上不來氣，靜了一下。我看着傅金魁君面旁泛着微笑。大家都表示贊同，許多人們笑

了。

談話幾乎到了九點鐘，已經過了睡眠時候了。我最高興的，就是因這是在傅君的面前舉行的。一般農民對傅君並不視爲怎樣有官吏的尊嚴。他們看傅君像一個伴侶一樣，實在說，傅君也像一個農人之子。

那個訴苦的老年人走了。當他走到房門的時候，他又對傅君耳語道：「老同志，現在保安有鴉片嗎？有一些許嗎？」

當他走開之後，傅君很憎惡的對我說：「那個老人是此地貧民會的主席，你相信嗎？他現在還要鴉片呢！這個鄉村還需要更多的教育工作。」

西北的紅星

當江西和福建的共產黨，在慢慢地建立抵抗南京的根據地的時候，在中國其他地方，也發現了紅軍。除了江西以外，最大的完整區域，是豫皖蘇區。包括揚子江中流兩個最富庶省份的大部，有二百萬人口。在這一帶的紅軍，是在徐海東和徐向前的指揮之下。徐向前是黃埔軍官學校的畢業生。

在他們西北的山中，另一個黃埔的學生——劉子丹，正建立現在在陝、甘、寧、綏的蘇區的基礎。他

是現代的魯濱。侯得，正和西北許多山中生長的人一樣，對於富人是特別仇恨的。在今日，劉子丹的名字，是窮苦的人民裏的福音，而是地主和高利貸的人們的鞭笞之神。

這位叛亂的戰士，是生於陝北的保安，是一個中農的兒子。他進過榆林中學，這學校設在長城的陰影之下，是陝西和蒙古騎兵交易的商業區。劉子丹在榆林中學畢業以後，考廣州黃埔軍官學校。一九二六年在黃埔畢業，加入共產黨，同時也是一個國民黨的青年軍官。一年以後，發生南京的政變，他從「清黨」運動逃脫了，而祕密地在上海作共產黨工作。一九二九年回到他的故鄉，在榆林組織了一些共產黨「仕官學生」，在同年又領導一個在陝西的農民暴動。這暴動在華縣附近爆發的。（華縣正是現在國民黨和西北軍隊彼此對立地方。）雖然這個暴動被腥血地鎮壓下去，但是從牠生長出西北的第一次的紅色游擊隊。

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間，劉子丹的事業，是一串敗仗，失敗，沮喪，逃竄，冒險的出死入生。中間還夾着一些被重行任命做軍官而被尊敬的時期，在他領導下的許多小隊，全被擊潰了。有一次他回到保安的時候，僅剩了兩支手槍，可是在一里期後，又招集了一支新軍隊。他被寬赦了兩次，在政府軍隊裏給了一種職務，這主要地是因為他在陝西祕密結社裏有勢力。他的冒險精神，勇敢，和粗魯，取得了普遍西北的聲援，而造成了「槍炮不入」的民間傳說，直等最後，一九三六年三月，在紅軍出征

山西的時候，他領着衝鋒隊，進攻敵人的要塞的時候，被殺身死。這個要塞的佔領，使着紅軍能渡過黃河。

從我在那裏所能得到的一切單獨各別的證明裏看來，在陝西頭兩三年的鬥爭裏，地主們和官吏們殺的太多了——這似乎是無疑的。一般武裝了的農民，在長期被鎮壓的仇恨裏解放出來，進行搶掠，把俘虜的人帶到他們的巢穴裏，勒索贖取，使他們自己像普通土匪一般行動。但是到了一九三三年，劉子丹的部下佔領陝北黃土山裏許多的縣份以後，共產黨在榆林才組織了一個政治部，來指導劉氏的軍隊。在一九三三年春，第一個陝西蘇維埃和正式的行政組織才建立起來。實行和江西相同的綱領。

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間，陝西紅軍有相當的擴展，改良了他們的軍隊，和蘇區裏的情形也相當穩定了。劉子丹佔領了西安外邊的臨潼，並圍攻省城數日，可是沒有勝利。紅軍的一支陷落陝西的南部，在那裏建立蘇維埃區。他們在那裏和楊虎城——陝西的省主席（現在是紅黨的聯盟了）的軍隊，幾次激戰是互有勝敗。以後軍隊的紀律逐漸改進，土匪的成份逐漸消失，陝北和甘肅的農民，對紅軍擁護才慢慢的加強。在一九三五年的終尾，蘇維埃統治了十七縣。當紅軍從江西和福建的根據地撤退的時候，劉子丹的部下加強了他們自己的力量，很少被南京注意，直到最近。

要知道，赤化運動迅速在西北發展的由來，並不必追溯很遠。一九三五年，國際聯盟的專家司丹樸博士（A. Stamper）曾為南京視察中國的這一部份。在他所作的報告裏，描寫了中國農民的災荒與窮困。在他作的「西北各省及其發展之可能中」（這書不是大衆讀物）司博士曾有幾行述說擁護西北土地革命的基礎。

他指出來，在幾年前的西北大災荒中，在一個縣份裏，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是死於非命了，在另一個縣分裏，有百分之七十三等等……他指出的估計，僅在甘肅看，就死了二百萬人（約佔總人口的可百分之二十）。這些死亡的大多數，如果官廳曾禁止堆藏五穀，或者混戰的軍閥，不干涉救災供給的運送，是可以得救的。

現在根據這個日內瓦觀察者的報告，再把國民黨所統治的西北區域略述一下：

「在一九三〇年的大災荒裏，用三天的量食供給，可以購買二十畝地。本省的富裕階級，利用這個機會，建築起來大的財產，而自耕農的數目日漸減少了。許多的地荒廢了，大部分集中到地主「官吏們的手裏。特別在甘肅省，有廣大的可耕而沒耕的土地。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的飢饉中，土地地主們用極端的廉價買去了。這些地主們，從那時起，發了大財。

「在陝西，抗租拒稅，不納田賦，是被認為一種光榮的事。所以富足的地主們，照例是不納稅的……

：而使人最痛心的是向那些在飢饉時期中放棄了他們的土地的農民，索取他們逃難的時期積欠的田賦。不交繳積欠的田賦，土地就被沒收了。」

至於在國民黨的甘肅呢？司丹樸博士說：

「在過去的五年裏，甘肅的稅收，平均每年超過了八百萬。這甚至於此中國最富足的而捐稅最重的省份的浙江，還更要重要些。人民所繳納的數目。比起公佈出來的數目，不知要出幾倍。第一，捐稅的徵收者，是會留下所徵收的數目的一部分的，而且在許多情形之下，會是很大的一部分。第二，在由省政府縣政府所徵收的捐稅之外，必須還要加上軍事領袖們所課取的數目。這數目官廳公開地估計着，超過一千萬。另外一種對於居民的開消，是本地的民團——這民團在許多情形之下，都演變成爲一羣土匪，依靠鄉村的供給過活。」

在這一篇短文裏，我不打算分析西北的農村經濟，但是參照一下我在甯夏省政府所找到的一篇很有重大意義的文章，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這篇文章列舉了國民黨委派的馬鴻逵將軍在本省所徵收的捐稅，包括下面這些種類：營業稅，家畜稅，駱駝稅，運鹽稅，食鹽稅，鴉片煙燈稅，羊稅，商人稅，擔夫稅，鴿子稅，土地稅，中人稅，食品稅，特別食品稅，土地附加稅，木材稅，煤炭稅，皮革稅，屠宰稅，船稅，灌溉稅，鐵匠稅，蔬菜稅。這還沒有包盡了所有徵收了的零星的捐稅，但這已經是夠提出一種意見：就

是在這樣地域裏，人民對於國民黨的愛戴是可想而知了！

甘肅的一個傳教師告訴我：他有見一些農民，爲納稅的緣故，把他們的屋子木牆斫下來，（在西北木材是很貴的，）運到市場去販賣，換了錢去納稅。他說當紅黨剛來的時候，許多農民的態度，雖然不是友愛的，到是一種不關心的態度。他們的信仰是：『不能會有更壞的政府了！』

紅黨是否有較好的表現呢？和我談過話的一切沒彩色的批評家，都承認紅黨們用積極改變佃農，貧農和中農的生活方法，在農民階級裏創造了經濟基礎。這些佃農貧農和中農，佔人口的大多數。所以達到這層的原因，是十分單簡的。在新蘇區裏廢除第一年的各種苛捐雜稅，並保證在將來只採用一種很小的土地和營業的累進稅。其次是把土地分給那些「沒有土地」的農民，和開拓廣大的荒地。

紅黨們普通把農村人口分成以下的幾種：大地主，中小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佃農，農業勞動者，工業勞動者，流氓無產階級和自由職業者——即教員，醫生，技師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公佈的西北蘇維埃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地主們的土地，沒收富農們所有不由自己勞力耕種的土地。不過，地主和富農們，還留有足夠他們自己勞力所能耕的土地。在土地並不缺少的區域裏——在西北是有許多這樣的區域的——居留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在實行中幾乎

並沒有沒收，而只是荒廢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被分配了。有候也實行一種好質土地的重行分配，貧農們絕較好的土地，而主們分給同樣數目的較壞的土地。

地主是甚麼東西呢？依照共產黨的定義，是很簡單的。任何農民，不是自耕而食，而專靠租給別人土地，取得他主要的收入的，叫作地主。由這一個定義，高利貸者被歸入到地主一類裏，也受同樣的待遇。按照司丹樸博士記載，從前在西北的高利貸利率，高到百分之六十，在緊困的時候，或者比這更高。他說在有些情形之中，農夫們已經歸還了原借款總數目的兩倍或三倍，但仍就欠着比他們所借到的數目更多。雖然在陝西和甘肅的土地是很便宜的，但沒有資本的農民，想積蓄些錢，去買一塊土地，簡直是完全不可能。我想起和一個甘肅的農民的談話來，他是十五年前移民到那個區域裏，但永遠沒有置起一塊小地，雖然那裏的土地只有十二元錢一畝。當他有工做的時候，他的工資平均是一毛錢一天！

上面所提到的階級以外的土地是不被受沒收的。最窮困的農夫，佃農和農業勞動者們，都供給了足夠維持他們的生計的土地。現在蘇維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在供給每一個人，足夠保障他和家室的一個美滿的生活的土地，而這正是農民階級最緊迫的要求。

土地問題——沒收和重行分配——在西北比在南方是很簡單些。因為在這裏，廣大的田產，從

前是被官吏們，捐稅的徵收者們和不在的地主們所有。在許多的情形之下，沒收了這些土地，貧苦農民階級的目前要求，就真滿足了。用不着牽扯到居留地主們和富農們。這樣，蘇維埃不僅從沒有土地的農民階級，用給他們土地的方法，創造了經濟基礎的擁護。而且在某些情形之下，用廢除捐稅及其他剝削的方法從中農取得了感情。而在有幾個例子之下，在反日運動的基礎之上，受到了小地主們的幫助。有幾個有名的陝西共產黨員，是來自地主階級的。

對於貧農的以外的幫助，是用蘇維埃貨幣的借款的形式而實行的。利息是很低或者完全不要利息。高利貸自然是完全廢除了。去年在陝西，大量的棉花和麥的種子，在生產價格之下，分給貧農們。好幾千件在紅色兵工廠裏做成的農業器具，供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們，去開墾荒地。在舊的蘇維埃區域裏，鴉片完全廢除了，而這件事幫助了農業生產的增加——紅黨們認為這是歸功於他們的。在保安設立了一個初級農業學校，而且告訴我，正在計劃開辦一個家畜農業學校，只等一個從上海聘來的專家，一祕密到來以後，就可以實現。

但是這些個辦法是否我正對西北產生了許多根本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改變呢？我們必須盤問人民本身，來尋求答覆。不過，同時反映出最有意思的政治影響，是爭取了大部政府軍隊們，對紅軍計劃的擁護。為爭取這些財富最多敵人們的同情，他們必須加重對敵人的說服運動，這樣張學良的事

件發生了。西北剿匪代理總司令張學良氏，他把自身的前途，以及他的軍隊前途孤注一擲，替紅黨請命，要求停止一切內戰，建立中國抗日的聯合戰線。

引用他發表的最近的通電裏的少帥的話：

「幾百萬的中國金錢，中國生命，如中國財產，被捲到不斷地內戰裏，和不斷地追逐所謂土匪裏。這些土匪們，儘管他們的政治觀點不同，然而仍舊還是中國人，假如政府當局，樂於考查，他們是有愛國心，理智和革命的精神的，他們前能被利用服務國家的。」

自從我訪問西北以後，自那個宣言發表以後，自從中國政局在危機中加深了以後，紅黨已經驚人地擴張了他們的區域和勢力。今天，假如我們要畫一幅紅區領域的地圖，將要包含：西蘭公路以北的甘肅的大部渭河以北的陝西的全部，沿着河南邊境的陝西南部，黃河以東的甯夏全部，以及綏遠的東南端角上。假如紅軍能繼續保留這個地方，當做一個「試驗區」——這似乎是現在國共復行合作的一個可能的基礎——那麼，他們在這個區域裏，能成就些什麼呢？他們已經成就的是些什麼呢？

在文化和經濟方面說來，陝西，甘肅，和甯夏，過去自然是中國最落後的地域。過去實在是沒有機器工業，而紅黨在他們的掌握的許多區域裏，建立了從來未有的新聞紙。管理吳起鎮紅色工廠的工

程師是一個受過外國訓練的中國專家，他放棄了在上海的一個每年有一萬塊錢收入的職業，不要任何東西，來替紅黨工作。因為他的燒用木炭的發動機，而成爲這個地方的奇物。像這樣的機器，沒有一個農民從前看見過。

但是在我們走進紅色中國的「工業世界」之前，是應當訪問一下農民的。看看他們是什麼樣子，紅色統治在他們身上成了些什麼功績。是不是他們政治生活裏有真正的發言權，他們對紅軍作何感想，他們是些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而且，最後，他們和「白」區裏的農民，是有甚麼不同？中國農民，一向是被認爲討厭組織，紀律，集體行動，及一切家庭以外的社會活動的。「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是中國一句老的格言，認爲是足以代表農民的性恪態度的。紅黨們能夠取消這個好幾世紀古老的保守的外形嗎？

蘇維埃的工廠

在我到前線的路上，在保安的西北的走了幾天，我駐下去拜訪陝西的蘇維埃「工業中心」——吳起鎮。吳起鎮不是因爲在工業科學上有任何成就——讀者不久就會知道——而著名的，乃是因爲牠是那裏僅有的鎮市！

在周圍的幾千里內，只有半遊牧的鄉村，人民安全像他們幾千年以前的祖先一樣，住在洞穴的屋子裏。許多的農民，仍然留着挽在頭上的辮子。馬、驢子和駱駝，是交通工具中的唯一的東西。在這裏燈光是用菜油，蠟燭是種奢侈品，電光是人所不知道的東西，而外國人像在非洲的愛斯基摩人那樣地稀少。

在這個中百世紀的世界裏，突然來了蘇維埃工廠，機器轉動者，一羣的工人們，忙碌地生產紅色中國的工具和商品，這是非常驚人的事。

我知道在江西的共產黨，反抗着缺乏海口的重大的障礙，和切斷他們與任何大的近代的工業根據地的接觸的敵人的經濟封鎖，而建築起來幾個茂盛的戰業。舉例說吧：他們舉辦了中國最富足的鎊鑛，每年出產這種最貴重的鑛物超過一千萬磅——祕密地買給廣東的鎊的搗斷專家陳濟棠將軍。在吉安的中心蘇維埃印刷工廠，有八百以上的工人。許多的書籍、雜誌，和一個「國家」的報紙——紅中日報——在這裏印刷發行。

在江西也有紡紗工廠，毛織工廠，和機器作坊。小的工廠，生產足供給他們簡單而需要的工業品，紅黨們自己說：在「一九三三年他們有超過一千二百萬元的「對外出口貿易」，這種貿易大部分是由南方敢於冒險的商人經手的。他們越過國民黨的封鎖，而得到很大的利工。但是製造品的大部分，

是手工業和家庭西業。怎些生產產品是經生產合作社發賣的。

前江西人民經濟委員吳亮平氏告訴我：蘇維埃有超過一萬所的「生產分配」的合作社，這些都是人民所有，由人民辦理的。雖然這個數目，是比國際聯盟調查員們的估計高了很多，但無疑地，紅黨們在這種集體事業上，是成功的。

實際上國民黨自身正在企圖在南方一帶，模倣紅黨們的這種制度，但直到現在，結果是在一種嚴密地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之下，舉辦這種合作社，假如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極端困難的。

可是在西北，我從沒有想到會有任何工業。紅黨們在這裏，比在南方，是有更大的障礙要克服的。因為這裏在蘇維埃建立以前，是連一個小的機器工業都完全沒有。在整個的西北——在陝西，甘肅，青海，甯夏，和綏遠——從面積上來說，幾乎等於整個歐洲，可是它們聯合起來的機器工業總投資，還比不上一個大規模工廠的一個支行，例如福特汽車公司的支行。

在西安和蘭州有一些小的近代工廠，但大部分都依靠着東方很遠的大的工業中心。在西北任何的大規模工業發展的可能性，必賴於從外界借用技術和機器，才能發生。假如在這一帶的兩個最大的城市——西安和蘭州，這種情形是真實的話，那麼，佔領甘肅，陝西，甯夏等更落後的地域的紅黨們所遭受的困難，是很明顯的。

自然，「封鎖」切斷了紅黨們的輸入機器和「輸入」技師。但是關於後者，紅黨們說他們的供給，在現在是很富足的。只有機器和原料，是最嚴重的問題。僅爲着要得到少許的機車，紡織機器，引擎或者鐵塊，紅軍們打了許多的仗。幾乎屬於機器這類的任何東西，現在都是由「俘虜」而來的。舉例來說：在去年他們進征山西省，他們奪取了機器，工具和原料，用驢子馱運，一直越過了陝西蔓延的山脈，到他們的奇怪的萬峯環繞的工廠裏去。

在南方的紅黨們，當他們來到西北以後，推動了一個「經濟繁榮」。他們經過了二萬多里路，過了世界上最困難的道路，帶着許多的機車，鏟床，鋏子，鐮模，滾機等等，他們帶來了幾十架勝家公司（Singer）的縫紉機，用這些機車，現在裝置了他們的衣服工場。他們從四川的紅色礦山，帶來了銀子和金子。他們還帶來一些石印石和輕的印刷機。紅黨們對於馬和驢子，很重視和愛好，特別是對於那些載運了他們從南方帶來的重担的有力牲口們，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蘇維埃工業，現在包括了在保安和肅荷蓮灣的衣服，軍裝，鞋，和紙工廠，在定邊的地氈工場，在永平的礦山，那裏生產中國最價廉的煤，和在好幾個毛織物棉花紡織工廠——一切這些工廠，都努力生產充足的貨物，去實現充實陝西和甘肅的四百個合作社的計劃。依照人民經濟委員毛澤東說來，現在的「工業計劃」的目的，是使紅色中國能夠「經濟自足」——充分地強壯，能抵抗國民黨的

封鎖而自存——如果南京政府拒絕接受共產黨「聯合戰線」的建議，和停止內戰的話。

最大的而且最重要的蘇維埃國家事業，是在鹽池——甯夏邊境沿着長城的最大的鹽湖——的精鹽工廠；在永平和延安的石油井，牠出產氣油，石油，凡士林，蠟，蠟燭，和別的副產物。在鹽池的鹽的貯藏，是中國最豐富的，在紅黨佔領鹽池以後，他們取消了國民黨攔斷全部出產品的習慣，允許把出產的一部分，交給長城以北的蒙古人，因而取得了蒙古人的同情。在陝北的石油井，是中國僅有的石油井。在佔領永平以後，紅黨們開鑿了兩個新的油井，據說比永平和延長在「非土匪」的手中的任何時期，都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的生產。

並且吳起鎮是在紅區裏最大的工廠工人的集中地點，而且牠的重要，也是因為牠是紅黨們主要的兵工廠的所在地。這裏也是媚人的劉羣仙女士的總部——她從前是上海的紡織工人，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現在是紅色工會婦女部的指導員，年齡二十九歲。

我在吳起鎮停留了三天，訪問了工廠裏的工人，考查了他們的工作情形，參觀了他們的戲院和政治會議，讀了他們的壁報及文字書籍。還有談話。我加入了一個籃球遊戲，在一個小隊裏——由外交部使者傅錦魁，一個政治部工作的能說英文的青年的專門學校的學生，一個紅色醫生，一個工人和我自己組成的。我們和兵工廠籃球隊對敵，遭遇了最可恥的戰敗。第二天早晨我知道了：三十一

歲的我，不能算是年青了，因為我的骨頭僵木了酸痛了。

在吳起鎮的兵工廠，像紅軍大學一樣，是在一大排在山旁邊建築起來的圓頂屋子做成的。屋子是涼快的，很通風的，由在牆的四角挖的通氣穴的光線照耀着。而主要的好處，是完全能預防空中轟炸的。在這裏我看見了一百多個工人，製造手榴彈，戰壕百礮，火藥，手槍，小的炸彈槍彈，和一些農具，修理部正在修理許多捆破壞了的來復槍，機關槍，自動來復槍，手提機關槍。可是兵工廠的出品都是很粗糙的，都被用去武裝紅色遊擊隊，正式的紅軍隊伍，幾乎完全是用敵人軍隊奪取過來的槍械和子彈去供給的！

兵工廠的管理員何錫揚（譯音）氏，帶領我參觀了各個部門，介紹給我他的工人，並且告訴了我一些關於他們他們工人的事情。何氏年三十六歲，未婚，在九一八以前是有名的瀋陽兵工廠的一個技師。九一八以後，他走到上海，在那裏參加了共產黨，以後走到西北，入了紅區裏。這裏的許多工匠，鄉不是「門外漢」。許多的人，從前都是在漢陽中國最大的鐵工廠裏做工，有少數的一些在國民黨的兵工廠裏做過工。我會見了兩個年青的上海工匠頭和一個修理專家，他們給我看了從瓜麥怡和洋行公司（Jardine, Matheson Sco.）慎昌洋行（Anberson Meyer Co.）和上海電力公司等有名的英美公司來的很好的推薦信件。還看一個是上海機器廠的工頭。還有些是天津，廣州和

北平的機工匠，而且有些都會和紅軍一同「長征」過。

我知道在兵工廠裏的一百十四個機器匠和學徒裏，只有二十個是結婚了的。這些結了婚的妻子們，都和他們一塊住在吳起鎮，或者當工廠的工人，或者當黨部的職員。在兵工的廠工會裏——這工廠代表了紅區裏的最熟練的勞工——黨員佔很大的百分數的。他們告訴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參加了共產黨和共產青年團的。

除了吳起鎮的兵工廠以外，還有織布和制服工廠，鞋工廠，織襪工廠，和一個帶有醫生的藥房，這醫生是剛從山西一個醫藥訓練學校來的，他的年青而漂亮的妻子和他在一塊當看護。他們兩人在去年冬天的山西進征中，都參加了紅黨。在附近也有一個醫院，裏面有三個值勤的軍隊裏的醫生，主要地是醫治受傷了的兵士。還有一個無線電台，一個簡略的試驗所，一個合作社，和一個軍需根據地。除了兵工廠和軍裝廠外，大部分的工人，都是年青的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或三十歲的婦女。『同等勞動同等報酬』是中國蘇區裏的一個口號，在這裏對於婦人們，是沒有工資區別的。勞動在外表上，比在蘇區其他一切人，都得到優先的經濟待遇。也勝過紅色指揮官，因為紅色指揮官並不領受正式薪金，只是少數的生活津貼，而這津貼，要看會計處的負擔輕重來決定的。

劉羣仙女對我述說了工作情形，工廠裏的工人，每月得到從十元到十五元的薪金，宿膳由政

府供給八小時的工作日和六天的星期週。當我問訪他們的時候，工廠都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開動着。一天換三班工人！大概是中國最忙碌的工廠吧！工人們被保障有免費的醫藥待遇和受傷的卹金，女子們在受孕期中有四個月^的領取工資的休息，而且能領到他們的「社會保險金」。這種「社會保險金」是由扣除工人的工資的百分之十，和由政府加上同樣數目的一種基金準備的。政府也捐助全部出產的百分之二，爲工人們的教育，娛樂等等消費。這些款項都是由工會和工人的工廠委員會一同管理的。

一切這些聽起來，是很進步的；雖然，或者離共產主義烏托邦還太遠。在蘇維埃爲生活的鬥爭中，這些個情形已經實現了——這事實是很有趣味的。牠們是如何原始地實現了，那是另一個問題！他們有俱樂部，學校，廣大的寄宿舍，一切這些都是實在的；但是也有黃土地版的洞穴房屋。可是沒有洗澡的噴水器，沒有電力。他們是有食物的，但飯食只是些小米，蔬菜，有時候有些羊肉，可是沒有茶，沒有糖，沒有牛奶，沒有茄啡，他們用蘇維埃貨幣，收集他們的工資和社會保險金。這是沒有關係的，但是他們用蘇維埃貨幣所能買到的物品，是很嚴密地限制到必需品上——而且這些必需品也並不用買到很夠用的！

普通的美國工人和英國工人會要說：『不能忍受的呀！』但對於這些人們，很明顯，不是這樣的。

要明白這是爲什麼：你必須拿他們的生活，和在中國別的地方的制度相比。舉例說吧，我看過別處無數的工廠，在那裏很小的男女童工，坐着或站着做他們的工作，一天作到十三小時，才很疲倦回到家裏睡，我也記着在絲織工廠的小女孩們，和在棉花工廠的慘白面孔的青年婦女們——他們這些人，像在上海的大多數的工廠裏的實在是當四年或五年的真正奴隸，而賣給這些職業的。白天或夜裏，除非有特別的允許以外，不能夠離開這種很嚴密的監視。而且我記着：在一九三五年之中，有二萬九千以上的屍體，從上海的街道河流和運河檢集起來——這些屍體，是無家可歸的窮人，或者是他們不能喂養的兒童和飢餓的嬰兒們。

那麼，在吳起鎮的這些工人們怎樣呢？雖然是在開辦期中，在這裏至少一種康健衛生的，有運動的，呼吸着清潔的山中空氣，自由，尊嚴，和有希望的生活。在這裏是有發展的。他們知道沒人從他們身上榨取金錢，我想他們是知道是爲他們自己和爲中國而工作的。而且說他們自己的革命家。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明白了：爲什麼他們對於每天二小時的讀書和寫作，他們的政治課程，和他們的戲劇談話，是那樣地認真；爲什麼他們在遊戲，文學，公共衛生，壁報，「工廠效能」等等的組織與個人之間的競賽裏，爲着爭取那很可憐的獎賞，而激烈地競賽着。一切這些事情，對於他們都是真的，是一些他們以前所不會知道的事情，是一些在中國別的任何工廠所永遠不能知道的事情。他們似乎很感謝，生

活的門是爲他們打開了！

且說。一切這樣事情，對於任何像我這樣的中國通，是很難相信的。關於它的重要意義，我仍然是很迷惑的。但我不能否認我所看見了的證據。這裏篇幅有限，我不能仔細敘述這些證據。我應該說出十幾個我談過話的工人們的故事。從他們的壁報的論文和批評中引用的話，給你你看。這些壁報是用幼稚的新文字的筆墨胡亂的寫成的，有許多由專門學校的學生的幫助翻譯出了。我應該告訴我所參加的政治集會，和由這些工人們所創造的和排演的戲劇。我還應該告訴你許多小的事情，去補足那些不易明瞭的敘述。

但是當我一邊寫着的時候，我偶然想起了一件這樣的「小事情」。我在那裏遇見了一個電氣工程師，一個名字叫朱擇志（譯音）的很活潑但是很細心的共產黨員。他很熟習英文和德文，是個「力學」專家，而且著了一本在中國用的很廣地工程學教科書。他曾經在上海電力公司，以後在安得生公司。最後在中國南部執行業務，是一個能幹的工程師和有效能的人。每年有一萬塊錢的收入。他放棄這種職務，離開他的家庭，來到陝西的這些曠野的僻塞的山裏，不爲任何報酬對紅黨們貢獻他的服務。這真是使人不相信的！這種現象的背景，是一位慈愛的祖父，寧波的有名的慈善家，他臨死的時候對青年的朱的話誠是：『貢獻你的生命，提高民衆的文化水準。』而朱決定了最快的辦法，就是

共產主義的辦法。

我想到朱的這件事情來，是有點驚心動魄的殉道者和熱心家的精神。對於他這是一件稀罕的事。而且他期待着一切別的人也這樣地想。我相信，當他看見了這裏的一切的人們，原明顯地部是很快樂的時候，他一定驚訝的。當我問他，他對於這裏意見如何，他很莊重地回答，他只有一件嚴重的批評。『這些人們用少多的光陰在唱歌上面了！』他瞞怨地說。『我們簡直沒有時間來唱！』

我覺得這句話，完全代表了這個奇特的陝西蘇維埃的『工業中心』的青年的勇敢的意見。

彭德懷論游擊術

關於中國紅軍怎樣並為什麼發生成長起來的這個問題，我想介紹一段我和彭德懷的談話，這一段談話最有興趣。我記得當是我們兩個人是坐在豫旺壩舊縣公署的房子裏，這房子是一個兩層的建築物，有一個帶欄杆的走廊——從這個走廊中，穿過夏平原，可以遙望着蒙古。

在豫旺壩高大的城牆上，老遠有一羣紅軍號兵在那兒練習吹號，又在城市的一角上，正飄揚着一面大紅旗，黃色的鏟刀和斧頭標誌，在摺縐的旗面上時隱時現。我們又可以看見在一邊有一個潔淨的院落，那兒正有一些回民婦人在淘米做飯；另一邊，有一條繩子掛着不少洗出來的衣服。在遠處

的一塊方場上，有好多紅軍兵士在那裏練習爬牆，跳遠和扔手榴彈。

彭德懷和毛澤東同鄉，是一位湖南人，可是他們兩個人直到紅軍成立以後才遇到一塊的，他操一口湖南土音，像機關槍那樣快。只有當他慢說和語句簡單的時候，我才能聽得懂——可是他這個人却很不耐煩慢慢說話。我這次和他談話，賴有一位英語很好的北平某大學畢業學生，給我翻譯，我希望這位青年朋友永遠健康，或者將來他能有一天看到我這篇對他深致感謝的文章。

彭德懷開頭說：『第一中國發生遊擊戰爭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經濟破產，特別是農村的破產。帝國主義，地主和軍閥混戰，全在一起去破壞農村經濟的基礎，如果不剷除這主要敵人，則農村經濟永遠不會恢復。重稅剝削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侵略，加重了農村破產的速度，另外更有地主們爲之推波逐浪。土豪劣紳們在農村裏的殘酷剝削，使大多數農民的生活，陷於極度困難，農村裏的失業，非常廣泛。惟其如此，所以農村裏的貧苦階級，都在擦拳摩掌，準備爲改變現狀而戰！』

『第二，游擊戰爭之所以獲得發展，是因爲中國內地的落後性。交通的阻塞，鐵路橋樑，以及公路的缺少等等，使民衆們能夠武裝起來並組織起來。』

『第三，雖說中國的戰略中心地點，都或多或少少的被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然而這種統治畢竟是不平衡，不配合的。在各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之間，事實上存在着廣大的間隙，在這些間隙處，遊擊戰

爭能夠很快的展開。」

「第四，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已經把革命的觀念廣泛地種入人心，就是在二七年反革命發作以後，城市裏的屠殺雖在盛行，但許多革命者還是不屈不撓，去追求有效的反抗方法。不過，由於帝國主義與買辦對於大城市聯合統治的特殊制度，由於一開始缺乏武裝力量，所以很難望在城市裏取得革命的根據地，於是，遂有成千成萬的革命工人，智識份子，以及農民，回到了鄉間去領導農民武裝暴動。本來，不可忍受的社會經濟條件，已經在農村裏造下了成熟的革命條件，這裏只要有正確的領導和羣衆運動的組織形式與戰鬥的目標，就夠了。」

「以上這些因素，遂使革命的遊擊戰爭如火如荼的展開，獲得了偉大的成功。當然，我說的很簡單，還未曾突入問題的深處。」

「除了上述的原因以外，遊擊戰爭之所以能獲得成功，遊擊隊之所以能長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就是因爲我們的武力能和羣衆打成一片。紅色遊擊隊員，不僅是戰鬥的武士，同時也是政治宣傳員和民衆的織組者。他們每逢到一個地方，就把革命的種子帶入；他們很耐心的和農民羣衆解釋紅軍的正真任務，使他們明白只有經過革命，才能實現他們的需要，並給他們解釋，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他們。」

『但是，閣下方才會問爲什麼有些地方遊擊隊發展得很快並變成一枝堅強的政治力量，而在別的地方則很快的即被撲滅，這的確是一個很有興味的問題。』

『首先要記着中國的遊擊戰爭，只有在共產黨的革命底領導之下，才能獲得成功，因爲只有共產黨才願意並能夠去滿足農民的要求，了解在農民中進行深刻的，廣泛的，經常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之必要，而且也只有共產黨，才能屢行在宣傳時所給予農民的諾言。』

『第二，要記者，一個活潑的遊擊隊底領導，必須要堅決，勇敢，有大無畏的精神。在領導方面如果沒有這些特點，則遊擊戰爭不特不能成長而且，在反動勢力進攻之下，只有一天一天歸於披零破碎。』

『因爲羣衆們只對於實際解決他們的日常生活問題，感到興趣，所以只有立時滿足他們的迫切要求，遊擊戰爭才能發展開來。這就是說，必須要很快的解除了剝削階級的武裝，使之不能動員。』

『遊擊隊員永遠不能夠靜止，否則就是自取滅亡。他們必須經常的擴展，必須在他們的周圍不斷的建立新的外圍區域與武裝團體，以資掩護。政治訓練必須和每一個鬥爭階段平行，而當地的領袖必須從每一個新團體中發展出來，以增厚革命陣壘。自然，從外部介紹進來的領袖並不一定能很多，然而如果不能從地方羣衆中經常的造就新的領袖，則遊擊運動將永遠得不到最後的勝利。』

以上彭氏的敘述，是甚有興趣而且也很重要。不過如是不能的話，我總願意知道紅軍作戰的一些原則——這些原則使紅軍能對付比它器械優良好多倍的敵人，而且復假乎成爲一個不可戰勝的力量，讀者如果讀過勞倫斯（Colonel Lawrence）的傳記和他所經歷的戰役，一定會不期而然地把紅軍的戰術很這位偉大的英國機動戰天才家的戰術互相比較，紅軍和阿拉伯人一樣，實行陣地戰的時候很少，而且也鮮平常；但是紅軍又和阿拉伯人一樣，在機動戰中，却表現出來不可戰勝的威力。

在去年十二月陝變以後，一般人都已經知道，被派去剿共的張學良將軍和紅軍停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爲他在過去歷次戰役中已經深深領略了紅軍的巧妙戰術，而且他相信能夠聯合他們抗日。張將軍和他手下的好多官員——都是狂熱的抗日者——和紅軍戰鬥了三年以後，都堅決相信，將來和日本作戰時，中國必須倚賴於優越的機動戰術和遊擊戰術，於是乎，他們乃渴欲知道在過去十年的戰爭經驗中紅軍所學習的遊擊戰術和戰略。

本來，關於這些點，我在這次談話以前就會問過彭德懷。我當時問他：「你能夠把紅軍遊擊戰術的原則，提綱挈領地歸納起來嗎？」當時他認爲可以，並預先寫好一些小單，這次拿出來唸給我聽。至若關於這個題目的詳細紀述，他又介紹我一本毛澤東寫的小冊子——在蘇區出版——不過可惜

我並沒有找到。

彭德懷給我解釋：「假如一個新開闢的遊擊隊若想得到成功，則必須遵循某些戰術上的原則，這些原則都是我們從長期的經驗中習得的，雖則依照情況可以酌予變更，但我相信如果離開這些原則過遠，則一定會歸于消滅。簡單來說，這些主要原則可以歸納如下：

「一，遊擊隊必須避免每一個失敗可能性很大的戰鬥。除非看到有勝利的把握，不應輕易交綏。

「二，凡是領導很好的遊擊隊，都應當以奇襲爲主要進攻戰術。陣地戰必須避免，本來，遊擊隊並沒有輔助的兵力，沒有後方，也沒有給養綫和交通綫，而敵人則一切皆有。因此在長期的陣地戰中，敵人就能得到各種便宜，而一般說來，遊擊隊勝利的機會是和戰鬥時間的延長成正比例而消失的。

「三，在每次交綏之前，必須要做一個慎密而精細的進攻計劃，特別是退却計劃。任何一個進攻，事先如果沒有完善的準備，則遊擊隊常常會被敵人暗算，優越的遊擊戰術是遊擊隊的最大利益，但如果用之不當，則等於自取滅亡。

「四，在遊擊戰爭進展的過程中，必須要用最大的注意去提防民團——原來民團就是地主豪紳們最前方的，最後方的，而且也是最有決定作用的抵抗綫啊。對於民團，必須用軍事力量加以摧毀，不過假如是情形允許的話，也應該予以政治的克服，俾爭取羣衆到這邊來。但無論如何要記着，假如

一個地方的民團不解除武裝或使之不能動員，則絕對不能動員該地的羣衆。

『五，在和敵人正堂堂作戰的時候，遊擊隊的數目必須超過敵軍。不過，若當敵方正式軍隊正在移動中，休息時，或警戒疏忽的時候，則找好敵綫的要害地方，用較少的隊伍即可來一個疾風疾雷的襲擊。在這種場合，時常百人的突擊隊即可對付敵軍成千成萬的大部隊，在實行此類攻擊時奇突，迅速，勇敢，不動搖的決心，算無遺策的機敏性，以及選中敵人的要害，這些都是取得勝利所絕對必需的條件。自然，惟有富有經驗的遊擊隊，對此才能勝任。

『六，在實際戰鬥中，遊擊隊自己這方面的戰線，必須有最大的伸縮性。如果忽而發現事先對於敵軍的實力，準備，戰鬥力，估計錯誤，則必須用疾風迅雷的速度退出火線，也正如向敵人進攻時那樣敏捷一樣。

『七，在戰術上，凡誘敵，分敵，欺敵，激敵，埋伏，都必要靈活運用。那些戰術，中國古語稱爲『聲東擊西』。

『八，遊擊隊必須避免和敵軍的主力交綏。應該向敵人最弱的環子或最致命的地方集中攻擊。『九，必須要有一切的警戒，使敵人不能發現遊擊隊的主力所在。因此，當敵人行進時，遊擊隊切不要集中在一個地方，而應該時常變換位置——當向敵人進攻的前刻，在一天或一夜裏必須要變

換兩次或三次。遊擊隊的祕密移動，是勝利所絕對必須的條件。按照一定計劃很好的分散與集中，是實行遭遇戰時所必需的。

「十，除了高度的機動性以外，因為遊擊隊和地方羣衆不能分開，所以情報非靈通，而對此也應該予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在理想上，每一個農民都應當是遊擊隊諜探部的一個工作人員，能夠這樣，則敵軍的每一個動作就沒有遊擊隊不知道的了。遊擊隊應該用最大的注意去保證關於敵軍的情報，同時，還應該經常立幾個輔助的情報網。」

以上這十個原則，根據彭總指揮所說，是紅軍所以形成現在這樣勢力的戰術指針。彭將軍接着說：

「所以你看，要想遊擊戰爭勝利，竟要求這樣多的基本條件：勇敢，敏捷，動機，密祕，諜報計劃，以及行動時的奇突堅決。這些條件如果缺一，則遊擊隊即難獲得勝利。爲什麼？因爲在戰鬥開始時，假如他們缺少迅速和決斷，則戰鬥勢必延長。他們必須敏捷，否則敵軍就要增援。他們必須根據可靠的情報去密佈置作戰計劃，而行動時又必須奇突，否則敵軍就要跑掉，或者增援備戰。他們必須機動而有彈性，不然他們就要失掉了彼等對於遊擊戰的利益。」

「最後，遊擊隊所絕對必要的，就是爭取農民羣衆援助自己並參加自己的隊伍。假如不能動員

並武裝起來農民大衆，則事實上遊擊隊即沒有基礎，因而也不能存在。只有把革命的種子深入人心，只有執行羣衆的要求，只有把羣衆團結在蘇維埃的周圍，並且只有藉着羣衆的蔭蔽，遊擊戰爭才能獲得革命的勝利。

這時我坐在桌子旁邊筆記，彭將軍則到屋子外邊走廊上走來走去，不時回到屋子裏來告訴我幾句。突然，他停住脚步，站在那裏若有所思。

『但是，沒有一件事情，絕對沒有一件事情，比這個還重要——那就是紅軍是民衆的軍隊，其所以發榮滋長，是因爲得到民衆的援助。』

『我記得是在一九二八年冬天吧，當我領的隊伍在湖南損傷的只剩兩千多人了，同時我們又陷入重圍。當時國民黨軍隊把我們周圍三百里的房屋完全燒掉，把一切食物都括掠淨盡，隨即封鎖我們。我們沒有衣服穿，我們用樹皮聊作短衣，我們把褲腿割下來製造鞋子。我們的頭髮都長得很長，我們沒有住所，沒有油燈，沒有鹹鹽。我們大家都病了，而且陷於半飢僅狀態。農民比我們也好不多，同時凡是他們的東西我們一點也不動彈。』

『但是農民們却鼓舞我們。他們把白軍來時藏在地下的米穀掘出來給我們吃，而他們自己則吃土豆，草根。他們憎恨白軍，因爲燒他們的房子，偷他的米。其實我們到這裏來以前，他們就已經把地

主和稅吏打跑，因此他們歡迎我們。有許多人加入我們的隊伍，而且幾乎全體來分頭幫助我們。他們願意讓我們戰勝！因此，我們繼續打下去，終於突破了封鎖！

彭轉向我非常簡要明切的結束道：「戰術固然重要，但是假如沒有廣大的民衆來援助我們，我們終究不能存在。我們不是別的，正是民衆解放的先鋒隊啊。」

不管彭氏說的對不對，但是我不能忽視他語中的信仰力。

(雄壯)

紅 軍 歌

4/4

1 1 1 1 7 6 5 6 7 6 0 6 5 4 3 6 7 1 7 6 0

同 志 們 快 快 來 拿 着 槍 我 們 是 人 民 …… 的 武 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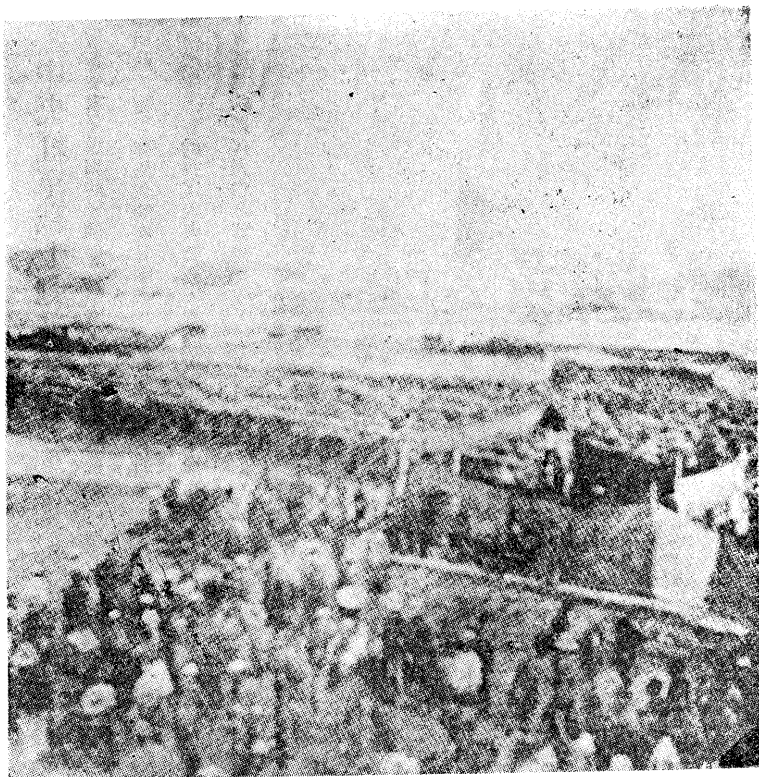
1 1 1 1 7 6 5 6 7 6 0 6 5 4 3 6 7 1 7 6 0

要 打 倒 日 本 強 盜 和 漢 奸 要 創 造 獨 立 新 中 國
6 5 6 7 7 7 0 7 6 7 1 1 1 0 1 7 1 2 5 5 5 4 3 0

敵 人 在 發 抖 了 奮 勇 向 前 衝 ! 我 們 是 無 敵 的 紅 軍

3 2 3 4 7 1 7 1 3 6 0 1 7 1 2 3 2 1 7 6 0

拚 熱 血 頭 顱 把 革 命 完 成 這 是 我 們 神 聖 的 戰 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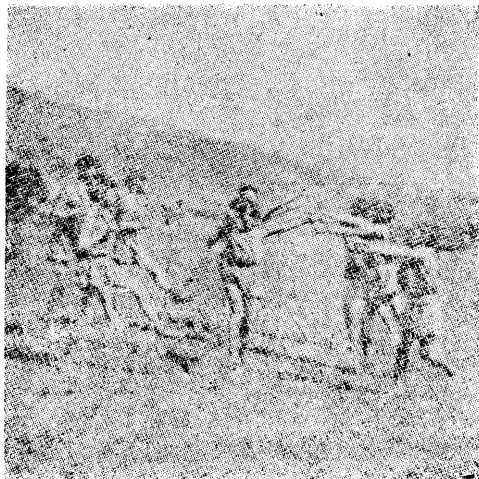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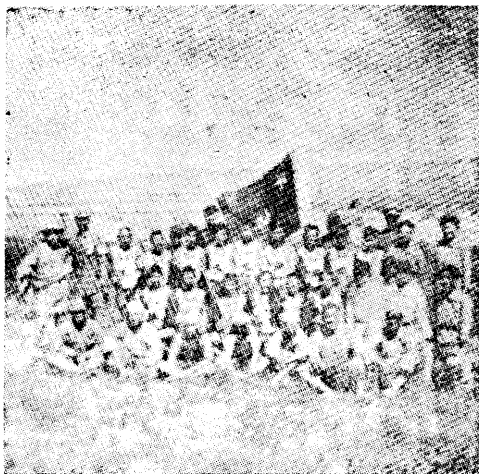
防空演習

不用鋼盔，用隱

身草，紅軍很巧妙的
躲避中央飛機的轟炸
，這裏是個在寧夏的
曠野裏召開的羣衆大
會，許多回民都來參
加，紅軍雖只有這樣
簡的防空設備，但是
很經濟而有效的

中央紅軍戰士劇社

這是在寧夏遇到的一個紅色劇團，這些青年演員扮着不同的人物，有的化裝成日本人，穿着和服，有的裝南京的軍官，有的扮工人與農夫，有的扮作回民，那些胸上有紅星的則代表聯合戰線。



紅色機械舞

用手腳的動作，象徵着機械的旋轉，表現在他們對「機械化時代」的熱望。

中國紅軍

Norman Hanwell 作

「這篇文章的著者最近才從四川回來。在四川中國紅軍佔領的區域內，他消磨了二個月的工夫。他和共產運動接觸，乃由於他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特別注重農村結構，他的對於中國的知識，很是綜合的。他能夠直接參考原有的資料。在這篇文章裏面，他曾親自作過觀察，並且從此得到自己的結論。這篇文章，我們相信是第一篇澈底的，完全公正的，中國紅軍的故事——編者

中國共產黨的實力和性質，特別是紅軍動員的記錄，現在構成一個在遠東極爲人仇視的事體，也是引人注意的事體。由國民黨得來的消息，多是戰時宣傳品，甚至於重披閱軍裏地圖的時候都沒有什麼價值了。若干年來，中國報章沒有了自由，來討論這問題，直到最近，才有一些重要的材料公布。可是一九三四——一九三五收復川贛共區之後，才第一次可以研究這種問題。並且紅軍穿山越嶺的由贛赴川，這驚人的行動引起了羣衆特別注意，同樣在中國道聽途說，流播概略的消息，使紅軍佔領下實際情形的詳細描寫，更爲需要，爲適應這種需要，在中國報紙中雪片似的發現了許多這種文章。

這些文章之中，有一篇特出的報告，值得特別注意，這裏面有許多真實的材料。這就是國聞周報循實陸續發表的幾段文章，這似乎是一九三一楊銓法案之後，中國合法報章裏面，准許刊載的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文章裏最可靠最有價值的。這些消息這樣的有趣，很值得將循實的報告撮要提出——隨便的整理翻譯可是極力保存原有材料的精神——使西方讀者，注意這事體的，多知道一些。這篇文章的選擇，只頗於關於四川紅軍的一部分。

爲使循實所供給的材料更加新鮮豐富，我用三個月的工夫，周遊四川省的某部。在這篇文章結論的一部裏將我個人的印像撮要刊出。因爲現代中國的最不穩定的軍隊，就是中國的紅軍，所以要這篇文章在什麼時候刊出，都不怕失掉時間性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退出了江西，一毀興趣的焦點便西移至四川。在四川省川陝蘇維埃政府樹立幾乎有兩年之久了。因爲國民黨曾集中軍力，攻擊江西蘇維埃，所以四川紅軍沒有受什麼影響，建立了活躍的蘇維埃政府。它雖然陷在不斷和地方軍隊作戰的情勢下，實際却推行許多共產政策。這蘇維埃在那裏？人數比他們的敵人少，但他們用什麼方法總獲勝利？這些紅軍從那裏來的？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的發生，都不是容易解答的。

一九三二年，最後建立了東北蘇維埃區域的紅軍在豫鄂皖三省交界地方會很活躍。後來因爲

雜牌軍和國民黨軍的進攻，使紅軍不得不尋新的出路。紅軍進軍到離陝西省會西安七十里的地方，便被擊退了。因為事實上他們南方沒有敵軍，乘機他們進到四川東北。在這裏佔領了通江南江巴中。徑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在通江樹立了蘇維埃政府。不久白軍軍事行動使紅軍從這些佔領未臻鞏固的區域撤退了。

可是這次撤退並不是說紅軍在這地方的優勢就終結了；因為四川的內戰復又爆發，這在四川是一種常見的局勢。劉湘和劉文輝叔侄間的家庭衝突，開始使川軍從共產軍放棄不久的地帶退出。這等於公開的邀請紅軍重又入川，紅軍前進了，在五月二十六日再陷了南江，二十九日再陷了東江，於是繼續前進。六月底已經有很大的進展——他的右翼逼近廣元城，中路進到嘉陵江河東，逼近蒼溪，左翼追到閬中儀隴附近。這時它的標語表現了紅軍的最大希望，勝利的誇耀「北抵漢中，南脅長江，西搖成都，東震武漢」（紅四方面軍戰略史）。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月間，眼看宜漢和綏定陷落。結果四川省的官吏大感恐慌，怕紅軍繼續南進，到長江商埠的萬縣，甚或到當時戒嚴的重慶，以致截斷了川省對外的交通。

這種軍隊，這樣快就陷落了這麼寬廣的地帶，是什麼樣子的呢？它的人數有多少呢？它有多少武器和怎樣得來的呢？在山陵地帶行動這樣迅速，他們受過了什麼訓練呢？

最初這股紅軍，在徐向前領導之下，由鄂豫入陝，再由陝南下入川的時候，它的人數。按照各方統計，傳在一〇・〇〇〇和一五・〇〇〇之間，槍數在八・〇〇〇和一〇・〇〇〇之間，西北紅區政治部主任兼政委陳昌浩所寫的「紅軍四方面軍戰鬥略史」中，對於這一點，也沒有說出數字來，只曉得該軍所轄的是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七十三等五師，

入川以後，這原來的核心，逐漸擴充成四軍，又收編過顏德基的部隊及劉存厚，王維周等的軍隊爲第五軍。關於川省紅軍的軍事組織系統和一部份紅軍首領的姓名，可參看本文附表，不過這表沒有告訴我們紅軍的人槍數目，因爲紅軍各軍雖同是「三三制」——每軍三師，每師三團，每團三營，每營三連——人數是很難確定，它的人數每連有五六十人的，也有七八十人的，一百人的。至於槍支最多有每連七八十支，最少的才有四十支。假定每連平均以七十人計，則這時候（一九三四年五月）這表裏全軍數目大約有二萬六千人，槍兩萬支。

除了紅軍本身外，還有其他的武裝，如赤衛軍和遊擊隊。詳細的表冊，雖不能全有滿意的數字，也足以略示這些軍隊的實力。綜合這些表冊的結果，這時候的遊擊隊和赤衛軍，一起不下一萬五千人，但槍支不過在二三千支之間，其餘的都使用如矛，大刀，竹槍，土槍等各色各樣的武器。

至於正式的紅軍武裝配備，因爲來源不同，槍支自然是很複雜。有新式，夾板，漢陽，奉天，廣東，三八，

各種四九兩軍的步槍，多半是漢陽奉天廣東造的，都認爲是比較精良的武器，其他各軍的槍比較複雜些。子彈也是這樣，四九兩軍的每人平均有二三十夾，但其他各軍則少至每人祇有四五夾，甚至有打不死人的木彈頭的。

重要兵器中，以自動步槍佔大多數，自動手槍次之，也有少數的礮，但是不大使用，因爲缺少炮彈；手留彈多半是瓜式，是從劉存厚那裏得來的，不過一般的多半不發生效力。重要兵器是歷年在鄂豫皖繳得中央軍的（從中央軍繳的槍支，甚至於買的槍支很多，紅軍時帶叫他們作我們的輸送隊）就所有的這些不完全的統計看來，入川紅軍的概數大約有四萬人，二萬五千支槍。別的統計有的少至一〇〇〇有的多至一五〇〇〇人，但是他們的材料沒有循實的可靠，傷亡病死的兵士雖不下二萬人，但新來自動加入和補充的，加上被裹脅的人一定超過了這些損失。是以在最近朱毛由贛入西川的軍隊和徐向前的軍隊匯合以前，四川紅軍的實力，或者超過四萬人；槍支也必因幾次的勝利又增加了二三千支。現在西川匯合軍隊的實力怎樣，不能夠說得很確實。當江西軍隊西征，遠道貴州的時候，損失了驚人的數目，可是在路途上，又參加了許多許多新的份子。因爲他們途中經過許多缺少食物的地方，軍隊數目，自然比一九三四年方離江西中央蘇區時候減少，數月以前我在四川的時候，可以接受的數字是在徐向前部下紅軍約八萬人——約爲循實所調查者兩倍——江西來的

軍隊約二萬人。

紅軍對省軍和政府軍作戰，往往勝利，但對方的數目却遠超過紅軍，有時多至四倍以上，顯然的，她們的勝利並不全靠人數與器械，紅軍的訓練教導比中國其他軍隊的複雜系統簡單許多。他們的訓練只有三大項——第一射擊，第二跑步，第三爬山，特別是利用鐵鈎抓子繩索這些傢伙。精神方面的教育是可以想像，進行得很猛烈。功課包括識字，聽講，讀標語，喊口號，唱國際歌。換而言之，用讀書聽講，演說記憶，唱歌等方法，將紅軍澈頭澈尾的施以共產主義的洗禮。據循實調查，從某祕密文件中看過紅軍各種成分的大概統計：紅軍中以貧農雇農的分子為最多，平均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工人百分之十，其餘的百分之卅是退伍軍人和團丁；紅軍中的共產黨員，一師中最多的三百多人，最少的六十幾人。

紅軍軍事動作的時候，運用宣傳和運用兵力一樣。雖然中央軍關於紅軍的實情——口令長官軍容等很難認清但是紅軍由於精明的偵探工作，對於中央軍的進退，豫先就知道了。紅軍知道每次換防來的部隊，甚至於團營連長的姓名綽號經歷，他們都明白。向中央軍說起來一點也不錯，這是屢試屢驗的事。這些情報，有一些是從前線交換警號得來的。

有時中央軍因為給養不接濟，改吃稀飯或改觀吃麥子，紅軍知道，便要在前線上借以作宣傳的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席 張國燾

中 國 紅 軍	1. 西北軍區政治部	主任 陳昌浩 副主任 傅昌鐘 曾長流	2. 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區總指揮部	總政治委員 陳昌浩 副總指揮 徐向前	3. 參謀處倪志亮	修械處 印刷廠 縫衣廠	主任 鄭義齋	4. 總經理處	院長 周光坦 主任 張琴秋	5. 總醫院	6. 軍事學校	
	第四軍	王軍 洪 坤 長第十師 此軍為四方 面主力該軍 主力為十二 師全軍人槍 均較各軍為 優	第九軍	何軍 長二十五師 此軍作戰次 於四軍主力 二十六師於 四軍主力	第三十軍	余軍 長八十八師 作戰力次於 八十九師九 軍主力為	第三十軍	孫軍 長九十一師 作戰力與三 十一師等主 力	第三十軍	王軍 長九十八師 新編人槍均	第三十軍	
	許軍 政治委員 某 第十二師	詹軍 政治委員 芳 二十七師為 二十五師	李軍 政治委員 念 九十師九十 師	曾軍 政治委員 流 九十三師為 九十一師	陶軍 政治委員 九 十九師壤							

資料。有人或者會驚訝，爲什麼省軍長期沒有發餉而成了習慣，紅軍並沒有更大的成功。當省軍鴉片烟沒有運到的時候，他們便喊「老鄉，你們這兩天沒有鴉片吃了嗎？我們有啊，你們可以拿紙烟拿鹽來換吧。」於是大家約好了不放槍，客客氣氣地這樣「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這樣交換的事時常發生的。紅軍時常因爲這種交換的事，得到兩種利益——他們得到了必需品；同時換出的鴉片，一定會給政府軍的效率一些壞影響。

有一件事證明紅軍探察重要軍事消息的効率很高。一九三四年八月初旬，高級指揮部的通報，說確實發現了紅軍對於中央軍軍事上的機密電，不但能偷着收，而且無論什麼密碼，都有法子譯出來。

徐向前和這些四川紅軍的軍事策略，和賀龍的有很大的差別。賀在鄂西，湖南，四川東南，東擊西，神出鬼沒，旋磨打圈，有「迅速如風」的名稱。賀龍那時所處的地位，除了東突西竄作游擊戰而外，實在沒有什麼良策；徐向前在四川的情形根本就不同；有他們的「川陝省」紅區，軍事政治的策源地，這要採用完全不同的政策；那就是「爲保衛赤區而戰」，「爲消滅進攻赤區的劉湘而戰」，「當紅軍在他們的區域內，樹立蘇維埃政府的時候，該地所有的自然疆界，就要用以作爲防守的工具。他們可以利用地形，多築工事，以逸待勞的陣地，等待省軍——直到一九三四年底，劉湘戰敗，公開退却，要

求中央軍力援救以前，中央軍並沒有聯合作戰。

就是這樣不及賀龍的用兵，徐向前部下紅軍兵力的運用，已經比政府軍的靈活得多了。總是據險而守，紅軍只消在幾點上配置少數的軍力，就可以與中央軍對峙，而且在一些前方陣地的工事中，只放三五個人警戒，直待有異狀發生，接到警號時，才有兵來增加。每到夜裏，東一堆西一堆地燒些疑火，或是用少數的兵吹哨子，奏衝鋒號，作種種聲音，佈些疑陣。就在紅軍的本陣地的工事中，任警戒的也多半是游擊隊赤衛軍，真正的紅軍，則在後方或其他相當地點，不是訓練，便是休息。

特別著名善戰的紅軍，像四軍的第十二師和三軍的第九十師等，有時只要他們擺在中央軍主力的當面，因他們的威名，就能嚇得敵人胆寒，而得撐持局面，隔不幾天某處有什麼特別情形，需要他們便悄悄的換上其他的隊伍，使他們的敵人莫明其妙，跑到的戰場去了。再過幾天，他們到別處的任务完成了，於是又調回原處。

政府軍常常弄得莫明其妙，所以間諜時常報稱，「陳昌浩帶了幾團到某處去了」「徐向前帶了那一師到了那裏去了」重要的事實，例如數目地點，他們却得不到。他們自己的行軍，却和紅軍不同了。——完全不用疑兵計，前線唯一的調動，就是全隊的移動。

紅軍因為數目較小，必須退而採取人工方法防守，這樣人力才能夠作最有利的運用。因此山連

山的建築深溝壁壘，和其他軍事障礙物，戰壕最少的也有五六道，有的多到十二三道。這些戰壕和障礙物不是紅軍建築的，而是包含受過訓練的土木石工人的一種特別隊建築的。他們只管工作，不管作戰。這種計劃，一舉兩得，不僅利用了這種專門人材的長處在戰爭防守的工作上，並且使紅軍在可以好好修養的時候，不出去築修戰壕。中央軍則恰好相反，他們得自己掘戰壕，不獨費時，使兵士筋疲力乏，不足以阻擋紅軍的奇襲，並且下第一次雨水，就將全行沖毀。對照起來，紅軍的防禦工時，可就整齊堅實得多了。政府軍必須犧牲許多人才佔領它，再費許多時間毀壞它，——毀壞的兵士也不免要罵幾聲，這些過去的建築者，他們作得太結實了。

紅軍並且專在心理弛懈的時候從事進攻。在下午敵方軍隊經過長日的緊張，在晚飯前，正從事休息和有些人要抱起大烟槍的時候，紅軍就作驚人的奇襲了。

雖然紅軍的活動的區域，時常的變動，但是他們良好的紀律，實顯示其組織與統制之得法。拿這個和缺少訓練的省軍比較，紅軍自然似乎是和他們自己所提出的「人民的保護者」口號相符。政府軍軍官時常提起紅軍訓練的很好，可是在作政治宣傳的時候，就稱之作「赤匪」或「殘匪」了。這裏有一位傳教士的一段話——他絕不是親共的，因為也曾親自參加現政府的地方行政——「紅軍在川南佔領城市，拿去所有他們需要的東西，省軍克復了這些城市（紅軍繼續長征的時候

橫加破壞，甚至於將商家的貨物取來放火燒了。」

省軍這種行動是不僅限於川南的，當四川蘇維埃軍隊西行和由江西長征來的紅軍匯合的時候，許多傳教士因為怕紅軍，要向他們的方面移動，被逼得撤退離開北方的教堂。當紅軍向更北方面過去，他們回到教堂的時候，他們一切稍為值錢的東西都被搶了。雖然紅軍前進的時候，這些教堂永遠沒有被靠近過，却是被認為保護民衆，抵抗恐怖的「赤匪」的省軍占領過。

我從許多一個醫生那裏，聽到這樣的話——根據舊日對於省軍的經驗——所受到的影響，就是如果他們離開，則在紅軍未入境以前，他的藥貨和設備，都早就失蹤了。

我並且看清楚了，在中國訪問關於紅軍的活動，是多麼不可靠。越走近所談的區域，謠言的程度越少。當離開成都——四川省會——向北旅行的時候，我聽說許多巴中燒成焦土的故事，有人告訴我紅軍將城裏所有的東西搶走了。那地方的萬人坑到處都是，換句話就是說，可憐的城市什麼也沒剩下。

到了巴中，實際情形怎樣？雖然我幾乎踏遍了城裏的街市，我不能看出任何這種宣傳被毀壞了的證據。誠然這城市的人口沒有紅軍佔領三十天以前那麼多了。不過顯然，所有政府宣傳員都說紅軍殘暴無道，而還有這些人留下，豈不奇怪麼！萬人坑？我沒有看過，也沒有接收有萬人坑存在的報

告。在這城裏得到的故事，只是這地方被紀律很好的紅軍占領了，紅軍用宣傳的方法要收得農人工人的支持。全城貼滿了給「農工」「城內貧民」的布告。土地重新分配已經提出，可是因為佔領的時間過短，似乎並沒有實行。壁報的遺跡，有的地方仍然能夠看到，裝飾用的諷刺圖的遺跡也有。諷刺圖的大部已模糊，但是有的對外國人的諷刺仍然能看出來，都是攻擊帝國主義和外國壓迫的，這裏曾經搶劫過麼？是的，不過搶劫不獨是紅軍。紅軍收聚他們必需的物品——這時候似乎沒有給錢，不過大部搶掠是本城流氓土匪幹的——結果埋怨到紅軍身上。當原物主回巴中的時候，許多贓物，都在鄰居屋內發現，這種事實，是有力的證據。

在離開四川以前，我得到機會和一位方從紅軍撤退不久地方視察旅行回來的教士談話。這地方是四川紅軍和江西紅軍會師的地方。他用許多照片附作報告，論及某些城市的完全毀壞。並且指出這些城市，直到紅軍準備離開以前，為軍事上的緣因，才毀壞的。離開這地方的時候，紅軍攜帶所有他們能帶的必需品，將他們不能帶的食品，投到污水坑裏，這樣可以免得落到政府軍的手裏。除了根據軍事上的理由，這種政策是不能被贊同的，可是由於共黨錢幣流行的很多，可以證明紅軍盡量以錢購買東西，不用說，非紅黨組織重又統治，這些紙幣布幣完全沒有用，紅軍銀幣的銀子值錢，可是政府軍到來，農民帶着很是危險。

一般既認爲共產黨對於稍與前政府有關係的人，都是不利的，所以四川許多居民都以爲有許多屠殺。我三個月的旅行中，最常聽到的話，就是「如果紅軍不這樣好屠死，現在他們當完全統治四川了。」這種常被詛咒爲不必要的屠殺是指殺那些寄生者而言。人們大致都猶豫這些榨取階級的惡劣行爲，是否就要受懲罰的最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在紅軍門口所殺的人，實際乃是當地居民殺的。他們利用一種軍隊撤退，一種軍隊未佔領以前的棍亂情形，解決舊日的仇人。有些人表示感到這種屠殺，如果不是有組織的紅軍幹的，也是他們容許的。是以他們必須分擔這種責任。這可以承認這時候的屠殺，比以後所得到的報告多一些。現在的殺人正法，須由共產黨認爲正當才成——特別是腐敗的官吏，就是林語堂在他最近的一本書「我的國家和我的同胞」裏面，也認爲該殺。由於這種政策的修正，紅軍將繼續在四川農民中，抬高它的聲譽。我們必須認識的，是任何有內戰的地方，必然伴有屠殺，至他屠殺得「公平」和「不公平」的問題，就全看讀者和觀測者的偏見了。

我從各方面聽說紅軍組織很精密——在四川紅軍雖然不是武裝最好的，却是組織最好的軍隊，循實報告中的特勤隊，木工鐵工担夫是確實的。青年和婦女用來作宣傳，縫紉，烹調等工作。當他們在成都西面的時候——當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們又到這邊去了——他們在一個城裏，有六架能攜帶的無線電報機，保持他們和全中國的其他紅軍繼續有聯絡。

紅軍的組織，和省軍組織的比較，最好用一位外僑，遊歷某處及所說的下面一段話，表示出來：「紅軍習慣是自己建築臨時掩蔽部，他們有特別隊替他們幹，因為這種組織的結果，是以在某處雖有八萬紅軍駐紮，比以後一萬二千到二萬省軍駐紮，對於該處人民的攪擾還小。」中國政府宣傳，稱紅軍爲「匪賊」，這種誣蔑，誰還能找到比這更好的證明呢？四川現在進行的，乃是兩種軍隊間的內戰——一種組織好，一種武裝好。

中國紅軍怎樣建立蘇區

N. Hanwell 作

「共黨到了一個村莊就在莊外札營，派代表入莊內和村長鄉長談話，安撫他們，然後紅軍入內，占領衙門，時常要審問鄉長的。如果村民沒有怨言，鄉長可以恢復自由，如果他會壓迫人民，就將他驅逐了。可是沒有一個村莊，在廣衢豎立高杆，懸掛人頭示衆，如汾州懸掛幾個共黨首級那樣。」

「共黨首先預備好一張單子，令王先生捐洋五十元，李先生捐洋五百元，希望趙先生能捐洋五千元，諭令劉先生從他的豐滿倉廩裏納出倉糧五十袋，唐先生必須捐鞋一百雙等等。這樣的錢財用品給了紅軍，都有正式收據交給捐戶。一般的捐，都是在捐助人所能擔負以內的。」

「自然這些人們不願意捐助，可是因為這些要求如此合理，他們到還高興，真是出他們意料之外。所捐的錢是給紅軍發餉的，有一些儲存起來，其餘的就很慷慨的分給貧窮需助的人們。」

這是今年有一個記者旅行山西後寫的。我自己去過山西。不過這是在他所說的共產黨活動以前。

當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開入新的地帶的時候，他們的所作所爲，許多記載，雖然小節不一，大致却相同。記載有時隨觀察者的偏見人異。如果談話者是當紅軍來到，損失很大的人，他自然只報告一些

使他們戴上有色眼鏡的事實。反過來，如果談話的人，是一個無家業的勞工，除了束縛他的枷鎖以外，一無所失——像共產黨所說似的——他自然要說他們和玫瑰花似的了。雖然這些觀點之間，有很大的差異，我看要獲得共黨占領地方的慣常方法之一種清楚的認識，也並不是不可能的。

自從我根據我在四川幾個月的經驗，在「亞細亞」五月號寫了一篇文章之後，我又到黃河以北好幾省，旅行有些區域和紅軍的路線很近。很幸運的我得到機會，由許多中國旅客和研究專家得到消息。他們有許多人到過不開放給外僑的地方。將這些消息和我在四川、陝西、山西、江西各處所見聞相對照，我相信我對於早期共產黨占領新領土實際所用的方法，和他們對於中國內地兩個基本問題——土地和租稅的處置態度，得到了確實的記錄。

他們今日的政策，總是要樹立一種繼續長久的政府，而早年的時候，因為軍事上的需要，在開進到新的區域的時候，他們只收聚財帛和一些必需品，這些強迫捐助多半是縣裏的銀行、會所的富戶——事實上如果一些富戶被認為是土豪劣紳或高利貸者階級分子，不獨要強迫他們供獻他們的財實，並且和其他視為「人民公敵」、「反革命分子」的人，一同正法。最近的時候，在長征路線上，——如自江西西征入四川的長途中——佔領了城市，要徵發必需品，不過有許多時候我注意到，只將用的東西拿起，並沒有橫加毀壞，縱火焚燒的事，像我說過四川省軍幹的，而將罵名落在紅軍身上。

時常在開拔以前，紅軍要毀滅地契債券，以博貧民和債台高累的農民的擁護，時常招募當地居民，稍加擴充，然後再繼續前進。早期因為戰爭需要的壓迫，不免兵額過多，經過幾年，紅軍組織加嚴，加以在占領任何新地帶前，時有明確的消息得到，超額人數不給取消，就給減少了。

紅軍如立意要擴大蘇維埃政府下的領土，則發生取得和保持民衆擁護的必要。在行政上，蘇維埃政府是以省、道、縣、區、村爲基礎的，區和村的官吏，是直接由民衆大會來選，其餘省道縣的官吏，則由代表大會選出——這種系統乃效倣俄國蘇維埃的制度，所不同的一點，就是紅軍的勢力大一些。士兵選舉一名代表所要的人數，比一般公民爲少。因為他們負着保衛國家的重責，所以給他們以特別的待遇。在那些土地分配過壞的區域，土地過少，租金過重，地主手中土地過分集中——共黨政策自然要注重解決土地問題的。

不久以前，我和一個紅軍沒有到過的一個省份的省府委員會見，他是省主席很親近的。他告訴我他有一些土地，不過他得不到許多地租——他說『只得收獲的一半。』我看他並沒有認清他所說的話的意義。我並沒有提醒他，中國法律所允許的最高額，是收獲的百分之三十七。按照事實說來，『只有收獲的一半』和中國其他一些都分地租相比，並不算很高的。最不幸的事實，就是地主和官吏——常常是一人兼任二者——不考慮收租這件事。他們對於農民有生殺予奪之權，如果租戶稍

有不慎，就剝奪了他們的土地；而在中國今日，一個農民沒有土地，便等於處在絕境的。

甚至於在紅軍未到歸共產黨統治的新地方以前，就努力從事暗中刺激對於土地之不滿，鼓動當地人民抗稅抗債。這種辦法，早就在民十六國民軍北伐以前流行了，那時候他們前方的工作人員（當時國民黨中的共黨份子）就這樣的鼓動湖南的農民，國民黨簡直不用怎樣作戰，農民自己就已經勝利了。

共黨軍隊一到，接着的一步，就是樹立村蘇維埃，和一些初步調查必要的機關。四十戶至六十戶間，聯合樹立一村蘇維埃，每十戶或十家，選土地委員一人，通常由工人或工匠充任，大而戶口年齡食糧小而雞犬牲畜用物，皆由土地委員調查清楚，一一登記。鄉村蘇維埃派少年先鋒隊員同土地委員及本地窮人組成查田隊，詳細調查該村一切田地情形，查竣後再由鄉蘇派人復查，查清即着手分田。循實耗費了十個月的工夫，研究川陝蘇維埃政府的政績，對於那裏所實行的土地法，得到很清楚的描寫。地主階級所有的土地，無條件的沒收；地主階級是指自己有土地，但並不耕種而行租出的人——他們和土地與實際耕種者，常沒有接觸，只僱人收租而已。田租時常超過收穫的一半餘剩者，不足以供養耕種者的家庭。對於一羣「富農」，又採取一種稍有不同的政策。富農是指自己有許多土地，僱工耕種，並且出租自己種不了的土地。兼營高貸利者而言。其土地也一樣的收沒了，但是和地

主不同的，就是富農仍然可以照舊作農人，重分土地的時候，他還可以分得一份較壞的土地，被認為中農的人們，便是很幸運的，因為他們所有的土地，顯然是共黨認為合理的。他們的土地，一點不沒收，仍然還歸他自己所有，但是須自己耕種，不許租出或僱人耕種。共黨到處盡可能的用各種方法鼓勵開墾未耕種的土地。

土地現在可以重新分配了，但分給貧農的時候，用什麼標準和給誰呢？分土地不是按勞動能力作標準，採用的是計口授田制，籬垣田界都取消了，而重新劃定。土地按照它的產量分成等級。分配的原則是『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能夠作莊稼的壯年男女多分一點，老弱的少分一點。』雇工，貧農，兵士，和失業而願意親身作莊稼的窮人，都應分得土地。凡參加紅軍和其他的農工戰士，予以特別的待遇。他們的土地，乃然當地蘇維埃監督之下，負責代耕。對於佃農，則將他先前耕的土地給他，他欠先前地主的租錢利錢一概勾消。所有典當給人家的土地，一概無代價收回，完全歸佃農所有。

土地法還包含有立意爭取白區新兵的條例。凡白區工農及白軍士兵來參加紅軍者，與紅軍兵士同樣待遇，分得公田由蘇維埃命人代耕。白區來之醫師，技術人材，專門家，教員，除應得之工資外，如攜帶家屬，亦同樣分得土地。

不僅『榨取人的』地主的土地要收沒，他們的耕牛農具也要收沒。這就發生了耕牛農具的重

新分配的問題。就是將它分給農民或集體的使用它。到今日大約還沒有看到像蘇聯那樣的集體農業的紀錄。他們實行的政策，是無田者授以田，並盡力設法集體使用耕牛和農具。要在農民中間分配耕畜農具，自然不免發生不公平的怨言，是以中國蘇維埃組織者的講演和行動，都顯出鼓勵集體使用器具的希望。

土地分給貧農和紅軍游擊隊，糧食就歸他們所有。凡地主豪紳反革命的土地，一律收沒，沒有分的荒地，由蘇維埃交給有勞動能力的勤儉的貧農耕耘，收穫的六成歸他們自己，四成歸蘇維埃，作爲紅軍的食糧。設立糧站，存儲紅軍公田收的糧食和被「白匪」——紅軍和白軍互相稱呼一個名詞——壓迫走的工農的田地收的糧食。組織澈底的監察制度，苟有任何隨便糟蹋耗費吞沒變賣等違法事件，都要受法律的處罰。紅軍公田，由蘇維埃覓人代耕，收得糧食交蘇維埃保存，紅軍可以領取糧食或變賣成錢。代耕者的工資，則以從地主沒收之田地的糧食償付。並定下被白軍逼走的農民的糧食處理的條例。他們的穀物，由當地蘇維埃代收，以十分之二給收穫者作工錢，其餘的保存起來。限逃跑的人三個月內回家。經過考查之後，可以發還他們的穀物三月以上回家者，須經嚴密的考查，並得農人担保，始發還其糧食。但如被認爲反動分子，則將他們所有的土地糧食收沒。除去代付的工錢外，其餘沒收的糧食都分給窮人。

最重要的一事，是在所有中國共產黨統制的領域內，禁止種植鴉片，循實遊歷過一度是蘇區的地方，說是簡直看不見一根烟苗。可是有個例外，即如有蘇維埃政府許可，村蘇維埃得用有限的土地，爲着特別的需用，種植粟粟。吸煙的人，在共黨統治下，按照年齡分等級。三十歲以下者，必須立刻戒絕，三十歲到四十歲者，給一年限，一律戒除。四十歲至五十歲者，限期兩年。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因積病或體弱難戒除者，可得某種特許。此外又專設戒煙局，切實助人民戒烟。但有一種例外，值得注意者——即販運烟土到白區售賣者不禁，蘇維埃政府甚至於獎勵之，這樣可以鴉片交換更有用之物品。

在中國共產黨觀點中，和土地問題同樣重要的，是租稅問題。稅則的改革，自然適合一國農民要求。據說四川一省有些縣份每年應納的錢糧，一年竟徵到十次，預徵十年，徵收錢糧到全收成的百分之六十。收成大半拿去納租，再用大半拿去完糧，農民一年在重債剝削之下工作，却沒有糧食供養一家老小。四川的情形是到了極點，但是可以證實各省的地租錢糧，都須減低的還有許多呢。四川這種負擔如此的重，有些縣份，過半的農民拒絕耕種，這是去夏四川飢荒的一個原因。

共黨對於稅收政策，提出最根本的改革。——照循實說：『這種稅收政策的改革，和從窮人身上取得重，從富人身上取得輕的稅制，完全相反。』一個共產黨宣言提到：『完全取消所有國民黨軍事和政府稅的剝削，向有產階級實行累進稅。取消由紅軍工人和鄉村城市的窮人所收的稅捐。』一切

原有稅捐，一概取消，而代以富有階級負擔較重的「統一累進稅」。

蘇區採取了一種農業土地的稅收，有些地方稱爲公糧或政府錢糧，因爲有些時候，按食糧種類征收，用以供給紅軍，和救濟不能自給的人們。爲徵收這種租稅，和分配土地一樣，農民分成三個階級——貧農，中農，富農。頭兩個階級的稅率，通常是一樣的，富農的稅率，則累進的高一些，免稅的收穫的數量，也爲貧農中農較諸富農大一些。下表是共黨政府先前在中國四個不同區域，實行的稅收單位和稅率表，四個不同區域即川陝區，閩南區，閩西區和贛浙交界區。稅率和免稅都是累進的。到某種數量止，通常是足以供收割者生活，收很少的稅或免稅。這個數量以上，稅率累進，直到收成百分之二十。二。這顯然比非共黨區現存稅率較輕些，再者，占收成四至七成的地租也行不通了。

不僅基本稅率比較減低，並有某種特別免稅辦法。紅軍家屬（父母妻子不能勞動者）可以免稅。貧農納完課稅後，所餘不足以供家庭生活者，如由當地蘇維埃決定，可以豁免。經受天災或白軍兵禍者，稅收亦可減免。爲鼓勵改良農業起見，如改良籽種，改良耕田，則收成可以免稅。旱潦之田，經過開墾，收成免稅三年——但是富農僅免稅一年。川陝蘇區公糧，乃因糧食之種類收稅公糧的分配，以十分之四作紅軍用，以十分之四作公務員及來往運輸隊用，以十分之一供保衛地方的團勇用，其餘的供救濟殘廢和扶卹窮困與無力工作者用。

公糧或錢糧稅收表

甲 川陝蘇維埃政府

收穫量

壯

丁

老

幼

富

農

(下列由收割繳納數字)

三措(六千兩)

免稅

免稅

五〇〇兩

四措(八千兩)

免稅

五〇〇兩

七五〇兩

五措(一萬兩)

五〇〇兩

七五〇兩

一〇〇〇兩

六措(一萬二千兩)

七五〇兩

一〇〇〇兩

一〇〇〇兩

七措(一萬四千兩)

一〇〇〇兩

一〇〇〇兩

一〇〇〇兩

八措(一萬六千兩)

一〇〇〇兩

一〇〇〇兩

一〇〇〇兩

九措(一萬八千兩)

一〇〇〇兩

一〇〇〇兩

不再累進

十措(二萬兩)

二〇〇〇兩

不再累進

不再累進

乙 西江稅率

收稅基本單位

貧農中農稅率

富農稅率

一担（每人）

免稅

百分之四

二

免稅

百分之五

三

百分之四

百分之六

四

百分之五

百分之七

五

百分之六

百分之八

六

百分之七

百分之九

七

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

八

百分之九

百分之十一

九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二，五

一〇

百分之十一

百分之十四

一一

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十五，五

一二

百分之十三，五

百分之十七

一三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八，五

一四

百分之十六，五

百分之二十

一六

百分之一八

百分之二二

五十担以上稅率不再累進

丙 浙贛交界蘇維埃稅率

收稅基本單位

稅率

五担以下

免稅

五担至一〇担

百分之五

一〇担至二〇担

百分之七

二〇担至三〇担

百分之九

三〇担至四〇担

百分之一一

四〇担至五〇担

百分之一三

五〇担至六〇担

百分之一五

六〇担至七〇担

百分之一七

七〇担至一五〇担

百分之一八

丁 福建稅率

歲 收

貧農中農稅率

富農稅率

百分之一担(每人)

免 稅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五

百分之六

百分之三

百分之六

百分之七

百分之四

百分之七

百分之八，五

百分之五

百分之八，五

百分之一〇

百分之六

百分之一〇

百分之〇一，五

百分之七

百分之一一，五

百分之一，三

百分之八

百分之一三

百分之一四，五

百分之九

百分之一四，五

百分之一，六

百分之一〇

百分之一五

百分之一，八

百分之一一

不在累進

百分之二〇

蘇區的稅收，不僅是基本農業土地稅一種，其他稅收，因當地情形和對白軍戰事需要的不同，隨處而異。循實視察四川東北部發現三種特別稅很重。一種是該地特產銀耳稅。銀耳是一種木耳，有錢

階級需用很多。上海食店貨窗中陳列銀耳很多。這種產物課稅一成至三成，資本不及三十元的貧農和中產階級免稅。第二種重稅是鴉片稅，因為鴉片產量有限，所以稅收也有限。用鴉片的地方，徵稅到貨價二成至四成，並無免稅。第三種重稅為屠宰稅——全中國都有稅——一頭徵稅一成。婚嫁喪葬時，屠宰豬羊供家家食用者無稅。另外的兩種普遍稅收，即蘇區入口稅和出口稅。出口稅如棉花、藥材、五金、豬牛羊、糧食等，按價抽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但有時候得酌量情形豁免。入口稅如西藥、五金、鹽、米、煤油、紙張、油漆、雜貨等，按價抽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稅，有時亦得免稅。食鹽對於中國人很重要，因此特別有食鹽入口的免稅。在江西用盡了種種方法，通過國民黨圍剿的經濟封鎖，私運食鹽入紅區作竹筏子，每個竹桿實滿食鹽，或假作出殯，棺材裝滿食鹽，是他們用過法子中的兩種。

用他們累進稅和豁免不能夠納稅者負擔的政策，共黨立意完全推翻先前的稅制，在中國任何地方，當佔領新的領土以前，他們在宣傳中，公佈先前的稅制是要解除的。

下一篇文章，我要將中國蘇維埃怎樣的樹立某種文化和經濟組織，以伸張他們的勢力，到他們統治下的人民的日常生活，作個概要報告。

在中國紅區裏

N. Hanwell. 作

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任何區域得到統治權的時候，他們對於文化經濟要有什麼轉變呢？首先要顧及的，毫無疑問，乃是既得領土的防衛的需要，特別在防衛的紅軍，比敵人相差若干倍的地方。所以在防線以內的建設機會，很是有限的。政府當局布告，有的時候，甚至於也承認，保持生產和紅軍占領以前的水準相同，有種種的困難。並且認為這種失敗，乃由於軍事時期的延長，但是無如論如何，文化經濟的改進革新，總有許多新的嘗試，並且實際也有許多的成功。

蘇區教育設施，乃在稱為文化教育委員會之下，該委員會共分爲三科，管理學校教育，社會文化，和國家出版。第一，學校教育科，負責創辦列寧小學，醫學班，農事學校，蘇維埃學校，財政經濟學校，教師養成所，並負責審查學校教師。在這篇文章最有關係的區域——先前在四川東北的蘇維埃共和國——因爲有當前更緊問題的急待解決，許多這些機關，仍然未曾開始，未經舉辦。可是所有蘇區各縣，都有列寧小學了。它的目的，乃在赤化該區的兒童。由黨的觀點看來，這種學校組織成功，可由陝北（這裏這樣的學校曾存在過許久）的青年，教育成功看出。純在共產黨羣圍裏不受任何其他的哲學，騷擾他們黨的思想。第二社會文化科，有工農刊物出版所，閱報識字班，音樂隊，俱樂部，學會和新劇團，

木頭人戲團，文化演講等等。第三國有出版科分三股——編輯委員會，審查委員會和印刷股。

宣傳，這是共產黨在全世界自誇的。它的組織不亞於教育的徹底。它的目標，不僅直接運用宣傳品，鼓動民衆，並且組織他們，和協助地方工作人員，所有各地方機關包含各縣都有正式的宣傳隊，紅軍之中，也有常川駐扎的宣傳隊。

四川東北和陝西南部，見到的更重要刊物之中，有『蘇維埃』，這是川陝蘇維埃政府的機關報；『赤化全川』，由西北革命軍執行委員會出版；『紅軍』，由紅軍中央總指揮部出版；『川北窮人』，由西北軍區政治部出版；『斧頭』，由川陝總工會出版。還有許多其他報紙出版，包括各鎮市要地貼的壁報在內。這些報章有的每日出刊一小張，有的每三日出刊一次。

勞工委員會指導下的一些活動，對紅區內勞工的文化生活，有很強的影響。這委員會的最重要辦公處之一，乃是關於失業者的保險的。保險金錢，並不取於工人，乃取諸顧主和資本家，用來救濟失業。其他勞工團體，到能樹立的地方就樹立。這就是職業代辦所，勞動保險所，勞動研究所和工人農人住的旅館，更恰當點，這可以稱作小店。雖然這些團體有許多還沒有進行，它們的計劃，却能表現或種將來政策的價值。到現在紅黨各縣所最關心的，是農業勞工和小家庭工業。不用說，有一些基本事業是必須研究的——例如每日工作不得超過八小時，限出最低的工資，獎勵工會，儘可能的保護勞工。

和勞動政策有密切關連的，乃是男子和女子，承認有同等權利，採用「作同樣的工作，給同樣的報酬」的原則。自然如果一個童工的工作，和成年工人作的相等，他必須得同樣的工資。——並且有了這樣的規定，就不用童工法令了。因為同樣的工資，自能夠顧用一個更能幹的成年工人啊。在蘇維埃區域，女人可以參政，至少有一個女人，賀龍的姊姊，率領過軍隊。

中國共產黨下的經濟組織，有許多地方和在新經濟政策下的蘇聯相同，小商人仍然還有地位，可是努力採用合作統制的團體。

在通江，兩年來的川陝蘇維埃共和國首都，曾建立有蘇維埃農工銀行，這銀行有權發行可以兌換的錢幣。在紅區和攻擊白區所沒收的一切金銀，都集聚到這銀行裏。這銀行有一個時期，曾開過賽寶會，擺有大堆的金塊銀塊，這次展覽會和在其他蘇區各縣發生的同樣事情，結果傳出許多莫須有的故事，有的說這些金担銀塊的來源，是得自神佛鬼怪，有的說是從蘇聯得來的。實際上這些金塊銀塊，乃自各方面得來的；大多數是得自金條，金塊，金葉，銀塊，和各種婦孺的首飾。這次展覽的主要目的，乃在指示人民，銀行的資本很充足，拿這作基金，可以充實紙幣的安全，維持信用；甚或想要顯示新政的實力。

起初四川蘇區流行的錢幣，和該省其他各處通行的一樣。通用最廣的，是四川的「漢板」和國

有的袁世凱銀元。自從中國通貨制度改變了之後，紙幣傳播的更廣了。雖然以後許多舊銀元，重鑄成共產黨的徽號。這種銀元用共產黨錢幣代替了，這些種銀元，在蘇區裏完全照舊的流通許多，自然在紅區裏，四川省銀行的紙幣不能再用了。後來共產黨政府強健的樹立起來之後，在通江，建設了兩所造幣廠；一個專鑄銀幣，一個專鑄銅幣。中國研究專家循實，確切的發表過：共產黨鑄出的硬幣的重量，和合金裏純銀的百分數，比袁世凱銀幣和四川銀幣的高。紙質或布質的銅元票也很通用。

由四川蘇維埃政府看來，他們並不要靠武力來維持貨幣的信用。自然他們想用各種方法，保持他們政府的力量。共產黨曾用盡力量，來維持法定的兌換率。不過和在中國其他各處一般，民衆生活當前，時常發生一個問題，即毫無限制的，究竟能夠再容許多少貨幣流入市場內呢？起始的時候，自從四川蘇維埃政府已經確定了法定的銀幣銅幣兌換率，人民可以用三十串工農銀行的銅元票，兌換一塊四川銀元（共產黨銀元鑄造以前的銀幣）後來人民對於銅元票的信用日減，許多人開始賤賣米麥布匹，將銅元票換成銀幣，收藏起來。硬幣兌換有了限制，結果銅元票的價格繼續下跌。一年以後，跌到二百五十串換洋一元。到了一九三五年底，四川紅軍西開，和由西南入川紅軍匯合的時候，通江跌到三百五十串換洋一元，比原來法定價格的十分之一還低。紅軍開拔之後，自然預料到還要慘跌，因為白軍到來，不論紙幣布幣，不僅一點價值沒有，並且藏着還有危險了。

爲的怕有人誤會，這是中國新發生的情勢，我要特別再說幾句。我有好幾個四川省銀行的紙幣——就是現在，四川發行紙幣的銀行，依然有許多——這些紙幣在我旅行該省的時候，一點價值都沒有了。有一次是現在四川統治者，故意的使它們跌價。

因爲「武裝防衛」的壓迫，很難希望到有什麼建設。一九三四年從四川的東河，向北修了一道運河，和陝南的渭河相連。不過這道運河的建築，主要的目的，與其說是爲建設事業，不如說是爲軍事目的。共黨從這地方撤退西進，和朱德紅軍會合，就用這道運河運輸。用筏子小船，搬運行李用品。

至於談到共黨統制各縣的商業，雖然私人事業貿易，繼續還有，却努力採用新的交易方法。四川紅區各縣的貨物互相交換，乃由兩個組織作媒介——經濟公社，和貧農合作社。經濟公社乃由蘇維埃籌款設立，總辦事處設在通江，每縣設有分所。除了按照收獲法收集糧食之外，還作蘇區各階級人物，買賣交換貨物的媒介。買賣的時候用錢幣，交換的時候用食鹽，棉花，鴉片等物。例如一些鴉片，可以交換若干麥子；或是食鹽交換麥子，或是交換豆子。貧農合作社，在村蘇維埃的監督之下。它的資本得自貧農收集的股本，自然收集到的股本很小。資本中每股不過在五串到二十串之間，它的事業，和經濟公社的一樣，管辦理食糧食鹽，棉布，農具和農民各種必需品。每兩星期清賬一次，將贏利分給股東。在通江縣產銀耳——一種調味美品——最佳。這銀耳產區，在蘇維埃統治下，已經約二年了。

這個時期，蘇區裏貼滿了告白，說「銀耳是發財人吃的，不是我們窮人吃的。」共黨努力鼓勵銀耳出口，運至四川各大都市，如重慶，並海濱各大都市，如上海。這些地方用銀耳很多。共黨發出種種布告，勸導貧農放倒綠樹，在該區山坡，散置木材，以便產生銀耳。所有銀耳產品，由每個村蘇維埃收聚，如果人民要買來自己食用，得從蘇維埃購買。

和這種確立營國產品相反的，是採用種種方法，鼓勵一種私有工業。這種工業共黨很依重。共黨從北方入川之初，他們奪取了許多食鹽，足以供應使用若干的時日。再者無論如何，由售鹽為生的人，還可以得到很不少的食鹽。到了後來，鹽價漲到一元銀幣市鹽一斤，這才表示食鹽大為減少了。在這個時期，蘇區的居民，逼得吃用沒有味道的食物了，紅軍可以購得一定價格的食鹽，可是這種鹽量，也很限制。私運進來的食鹽也有一部。雖然一百三十三磅鹽水才能煉鹽四兩。在通江西門外，有兩個關閉的鹽井，重又開辦了。蘇區有特別鼓勵製鹽，販鹽的條例公布，有如下的規定：

「凡井戶，爐戶，鹽井老板等，已經逃走的可以回來，按照蘇維埃的法令經營鹽業——繳納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所得稅。

「凡逃往白區的，其他白區的工人，如果願意到蘇區來工作的，都得受蘇維埃勞動法令的保護，以八小時工作，每日可得五角至一元的工薪（通常薪金日薪僅一二角）

「豪紳地主、反動份子之鹽井蘇維埃沒收之，照合作社辦法經營，收成百分之十作「社會勞動保險。」」

出了銀耳和食鹽之外，蘇區內的主要商業政策，乃是不干涉正常商人市場經濟的政策。可是在所有的共產黨統治區裏面，還有普遍施行的某種規章，從各方面努力，禁止投機或抬高物價。各縣的商會解散了，否認所有大小商人的特權。在白區裏面，他們有這種特權利用商會的名義，創下了特別的專利。當一發現商人怠工，或屯積貨物，高抬物價，以求厚利肥己的時候，立刻就想出方法，限定價格，並採用訓練商人的方法。可是一旦專利統制的情形剷除之後，無論什麼地方，立刻又恢復貿易的自由。這種政策，並不是說不徵取商業的稅收了。在中國蘇區裏面，這種稅收的存在，和其他各稅一樣，是疊進稅，由商業資本中抽納。按照附件規定，這種稅收，分爲十四個不同的等級。從資本在一二百元之間的公司，抽納百分之六的稅，到資本在一萬和五十萬之間的公司，抽納百分之二十五的稅。不用說，大多數的公司，所在的區域，只要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他們的資本主義化，是受很大的限制。

爲無生產而很重要的羣衆，繼續要求食物，例如紅軍和附屬的機關，對於紅軍統治區內的農業，予以很重的担負。雖然有下例的種種口號

「加緊春耕」

「加緊秋耕」

「放鬆了分得田地的耕耘，就等於放鬆了消滅敵人」

可是很顯然，至少在四川東北部的農產有跌落的傾向。這有好幾種原因。因為缺少壯丁從事耕種，紅軍的土地並沒有完全耕種，富農有的時候怠工。自耕農在內戰不安的時候，他們注意他們自己的土地，房屋農具，便不注意生產了。貧農和佃農由共產黨的土地重新分配，得到田地，自然是很喜歡。不過有許多時候，他們對於這種土地分配的新方法，很驚奇，因為這種分配方法，和他們「聽天由命，替人傭工的傳統意識」不同。有些農民，怕他們的地主有一天回來，他們好好的耕種他們所得的重新分配的土地，可是祕密的報答舊日的地主。

關於農產物，共黨當局，當前有三個困難問題。第一：缺少農業勞動力，這主要原因，並不是許多人因為恐懼逃跑了，却因為需要許多人從軍服務。這時候從軍服務，自然是識為最重要的了；第二：缺少農業資本，這因為所有能用的款項，都用作防衛戰爭了；再者，共產區有許多資本都逃避了；第三：缺少生產用之農業設備，因為有一部份農具被毀壞了，用它的金屬來作武器。

為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共黨重又走向他們最有經驗的途徑——組織，鼓勵農民之中，設立「耕田隊」和「勞動協助會」。這種方法，是藉合作的力量，同樣的人數，能夠作更多的工作。能幹

婦女也鼓勵在農事中多行工作。爲克服缺少資本的困難，共黨幫助農人們參加生產合作和信用合作，這可以使他們得到籽種肥料等東西。缺少農業設備，則用鼓勵設立「耕畜站」、「耕畜合作」，集體運用耕畜方法解決。鼓勵耕地競賽，增加生產，則給報酬。對於肥料等物，也同樣設立特別合作社應付。

還有幾種不同的「農業隊伍」值得提出的。全農村中分作若干「耕田隊」，由農夫農婦組成；每隊有個首領和副首領。在一定時候，舉行會議，討論耕種方法。此外還有特別「耕田隊」，它的目的在替出外的紅軍耕田。另外的一種組織，可以和蘇俄工人的突擊隊相比。他們的責任，不僅是他們自己在最小限度的時間，作最高限度的工作，並且用前進的方法，幫助落後的工人和農人。還有另外一種團體，叫作「輕騎隊」，他們的責任，將所有的破壞、怠工的情形揭發，他們用口號講演、會議、壁報等方法，澈底公布出來。他們並且積極，補救不好的情形，教導民衆，注意他們的危險，改進的需要。

中國共產黨完全認清，在如同中國存在的這樣落後封建農業經濟，有一些事情，比僅僅重新分配土地還重要。作他們本想採用蘇聯存在的農事合作和國有農場。不過對於中國農民，這樣農事合作，顯然當被認爲是爲別人的利益作工作了。再者過去，甚至於現在大部分人，認爲農人所知道政府唯一的活動，就是收稅結果一般農民認爲政府僅是另外一種機關，對這機關他必須納貢，並不希望

什麼報酬。是以中國民衆只會計較管理，管理越少，他們越好。這是顯然的，共產黨不獨管理不少，並且在各方面還想擴張政府的活動。這時候他們如果想要得到農民羣衆的支持，他們必須很具體的表示他們的意見，這樣增加政府的活動指導，乃爲他們的利益。所有其他的情形都相同，則他們的成功全靠他們能否拿出效果來，這些效果並且要比他們所必須增加的要求大許多。

A 調 (活潑) 兒童團歌

4/4

1 3. 1 2 5 1. 3. 1 2 5 2 3. 5 6 5 32. 1 2 5

(一) 準備好了麼? 時刻準備着! 我們都是抗 日兒童團

1 3. 1 2 5 1 3 1 2 5 2 3 5 6 5 25 52 321

將來的主人 必然是我們 打帝帝 打打 帝打打帝帝打打

(二) 小兄弟們呀! 小妹妹們呀! 我們的將來 是無窮的呀

牽着手前進 時刻準備着! 打帝帝打打 帝打打帝帝打打

(三) 帝國主義者 軍閥資本家 我們的精神 他們都害怕

快團結起來 時刻準備着! 打帝帝打打 帝打打帝帝打打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毛澤東與某外國記者談話

最近某外國記者至陝北延安府會見毛澤東。關於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作如下之談話，誌其要點如下：

問：共產黨現在執行的統一戰線政策，與你們過去一年間所發表的，基本上有無改變？

答：如果從基本上說來，是沒有什麼改變的。這表現在下列各點：

(一) 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正向中國侵略。但是我們要求英、美、法、蘇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不反對；在這個基點上我願意同這些國家建立友誼的關係。

(二) 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民族的。這就是說，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開漢奸在外。有人說共產黨倡導人民陣線，這是不對的。共產黨倡導的是民族陣線，這種民族陣線比起法國或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來，範圍廣大得多。

(三) 因此，這個抗日的民族陣線之主要政綱，應該包括下面各項：

(1.) 國內的和平統一；

(2.) 對日抗戰；

(3.) 人民的民主自由；

(4.) 南京政府轉變為真正的國防政府，容納各黨各派，罷免親日派；

(5.) 國家制度改變為基於普選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

(6.) 改善人民生活；

(7.) 發展工商業；

(8.) 聯合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

問：爲了完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你們準備犧牲到什麼程度？

答：這要看看歷史情形。從一九二七年夏天開始，國民黨放棄了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放棄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與農工政策，放棄了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的政綱。並且走向相反的方面，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單獨負起中國革命的責任，並推行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的政策，與中國國民黨處於對立地位。我們當時採取的這種同國民黨對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與必要的。但當九一八事變

發生後，共產黨就發表宣言；要求停止內戰，願在三個條件下與國民黨訂立國內和平對日抗戰的協定。可是那時僅有十九路軍同意我們的主張，南京方面則完全不同意，並且還舉行了大規模的圍剿。及至華北問題發生，國難已臨極端嚴重關頭，我們乃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進一步發表了組織抗日聯軍國防政府的宣言，同年十二月公佈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黨的決議案，並提出統一戰線的具體綱領。這個新政策宣佈之後，立即得到廣大民衆的贊同。這是因爲更大敵人站在面前，只有停國內戰爭，才能進行抗日禦侮，在中國政治上開闢了一個新階段。但是國民黨還不願放棄其老政策。到了去年八月，我們又寫給國民黨一封長信，堅決要求把敵對的目標，自國內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並提出改變國家制度爲民主共和國，召集普選國會。要求他們痛悔既往，與民更始。我們聲明：蘇區願意實行與全國一樣的民主制度。這封信獲得了國民黨中廣大的同情。然而國民黨中央並沒有回答我們。西安事變爆發，國家處於重大危險前面，其危險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機進攻，其得和平解決，實是如天之福。我們爲了鞏固國內和平，實現迅速抗日起見，當國民黨三中全會開會之前夜，乃於二月十日給了國民黨一個重要的電報。在電報裏表示了下列各點：

(一) 蘇維埃政府改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並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的指導；

(二) 在特區政府境內施行澈底的民主制度；

(三) 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此種方針，在去年我們就已實行，現在不過重說一遍）

(四)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爲了消除各界疑慮。取消對立狀態，以便同國民黨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國民黨方面，則要求他們根本改變過去的政策，實行對外抗戰，對內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綱領。

問：你們現在在這裏和在別的區域，將如何實行你們統一戰線的原則？例如對於商人，知識份子，地主，農民，工人，軍隊等方面的辦法。

答：對於商人的關係，過去與現在沒有什麼差別。我們從來就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紅軍所至，無不保護商人，最近西安三原一帶，紅軍不但保護商人，並且連地主的土地也沒有沒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稱贊，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至於蘇區裏面，商業是完全自由的。

對知識份子的關係，過去與現在也是一貫的保護政策，優待藝術人員，文化人員與藝術家，對他們都採取尊重的態度。

對地主，只要他們不反對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沒收他們的土地。工人方面，則斟酌情形，實行各種改良待遇的辦法。

對待國民黨軍隊的態度問題。任何中國軍隊，尤其是有光榮歷史的黃埔軍，都應在民族陣線下親密團結，一致抗日。槍口向外，不生內戰。紅軍與國民黨軍隊雖打了十年，但我們絕不記舊恨，願和他們攜手偕行，並且在統一指揮下，一致為保衛祖國而戰，我們相信，他們一定是和我們有同心的。上述這些政策，我們都願意同國民黨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見，並把這些附在抗日方針，國家制度等等主要條款之後，一並放進民族陣線的綱領裏面去，以便在全國範圍內實行。

問：新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否即謂中國共產黨人為建立民族陣線，放棄階級鬥爭，而變成了民族主義者？

答：如前所述，共產黨決定實行的各種具體政策，其目的完全在為着真正抵抗日本保衛中國，因此必須實現國內和平，取消兩個政權的對立狀態，否則對日抗戰是不可能的，這叫做將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體利益，將階級利益服從於民族利益，國內任何政黨與個人，都應明此大義，共產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於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熱情的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並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階級鬥爭問題上，我們主張從上述兩方面努力，適當的解決此問題。

第一，在地主資本家方面，他們是有錢有勢的，首先應當尊重民族利益，對於工農的生活及待遇極力加以改善。因為地主資本家如果照舊對工農施行各種慘無人道的壓迫與剝削，只顧他們一部份一階級的利益，工農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國家就要滅亡。地主資本家也要變成亡國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資本家，都應激發愛國心，爲了抗日救國的必要，贊成改善工農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決不能只讓自己有飯吃，工農就沒有飯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農就沒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漢奸分子，才不顧大局與民族利益，當此亡國滅種關頭，還向工農盡力的壓迫，剝削。這一方面的要求，我們已經代表全國工農向國民黨提出，國民黨爲了大局與民族利益，對此應該有滿意的答復。

第二，在工農貧苦羣衆方面，他們是無錢無勢的，但他們是國家的基礎，是最大的階級。當此亡國滅種關頭，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同樣是抵抗日本，保衛中國，並且他們將是抗日救國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國沒有他們是完全不行的。他們在得到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後，他們對於地主資本家與國民黨的不滿，也就可以減少，但工農同樣應該顧到大局與民族利益，因此，凡與抗日救國不適合的要求，我們同樣不主張提出，共產黨主張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沒收土地，就是爲了這個原故。

中國共產黨現在提出的這些政策，沒有問題的是帶着愛國主義性質的。有人說：共產黨是國際

主義者，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不要保衛祖國，這是極糊塗的話，中國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主張世界大同運動，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爲了保衛祖國，願意抵抗日本到最後一滴血。十五年來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鬥爭，是人人皆知的事實，這種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並不衝突，因爲只有中國的獨立解放，才有能力去參加世界的大同運動。

問：如果中國民族陣綫政府建立起來，那麼對日本的和平條件是什麼？中日兩國之間是否還應以進行談判？

答：如果日本願意和平的話，我們是不拒絕談判的，我們的和平條件是下列各項：

第一，日本取消對中國侵略的政策，即取消其所謂大陸政策與廣田三原則，尊重中國的獨立，將兩國放在完全平等地位；

第二，交還東北四省及察哈爾北部，取消滿洲國，取消殷汝耕冀東政府；

第三，撤退華北駐屯軍；

第四，停止日本飛機在中國境內自由飛航；

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國各地的偵探組織，即所謂特務機關；

第六，禁止在中國境內的日本人對於中國人所施的橫暴無理態度；

第七，禁止走私。

祇有在日本同意談判這些條件的原則之下，才應該進行和平談判。一切犧牲中國領土主權的談判，我們都要反對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這些條件上談判之可能，日本現在是軍閥政府，這種可能並不存在。

問：對日本作戰是否已成爲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軍閥政府以前，日本侵略政策是不會停止的，因此戰爭無可避免，德日協定後，戰爭的威脅更加緊了一步。

問：日本方面宣稱中國國共合作是妨礙遠東和平的，你如何答復這種理論？

答：日本軍閥的所謂「遠東和平」，是說日本佔領中國，而中國則不要抵抗，讓其佔領，同中國問題有關係的各國如英、美、法、蘇等也不要反對，這就是「不戰而亡人之國」，是日本軍閥需要的所謂「遠東和平」，但是還有一種遠東和平，那就是實行我在上面講過的辦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還東北四省，撤退駐屯軍等等，使得中國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國與中國和平地通商，這是另外的一種遠東和平，但只有這種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這是中國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國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這種和平的，僅只有日本軍閥及其侵略盟友德意等法西斯國家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反對「遠東和平」這就是說的前一種「和平」；我們又贊成遠東和平，這就是說後一種和平，我們主張拿後一種和平去代替前一種「和平」，因為日本軍閥口中的所謂「和平」只是戰爭的別名，只是使得中國人當奴隸的別名，只是使世界各和平國家感受威脅的別名，而且只是給日本人民的極大損害的別名，這種「和平」據我看來，是應該對他「妨礙」一下的。

問：中日戰爭和世界和平之間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調和的基點呢？

答：中日戰爭和世界和平之間當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數的國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軍閥則希望戰爭，這種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針是不能調和的。要解決這一矛盾，只有一條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國家與中國一同反對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軍閥服從世界公論；另一方面，如果戰爭不能避免的話，中國應該堅決抗戰。只有這些辦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適應的，同世界調和的基點，也只能建立在制裁與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問：九國公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和國聯盟約等類和平公約，你以為能夠阻止日本對中國侵略戰爭嗎？在中日戰爭中，你以為這些條約將起何種作用？有何種意思？

答：這些條約，在今天看來確表示着一種和平願望，因此，侵略國家就表示了他們的堅決反對，但這些條約對於日本這樣的侵略國家，僅只是一種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是不可能

的，這些條約在中日戰爭中，決不會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沒有多大的實際政治上的意義，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必須有一種新的條約，而這種條約應該包括以武力對待日本侵略暴行的具體事項在內，像締結太平洋集體安全條約之類，祇有這種條約才能真正阻止戰爭，戰爭起來時，也能夠迅速結束戰爭。

問：在聯合戰線政府成立之後，中國能夠立即對日作戰嗎？或者還須相當的準備時期？

答：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進攻中國時，不管在什麼時候進攻，中國都應該立起抗戰，但我們並不主張向日本挑釁，我們的方針是自衛戰，因此，我們應該迅速的切實的從各方面作準備，使中國任何時候都能夠應付事變，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所謂「長期準備」，反對擁準備之名，行妥協之實。

問：如果沒有國際幫助，中國人民現有的資源財力，是否已足以發動一個勝利的抗日戰爭？中國能否支持戰爭的財政經濟負擔？

答：沒有友軍，中國也是必須抗戰的，而且以中國的資源與自然條件，是能夠支持長期作戰的，紅軍十年作戰史，就是活的證據，但是我們正在找尋友軍，這是因為日本已有他的強盜同盟，中國決不能自處孤立，所以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五國建立太平洋聯合陣線。這種聯合陣線是援助中國的，同

時也是各國互助的，因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國的大禍，也是世界的大禍，如像德國是世界的大禍，一樣，何況這兩個侵略國現在已經聯合起來了，我以為中英美法蘇五國應該趕快的聯合一致，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之虞。

問：在現狀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狀況之下，這樣一個戰爭，對日本的經濟、財政、貿易等的影響將如何？日本能夠在這兩個的幫助下渡過這個戰爭嗎？

答：日本侵略中國，對於日本人民是完全沒有利益的。日本對中國戰爭的最後結果，將不是日本的勝利，而是日本財政、經濟以及政治的崩潰。這一點不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資產階級中具有遠見的人們也是知道的，但日本軍閥，則無論如何也不知道。日本軍閥已經結合了一個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幫助和策應。他們不但希望用這種方法去渡過向中國侵略的戰爭，而且正準備用這種方法取得全世界。他們所做的夢當然是很圓滿的，但是據我看來，他們的結果將不是怎樣圓滿的，中國人應該有戰勝日本的自信心。

問：共產黨為什麼主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釋。

答：並不在意，實是在意中，大家沒有聯繫過去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罷了。自從日本侵略開始以來，我們就是願意停止內戰的，因為祇有國內和平，才能對日抗戰。四年前三個條件下與國民黨軍隊

訂立抗日協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國民黨書等等，無不是表示我們誠懇的願意同國民黨建立新的聯合戰線。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份人極力挑撥內戰，內戰危險是嚴重的，如果沒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張漢卿送蔣介石先生回家一舉，如果不依照蔣先生處置西安事變的善後辦法，到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然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損害；當西安事變中，日本軍閥方面，寧滬平津一部分中國人方面，都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的陰謀，這種說法完全不合事實，西安事變是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與國內改革問題上，因政見不同而發生的，完全是一件突發的事變，我們事前全不知道。事變之後寧陝對立，於是又有人說：共產黨要把西安造成馬德里，這也完全不合事實，中國和西班牙的政治環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有內亂，而在中國的今天唯一的是對外抗戰，國內則必須和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事實，已經證明他們的話完全是憶測，有些則是惡意的造謠。

問：許多人不但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幹的，而且說在城牆上紅旗高懸，又說紅軍在三原一帶擄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實如何？

答：關於西安插紅旗一類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漢奸看見了罷，可是西安人至今沒有看見。擄掠青年男女的話，也必然是出之於日本人與漢奸之口，這也只有去問三原的青年男女才會明白。現

在官方文件中，還在說紅軍殺人放火，壓迫民衆，破壞農村。這些話他們已經說了十年了，可是至今還不疲倦，還要說一遍，說話的人固然有他說話的自由，可是全中國人也都有眼睛看事實的自由，現在政府還沒有製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實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紅軍走過或住過的地方去看，看實在情形，用不着我來多說。

問：外面傳說共產黨現有的政策是向國民黨屈服，投降和悔過，於此，你有何意見？

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這樣說。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都不願意這樣說，日本人只願意國共相打，決不贊成這種「屈服投降悔過」的政策，因為日本軍閥深知共產黨採取與國民黨協調的政策，儘管有人說它是「屈服投降悔過」，不過實際是給與日本侵略政策以嚴重打擊的。觀察中國的問題有一個標準，就是凡屬革命政策，日本一定不歡迎。要檢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動之是否正確，只要看一看日本的態度如何。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的反對所謂「屈服投降悔過」的政策，就可以證明我們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產黨向國民黨要求的，是請他們結束十年來的政策，這些要求，表現在共產黨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報中，那就是關於召集救國代表大會，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準備抗戰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願意改變蘇維埃與紅軍的名義，取消同國民黨的對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沒有疑義的，共產黨的這種步驟，是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但這種讓

步是必要的，因為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急性。這叫做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國民黨中所有明智的領袖與黨員，都是明白這種意義的。但國內有一部份帶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的把我們的這種讓步叫做「屈服，投降，悔過。」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魯迅，在他的一篇小說上，描寫了一個叫做阿Q的人，這個阿Q，在任何時候他都是勝利的，別人則都是失敗的，讓他們去說吧，橫豎世界上是不少阿Q這類人物的，此外還有一部份患着「左傾幼稚病」的人士，這種人各地都有，槍殺王以哲的那位孫銘九，就是這類人物的極端的代表。他們愛國出於熱忱，他們為喪權失地的悲慘歷史而憤激，他們的心地是純潔的，但是他們缺乏政治經驗，在大事變中認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與全體，過去與現在；今日與明日的差別與聯系。他們開始即反對蔣先生回京，後來又反對和平解決。在西安方面，有一部份人，不但對共產黨不了解，即對張楊及在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們不了解國民黨進步雖然是緩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國民黨中，國民革命軍中的抗日情緒在日益增漲，大多數的領袖與黨員是能夠和我們及人民一道從事於抗日救亡的事業的，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誠然至今還不滿人意，但是業已開始了他的轉變。三中全會的決議，可以看作這種開始轉變的證據。他們不知道把國民黨多數的愛國份子及可能走向愛國的份子，同實際賣國的份子即所謂親日派，區別開來。他們把這二者混而為一。他們又不

知道國內一切先進份子的責任，在於多方說服暫時還不能了解我們觀點的人使之得到瞭解，以便共同赴敵。這其間需要忍耐力，有時需要退讓一步，只要不違反抗日救國的大原則就可以商量，關於這部份性急的志士們對於我們政策的不了解，我們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評奉獻他們，至於有些唯求個人與部份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腦後的人們，不管他們是親日派或口頭抗日家，那就不是什麼自我批評，也不是僅僅諷刺幾句的問題，而是揭破他們陰謀，使之無法施展其技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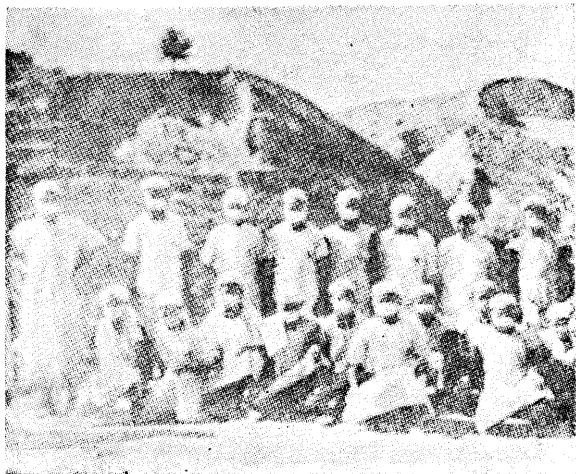
問：你們對於三民主義國家的態度如何？

答：我們老早就信仰三民主義的，不然我們爲什麼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夠加入國民黨呢？我們黨中曾經有若干人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及省黨部委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林伯渠，吳玉章，董用威，謝覺哉，董惟健諸位都是。又有許多人曾經是國民革命軍的領導幹部，我們的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林彪，葉劍英，徐向前，諸位都是，現在的任務是必須爲真正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鬥，這就是說以對外抗戰求得中國自由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選國會制，民主共和的民族主義，與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數人民痛苦的民生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與我們現時政綱，並無不合，我們正在向國民黨要求這些東西，去年六月致國民黨書中，已要求他們恢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我們是最堅決最忠誠地爲實現三民主義中國而奮鬥的。所以我

們過去實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論，亦無非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而已，至於我們還信仰共產黨主義，那是不相衝突的，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曾經同意我們同時信仰共產主義，並且國民黨員中有許多是信仰資本主義的，有許多還信仰無政府主義，有些人則信仰孔子主義，佛法主義，基督主義，無所不有也無所不包。祇要當前革命政綱取得一致，即構成團結救國的基礎，即消滅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國難軌道，中華民國光明燦爛的前途，實基於此。

蘇維埃的娘子軍

圖中的青年女子，從右往左：中共書記洛甫夫人，爲共產主義青年團婦女部書記；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女士，北平師大畢業生；博古夫人劉羣仙女士，其次有內務人民委員長同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的夫人，這些女人都是從江西參加二萬里長征來的。



紅色護士

寧夏豫旺堡附近設着紅色後方醫院，有二百名護士，一半男的，一半女的，是共產青年團從當地青年中選拔出來訓練的。紅黨對醫藥衛生工作非常積極，各地設立不少醫藥學校，由西醫負責教授，並從上海北平各處祕密輸入醫藥用品。



保安紅校的學生

這些青年人雖然在紅校讀書，却都是紅軍身經百戰的老戰士，平均每人都有三處傷。

紅校的劇社

這是利用一座破廟搭成的舞台，幕上有拉丁化的標語，但是已經看不清楚了。



附錄

隨軍西行見聞錄

廉臣作

我國共產勢力，年來伸張極速，朱毛，徐向前，賀龍，蕭克等赤軍，已成爲中國一強大力量。當赤軍初起時，本係星星之火，迄今則成燎原。朱毛赤軍原系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時，朱德率領之葉挺、賀龍殘部及毛澤東率領之湘南農民軍會合而成。南京及各省軍隊征剿已歷八九載，但朱毛實力有增無減。年來蔣委員長親身督剿，步步築壘，滿擬一鼓殲滅之，不料朱毛早見及此，於去年十月中突圍西走，由湘粵邊而入黔，逗留於黔川滇三省一時期，最後竟冒險突過金沙江大渡河（此二河均爲長江上游，河寬水急）而入川，與川北徐向前會合。現在中國兩大赤軍會合，聲勢大振，且軍事重心已由東南而移到西北，剿共軍事，無論在作戰上運輸上皆大感困難，赤軍活動將愈難抑止矣。

記者向業醫，服務於南京軍者四年，前年隨南京軍五十九師於江西東黃坡之役，被俘於赤軍。被俘之初，自思決無生還之望，但自被押解至赤區後方之瑞金後，因我係軍醫，押於赤軍衛生部，赤軍衛生部長賀誠親自談話，當時因赤軍中軍醫甚少，他們要我在赤軍醫院服務，並稱願照五十九師之月

薪，且每月還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費。我係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軍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費，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後，我幾次被遣至石城之赤軍預備醫院，時而調回瑞金之衛生部。赤軍中最高人物如朱毛林彭及共黨中央局等赤區要人，亦曾屢爲診病，那些名聞全國的赤色要人，我初以爲兇暴異常，豈知一見之後，大出意外，我第一次爲毛澤東與朱德診病時，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我爲之診病時，招待極謙。朱德一望而知爲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雖患瘡疾，但仍力疾辦公，狀甚忙碌。我入室爲之診病時，仍在執筆批閱軍報，見我到，方擱筆。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謾，這兩個赤軍領袖人物，實與我未見時之想像，完全不同。

去年十月中旬，南京軍已佔興國，赤軍即突圍西行，我也被攜同走，這次行軍，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除在黔北之遵義府休息十餘日，以及渡過金沙江後在會理縣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終日行軍，由江西而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雲南，西康，而轉入四川之理番，松潘，足跡幾遍大江以南，歷時八月餘，約計行程一萬二千里，歷盡無數高山大川，而與徐向前會合。我以文弱之軀，經此磨折而今日還能生還，自慶更生。但同時自幸此生竟能走遍長江及珠江流域之各省，而且到了許多夢想不到的地方，亦足自豪。至本年七月上旬，我被衛生部長賀誠派往懋（功）寶（興）遊擊大隊當軍醫，出

沒於兩縣之山地。某日晨川軍來攻，我被川軍衝散，身存之現洋二十餘元均被民團搜去。後幸遇川軍五旅之軍醫正蔣君係昔年同學，得其幫助，由天全、雅州、成都、重慶而搭輪回家。合家歡敘，幾如夢中。

比次赤軍拋棄數年經營之閩贛區域而走入四川，顯係有計劃之行動。當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觀之，則赤軍確已進行了充分準備。自五月到九月招集了赤軍新兵將近十萬人，當我與林何二先生（何亦係張輝讚部之被俘者）於八月被派至軍事工業局（赤軍各軍需工廠之管理機關）衛生所時，見兵工廠、被服廠等各有數千工人，日夜作工，狀極忙碌。以後，九月間在紅色中華報（赤區中央政府機關報）登載張聞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員會主席）之文章，微露赤軍有拋棄江西而到赤區以外之圍剿軍力量空虛地區活動之可能。果然，十月中，全部隊伍均行走西矣。朱毛破圍之時，除在江西留有小部隊外，朱毛率領退出江西之赤軍人馬兵仗，將及十三四萬。共黨要人幾全體隨車。各縣共黨中下級幹部之隨軍者有萬人，並有婦女幹部一二百人，均腰懸短槍，腳穿草鞋隨軍出走。此輩娘子軍，均係身體強壯，健步如飛者，常在衛生部招呼傷病兵。有時竟能充仗子抬傷病兵。

赤軍分兩路渡過信豐河後，（一路由信豐北之王母渡，一路擊退信豐東南之古陂新田粵軍）即在南康、大庾兩縣之間渡過漳水，突過贛州南雄之汽車路，在古陂新田及贛雄汽車路上，粵軍本築有塹堡，並有守軍，但寡不敵衆，聞風遠逸。由此年國來軍包圍贛省赤軍之第一道塹堡線，全被衝破。沿

途壩堡，均被赤軍及當地冤恨國軍守土兵士之平日強賒硬買之居民拆燬。壩堡係用以進攻及封鎖赤軍者，常築於汽車路之兩旁，重要路口，及路旁之山巔。壩堡以石及磚造成，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大小不一，有排堡，連堡及營堡。平日守軍居於堡內，有步槍機關之槍洞，可以向外射擊，出入壩堡只有小門，遇有赤軍進攻，守壩兵士即閉門固守，向外射擊。此種壩堡對赤軍軍事行動，妨害甚大，故赤軍一至，居民亦起而拆燬壩堡。赤軍一出封鎖線，如虎添翼，即猛撲湘粵邊之汝城（湘境）城口（粵之仁化北），漸即佔領城口，粵軍之軍用煤油幾千箱及大批彈藥均被赤軍奪去。粵軍在城口與湘南汝城桂東相連之壩堡線（即國軍第二封鎖線）即被突破，壩堡全被拆燬。此時赤軍銳不可當，中央軍遠在湘贛邊，粵軍只圖自保，湘軍則何能獨力抵禦，且早已聞風遠走，故赤軍未遇抵抗即佔領宜章城，通過粵漢路之汽車線（此為國軍之第三道封鎖線）照例拆燬壩堡。前鋒即佔領臨裝，嘉禾，藍山。此時湘軍李云杰部從寧遠南下，擬在天堂圩附江攔擊赤軍，豈知在天堂反被赤軍包圍，全部擊潰，狼狽北退，赤軍又獲鎗彈不少。此時也，赤軍勢如破竹，分兩路，一出道州，一出江華永明，城市悉被佔領，即全部渡過瀟水。南京軍及湘軍此時跟蹤追剿，已無能為，僅派少數部隊，尾隨赤軍監視。而薛岳周渾元及湘軍之大部集中湘江沿岸之零陵（湘境）全州（桂境）命桂軍集中灌陽，興安，當時蔣委員長之計劃，擬以大兵攔阻赤軍渡江，並從北驅逐赤軍入桂，使赤軍與桂軍兩敗俱傷，以便坐收漁利，但桂軍李

（宗仁）白（崇蔭）深知此隱，故一方懼怕損失實力，同時並懼赤軍不能過江則必然停止桂省或桂林附近活動，則薛周兩縱隊將尾隨赤軍之後，而深入廣西，桂省大權將落南京政府之手。所以蔣與安桂軍向南撤退，薛周及湘軍在全州單方出擊，絲毫不能阻止赤軍渡江，因此赤軍得平安無事渡過湘江，把沿湘江兩岸汽車路上之壩堡拆毀（此為國軍第四道封鎖線）赤軍一出此四道封鎖線，如虎出押，可以東奔西突矣。微聞與安桂軍之撤退，係與赤軍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南京政府蔣委員長幾年來壩堡政策與剿共軍事，全部付之東流矣。

赤軍當時之喜悅，真是無以形容，赤軍政治部印編一歌曲，係用中國馬號進行曲舊譜，教赤軍兵士唱，因此我所在之總衛生部之二百多個看護生（都是十五六歲）天天高唱入雲，這一歌曲之調句是表示赤軍之喜悅和對於蔣委員長之壩堡政策的譏笑。歌詞云『共產黨領導真正確，人民擁護真真多，紅軍打仗真英勇，粉碎了××黨的烏龜壳（意即國軍之軍堡）我們真快樂，我們真快樂，我們真快樂。』

赤軍之所以能突破重圍，不僅在於有軍事力量，而且深得民心。即如赤軍入湘南時，資興、郴州、宜章一帶，為昔年毛久經活動之區域，居民受共黨之宣傳甚深，故見赤軍此次復來，沿途燒茶送水招待赤軍。我在行軍時見每過一村一鎮，男女老幼立於路旁，觀者如堵。而且湘南各縣在幾年前，朱毛在

此活動時，已有居民加入赤軍者。故此次赤軍路過時，此輩赤軍之家屬，聞風早在路口探問其子姪還在赤軍否。總衛生部之管理科長（如南京軍之司務長）即爲宜章之文明司人，當日路過文明司時其老母在路邊迎接。但隊伍休息十五分鐘即前進。管理科長向衛生部之主任參謀（當時衛生部爲一個梯隊）告假二小時，回家一次。當日按時歸隊，又帶了十一個農民來當赤軍，兩個當佚子（一個佚子以後即與我挑行李）又攜來家製極甜之白酒（以米製的，遠優於江西所產）分給我等。

湘南農民之所以能受共黨宣傳者，半由於共黨之活動，半由於當地土豪劣紳平日欺壓農民之故。昔年朱毛退出湘南時，當地土豪回鄉以後，以搜共爲名，敲榨貧民，因此農民以冤報冤。甚之貧民有如此痛恨者，據由辦理科長代我招來之佚子云：『前幾天我們街上早在傳說紅軍要來了，我們村上前五年受那個李區長害的三十餘家，就祕密商量，暗中監視李區長的行動。前天朝晨團防退出文明司時，這三十餘家百餘男女即在離鎮二十餘里之某村中，捉獲李區長，前日上午十二點鐘即把李區長送到紅軍司令處。而且還領了一連紅軍去上山搜出團防的長短槍二十餘枝。現在這三十餘家有五十一個人都當紅軍了。』他又繼續說：『紅軍來了，我們窮人才有一口飯吃，不說別的，像我這樣當挑夫，每二天工錢就一元，而且先付十天工資安家。我家裏那兩個村子上前昨兩大約有八十八個人去當紅軍挑夫了。』湘南農民之相信共黨有如此之深，而且不是一處。在湘南以至全州附近渡過湘

江時，所有城鎮鄉村，都是如此。至此而我更深嘆剿共之不易矣。

赤軍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僅在鄉村農民受到赤軍『打土豪，分土地』、『沒收土豪劣紳的穀米分給農民』之宣傳和行動。而且軍隊有紀律，朱毛赤軍中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內容我已記不清），確使赤軍兵士遵守。不說旁的，即如進延壽圩湘南大鎮，宜章城時，赤軍所用『蘇維埃銀行』鈔票，均按日兌現。所以除幾家大店主自懼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舖照常營業，而且莫不利市三倍。這一點我在南京軍中已服務多年，在鄉僻之區行軍或駐軍時，均未見過。而且因為對於中央銀行鈔票之行使，過去各省門戶之見特深，許多地方未設分行，當然不能兌現。故軍隊一到時，僅憑該憑軍長官之一紙命令『按市通用』，而又無兌現機關，使商民對中行鈔票反生疑慮。特別是兵士不守紀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影像。

還有一事為國民黨及國軍所無者，亦使我有深感者；赤軍路過宜章時，在粵漢鐵道（未建成，現在只通汽車）上有修路工人四百餘，內有幾個共產黨員，已秘密活動幾年。且內中一學生，亦為該黨所派在修路工人中活動者。赤軍來時，全數工人加入×軍。當我路過該處時，正見修路工人在持槍上操，赤軍已派軍官去訓練，而該共產黨學生作修路工幾年，已當政治委員（赤軍營以上都有政治委員，職權甚大），正在向修路工人演講。此事深深使我憶起，國民黨北伐時，各處民衆響應，北伐軍勢如

破竹，正如王者之師。自國共分裂以後，像北伐時民衆響應之事，已消滅匿跡，反之，全國人心，大都失望。共黨份子如此埋頭苦幹，而返視國民黨員，則徒爭名利，何曾見一個在東三省日本勢力下埋頭苦幹的人。我深感共黨自有其社會上根深蒂固之潛勢力，勦共與消滅共黨決難成功也。

赤軍渡過湘江之後，已使當時薛周兩軍與桂軍之迎頭攔阻完全失敗，而且尾追亦極困難。因爲赤軍渡過湘江以後，即上西山延脈之越城嶺。山勢連綿，追剿軍無法包圍。赤軍之後衛節節抵抗，而赤軍前鋒即向湘黔邊西進。

赤軍之能夠翻過越城嶺與西山延脈，而且在此山高入跡稀少之區，未受損失者，確是赤軍上至首領下至士兵具有克苦耐勞與其他各種優點，而這些都爲國軍所不及者。

西延山脈之高峯如老山界，確爲我十幾年來第一次上過的高山。千家寺是在老山界的山脚下。我記得是一天的下午總衛生部才抵千家寺，當時休息吃飯後，即上山。上了二十里到一小村子，只七家人戶。此時太陽西下，伙子，馬伙均忙於找火把，過一下天黑了，隊伍還是前進。可是因爲隊伍中有些人沒有找到火把（因爲人家少，找不到火把的材料），在黑夜裏黑摸，走得很。我在第六連的先頭走，簡直是走一步停一下，走一步停一下。天氣又冷，風又大。山又高，山下的泉水的流聲如萬馬奔騰。人又疲倦，可是不敢合眼，因爲路太狹了，只有一海關尺闊的路。有一個看護生在行軍時，因爲天黑未

找火把，再加上睡迷糊糊的走着，忽然一失足滾入水溝裏去了。當時就命傳令兵執了火把，慢慢的拉住樹根攀到水溝裏，可是那個看護生已經跌得不只滿身泥水，而且不能言語了。這就警惕了各人小心翼翼的慢慢的走着。因為走得慢，即使下午預備了火把的人，也已經把二三個火把燒光了，以後簡直前後看不見火把了。只有稀稀的看幾個馬燈的燈光在走動。隊伍越走越慢了。走幾步，停五十分鐘，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時期已經是次晨兩點鐘了。前面順序的傳下了司令員的口頭命令：『各連隊隨地靠路旁露營。各連火仗到前面煮飯。』同時大家又順序喊『向後傳』……實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濕是乾的，大家就橫七豎八的倒在地下把被單往身上一蓋就睡。人生再沒有比這個時候，這個地方睡得舒服的。不要兩分鐘已經鼻息呼呼的入睡鄉了。

次晨天尚未明吹號，起身吃飯，並且各人還帶了午飯。據當地居民說，此地到唐莊還有六十里。而上山還有四十里。

山實在太聳了，因此隊伍走不快的。確空身上山還要腳酸氣喘，那些伙子還要挑上三十五斤的擔子，真是不容易。

在我們總衛生部先頭走的是赤軍總政治的，而蘇維埃中央政府之要人林祖涵，徐特立等亦均與總政治部同一行列，故我時與林徐路遇，當日上老山界時，我見林徐二人亦正步行上山，林祖涵為

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曾與孫中山共事，創辦同盟會，領導辛亥革命，北伐時爲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在赤區所有財政均出其一手計劃，林年將六十。白髮童顏，身體甚健，在八月餘的行軍中，林只騎十八天馬，經常步行。徐特立爲教育部副部長，曾任湖南教育廳長，年逾五十，赤軍離江西時，徐本有一馬，但半途因知傷兵缺乏驢馬，徐竟轉送給衛生部之傷兵。而其本人則步行。此林徐二老之潔身自好，愈老愈壯之精神，誠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擬也。

老山界這個山也高得非常使人發急，到了一個山頂，只見前面只有一個高峯了，不料上了那個高峯，前面還有一個高峯。這樣一個又一個的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氣和汗流夾背。正在這個時候，忽聽見隱隱有留聲機的聲音，正唱着『罵一聲毛延壽你賣國的奸賊……』一張片子唱完，又聽見一陣歌聲『同志們快起來拿刀槍，我們是人民的武裝，要打倒帝國主義和漢奸，要創造蘇維埃共和國……』原來是政治部的宣傳隊正擺着宣傳棚，爲鼓勵行軍，提起部隊的精神，使之忘却行軍之疲勞而設的。在宣傳棚旁邊的石頭上，拿粉筆寫着『同志們努力啊！還有二十五里就到山頂了！』『競賽一下，誰先上山頂！』經過宣傳棚的留聲機和唱歌的，的確我們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們隊伍內的那些小看護生也唱起來了『……罵一聲×××你賣國的好賊……爲什麼投日本，你喪盡了良心。』這樣一唱，又到處引起唱着……『粉碎了×××的烏龜壳，我們真快樂……』唱了一陣以後，大

家還是照着路向上走，這樣走了共有十二個高峯，才到山頂。當然到了山之最高頂，大家就興高彩烈，精神也興奮了。時候已經下午四時了。但是八十里的高山，終於走到了山頂。

從山頂到唐莊，名爲二十里，實在將近三十五里，所以大家又走了一節黑路，當晚就到唐莊宿營。八十里高的『老山界』比之後來赤軍所過的高山看來當然不算高。但是赤軍在高山上的兩天兩晚的不斷的行軍，而沒有多少掉隊落伍的兵仗（衛生部的病員都到齊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實在是赤軍中兵仗的團結，同時在山上行軍中，赤軍政治部能設法以減少行軍疲勞及提起行軍精神，如用宣傳棚等等，這確是他們設想的週到。

赤軍在西延山脈週圍遭遇了極多困難。最重要困難之一，就是赤軍每到一處，全村全鎮房屋糧食統統燒了，究竟是誰燒的呢？開始老百姓傳說是赤軍燒的，但是事實上我不能完全相信，因爲許多鎮市在赤軍未到前就已在火燒了，這樣難道赤軍自造困難嗎？把房屋糧食統統燒光，豈非使赤軍自己無處住無處吃嗎？後來這個事情水落石出了，當赤軍駐廣南寨時（廣西龍勝縣之西北）我們總衛生部於次晨集合於廣南寨鎮外田野間，快將出發時，忽見鎮內三處房屋同時起火，顯係有人放火，總衛生部司令員賀誠即下令警備連同回鎮搜索，忽然捉到七八個穿赤軍軍裝的放火的人來，一問他們，都是廣西口音，就供出他們是龍勝縣政府所派專燒民房，每日得大洋二元，作用在一方便赤

軍無處住，不得食，一方則引起居民對於赤軍之懷恨，一詢其何處得來軍衣，均說縣政府中捉獲赤軍之掉隊落伍兵佚，殺之而剝去其軍服，即由所派之放火人，穿上赤軍軍服，冒充赤軍，放火之後，使居民憤恨赤軍，這幾個人已放火燒了好幾個鎮市了。因為他們穿上赤軍軍衣，冒充有病而掉伍者，天天隨在赤軍隊伍後面走，或者偽充赤軍之偵探隊，在赤軍將到時，先放火燒屋。

總衛生部長賀誠當然不是一個笨人，他當時聽了他們如此說，一方面即傳令部隊大家去救火，救熄後，召集全鎮居民來開會，當場要這放火的冒充赤軍的七八人在居民面前自供，結果幾百居民立刻動手把這七八個人一頓拳足，打得那幾個人快氣多沒有了。賀誠忽然又停止說：「這是廣西軍閥官僚一方面誣害紅軍，一方面是殘酷的使你們年終的時候，弄得無家可歸。紅軍是幫助百姓的，我們幫助你們救火。現在你們太可憐了，那家房子被燒的，紅軍願把沒收土豪的洋錢大煙救濟你們。大家到那邊去領。這幾個放火的人，大家願意怎樣辦呢？」一經賀誠的演說，數百居民衆口一聲要求槍斃這七八個人。結果把這七八個人拖到鎮外去了。大家跟着去，一回兒又回來在那個空場的角上的桌子上領洋錢和大煙。忽一回就有五六十個年輕力壯的男子到賀誠面前說：「我們要當紅軍。」結果就有一百多人連續的寫上名字當紅軍了。

我於此事深深感覺，桂軍領袖白崇禧氏，雖有小諸葛之稱，但派人縱火以嫁禍於赤軍之舉，終屬

太慘，且也不智。如廣南寨之事，豈非反增居民對於地方當局之惡感而助赤軍以取得民心乎。

赤軍由廣南寨西北進，爲兩河口與牛皮山。地處桂湘交界，由此下山西通湘之通道，北通綏寧，南通三。江常時薛周兩縱隊及湘軍大部集中於城步，綏甯，靖縣，會同等縣以阻赤軍北上與賀龍蕭克之赤軍會合。桂軍以一部扼於桂湘邊以阻赤軍南下。並以一部尾追赤軍。當時赤軍前鋒已佔通道縣，卽避實就虛而逕趨貴州之黎平府。

貴州東部與北部之守軍爲候子擔部兩個師，候子擔本爲貴州三首領之一，（王家烈，猶國才，侯子擔）兵力雖號稱兩師，但槍彈均係其赤水兵工廠所土造，且無新式武器。這標兵力，如何當能朱毛赤軍。故赤軍分路連佔錦屏，柳霽，劍河，台拱而入鎮遠佔領通貴陽之汽車線。候子擔可憐連戰連敗，直敗至烏江邊王家烈部。此時在新黃平扼守，但亦被赤軍擊敗，棄城而走。此時赤軍卽完全佔領鎮遠施秉，黃平。

赤軍由湖南轉入貴州，此時確繳獲槍械不少，候子擔部至少一師人被繳械。並連佔黎平，黃平，鎮遠三府城。尤其鎮遠爲通湘西之商業重鎮，赤軍將各城市所存布匹購買一空。連戰連進。此時赤軍之士氣極旺，服裝整潔。一步隊中多穿上了新軍服，在湘南之疲勞狀態，已一掃而空矣。

貴州居民之貧苦真是遠非我等居住於江浙十里洋場者所能想像。做莊稼的（農民）冬穿單衣，

且無完整者。每人有一件已補縫千百次的『家常衣』，小孩則隆冬還是一絲不掛，當我等行軍經過時，立於路邊之小孩，正在發抖。而居民唯一禦冬之物，即爲『烤火』也。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在這個貧窮的地域中，煤炭却到處可得。上海賣三十餘元一噸之無烟煤，那裏只要一吊錢，而且一元大洋要兌二十吊。當我等行經劍河縣附近之某村落時，見路邊有一老婦與一童子，身穿單衣，倒於路邊，氣息尚存，詢之，始知爲當地農家婦，秋收之後，所收穫之谷米，盡交紳糧（地主），自己則終日乞食，因今日氣候驟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臥路旁，正詢問間，赤軍領袖毛澤東至，告以老婦所言，當時毛即時在身上脫下毛線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單一條，授於老婦，並命人給以白米一斗，老婦則連連道謝含笑而去。

貴州東部各縣之苗家甚多（俗稱苗子）。過去我見東方雜誌或其他遊記上所載苗家之照片及村落，此次則親觀苗家而且住於苗家。苗民自稱苗家，稱漢人爲漢家。漢人向來欺侮苗家，故苗漢之間時相械鬥。此處苗家身穿漢服，女裝如清末民初之闊邊長衣大袖之服裝。苗語則與漢語全不相同。唯一一般苗民皆能漢語。苗家好武，常身攜利刃。在黔東之苗家已與漢人相處甚久，除城市外四處都住苗家，間有漢人同住者。苗家之房屋係用木板製成，上覆草或松樹皮，屋之週圍用木編之籬繞一圈。苗家食物爲玉黍，但間有白米者。惟苗家無存米，只儲穀子於樹叉上所築之穀倉內，每天吃的米，每天打

穀子。

赤軍一入貴州，更盡力在漢民苗民中活動。赤軍之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對貴州軍閥壓迫苗家等之宣傳，取得苗家之擁護，並煽動苗家漢人到當地平日壓迫漢苗貧民之區公所長等的家裏，把財物穀子散給漢苗民。間有繳獲民團槍支者，亦發給苗家，武裝苗民。赤軍時時防備不使引起與苗家的衝突，而且處處給苗家以利益。如赤軍在黎平時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隊，在苗家區域中絕對遵守紀律，並叫赤軍兵士每人備一件東西，送給苗家。

貴州之一般貧苦漢人與苗家，確受赤軍之宣傳甚大。當蕭克由湘邊轉入湘西時，亦由此經過，亦給當地漢苗居民以好感。故朱毛赤軍一至，漢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赤軍者。並有時詢赤軍何時『安民』者。赤軍因有漢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貧瘠之區未受饑餓。

貴州漢苗貧民之所以受赤軍之宣傳者，不僅因赤軍之活動的結果，亦由貴州當地之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所造成。貴州人民之受軍閥之壓迫，亦非江浙人士所能想像。軍隊則抽丁，苛捐雜稅，勒種烟苗，使農民之生活，終年辛勤而不得一飽。此次赤軍入黔，候子擔已勒收過兩次『剿赤』捐。軍隊既不能衛民而反是害民。此實為共黨取得人心之一大助力也。

一入貴州，除見居民之貧困而外，尚有三事，為長江流域所未見者：即是一為鴉片滿地，一為天天

下一絲絲的毛毛雨，一爲處處是高山峻嶺，找不到如湘贛兩省之平地，更說不上江浙之平原矣。所以地圖上有形容貴州地方情形之言曰：『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確符事實。入黔兩月，未嘗連晴三天。

烏江戰役爲赤軍入黔以來第一次激戰。當時候子擔部扼守烏江北岸，赤軍則佔餘慶甕安兩城，向烏江邊之猴場前進。猴場爲黔北大場之一，商業極盛。我至猴場時，赤軍已佔三日矣。此時正值陽歷新年，到處佈滿赤軍之佈告與標說。赤軍中每人發過年費，商店及小販莫不利市三倍。此處店民多能道『蕭軍長』（卽赤軍蕭克部）經過猴場之情形者。此時因爲赤軍驅逐烏江北岸之候部尙未成功，故後方部隊在猴場停止。第二日見一老者攜一病者至，詢之則稱贛之蓮花人係蕭克部赤軍。過此時所留養居民家中之病兵。現在病將愈，願隨朱毛赤軍去。後將此人送給司令部去。此事亦使我感覺赤軍兵士之深受共黨之訓練對共黨信仰之深。

第三日部隊都向烏江界河前進，一至江邊，則深嘆烏江確爲軍事上的天險。河之兩岸，均爲高山絕壁，河面之寬，遠過湘江，水流之急，爲一秒鐘三米特之流速。赤軍『以竹子架一浮橋，不用一船，人行其上，不能負重，而每人行列須隔一米特。』赤軍奪獲一船，用以載渡無線電機械及馬匹者。我等走上竹子浮橋時，見兩旁水流甚急，心其喘喘。渡過河之北岸，卽上高山，山之險要處，候部所築之工事，累累

在目。

烏江戰役中有赤軍之傷兵七名及黔軍之傷兵兩名均由總衛生部之担架隊抬着我爲之治傷時，詢及一輕傷者，據云烏江戰役之經過如下：

候部在河北工事中扼守時，赤軍於拂曉時依樹木竹林之隱蔽而接近江邊，赤軍當即以機槍迫擊炮攻擊對岸候部，候部立即還擊，但候部之手提機槍及輕機關槍都係赤水兵工廠所土造者，射力不遠，不能達南岸，所以赤軍做好了幾個以竹筏成之竹排子後，即冲下河邊，以工兵連之一部及步兵連之一部架竹排強渡河。但水流太急，第一次之兩個竹排子全被水流冲。但赤軍並不因此氣餒，又有六七個竹排一齊過河。這次有六個排子達到北岸，赤軍即一躍登岸，驅逐河邊工事內之候部而佔領其工事。候部即退守半山之工事，同時向下射擊。此時也，赤軍堅守河邊工事，河之南岸繼續放竹排載赤軍過河。三小時後，赤軍以奇兵由上游十二里處偷渡一團人，向下游之候部側擊，並抄襲候部之後。這樣候部一部被繳槍，一部突圍而向團溪遵義退走。赤軍則一方架橋，一方追擊。指揮烏江戰役之赤軍軍官爲劉伯承，四川有名之軍官，曾擊敗吳佩孚，並爲四川軍隊中極有聲威者。在川時已加入共黨，國共分裂後，曾領導四川幾萬軍隊於瀘州起事。

赤軍渡過烏江之後，候子擔部已無抵抗能力。故赤軍於佔團溪後，乘勝直迫，在兩百里路中，節節

追擊，不停留的攻擊前進，終於在第三日上午三時佔領遵義城。同時赤軍右路即佔眉潭，綏陽，中路佔桐梓城與川黔邊松坎場，擊敗川軍廖澤旅，大有乘勝入重慶的形勢。當時重慶市面頓現不安，川匯款至上海之匯水曾至百分之七十。人心不安，可見一般。但赤軍消滅候部後，並未前進。在遵義桐梓，眉潭，綏陽休養兵力。

此次赤軍入黔北後，確使赤軍得到極大收獲。

收獲之一，赤軍擊敗候子擔兩師，大部槍彈多被赤軍繳去，赤軍武器彈藥因此得一補充。赤軍以此而擊敗二進遵義時之王家烈之兩師與南京追剿軍薛岳之兩師。此種小軍閥在剿赤聲中不知淘汰幾多？平日魚肉人民，一旦有事，則兵敗師喪，面以槍彈濟赤軍。故赤軍稱南京及各省軍隊之長官爲輸送隊長，稱蔣委員長爲輸送總指揮，誠屬刻薄之至。

赤軍收獲之二，使赤軍部在黔北休養十二天。而這十二天的休息，使赤軍在湘南之疲勞，完全恢復，精神一振。使以後之戰爭，不僅戰鬥力不減，反如生龍活虎。

當時赤軍之所以能得休息十二日者，由於南京進剿軍周薛兩部急急進貴陽城，爭奪貴陽地盤，不願向赤軍攻擊，深懼犧牲自己實力。然而候子擔王家烈等小軍閥之命運則均至末路矣。薛岳用彼等以當赤軍之鋒，借赤軍之力以除其實力，結果王家烈候子擔實力一完，不是槍斃，就是下野。南京軍

此種辦法，莫怪各省當局均有飛鳥盡良弓藏之嘆。大有畏南京軍甚於畏赤軍之慨。因赤軍只能在鄉僻之區，而南京軍名正言順，可以取其地盤，驅之以遇赤軍，而使其實力喪失也。惟此種情形，亦是俗語所云：『斧頭吃鑿子，鑿子吃木頭。』薛岳之被命為追剿部隊，亦非薛岳所願也。

赤軍收獲之三，莫大於收獲人心。因赤軍在黔東之紀律較侯子擔部好得多，此事已風傳黔省。因此遵義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兒習藝所、學校學生及商民貧民等成羣結隊懸旗歡迎赤軍。旗上高書歡迎蘇維埃政府毛主席，歡迎紅軍總司令朱德。朱毛二赤軍首領竟在歡迎聲與砲竹聲中進入遵義城。在城門口空場上與歡迎代表一一握手後，即略略與歡迎之民衆講一些話，並表示感謝歡迎，赤軍願為黔民解除痛苦。

赤軍於第三天在第三中學操場開民衆大會。朱毛親自出席。工農學生商民被宣傳而執旗參加大會者將萬人。朱德大講其赤軍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說赤軍願意聯合一切國內各界人民各方軍隊一致抗日。毛澤東則大講其蘇維埃政權不收捐苛雜稅，全民選舉，蘇維埃政府主張抗日等等。

赤軍這種宣傳，影響黔省人心極大，赤軍在這個大會上成立『革命委員會』，並真有幾十個學生、工農商民當選並演講，且內有教育界份子。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不幾日就成立了幾百人的抗捐隊。自動去清查貪官污吏，沒收其財產，當場鳴鑼聚衆散發。貧民之集在縣公署（駐總政治部）天

井中等發「土豪衣服」者何止千數。

赤軍一方宣傳，一方招募赤軍新兵，十二日中確有四五千人加入赤軍。此輩均係川黔滇籍之貧民或退伍者，對於川黔滇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輩加入赤軍，對於赤軍有莫大之作用。以後朱毛之能轉戰於黔北者，此輩出力甚大也。

赤軍辦事敏捷。我在國軍中亦未見者。赤軍進遵義城後第二日，被服廠，修械，糧秣廠均已開辦，新兵之軍裝不久即發出，舊槍即修理完竣。

總衛生部所有之傷病約三百餘人，在此休息期中，有十分之八醫愈出院。赤軍總司令朱德曾親至總衛生部之病房，慰問傷病兵，與參加烏江戰役之赤軍受傷兵士談話半小時。當時有烏江戰役中侯子擔部之傷兵二名亦為總衛生部收容而為其醫治者，朱德亦略與其談話，囑他們安心靜養。

我以駐軍有暇，曾步遊遵義全城。遵義地處黔北要衝，有汽車路北通川邊之招坎場，自遵義向南越烏江而直達貴陽，為黔省通川重慶之要埠。因地處川邊，故風俗習慣及商業情形，均與川省有密切關係。遵義城有新舊兩城，新城為商業集中之區，舊城為官署與住宅區域。兩城之間有小河，中貫以石橋。城中官署廟宇，當時悉被赤軍駐滿。據開黔軍柏輝章師長之公館（在舊城）駐有赤軍總司令部，朱毛即駐於此。遵義全城有男女中學校五六所，赤軍對於學校機關不駐兵，以示維護教育。但各校均

未上課，惟赤軍對於青年學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組織抗日救國會及紅軍之友社等等。所以赤軍進城之第一日即有幾十男女學生，大部爲中等學校學生，執旗在街上演講，爲赤軍演說。當我步至縣立三中時，正見操場上有該校學生之藍球隊正與赤軍比賽。赤軍球藝甚精，因平日提倡體育甚力。赤軍想盡方法鼓動青年學子，由此亦可見赤軍對於青年學子之注意焉。

尤有一事可記者：當赤軍在遵義成立革命委員會時，有一女學生名李小俠者，年約二十，同情赤軍，在大會上演講，後被舉爲革命委員之一。爲當地學生中之長於交際者，當赤軍退出遵義時，李小俠亦隨赤軍而去。聞赤軍進入遵義以後，李小俠之家屬有七十歲之祖母，並有父母及一弟均爲王家烈氏槍殺。待赤軍二進遵義城時，李小俠已不能再見其全家矣。因此李小俠活動益積極。後聞赤軍逼近貴陽時，李曾單身混入貴陽城中進行密謀。以後此黔北女將軍不知還在否。

當我步行遵義全城時，只見三種店舖，門庭若市，一爲洋貨鋪，套鞋、面巾莫不售賣一空。二爲書店，遵義城有書店三家，間有上海南京之雜誌出售，此三家書店之新舊書籍鉛筆抄簿，均售賣一空。三爲酒肆，全城麵館酒樓，莫不利市三倍，遵城酒肆中頗饒川菜滋味，我亦同二三人去過一次回鍋肉、臘子雞，及各種泡菜，均饒川味，且價極廉。

赤軍在遵義時，所以商店照常營業者，係因赤軍之蘇維埃紙票按日均兌現，且赤軍沒收黔省主

席王家烈氏所經營之鹽行值幾十萬元，及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購之白金龍香烟值五萬元，準備舊歷年節以慰勞薛岳軍隊者，均被赤軍截獲沒收。赤軍即以此鹽及香烟一部在遵義桐梓兩城發給貧民外，其餘出售，每赤軍鈔洋一元可買鹽七斤，可買白金龍香烟四罐，價值遠賤於平昔。故赤軍以監煙兩項收入之現洋兌付紙鈔也。

赤軍在黔北休息十二天後，即全部經桐梓赤水而由土城渡過赤水河，向黔南前進。

桐梓縣爲黔北入川的門戶，縣城不大，自南至北只一里餘。但有一特點，足使我遠不忘者，桐梓城爲貴州歷年來該省軍政領袖之家鄉，故有美麗堂煌之洋樓數十座。這些洋房，都屬貴州歷年來之軍政要人的。而在洋房之旁則有無數鄙陋之草屋。軍政要人之門前有汽車，可以來往於遵義及川邊，而貧民則背負背斗終年辛勞而不約飽。(雲貴川幾省運夫及小販，不用肩挑而用背斗)貧富之分，宛然如畫。

自桐梓經良村至赤水縣之土城，均係大路，地勢均向上，間有幾段築有汽車路基，但此種汽車路，確爲中國最難行之汽車路。我經過時，正值下雪，故路上濕而且滑，行路之難莫甚於此。當我上桐梓西門外之高山時，見赤軍領袖毛澤東正手提竹杖步行上山。兩腳污泥及膝，且滿身污泥，恐依路滑跌於污泥中所致。

赤軍由土城，太平渡二鎮架浮橋渡過赤水河。向古蘭以南前進，此即由貴州而入四川省矣。以後經四川邊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經過許多小路，爲赤軍西行以來湘黔兩省從未經過之小路，尤以兩河隘爲最險要。由兩河隘進威信縣爲三十里，兩邊削壁中有水溝，一邊山崖上鑿一人行道而通過，只要道路破壞五尺，軍隊即無法通過，歷盡無數困難而，經達雲南之威信縣（舊名扎西，在滇黔邊）部隊達到威信之時，正係舊歷正月初三。即在該縣休息一天，但氣候嚴寒夜間降雪。

雲南之民族問題，值得注意者，龍雲爲夷家，雲南軍隊與政府中上級官員，都屬夷家，漢人則受壓迫。故赤軍未到威信時，在某一鄉村中，曾有北京大學畢業而曾任雲南某縣縣長者，晤赤軍首領，願率當地民團並可號召各縣民團助赤軍進攻雲南，爲漢人解除壓迫。赤軍在此區域時，爲取得居民之好感，故亦以各民族解放爲口號，以取得漢回苗各民族的同情。以後，赤軍曾以羅炳輝（雲南人，久在雲南軍隊中服務，曾屬朱培德部下。早爲祕密共產黨員。在江西吉安爲民團指揮時，率幾百民團加入赤軍）的九軍團在畢節宣威東川一帶活動。漢回苗民之加入赤軍者五六千人。震動全滇。滇民盛傳赤軍有一雲南籍之羅軍長要回滇驅逐龍雲。羅之聲名，亦以大振。但赤軍雖反對龍雲，夷家壓迫漢回苗民，同時却對一般夷民，則以民族平等，反對大漢民族主義等等進行宣傳。

赤軍原定計劃本擬由威信繼續西進，渡過牛欄江而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後，忽然又向東

回，恐係當時局勢不能過江，故不冒險。但赤軍之忽然折回黔北，確出川黔軍隊意料之外。川軍本在北面與赤軍並行向西追擊，以便迅速馳赴江邊扼阻。而赤軍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東，待川軍發覺而折回時，赤軍已渡赤水河而佔桐梓、樓山關。赤軍此種狡猾機動之作戰方法，常以出奇致勝，此均爲朱德、毛澤東之特長。故在赤軍中，毛澤東有諸葛亮之稱。

赤軍重回黔北之桐梓遵義，曾打一大勝仗，此爲赤軍自江西突圍以來有數之勝仗。此仗似出赤軍極有計劃之行動。當赤軍佔領桐梓之日，卽整備野戰醫院，我被賀誠派往野戰醫院收容傷兵。當日下午在婁山關卽與遵義向婁山關攻擊前進之王家烈部兩師人接觸。王部幾次攻婁山關，均爲赤軍守軍擊退。赤軍則派大部由兩翼包抄王軍之後，攻佔王軍之後之遵桐馬路上之板橋鎮，截斷王軍歸路。而當時婁山關之赤軍亦居高臨下進攻王軍，王軍不支，四方包圍，兩師人大部繳槍，小部潰散。赤軍則猛烈追擊，當夜三時佔領遵義新舊兩城。聞王家烈出走時只率師長柏輝長等隨從數人。此仗實使王家烈傾家蕩產，不久卽出黔遊歷而作下野客矣。

當時野戰醫院卽隨軍進遵義城，但次晨又開始大戰。進攻赤軍之部隊係薛岳所部，由吳奇偉率領兩師人自貴陽北進，渡過烏江後，本擬增援王部，不意王部失敗如此之快。至懶板橙（離遵義六十里）時，王氏率隨從退下，與吳軍遇，備告失利情形，吳氏卽急赴遵城。在遵城南之十里鋪以外（離遵

城約二十里）與赤軍彭德懷之三軍團接觸，彭德懷親在火線上指揮，接戰後一小時，彭德懷即斷言當日下午吳部兩師可大部繳械，未幾林彪率領之一軍團由捷徑迂迴至吳軍之後，當日上午十二時，吳軍兩師即陷入赤軍四面包圍，四周有利陣地，均爲赤軍奪去。吳氏見勢不佳，擬即撤退，但赤軍愈逼愈近，繳槍之聲四起。大部已被繳槍，吳即拚命率領兩團衝破南面赤軍包圍線，由汽車路上烏江撤退。幸烏江浮橋未撤，故吳氏等即得渡河。但赤軍勇悍異常一部，由汽車路上向南尾追吳氏，一部即由左翼山路急行軍趕到烏江邊。此種急行軍亦爲赤軍之特長路上行軍在山路，綜夜八小時走了一百里。當趕到烏江邊時，吳氏本人早已過河，但所部尚有一千八百餘人正在渡河，吳氏見赤軍到，恐烏江浮橋被佔，而乘勢進迫貴陽，故下令立即在江南斬斷浮橋之保險索，橋即爲急流沖斷，赤軍不得過江。但在烏江北岸之一千八百餘人，均被繳槍。聞吳軍全部輜重，都在江北盡爲赤軍所得。此仗之後，遵義城中滿佈了赤軍與黔軍，南京之被俘槍繫者。此項俘兵，赤軍特爲之組織新編師，每人發繳槍費三元，專派共黨人員進行宣傳。後聞被俘官兵有十分之八被鼓動加入赤軍，不願當赤軍者，每人發路費送出。赤軍警戒線，赤軍對被俘之中上級官長，亦由朱德親自召集談話多。方安慰，說明赤軍主張抗日救國，希望全國軍人一致合作，被俘軍官之願留赤軍者留在赤軍，不願者就給川資送出赤軍區域，此種辦法確爲赤軍新辦法，故一般被釋之官長之殊有死裏逃生之感。

赤軍這一勝仗，確使南京軍及川滇黔湘各省軍事爲之震動。薛岳周渾元以川軍不能冒險前進，須重新佈置。赤軍則由圍攻賀龍，蕭克之部隊抽調幾師，扼守烏江東岸。據以後赤軍之捷報云，賀龍蕭克之部隊由此而將某軍陳渠珍旅全部繳槍。自遵義赤軍獲勝之後，赤軍兵士及下級官長都願與薛岳周渾元部打仗。自謂川滇黔軍隊之武器不足，繳之無味。與南京軍作戰，則有新式武器與充足之彈藥可繳。驕傲氣概，可見一般。

赤軍此次所以能連勝王家烈部與吳奇偉部之原因，一方面因赤軍之有頑強作戰之能力。而且赤軍兵心之團結一致，當猶國材二進桐梓城時，赤軍政治部所派之地方工作團中有一兒童局書記（即專在兒童中活動者）年僅十三歲，由江西隨部來，當是被猶軍切斷于婁山關附近之高山上，與赤軍失去聯絡。但此十三歲之童子毫不懼怕及失望，竟日夜爬山，走了二天三夜，終與赤軍會合，聞此童子行路口渴而找不到一點水飲時，實在口渴不能耐，故以自己之小便盛之於盃中而飲之，解口渴。此誠趣事，亦可見赤力團結之堅矣。同時其中另一原因，因赤軍中有大部黔省新兵。此輩在未當赤軍時，憤恨黔省當局之苛捐雜稅，使之生活不安，故作戰時據赤軍云新兵極勇敢。且此輩新來之黔籍赤軍均熟道路，幾次帶領赤軍由捷徑包抄王軍及吳軍之後，包圍王吳兩軍而繳槍。故赤軍之沿途打仗，非但未有極大減員，而能到處熟知地理者，正由於赤軍每到一地，即鼓勵當地居民加入赤軍。而在

作戰時，則得此輩之助也。

赤軍在遵義戰役勝利之後，駐重兵於鴨溪。（在遵城西南六十里）幾次想引誘薛周兩軍及川軍決戰。但薛周兩軍，及川軍郭勛祺、廖澤、潘左等部均小心異常，不輕易進攻。故雖赤軍幾次在赤水河兩岸引誘決戰，薛周兩軍均不前進，只小心的建築碉堡。赤軍見黔北無計可施，即急行軍乘隙偷過烏江。擬向全威脅貴陽。此時貴陽確大爲震動，後我到上海時，當時報載有貴陽飛機場被赤軍佔領，飛機廿餘架被燬等事。

以我猜測，赤軍南渡烏川，即思入川。但赤軍則故向東，佯攻甕安、黃平，待南京軍東向及滇軍出滇而向貴陽時，赤軍忽然向西南插入貴陽。竟由貴陽與龍里之間通，以佯攻貴陽姿勢，而以主力佔領定番，長寨，紫雲，貞豐，安籠，興義等各縣城，並經過盤江。赤軍此種狡獪之機動，確出蔣委員長意料之外。而當時滇軍四旅已入銑，赤軍反得乘空入滇，毫無阻礙。南京軍、川軍、黔軍、滇軍，均落於赤軍之後。故赤軍得一路無阻，到處繳少數滇軍之槍械，佔領滇中許多城市，截斷昆明通黔之幾條汽車路，而得從容渡過金沙江。

赤軍入滇後，有兩件有趣的事，亦爲赤軍兵士平日引爲笑談者：

一爲赤軍包圍曲靖而向馬龍進時，截得由昆結來之薛岳副官所乘汽車一輛，內滿載軍用地圖

並雲南著名之白藥（可醫槍傷，極貴重。）據被俘之副官云，他係由薛岳派入滇謁龍雲者。前日薛岳來電，因無雲南軍用地圖，請龍雲送去。龍雲接電之後，本擬派飛機送來，但次日機師忽病，故改用汽車送去。但未知曲靖已被赤軍包圍，汽車路亦被截斷。龍雲並送大批白藥，雲南之宣威火腿及普洱茶共滿載一車。車離曲靖二十里時，正遇赤軍。因此衛兵副官均被繳槍，軍用地圖未交薛岳，反而被赤軍用以渡過金沙江，白藥、火腿、茶葉，均被赤軍享受，故赤軍軍士每談至此，皆為捧腹。咸謂三國時劉備入川，由張嵩獻地圖，此番紅軍入川，則有龍雲獻地圖。

另一事則為赤軍進嵩明城，及官時，皆由縣長及當地軍警各界領袖迎入。原因並非此輩通赤。蓋雲南地處中國西南，年來雖知湘鄂贛川等省紅軍活動之消息，但官場佈告向稱赤軍為「赤匪」，而雲南人心目中之「匪」均係衣衫破爛，困苦不堪，並無新式武器，而且搶劫居民者。彼等見赤軍臨該地時，既未沿途搶劫，而且紀律甚好的，賣買公平，鈔票兌現，並且服裝整齊，有許多新式武器，為雲南軍隊所未見者。此輩地方官紳自以為此必是南京軍，因紀律軍容，遠優滇軍，此非南京軍而誰？因此排隊歡迎。且將省府命辦之糧米銀款全數交出，並募幾百伕子與大批嚮導以供「南京軍」。赤軍亦將計就計，自認南京，將一切軍需及伕役接收後，並應地方之盛宴。席間，由該長一一介紹，誰為縣長，誰為局長，誰為民團指揮，誰為紳士，一一介紹之後，各地方領袖並請此「南京軍」長官訓話。赤軍領袖即席

起立，口呼『同志們！』即在此時赤軍伏兵四出，立即將地方領袖監視矣。赤軍官長，當即宣佈『我們不是國民黨的南京軍，而是中央蘇區的中央紅軍。』此時地方領袖早已相顧失色。但赤軍並未與地方領袖爲難，即好言安慰而去。

當時赤軍，立即召集由地方交來之幾百伏子，響道開會。即席宣佈他們不是南京軍，而是赤軍，並詢問伏子是否出錢僱來抑係強迫派來當兵差者，衆伏子一口同聲均稱被強迫派來，並言概無工資，家中妻小亦將因本人出外而餓死。赤軍當席宣佈『雲南軍閥官僚如何使你們吃苦，赤軍現決全部放你們回家。但如有人願留爲紅軍伏子者，每日工資五角大洋，先付半月工資安家。』當時十分之九以上之伏子及響導均願受僱用，只有十餘人則要求回家。當以赤軍發給每人一元之路費回家。

我自到滇省以後，我對滇省有極好之感想。先是赤軍中人，常以爲滇省爲中國西部高原，即係高原，必係高山峻嶺，道難行，氣候惡劣，物產不豐。不意自到滇省以後，雖覺雲南之地勢甚高，但在滇東北有很大的平原。自黔入滇，地勢雖係向上。但此處地勢絕非黔省可比，而與贛省入湖南之地勢相似。在向滇省前進時，雖面前有許多高山，但一到山頂，則並不是下天，而是一片平原。以後走完平原，前面又是高山。上山之後，又是平原。地勢層層向上。且每一縣城及鎮市周圍又幾十里幾百里之平原，俗稱昆靶子，大理靶子，曲靖石靶子等等。靶子者縣城周圍之平地也，因雲南之道路平坦，兼以道路甚寬，可行

北方之驛車，而在交通事業之開展上又覺便利。如修汽車路則較黔省之鑿山開路容易多矣。故雲南汽車路發展甚早。

雲南氣候甚佳，遠非貴州之『天無三日晴』可比。昆明附近氣候溫和，正如江浙。我等經過曲靖附近時，即已不能穿棉衣。

惟每天氣候之變化甚大，時至下午四五時，常有巨風及陣雨，氣候亦較寒。

因雲南之氣候好，所以物產甚豐，曲靖馬龍以及滇東北產谷甚多，且有棉花。惟全國聞名之雲南鴉片烟，確是遍地種植。雲南鴉片之所以貴於黔川幾省者，係雲南鴉片所結之果實如拳，較大於川黔所出者。惟鴉片在雲南亦極便宜。在馬龍高明，每現洋一元可購雲土半斤。我當笑謂若江浙之癮君子聞雲土如此便宜，豈不將口涎欲滴乎。

滇省居民最多者為漢人，其次為苗家，夷家，回民。而現在夷則為統治雲南者，故夷家一般之生活亦較富裕。鄉間之村長區長，在某些區域中，以夷家為多。我等在官渡經過時，有幾十里路都係回民所居。風俗習慣，亦如江浙之回民，有清真教堂。赤軍之五軍團中亦有不少甘肅之回民，故與回民感情極好。赤軍亦極尊重回民之教堂，赤軍領袖朱德曾親至清真教堂與其教民首領談話。次日教堂以赤軍與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隊歡送，並有幾十回民加入赤軍，此輩回民加入赤軍之後，赤軍為之單獨成

立回民隊伍，一切風俗習慣飲食起居，悉照回民原有習慣。

在昆明附近，我常見居民之年三十歲以上者，多數在頭間（即喉部）生一瘤，男女均然，據云居民中十之七八均生瘤，此係泉水缺乏礦質所至。並有一個山上之泉水不能飲，飲之喉部即爛，故赤軍經此山時，均未飲水。

雲南不僅在氣候上，物產上，地形上均對我之印像極佳。而且雲南在政治地位上有過討袁之雲南起義，擁護共和政體有過光榮之歷史。

赤軍入滇目的本在渡過金沙江，故即分兵兩路入滇，主力則佔雲益馬龍，尋甸，嵩明而直逼昆明。而其另一路則先在滇黔邊吸引黔滇軍，曾擊敗猶國材之五團，繳獲甚多。乘勝入滇佔宣威東川兩府，後直趨巧家縣而渡過金沙江。赤軍之主力逼近昆明時，昆明及全省震動。但赤軍目的並不在佔昆明，而是引誘滇軍不向金沙江邊而急援昆明，同時赤軍原定在交西渡口渡過金沙江，但爲迷惑追軍而故意西佔祿勸，武定，更西進而佔元謀，由元謀北上至龍街伴作渡河，這一調虎離山之計追軍確又上一大當。周渾元，滇軍，湘軍將全部進剿部隊，均趨元謀，而赤軍却全部在交西渡全無阻礙的渡過金沙江。龍街之伴渡部隊，亦由捷徑趕回交西渡。赤軍在金沙江邊計渡九天九晚，而追軍則直至赤軍渡過金沙江之後，佔領通安州，而直逼會理州城下時，才知赤軍已由交西渡河，此時將追剿部隊，折回交西。

渡，則赤軍早已全部渡過金沙江，而早將船隻破壞矣。故赤軍安然渡了九天九夜，周渾元之追兵則第十一天下午才接近江邊，但船隻已燬，且滇北山洞內有赤軍扼守，不能接近河邊，徒呼負負而已。赤軍此計一成，赤軍士兵均極快樂。在第五軍團的政治部機關報上，編出一齣新劇，名爲『破草鞋』，形容蔣委員長自江西起追剿赤軍幾省，歷時半年以上，對赤軍追毫無剿所獲，只在赤軍之後尾隨，拾得少許赤軍穿爛而拋棄之『破草鞋』而已。當時赤軍傲慢之精神，亦可見一般矣。

赤軍之渡金沙江爲自離江西以來，最險要亦最得意之事，渡河情形，我見上海及各也報紙所載者，不確也不詳。我曾親自渡過金沙江，我亦覺此事爲平生大大幸事，使我永遠不能忘却者。

金沙江爲揚子江之上游，發源於青海，在西康雲南省境者，均稱金沙江，再下流而至四川之宜賓（卽敘府）稱揚子江。金沙江之兩岸，均爲高山峻嶺，除幾個渡口外，均爲懸崖絕壁。自雲南省走向金沙江時，離江六十里處，卽爲下坡。連下四十里而至交西渡，由交西渡到江邊爲廿里路長的山峯嵯峨，千奇萬怪，狀甚可怕。夕陽西照時，山峯照耀如黃金。自交西渡至江邊則山勢更陡，下山必用手杖，否則有滾下山溝之危險。而且這二十里中在當時天氣（陽歷四月底）已極炎熱，二十里中幾無草木，愈下山，愈覺熱。一到江邊，天氣更熱。赤軍士兵莫不痛飲冷水，江邊居民只五六家，係平日藉渡船爲生者，因春夏天氣炎熱及秋冬氣候嚴寒，故均鑿山洞而居。相傳三國時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

地』即係此處。三國誌上並云江邊氣候極熱，馬偕過水之二千人，中水毒而死了一千五百人，或真有其事也。

金沙江之北岸有船夫六七家，並設有關卡。川滇兩省之貨物來往，均須在此納稅。聞南雲著名之雅片——雲土，過河以後，即價高兩倍。居民自稱江北岸爲四川，聞南岸爲雲南。我渡河時，船之兩旁所坐之人數不均，且有立于船中者，船就傾折于北面，船夫則大呼『先生！背靠雲南，』意即叫立于船中之人，坐於船之南邊，面向四川者，背靠雲南，以免船之傾斜。南岸之泊船處爲沙灘，北岸都係懸崖，懸崖內鑿一將近一百米特之孔道，並有山窗洞，船到北岸即泊於懸崖內之孔道口。渡客即由孔道內走入東邊半山上之關卡。我等渡河時，水還未漲，故河水尙距孔道口二丈餘，有石級直上孔道。

金沙江寬約等於黃浦河之一半，立於河邊不能聞對岸之呼聲。水流自西而東，流度極快，計每秒鐘約有四五米達。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時水浪已有一二尺，但風雨作時，則水浪驟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風勢，真是嚇人。我等渡河之時正值怪風驟起，沙灘上之沙土，隨風飛舞，河邊居民在石洞所築之草屋被風吹去。我站立路中，忽來一陣巨風，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於地下，因此我等莫不嘆金沙江風威之大。但半小時後，風停雨止，且見太陽。詢居民，始知金沙江邊之風雨每次不過半小時，過後就晴。中國西部氣時變化之巨，由此可見一般。

金沙江如此水急，因此不能通船隻，自宜賓以至瀘州，才通木船，瀘州以下則通輪船。但金沙江之渡船在東川巧家以下則船隻較多。巧家以上海渡口最多十餘隻。龍街以上則只通皮船。船以獸皮製成，每船只渡一人。上遊之所以用皮船者，因水流太急。江中渡石礁多，木船易破。

赤軍渡河時，不能架浮橋，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共搜集六隻小船，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船可渡十一人。而且船已破爛，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每次來回，均須專人在船艙中將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復渡，故危險異常。渡江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時只能來往三四次。而赤軍全部人馬，幾乎都從此渡江，故除日間渡江而外，夜間則於江之兩岸，燃燒木材，火光照耀江面，終夜渡江。

赤軍之渡過金沙江而僅憑此六只破爛之小船，國人未目覩此或不信之。但事實確赤軍僅僅靠這六隻破船以渡江。當然赤軍之所以能如此從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於南京軍滇軍上了他的聲東擊西調虎離山之計，故有充裕之時間，渡過全部人馬。而且全部渡完兩天之後，追軍才到，所以掉隊落班者亦極少。但另一原因，則因赤軍之渡河技術，有極好的組織，試想，如無較好的組織，則在渡江時，人馬擁擠，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隻稍有損失，即將延長渡江時間矣。故赤軍在各方面之組織能力，確遠優於南京及各省之軍隊。我曾見赤軍總司令部及共黨中央委員會派有共黨高級人員組織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江軍隊均須聽命於這個江河司令部。各軍隊按到達江邊之先後，依次渡河，不得

爭先恐後。並在未到江邊前，沿途貼佈渡江紀律。軍隊到渡邊時，必須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須聽號音前進。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時，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灘上，預先指定先上那一隻船。每船有號碼船內規定所載人數及擔數，並表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時幾人上船，只能一路縱隊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員在船中秩序必須聽命於這個司令員。而赤軍之對服從命令紀律之嚴，亦非國軍所可及。即如赤軍中之軍團長師長渡河時，亦須按次上船聽命於渡河司令部不稍違背。赤軍之組織能力，除表現於組織秩序外，而同時極好的組織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後聞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於赤軍渡河司令部除派共黨幹部進行宣傳工作外，並優給工資。聞每天日夜工資現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鴉片，赤軍則命人燒雲南鴉片一大鍋，隨便由工人抽取不算錢。且日夜進食六次，每次殺豬，而共黨指揮渡河之人員，則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荳。語云重償之下，必有勇夫，誠可信也。並開渡河以後，共黨即燬船，船為當地夷家領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之生活暫時將絕，故每人除工資外，各給現洋三十元及幾斤鴉片，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對赤軍有好感而隨赤軍入川者。

赤軍之人槍由船渡金沙江，而同時亦將全軍馬匹渡過金沙江。渡船上本不許載馬匹，但渡河時赤軍想出方法，命馬夫棄馬鞍，拉住馬口索坐於船尾，使馬立河邊上，船離岸時，岸上派人執鞭驅馬，馬

即跟於船尾游泳過江。故赤軍自豪，渡過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馬，誠趣事也。

渡過金沙江以後，時江之北岸至川省之通安州爲三十里，均爲上坡路，而且山極聳，正如交西渡至金沙江南岸一樣。在這個三十里中，全係荒山，極少樹木，沿途只見一戶人家，偶於山坡上見些羊羣，此處已爲遊牧區域。自通安州至會理城，須再上坡三十里以後，道路始稍平，但兩旁仍有高山。通安州只一鎮市，爲川滇通商之第一鎮市，居戶約三百餘家，有小學一所。我到时，正見幾百鄉人，身佩紅布列隊將行，係由共黨鼓動去當紅軍者。聞共黨曾在通安州成立革命委員會，抗捐軍等等。過通安州而將到會理時，遠見會理城正在火燒。宿營地後，才知會理守軍爲川康軍劉文輝所部，劉元塘師。劉師據城死守，因恐赤軍爬城，故將城外附近之房屋全部燒燬，使赤軍不能接近城牆。但此舉却引起城外居民之大憤，因被赤軍鼓動數千居民，協同赤軍攻城。後聞此數千人大部加入了赤軍。

會理既有劉師死守，赤軍亦未強攻，只加監視。赤軍之目的，係在渡河以後，南京軍的追剿軍隊暫時不能過河時，藉此休息補充，故赤軍總司令部命令全軍在會理休息五天。並命各軍隊加緊居民中宣傳工作，規定招募赤軍新兵五千人的計劃。這個計劃，赤軍各部都執行，總衛生部亦亟亟執行。五天後，果然有新兵五千人加入赤軍。赤軍部隊之所以經常得如此補充，一因赤軍善於宣傳居民，二因雲貴川三省住民平日之生活實在太苦。會理居民莫不怨憤劉元塘平日種種之壓迫，苛捐雜稅，層出無

窮，自鑄銅質銀元，強令通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年，輕女子隨意姦淫，不從者累及全家。如此行爲，豈有不遭民怨之理。加以赤軍用如簧之舌，並領導貧民『打劉家』『打土豪』『莫怪貧民之成千成萬加入赤軍』。

五天以後，赤軍即北上，由會理，德昌，瀘沽，越雋，而至大赤河邊。爲每天行程六七十里，計行程廿九天。赤軍因急於搶大渡河，故未攻西昌，繞道用北上。自會理到大渡河邊，爲沿安甯河之大道，平坦處有二十餘里之寬度，但狹隘處只一安寧河與河邊之小道而已。安寧河兩旁均係高山峻嶺，東爲大涼山，西爲鴉髯江流域之高山，這兩旁高山都住夷家（漢人俗呼其蠻子或羅羅）漢人只居於沿安甯河之大道上。且每家築有碉樓，因夷漢民族衝突甚烈。夷家時常下山攻擊漢人村落，故築碉以禦之。赤軍至瀘沽時，即分兵兩路，小部至富林南岸，佯作強渡姿勢，以吸引對河之敵。大部則由瀘沽向西北進，佔冕甯縣城，而企圖在大渡河邊之安順場渡河。但由冕甯西北五十里之大橋鎮而至安順場須經過夷民所居之高山，歷時兩日半，這是赤軍當時之一大困難也。

四川之夷家爲川人所最恐懼者，安寧河以東大涼山爲夷之根據地，大涼山面積極大，南至甯南縣，北至大渡河，東起安甯河，西之至金沙口沿岸雷（波）馬（邊）屏（山）冕甯西北，直至康定以南，均屬夷家區域。此處夷家相傳爲諸葛武侯征伐之所謂『南蠻』。在冕甯西北之夷家山上確有啞

泉，食之即啞。冕甯縣誌及甯遠府誌均有記載。夷家均有武裝，有數千快槍並有少數手提機關槍（只就冕甯西北上的夷家而言）均繳自漢軍。沿安寧河兩岸土地本為夷家之土司官所有，但自劉文輝成都失敗而入雅州後，即調逐夷家土司官而據其土地為己有。因此夷家與劉家軍結仇甚深，實際上政府官吏之統治，只及於沿岸寧河兩旁平原上之漢人而已。夷家因不受統治，而且抗繳一切租稅，政府軍隊通過夷家之山時，必須大隊，一團以下，可被繳械。

此處夷家不若蒙古、西藏等民族，夷家還係部落，性情多猜忌，疑慮無定。各部落之間，常有世仇，故常相械鬥。夷家之生活，半為遊牧，半為種植。種植以玉黍為多，畜牧牛羊馬為多。

夷家中有兩種階級，一為黨夷即為夷家中之統治階級，一為白夷，白夷即為黑夷之農奴，終身為黑夷耕作，除衣食外，其他無所得，黑夷隨時有權置白夷於死地。每一黑夷常有白夷數百人，少則數十人為耕作，黑夷則終歲不勞動。黑夷與白夷不通婚。現在黑夷人數漸少，但仍保有其統治勢力，所謂土司者即此輩黑夷中之首領也。白夷原係漢人，係由黑夷擄來。黑夷將漢人擄來以後，常由大涼山與冕甯西北山上之黑夷相互交換擄獲之漢人，使其不知道路而不能逃逸。黑夷並為白夷之男女配婚，均稱男女白夷為娃子。（意即四川話之孩子）但每黑夷家必信任一個白夷為當家娃子，（如當家人）當家娃子攬有一切銀錢出入及日常事務之權。因過去漢人只籠統的不分黑白，只反對夷民，加以

夷民中之文化落後，所以白夷都助黑夷反對漢人。遇與漢軍作戰時，白夷均參加。

漢人之與夷家貿易，係由通司翻譯，亦有夷家能漢語者。但黑夷恐漢人殺之故不下山，遇事則命白夷與漢人往來。夷民常以獸皮麝香等物售於漢人，換布疋及鹽而回。

夷民之服裝與漢人完全不同，頭包青布而在腦後墮下一尺布，如上海之印度馬巡。有的鼻穿銀環，不論男女，均懸耳環。耳環不是金屬製，而以骨製，共有三四顆或圓或長圓之骨塊連成，一串而掛在上耳。熏面部黑身上穿的如和尚之袈裟，係由羊毛自織而成（此種外衣，質輕而軟，且可遇風，極適於行軍之用。）腰繫帶，夷民所居之山上氣候一日數變，中午炎熱下午四時起發巨風，晚八九時下雨，次晨天晴。我們經過夷民之山地歷時七八天，均係如此順序不變。因每自氣候變化甚烈，所以夷民出門，不論何時，必將外衣帶在身上。遇發風發雨即以外衣裹身，夷家每人身攜利刃，用以防身，亦用以割肉進食。足有綁腿，終年不穿鞋襪，只少數穿草鞋。但夷民生長山地，善於爬山，赤軍於山路行進時，夷民則由路旁之山石攀登而上，而且上山之快，宛如猿猴。

夷民生活之痛苦，還遠過於漢人，漢人還能耕平坦之田畝，夷民之田畝，日漸被川軍之官長及當地官吏所侵佔，而只耕植於山地，在山下遠望夷民所耕種之山坡上的山地，傾斜度幾如削壁，望之可怕。但夷民終年耕植於此，因其只有耕種山地，故夷民平日所食者，亦只玉黍而已。至於夷民所居之家

室，則更較鄙陋不堪，以竹木編爲壁，上覆松樹皮，潮濕特殊，跳蚤成羣。

赤軍所過之夷民居住之山，共有夷民十餘部落。當赤軍之前衛團出大橋鎮上山二十里時，卽有三個部落之夷民前後及左翼，包圍赤軍，意欲繳械。但赤軍善用宣傳政策，向白夷民聲明共黨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漢人軍閥壓迫夷民。並提出爲夷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劉家」（意卽打劉文輝的軍隊，因劉文輝壓迫夷民甚烈。）當時赤軍領袖卽與當前的一部落名「古鷄」者以鷄血充酒與夷民領袖共飲。表示插血爲盟共打劉家，經過插血爲盟後，「古鷄」一部落夷民非但不打赤軍而反被赤軍收編作「紅軍遊擊支隊」，而與赤軍引路及招撫「阿越」「羅紅」等十餘部落。此後赤軍全部過此夷山時，夷民則牽牛送羊歡迎赤軍於道旁。赤軍則以皮衣，舊槍，鹽布送夷民。故當時我等日夜恐懼之夷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過。

走完夷民山地，卽至「開羅」場，該鎮有人戶二十餘家。但此處有一趣事可記者：劉文輝駐西康打箭爐之隊伍，米糧須由西昌府供給，故劉軍設糧站於開羅。當赤軍前衛行抵開羅場時，劉軍糧站之人員還以爲南京軍至，亟爲設筵招待官長，並將軍米如數點交，計有四千餘包，每包六十斤以麻皮袋裝之。赤軍領袖將此項軍米照數發給各赤軍部隊，剩餘甚多，悉發當地民衆。我至開羅時，正見民衆不論老幼均肩負一袋回家，面有喜色。詢之則云「紅軍先生，我們白米好久沒得吃了，赤軍來了，才把劉

家的米發給我們吃，赤軍好！」文輝之搜刮民食反以之濟赤軍，而赤軍則以發給民衆，此則愈使當地民衆反對劉軍而歡迎赤軍矣。

自開羅至大渡河邊之安順場爲六十里。赤軍政治部謂安順場有「革命的歷史意義的地方。」原因是太平天國時，北王韋昌輝殺東王楊秀清後，當時太平天國內部頓起分裂，石達開率部離南京而入川，安順場卽爲石達開兵敗身擒之處也。當晚我爲政治部副主席李富春診脚病時，適李召見一老者，年已九十以外，爲當地之童館教師，嘗親見當年石達開在此失敗者。正由李富春享之以酒肉，請其講述石軍歷史。據老者言，石軍到安順場時尙有五六萬人，刀槍馬匹無算，但一至安順場，忽遇上游大水，安順場前面之山水瀑發不能渡河，前有大渡河，右有清軍，且拆斷小河之鐵索橋，左爲山崖絕壁，後爲夷民，且當時夷民之數量遠過於現在，石軍被困於此者，凡四十七天。當時軍心不固，而石氏本人亦動搖，故自縛入清營。石軍均爲俘獲。老者並云「長毛」並非強盜，自稱「復漢驅胡」。石部對人民甚和氣，軍隊有紀律。老者並云「紅軍之紀律則較冀王（卽石達開軍）更好。」據老者之所云若是。但石達開當時未能渡過大渡河而失敗於大渡河邊確係事實。我後見滬川各報，蔣委員長亦曾伸引石軍爲例，以比喻赤軍之必然不能渡過大渡河而失敗於河邊。但赤軍竟安然渡過大渡河，故赤軍頗以之自豪，認爲渡過大渡是歷史上的軍事的勝利。

大渡河亦揚子江之上游，大渡河流入泯江而轉流入揚子江。赤軍至大渡河時，時已五月底，氣候已暖。上游雪山正溶解，故水勢暴發，水流甚急。大渡河之河面及水流均較金沙江爲更寬更急，水浪更高。渡船每一往返，歷時五十分鐘。且每隻小船之船夫，須有八人作工。渡河方法，先將載客之船由南岸河埠，沿南岸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順流如箭飛似的斜過對面河埠。船至北岸河埠時不能稍前稍後，一不小心即觸礁石，船即分裂，故非當地熟知水路礁石之船夫，不能駕船。船返南岸時，亦須由北岸沿江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順流飛箭似的斜過南岸來，故如此往返需時五十分鐘。

赤軍抵安順時場只獲兩隻船，有劉文輝軍之一營兵駐於安順場對岸之大渡河北岸，並築有野戰工事，沿河扼阻赤軍渡河。但既有守軍，何以船隻不收容於北岸而繫之於南岸呢？事有如此湊巧者，北岸劉軍營長之岳家在河南渡之安順場。該營長當晚宿於岳家，以備明晨將其岳家及當地紳商全部渡至河北岸。因其情報赤軍尙距安順場六十里，須次日下午才能抵安順場，故安心在岳家與其婦妻酣睡。不料赤軍行動如神。當夜急行軍，半夜即抵安順場。因此兩船被扣，營長被俘。

但赤軍即使有兩船，並不易渡過大渡河。因河之北岸有守軍一營，船隻不能接近對河。且當時船夫早逃，沒有架船之熟練工人。但赤軍終於擊潰對河劉軍而渡過大岸河。此事亦爲赤軍據以自豪者。但即以我之旁觀者目光視之亦覺赤軍之士氣勇敢及共產黨團員之奮不顧身有以致之也。

據聞赤軍經過如此，赤軍領袖獲得兩船之後，即揀選十九個共產黨團員，中有幾個爲江西福建之木船工人，十九人即攜棧標，步槍，駁壳，手榴彈，及機關槍，駕着兩隻船，不顧一切之北岸駛去。河之南岸，赤軍則佈置機關槍及迫擊炮之陣地，並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強渡部隊。

當赤軍所駕之兩船離南岸時，赤軍即對之射擊，但赤軍不稍畏縮，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當時一跳上岸，雖赤軍對之射擊，但只有四個受傷者。其餘則一齊撲至劉軍工事內。此時劉軍一方驚於赤軍之奮餘，胆氣已寒，又加河南岸赤軍之機關槍迫炮描準射擊，劉軍幾不敢抬頭，而渡河之士勇赤軍即佔劉軍工事而繳其一部槍枝。聞劉軍有一機關槍手，正擬至高山陣地架機關槍，行不十步，即被對河赤軍之特等射手射倒於地，因此劉軍全軍向後退上高山。赤軍即搶守工事制止劉軍向下。一方則重駕兩船返至南岸載赤軍渡河。待赤軍渡過一營後，赤軍即向劉軍衝鋒。劉軍兵心已寒，全軍潰敗。赤軍即佔高山，乘勢向劉軍猛追。聞劉軍大部被其繳槍。如次戰役，赤軍在隊伍中大施宣傳及獎勵。此十九個搶渡大渡河者，尊之爲英雄的確，我雖非軍人，但在軍隊中服務已有幾年，強渡河流之衝鋒部隊亦已見過不少，但在如此水寬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十九人驅逐敵軍一營，佔領敵壘，却未之見也。故共產黨常以共產黨團員爲赤軍模範，此輩共產份子常以衝鋒在前，退却在後自任，此誠非國軍及其他一切軍隊所可比擬也。

赤軍既獲兩船之後，即開始渡河。但僅依此兩船而思全部赤軍過大渡河，歷時甚久，且後面追兵將至。故赤軍以兩天的時間，渡過輕裝之赤軍一師。而當時目的即轉向奪取鑪定縣之鑪定橋以求赤軍之全部由鑪定橋上過河。故赤軍大部由河南岸西進，經西康省區而向鑪定橋前進，已渡之一師，由北岸西進，同以奪取鑪定橋爲目的。

但在河之北岸，劉軍沿河佈防，故河北之赤軍，自離安順場對河向西走之三十里以後，即與抗擊之劉軍節節作戰。但劉軍如此分散，且缺乏通信工具，故被赤軍節節擊潰。劉軍中大部爲抽丁得來之新兵，不願作戰，且赤不會作戰。早聞赤軍之宣傳不殺白軍官長及士兵，故沿途繳餉。赤軍以繳得劉軍之槍彈，還擊劉軍，開河北之一師獲利不少。（赤軍打仗時如消耗之彈藥，與繳獲之彈藥相等，則云「不折本」，如繳獲與消耗核對有餘，則謂獲利。）在離鑪定橋四十五里之「冷漬」赤軍曾與頑強扼守之劉軍作激烈之戰鬥。後由赤軍南岸之軍隊，隔河向劉軍之後射擊，結果河北正面赤軍得迂迴至冷漬之後而包圍劉軍。聞此處劉軍一團全軍被俘。冷漬被佔，此時赤軍南岸前鋒即抵鑪定橋矣。

鑪定橋爲四川通西康、西藏之橋樑，鑪定縣城即在河之北岸。此處之大渡河，河面雖較狹，但兩旁絕壁，水勢更急。鑪定橋爲鐵索橋，以十三根鐵鍊爲之。鐵鍊之兩端繫於河之兩岸，九根鐵鍊並排於下，四條則爲兩旁之扶手。下面並排之九根鐵鍊上橫鋪木板，再在橫鋪木板之上鋪長條直板。人馬即由

橋上過去。吾始聞鐵索橋時，以爲極難行走。但鑪定橋則非但可以過人，而且可以過馬。鑪定橋長有九丈，闊約一丈，十三根鐵鍊，係由中國十三省募捐而造成。

南岸赤軍因無劉軍抵抗，故先抵鑪定橋之南岸。此時北岸橋頭有劉軍築工扼守，且劉軍將橋上之木板抽去，只剩十三根鐵索，以阻赤軍過河。赤軍領袖林彬（第一軍團長）卽命該部最有戰鬥力及其產黨團員最多之一連，擔任衝鋒，並在河南岸之天主堂內收集許多堆積之木板。這一連人前面衝鋒者從九根鐵索上爬過去，後面的赤軍則在後鋪板子。當時衝鋒部隊勇往直前，沖至橋北岸之劉軍工事前，劉軍已無鬥志，卽呼願繳槍。赤軍當卽繳其槍並佔領其工事。鑪定城內劉軍退出時，沿街放火。目的在使赤軍之糧食及宿營兩感困難。但赤軍一過橋北，一面向劉軍追擊一部救火。不一刻赤軍由北岸冷濱攻來，把鑪定縣撤退之劉軍前後包圍而繳械。此時城內之火已救熄，但全城一半以上之房屋均被湘軍火焚矣。幸存一半，則大感赤軍救火之恩惠，而莫不痛罵「劉家兵」。劉文輝部隊在會理西昌鑪定等縣沿途放火，以阻赤軍，實質上非但不能阻赤軍前進，而且反遭民怨。

赤軍之全部渡過鑪定橋，確爲赤軍之莫大成功。如赤軍不能過橋，則安順場渡河至北岸之一師，勢將孤軍作戰，而南岸之赤軍主力則必走西康。西康則係遊牧區域，糧食宿營兩感困難。而國軍進剿則以雅安爲後方，追部剿隊雖感困難，但有後路接濟，赤軍則極難克服困難也。今赤軍渡河，自此川陝

甘青幾省均將爲赤軍活動之地區矣。

赤軍既佔鑪定縣後，如向雅州前進，則仍須走向東南至漢源，榮經而達雅州。但赤軍將至泥頭分縣時，知漢源川軍扼守高地，居高臨下以待赤軍。赤軍當即改變方向，折向東北至天全河邊，強攻天全河之守軍楊森部之六個旅。這一轉動，使赤軍部隊由大道轉入高山小路矣。我記得赤軍在化林坪分縣駐軍一晚，化林坪在四千五百米特之高山頂上，此時已陽歷六月初，但當晚氣候極寒，明晨出發時，則四望皆係雪山，蓋昨夜已下大雪矣。此時氣候驟寒，而赤軍兵士之棉衣早於雲南丟掉，但赤軍士兵雖在嚴寒之下，依舊人人面有喜色而毫無怨言。

赤軍大部抵水子田時，前鋒已擊退天然河岸之楊森之六旅，而佔領天全、蘆山兩城。我等由水子地出發，經一高山，幾無路，亦無石階。兩旁竹木叢生，遮蔽天空，山上泥水極深，兩腿全在泥溝中爬走。上下此山共只卅里，但自天明早起，我衛軍隊半夜才達山頂。既無人戶，當然找不到火把。所以大部貯立於泥溝中，待至天明後才下山來。赤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爲國共合作時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亦在山頂泥溝中站立一晚，次晨我見其雖仍神清氣爽，但已滿身污泥矣。下山至山麓，有居戶六七家，見赤軍至如自天而降，羣相驚奇。據云彼等世居於此山麓，雖聞祖先言此山有路可通，但荒山野地，野獸成羣，從無人敢走此小路。羣圍赤軍詢山路上之所遇。

赤軍雖經化林坪之降雪高山，雖經水子田之泥溝小道，但赤軍兵士人人面有喜色而未出怨言。此無他，因此時赤軍軍心一致堅信必可與川北赤軍徐向前部會合，而同時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國之四川發展不但有無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陝甘，可逕與日本部隊開戰，實現共黨幾年來抗日及收復失地之主張。故赤軍至天全時，部隊中有一歌曲，詞云：「（一）目前中心的任務，要打日本兵，收復華北東三省；保衛民族；（二）四川地方頂呱呱，什麼也不缺乏，敵人要想封鎖我，那才笑話；（三）工農紅軍鐵一般，渡過金沙江，兩大主力來會合，敵人發慌；（四）紅軍越打越有勁，團結像一人，我們偉大的務任，一定完成。」這一歌曲之詞句，即可見當時赤軍情緒矣。

赤軍佔領天全蘆山兩縣之後，曾出兵於飛仙關，離雅州只有二十餘里。此時赤軍的目的係在急求與川北之松潘茂縣北川等縣之徐向前赤軍會合。故避開川軍攔阻，向西走邛萊山脈，佔室興懋功，而與在理查之徐部會合。不久兩枝赤軍即已會合，而我於此時，即被賀誠遣往川西特委之獨立營爲衛生主任。不久即被川軍被冲散，幸遇舊同學蔣君而得安全返抵家鄉，當搭民權輪至上海時，全家在碼頭候我，別後重逢，誠慶更生。

我三年來在赤軍中之見聞所及，和此次隨赤軍西行入川，我覺到赤軍及共黨現在已經成爲中國國內的一個實力派，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如赤軍僅係跳樑小丑，那麼何需乎南京政府及各省當

局集中百萬軍隊，費時幾載，每年耗費國家財政之大部，並且何需蔣委員長親自在江西、貴州、雲南、四川督剿。很顯然的，赤軍已經是南京的一個主要對手，而且這個對手——赤軍——的實力，超過國內除雲南京軍而外的其他各個實力派。論全國赤軍數量，除南京軍而外，赤軍則超過任何中國南方北方各個實力派。若論赤軍之質量，則我雖不知其詳，但有一事可以反證者，國內過去及現在之實力派，如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閻錫山等，當年都佔有比赤軍優越之地區及優越之經濟條件，但一旦與南京政府作戰，則在短時期內，都被蔣軍所敗。而徐軍則相反，蔣委員長之剿共已歷數載，屢屢限期消滅，可是赤軍並未消滅，而且朱毛徐會合，活動愈烈。並且南京軍幾年來之剿共，却送了赤軍不少槍彈武器，赤軍所有武器之來源何在？既無海口可買，又無新式兵工廠，而連年作戰之消耗，以及赤軍武器之擴充，都係繳自國軍。即退一步言，至少是赤軍能夠在幾年來，並且直到現在還在與南京政府對峙，而不相上下。故我謂赤軍在數量上在實際上是中國的一個數一數二的實力派。

以我旁觀者之地位觀察赤軍部隊之所以堅固與有戰鬥力，是由於下面的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赤軍兵心團結，這確係事實。試想軍幾年來在這樣困難條件之下作戰，如果軍心不固，則早已失敗。而赤軍兵心之所以團結，一方面確因共黨在赤軍兵士中進行許多教育工作。赤軍兵士是自認抗日救國，解放工農是自己的責任，這就使赤軍士氣大振，同時共產黨黨員及共產青年團

員却於赤軍兵士中佔百分之四五十。而這些共產份子，曾受共黨之專門教育者，在赤兵軍士中確有極大的細胞作用。譬如，瑟軍之新兵，大半依靠赤軍各連中共產份子去教育他們。在赤軍行軍中發生困難時，（如糧食及宿營地缺乏等等）共產份子必先讓非共黨份子之赤軍士兵先吃先宿，作戰時共產份子則沖鋒在前，退却在後。共產份子在火線上受傷時，非但絲毫無懷喪呼號者，而且還大聲疾呼：『同志們！努力沖鋒！』『不要顧我而妨害戰鬥啊！』。而軍之富有戰鬥力者，亦由於共產份子的領導。赤軍在作戰之前夜，每連之共產份子必先召集會議，決定明日作戰時如連長指導員傷亡，誰為繼任，如再受傷，須再繼任，這樣準備了四五个。所以在作戰時，即使下級幹部受傷，仍有繼續不斷的候補者，也正因此，所以赤軍部隊極不易擊潰。

赤軍兵心之團結及士氣之旺，為國內任何軍隊所不及。

第二個原因，赤軍所以不被擊敗，而反日益擴大，由於民衆給赤軍以幫助。即以江西赤區而論，赤軍在此作戰已多年，人口，經濟已兩感缺乏，但能堅持如此之久長，正由於當地民衆之極力幫助赤軍。再如此次軍入川，沿途經過，不知幾許困難，但赤軍有居民為助，故並未餓飯，而且沿途民衆之加入赤軍者有幾萬。

有人說赤軍沿途強迫居民以從赤軍，實質上，但不事其無，而且不可能，試想，赤軍初至一地，只要

居民遠避，赤軍何處去找居民？實際上赤軍一至某地，當地居民除非所謂「土豪」外，均未逃走，而且爲赤軍帶路，當挑夫，沿途到處成羣的加入赤軍當兵。

以我觀之，赤軍之所以得民衆幫助，不由赤軍之威脅民衆，而由於赤軍兵士守紀律的，確不擾民，不動民間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常常「沒收」所謂「軍閥、官僚、劣紳」的財物，散給居民，民衆感覺赤軍對他有實際利益，所以趨之若狂。

第三個原因，赤軍經過這許多困難終於克服了困難。赤軍所處環境之困難，遠非南京軍可比，欲同赤軍何以能克服困難？我以爲赤軍中確有一些領袖，這些領袖，非但聰敏，且有才能。譬如朱德，毛澤東爲赤軍之首創者，在各省軍隊及南京軍之不斷圍攻與物質條件如此困難情形之下，對戰七八年，竟以少數赤軍而組成現在幾十萬赤軍，這確非易事。我覺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爲不可多得之天才。因爲沒有如此才幹者，不能做成這樣大的事業。此外如周恩來，張國濤，林祖涵等遠在國共合作時，已是當時國內政治上之要人。周恩來爲黃埔軍官學校的政治部主任，國內各方面軍隊之學生很多與周熟悉者。周恩來之勇敢，毅力之，辦事精神，黃埔學生，對之仍有好感。

赤軍中之上級軍官如彭德懷，劉伯承，林標，徐向前，董振堂，鄒昆，羅炳輝，陳毅等，大部係國共合作北伐時之國民革命軍軍官出身，富有作戰指揮的能力。率領赤軍作戰已多年，對國事及政治問題，均

對共黨有堅決之信心。劉伯承、彭德懷、羅炳輝及以後之二十六路軍之趙博生、董振堂輩均爲北伐前後之國民革命軍中之共黨黨員，舉行兵變而爲赤軍者。他們爲堅信共產主義的份子，在赤軍中領導赤軍與國軍對抗這七八年。

我在赤軍中對赤軍領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怎也許多是由於我在南京軍中服務時所感影響太壞而有所致之。大家知道在別的軍隊中當一團長，個人生活已極奢華，更無論師長軍長矣。但赤軍軍官則反是：赤軍軍官之日常生活，真是所謂與兵士同甘苦。上至總司令下至兵士，飯食一律平等。赤軍軍官所穿之衣服與兵士相同。故朱德有「伙伕頭」之稱。不知者不識誰爲軍長，誰爲師長。而且赤軍領袖與兵士特地接近，軍長師長常雜在兵士中打籃球、排球。軍官與兵士相親相愛。這種赤軍軍官與兵士同甘苦之日常生活，確爲國內其他軍隊之軍官所無。也正因爲赤軍領袖在日常生活上與兵士同甘苦，所以雖在全種困難環境之下，而赤軍兵士仍毫無怨言。赤軍領袖之品行，辦事精神，亦爲現世一般武人望塵莫及者。茲略舉一二事爲例：赤軍領下自朱唯一的目的，毛起從無一人有小老婆者，赤軍軍官既不賭博，又不抽大煙，赤軍軍官未聞有貪污，及尅扣軍需者。還有一事，非但爲國軍軍官所無，而且爲常人所不及者。如趙博生、董振堂二人均爲西北軍孫連仲部下之上級軍官。在江西甯都率二十六路軍二萬餘人兵變投入赤軍。趙董二人均原係共黨祕密黨員。他們一至赤

區，即各將十餘年各人所蓄七八千元，全數捐給共黨中央，由此可見赤軍領袖對於共產黨之信仰及犧牲個人之精神與現世之貪污犯法，假公濟私之軍官比擬，顯有天壤之別也。

故我謂赤軍之幾年苦戰與赤軍之所以逐漸發展，確由於赤軍中有天才之領袖，有能爲之幹部，赤軍中及共黨中之許多人材，確爲全國不可多得之人材。

我自離赤軍至家鄉以後，自思既參加了剿共的南京軍，後又參加了被圍剿的赤軍。我在兩方面參加了對戰七八年。詳思幾年對戰之結果，對內只有破壞，對外則坐視日本強吞東三省，而且目覩北方將全落他人之手。如果現在南京軍，赤軍以及全國軍隊只要槍口一致向外，則日本之欲圖我國，決非容易。政府諸公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爲言，但時至今日，事已至此，應該及時改變方針。從消極方面說：國府及蔣委員長嘗以全力剿共幾年，赤軍並未剿滅，反而使赤軍之朱毛徐會合。彼等現今所處之地區，遠非如江西時之易於包圍。國內軍人稍知局勢者，均知根本消滅赤軍已不可能。如與赤軍再戰幾年，則不問誰勝誰敗，日本將早已亡我全國矣！如國內自相殘殺而坐視強敵併吞全國，則黨國諸公，非但不能對國人，而且中華民族永劫不復。

我以爲當今局勢，如再繼續內戰與剿共，非但不能救國，而且適足以誤國。政府當局應該變改計劃，協同赤軍以共禦外侮。全國赤軍數量，赤軍之質量，有識者不能不承認是一個極大的力量。這一個

力量，過去在環境十分困難情形之下，與南京及各省軍隊百萬對戰幾年。如果在給以物質之補充，則赤軍之戰鬥力將更加增加，爲什麼不移這個能戰的赤軍去抵抗日本呢？若合我全國兵力一致對外，則不難收復失地。同時赤軍之領袖不乏極有才能者，現在正需集中全國人材以禦外侮，爲什麼不用赤軍之兵力與赤軍之人材，以爲國家對外之用呢？

如果有人以爲赤軍甘心內戰，不顧外患，這我覺不然。赤軍領袖如朱毛、周恩來、張國濤、林祖涵、徐特立等，均係極有政治頭腦的政治家。昔年北伐前，北伐時均爲國民黨中委及國民革命軍之上級軍官。且也不能不說有相當功績於北伐。徒以各方主義不同，以致分兵對抗。今在國家一髮千鈞之時，內讎則死對外則生的時候，只要兩方開誠佈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對外。而且赤軍領袖及共黨均有過聯合全國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張。我並聞友人傳說，共黨中央及蘇維埃政府主張合全國兵力組織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我以爲政府之對外政策之迅速改變，此其時矣。我輩小百姓是在不使中國之亡於日本，不作亡國奴而已。我總覺得無論如何，紅軍總是中國人，總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敵侵凌，而專打自己同胞，無疑是自殺政策。以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如果停止自殺，而共同殺敵，則不僅日本不足懼，我大中華民族亦將從此復興矣。

C調 入 川 歌 $\frac{4}{4}$

5 5 3 5 $\dot{1}$ $\dot{2}$ $\dot{1}$ $\dot{7}$ $\dot{1}$ | $\dot{2}$ 5 4 3— |
天 險 的 金 沙 江 大 渡 河

5 5 3 5 $\dot{1}$ $\dot{2}$ $\dot{1}$ $\dot{7}$ $\dot{1}$ | $\dot{2}$ 5 4 3— |
蠻 荒 的 大 涼 山 獼 猴 區

$\dot{3}$ $\dot{3}$ $\dot{2}$ $\dot{3}$ $\dot{5}$ $\dot{7}$ $\dot{1}$ | $\dot{1}$ $\dot{5}$ $\dot{3}$ $\dot{3}$ $\dot{2}$ $\dot{3}$ $\dot{5}$ $\dot{7}$ $\dot{1}$ |
我 工 農 紅 軍 真 正 是 無 堅 不 摧

5 6 7 $\dot{1}$ $\dot{2}$ $\dot{1}$ | $\dot{1}$ $\dot{1}$ $\dot{1}$ ——— 0 |
佔 領 了 靈 宣 橋 建 大 功

5 6 7 $\dot{1}$ $\dot{2}$ $\dot{3}$ | $\dot{3}$ $\dot{3}$ $\dot{2}$ $\dot{1}$ $\dot{7}$ $\dot{2}$ $\dot{5}$ |
我 們 創 造 了 中 國 歷 史 新 記 錄

5 6 7 $\dot{1}$ $\dot{2}$ $\dot{3}$ | $\dot{3}$ $\dot{3}$ $\dot{2}$ $\dot{1}$ $\dot{7}$ $\dot{2}$ $\dot{5}$ |
我 們 取 得 了 兩 大 主 力 的 匯 合

5 3 5 $\dot{1}$ $\dot{3}$ $\dot{2}$ $\dot{1}$ — | 5 3 5 $\dot{1}$ $\dot{2}$ $\dot{3}$ $\dot{1}$ — |
勇 敢 前 進 勇 敢 前 進

$\dot{1}$ $\dot{3}$ $\dot{2}$ $\dot{1}$ $\dot{7}$ $\dot{5}$ | $\dot{4}$ $\dot{3}$ $\dot{2}$ $\dot{2}$ $\dot{1}$ ——— |
衝 破 圍 攻 北 上 打 日 本

G 調 紅 軍 紀 律 歌 $\frac{4}{4}$

<u>5 1 5 1 6 5 6 5</u> <u>2 2 2 3 2 1 6 5</u> <u>6 6 6 1 7 6 5 3</u>
英 勇 的 紅 色 指 戰 員 們 百 倍 緊 張 起 來 呵 提 高 紅 軍 的
<u>1 3 2 3 2 1 6 5</u> <u>3 5 6 1 7 6 5 3</u> <u>6 6 1 6 5 6 6 1 6 5</u>
紀 律 保 障 戰 爭 的 勝 利 軍 紀 風 紀 戰 場 紀 律
<u>1 3 3 1 2 3 2 1 6 1</u> <u>5 5 3 3 1 1 6 5</u> <u>2 1 2 3 1 1 1</u>

平 時 好 壞 關 係 戰 時 勝 利 一 棒 一 件 一 時 一 刻 嚴 格 遵 守 莫 忘 說

2. 上 四 句 同 上 一 段

上 級 命 令 堅 執 行 ， 毫 不 動 搖 毫 不 猶 豫 ， 不 打 折 扣 ， 不 講 價 錢 ， 澈 底 執 行 要 努 力 。

3. 上 四 句 同 上 一 段 ：

遵 守 時 間 ， 動 作 迅 速 ， 整 齊 清 潔 ， 愛 護 武 器 ， 提 倡 禮 節 積 極 努 力 ， 鬆 放 怠 慢 要 反 對 。

渡 金 沙 江

<u>3 1 2 3 1 2 3 5 3</u> <u>3 1 2 3 5 3 2 1 2</u>	
金 沙 江 流 水 嚮 叮 噹	常 勝 的 紅 軍 來 渡 江
<u>2 6 1 2 6 1 2 2 2</u> <u>5 3 2 1 2 3 2 1 1 1</u>	
不 怕 它 水 深 河 流 急	更 不 怕 山 高 路 又 長
<u>6 1 2 2 2</u> <u>3 3 1</u> <u>2 2 1 2 3 6</u> <u>5 5</u>	
我 們 真 頑 強 戰 勝 了	困 難 克 服 一 切 疲 勞

1 1 1 6 1 2 2 2
下 決 心 我 們 要 渡 江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frac{2}{4}$

2 . 3 5 5 | 3 5 3 1 2 - | 6 . 2 6 2 | 2 3 2 6 1 - |

(一) 紅色 軍人 個個要牢記， 三大 紀律 八項的注意

2 2 3 1 | 2 1 2 3 6 0 | 5 . 1 6 5 | 2 1 2 3 2 - |

第一	不要	工農一針線	衆羣對我	擁護又喜歡
(二) 第二	服從	上級的命令	我們勝利	更能有保證
第三	沒收	一律要歸公	私打土豪	紀律不容
(三) 八項	注意	我們要作到	時時刻刻	切莫忘記了
第一	早起	門板要上好	免得羣衆	心裏多煩惱
(四) 第二	早起	都要捆禾草	室內室外	髒物要打掃
第三	言語	態度要和好	接近羣衆	工作最重要
(五) 第四	賣買	價格要公道	政治影響	遠近都傳高
第五	借人	傢具用過了	當面歸還	切莫遺失了
(六) 第六	若把	東西損壞了	按價賠償	立即要辦到
第七	到處	衛生要講好	選擇避處	挖下衛生壕
(七) 第八	對待	俘兵影響好	不許隨便	拿他半分毫
倘若	把這	規則破壞了	紅軍紀律	處罰決不饒
(八) 紅色	軍人	互相監視到	爭取羣衆	工作作得好
到處	工農	鬥爭起來了	全國勝利	很快就達到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西北印象記

著者 · · · 外國記者

出版者 · · · 陝西人民出版社

發行者 · · · 陝西人民出版社

代售處 各地圖書雜誌公司

全書一冊——實價一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039B

書新行發社版出民人西陝

再版增訂

毛澤東論中日戰爭

實價一角

王明著

抗日救國政策

實價一角

王明著

為獨立幸福的中國而鬥爭

即日出版

代售處·各地圖書雜誌公司

毛澤東所作紅軍長征詩一首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閒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懸岩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1.00